第五辑·序

人是从“略识之无”开始学习“阅读”的，但很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下来，还未必能真正“阅读”。有时虽然读得欢畅，自己以为“阅读”已经上路，可是同有些内行大家一比，却还矮了一截。此研究“阅读”的必要性之所在。至于西方现代理论家之看重“阅读”，认为它可以表呈潜意识，可以重估思想史，可借以理解人类主体的表意过程等等，自然立意更加高明，只是为文深奥费解，“阅读”此类理论已为我辈所不能，何况用这理论来指导“阅读”，只能表过不提。

看起来，中国的读书界对“阅读”问题的探讨兴趣逐步抬头，这可能是读书札记、学术小品之类畅销的一个原因。若然，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幸事。因为，要让正儿八经的出版业真正繁荣，除了管理层面的适当“松绑”，让出版者和读者有较多选择权，更重要的，是仰仗读者们“阅读”能力的提高，学会使用“选择权”。前面一个问题，已经嚷嚷多年，什么“读书无禁区”，什么“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等等，在前贤先人、高明主管的努力下，可谓已经大著成效。一年出书十来万种，尽管其中还是问题重重，但毕竟琳琅满目，一走进书店，同过去满壁凄凉不可相比。可是后一问题，似乎还得努力。如果书店的多数主顾们不容易被诓骗，大多读书的人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则何愁优良读物没人赏识，也不必担心低劣读物会占领市场了！

一念及此，又激起我们再编几册《书趣文丛》的勇气。因为环顾书市，虽然同类出版物不少，仍然有不少“阅读”大家“漏网”。而就中国近代“阅读”史来看，这些位大家是不能不

令人注意的。从大家名作中学习“阅读”，可能比研讨符号学、解构学之类阅读理论更容易措手，更易为人接受。时下同类的丛书已有十多种，有些更以“一网打尽”为职志。无论就事业就商业言，我辈大可就此退隐，另觅谋生或不谋生之途。但从补苴的角度说，似乎还有可为。因为凡事如欲“一网打尽”，必然有所子遗，从而可以让一些小编辑来作补苴罅漏的营生，各尽其能，却也相得。何况从这里所选十位大家的名作可以看出，以中国之大，“一网打尽”委实不易。

讲到这里，似乎还可交待一句：《书趣文丛》产生的原委之一，其实就在补苴罅漏。人们误传它是同类丛书的始作俑者。大误。在它之前，已有有关的著名丛书。只是一时之间，有关的丛书容纳不了如许选题，不能不压缩范围。一时斫下十来个题目，而编辑手边已经有稿，又正好在有的刊物中出现了读书有趣或无趣的讨论，于是只能“分流”。“分流”也者，其实也可叫“嫁祸”，因为所以斫下选题，只是为了害怕亏本（当时也确实亏不起）。将不肖的“赔钱货”远嫁关外，配流他乡，隔不多时，流外之物居然成材，而且蒙名流大家赏识，得以持续出版至第五辑，实为始料未及。然而归根结柢，还得感念关内关外的诸多公婆，耐心帮助抚育。编撰中国出版史的衮衮诸公，大可以此事为中国出版“全国一盘棋”以至兴旺发达的一个注脚。一笑！

脉望

1997年10月

目录

- 7 自序
- 9 **第一辑**
- 10 明史杂谈（五篇）
- 21 批评家的责任及其他
- 25 谈《文心雕龙创作论》
- 30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
- 38 徐铸成的“报海”回忆录
- 47 “准备检讨”与“下不为例”
- 50 “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
- 58 思考、探索与追求
- 63 编辑的地位
- 65 “双百”声中话梁老
- 67 改革者与冒险家
- 69 好事的另一面
- 71 运用小说研究历史
- 82 “样板戏”不可忘
- 85 不要人为地制造神秘感
- 86 开卷有益
- 88 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
- 90 奥斯卡奖与诺贝尔奖
- 92 买鸭变鹅记
- 94 制止名胜古迹庸俗化
- 96 自觉与强制

- 99 治标不如治本
101 报纸的独立见解
104 再谈报纸的独立见解
107 忌讳何必太多？
110 人大归来答客问
113 出书难之我见
116 说闲书
119 服务质量还须上层楼
121 呼唤一个协会
123 我看上海报纸的改革
125 也该听听中国人民的意见
127 大家都来关心这场官司
130 儒学古今谈
136 敢于讲话，讲真话
137 称谓的变化
140 妇女的命运
143 “父母官”小议
146 聊天乃人生一乐
149 中法战争的主战派
152 京城“打的”
154 另一种“价值”
157 赞神戸市民
158 请给书店一席之地
160 “国骂”及其他
162 酒缘
164 酒缘续篇

- 166 三十年代书籍广告
171 漫谈书刊广告
176 辞书分卷出版呈疑
178 “请多关照”
180 请莫倒退
182 格律很重要
185 成都觅书记
189 闲话《茶余客话》
191 **第二辑**
192 《中山狼传》的公案
200 小说戏曲人物谈（二十七篇）
235 《封神演义》漫话
246 稗边闲评（四篇）
256 袁宗道论
263 散文大家袁宏道
283 袁中道论
296 身留异域，神归中土
300 爱国诗话（四篇）
311 谈张爱玲注译《海上花》
317 **第三辑**
318 十年噩梦今似醒
337 “文革”的一幕
343 “牛棚”纪事
350 “千夫指”之谜
353 “文革”特准出版两部书
359 记黄嘉音并谈《西风》

- 362 颜文梁先生年谱
- 410 为颜文梁先生写年谱
- 419 一首诗引起的回想
- 421 李平心之死
- 426 老报人徐铸成
- 434 沧桑饱经徵交谊
- 440 忆陆澹安先生

自序

这本杂著，收集自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五年这十多年间我所写的各类文章若干篇，大致分为三辑：第一辑是杂文或近于杂文者，还有一小部分属于政论或时评性质的；第二辑是一些读书札记、书评和为几本著作写的序跋；第三辑是怀念旧友和回忆往事（主要关于“文革”）。大都在报刊发表过，有三数篇是第一次发表。我的本行是出版社编辑，一做就是几十年。偶尔为文，也不多。编辑这个行当，“为他人做嫁衣裳”，社会舆论每为之不平，我却至今不悔，甘之如饴。照我的看法，编辑还只能说是“为他人补衣裳”，做点从文字到论点的修修补补工作。但经过自己手的修补，出来一件崭新漂亮的衣裳——书籍，是他人的，却像自己的一样，这喜悦之情也只有编辑体会得到。还有一说，编辑不能成家，只能叫“杂家”，这也含有一点轻视之意，“打杂”的专家。我则认为“杂家”不易做，他是审定判断专家或非专家著作的一家，他是“衡文公”，衡天下人文章的，什么知识都要懂一点，非“杂”不可，而且立足点更要高。

编辑做得长了，文章看得多了，会产生一种“职业病”，叫眼高手低。向来有句笑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笑话不能当真，但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关于老婆是另一话题，这里不谈；关于文章，正好相反，我很有自知之明，知道是人家的好。我在一篇杂文中写过这样的话：“我有一个习惯，每当看到一篇好文章，就急着想要告诉朋友们，共同享受阅读的乐趣。”这里说的好文章，就是我自愧写不出来的文章。什么叫好文章，各有标准不同。我心目中的好文章，应该是说出我平时

想说而未能说出的，或可能说出却说不那么好，或想说而不能说和不敢说的。凡合乎上述标准者，我都认为是好文章。七十年代末的一两年中，《人民日报》上像这类的好文章很多，特别是几篇以“本报评论员”名义所写关于拨乱反正的文章，以及每周一次的“读者来信”专版所反映的群众呼声，说出了人们久郁心头、急欲一吐的心里话，使人看了激动、兴奋并有所思，这都是我久久不能忘怀的好文章。仅举一个例子，有篇评论员文章写道：“民主不能靠恩赐，应由自己争取。”（大意）这话由《人民日报》来讲，刚经历过“文革”的人谁不受感动？记得当时有报道，连主管过《人民日报》的胡乔木也说：“今天的《人民日报》才真正是人民的报纸。”（大意）可惜，好文章不多见，不常有。

古人韩愈说：“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这就是有名的“不平则鸣”论。据韩愈解释，这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和其声，鸣国家之盛”，为太平盛世歌功颂德；另一是“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自鸣其不幸”，对社会现实有所揭露针砭。总起来说，写文章应有感而发，这自然也包含上述两个内容。我虽追慕好文章而不逮，但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正是有感而发。感有深浅广狭，但有感则一。京戏《失空斩》里诸葛亮有句唱词：“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他观的只是山景，但世事皆景，世人皆景，花花世界何处非景，是观之不尽的。因观景而生感，因感而发为文章，这便是有感之文了。这次编集子要题个书名，想到“观景”二字，即以名所居小楼。楼小景多，内容既杂，故又缀以“杂著”之名。

丙子元宵 于观景楼

书趣文丛……⑤

第一辑

明史杂谈

宋濂的遭遇

宋濂在明朝，称为“开国文臣之首”，学问渊博，文才出众，朝廷重要文告，大都出于他的手笔。他的文名，远播国外。外国使者来中国，都要问候宋先生平安。高丽、安南、日本的使臣，一到中国，就要购求他的文集。日本国内刻印他的《潜溪集》。他所写赠送高丽、安南使臣和为日本高僧写的文章，现都保存在他的文集里。他担任《元史》总裁，这部历史虽然成于众手，编写仓促，存在很多缺点，但仍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现存的《宋文宪公全集》，内容广博，文笔雄健，前人评为“辞韵沈郁，体裁严简”，是明人文集中的重要著作之一。他自少至老，每日手不释书，于学无所不通，不愧是明朝有开创性的大学者、大作家。

宋濂在学术上获得这样高的成就，是经过不断刻苦学习过程的。他曾自述求学从师的艰苦经历：“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当余之从师也，负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他又以自己的学习体会，告诫青年学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这就是说，攀登学术的高峰，并

无捷径，只有依靠为学者自己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这些话都见于他的《送东阳马生序》，是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明太祖很器重宋濂的才学，请他做皇太子的老师，并教几个亲王读书。宋濂为人，诚恳谨慎。太祖派人侦察他的行动。一次他宴客，第二天太祖问他，昨天吃酒吗？客人是谁？吃的什么菜？他一一从实回答。太祖笑道：“不错，你不欺骗我。”太祖因此信任他。当然，这也说明，太祖开头对他还是不大放心的，不然就不会派密探去监视他了。

因为宋濂受到皇帝的恩遇，他的儿子和孙子也都做了官。次子宋璠任中书舍人，长孙宋慎任仪礼序班，都是内廷亲近之职。明太祖很关心这两个年轻人，常常教导他们。他对宋濂说：“你为我教导太子、诸王，我也教导你的子孙。”洪武十年，宋濂六十八岁，告老还乡。太祖赠他礼物，祝他长命百岁。此后宋濂每年进京朝见，太祖慰问备至。君臣之间的关系可谓亲厚了。

洪武十三年，发生了丞相胡惟庸谋反案，宋慎也牵连进去了。这是叛逆大罪，父祖连坐，宋濂被逮捕解京。太祖并没有念旧情宽恕他，要杀他的头。无人敢营救。马皇后出来讲话了。这位皇后，是历史上少有的贤后，品德高尚，富有同情心，做了许多好事，历史家该给她大书特书。她劝谏明太祖道：“老百姓家为子弟请先生，尚且待之以礼，善始善终，何况天子家的先生呢？宋濂居家，不会知道孙儿的事情。”这话太祖听不进。她陪太祖吃饭，不沾酒肉。太祖问她缘故。她答道：“宋先生快死了，我为宋先生做福事呵！”太祖默然不语，不知是否有所动心，但是放下了筷子。明天下令赦免宋濂，放逐到茂州（今四川茂县）居住。路上，宋濂就死了。宋璠、宋慎仍都处死。宋濂所受优待，就是免掉杀头。

后人在史书上，查不出宋慎与胡惟庸通谋勾结的事迹材料，因而对这个案件的真实性，不免怀疑。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宋濂对国家的贡献，他的忠诚和正直，明太祖是最为了解的，出事的前一年，还在褒奖他，何以一下子要把他置之死地呢？这事说来奇怪，其实一点不怪，独裁专制君主对人的好恶，臣子们的生死安危，不是依据国法，也不是按照正常的情理，而是由君主个人一时的利害喜怒来决定的。宋濂的遭遇，就是一例。

刘伯温的悲剧

明朝有几个人物，由于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学或艺术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加上独立特行的品格，而成为民间妇孺皆知、广泛传诵的传奇式人物，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如刘伯温和徐文长，就是这样的人。这里且不谈徐文长，只说刘伯温。

从东汉、三国出了诸葛亮——上识天文，下知地理，料事如神——这样一个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智慧化身，以后每个朝代，便都有一个由民间传说塑造而成的这样人物出现。在明朝便是刘伯温。一部《英烈传》小说，把他写得神乎其神，而据说是他作的《推背图》（实是托名伪作），一直到解放前，还被一些江湖术士当作预言式的天书，拿来骗人。

然而，翻翻后人所编有几十万字之多的《诚意伯文集》，再看看《明史》和其他有关他的传记材料，历史上真实的刘伯温，并不神秘。他确实有才，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为明太祖出谋划策，完成统一事业；他精通天文历算，是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为明朝编定了《一统历》。明朝的创建，他立有大功。但是，他却常被人诬陷，有几次明太祖对他很不满意，差点要办

他的罪，他在这方面丝毫未能未卜先知，传说中称道他所擅长的“神机妙算”，对他自己并没有帮上多大的忙。

有一年天旱，刘伯温上奏章，为一些死亡兵士的寡妇、士卒和工匠请命。明太祖一心求雨，准了他的奏章。过了十天，一滴雨也不见，太祖发怒。刘伯温吓得辞官回乡。又一次，有官吏秉承丞相和刑部尚书的意旨，诬告刘伯温居乡图谋有王气的地做坟墓，这是叛逆的大罪。太祖听了，削去他的俸禄，他赶忙入朝谢罪。这都说明他在朝廷的处境很困难，常有不测之祸。

朝廷上当权的大官，大都不喜欢他。记载他生平事迹的《行状》、《神道碑》都说他“性刚嫉恶，与物多忤”，大概是指他处事严正，好说真话、直话，性子又急，因而得罪了許多人。明太祖想选一个宰相，曾举自己喜爱的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人，问他这三个人有没有这个才能。刘伯温则认为对宰相的要求，必须“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者也”，就是说要心平如水，大公无私，这三人都够不上这个标准。太祖说，那么你来做宰相吧。他说，他也不行，他“嫉恶太甚，不耐烦剧”。

关于“嫉恶太甚”这一点，他还写进了文章。《古文观止》所选的《卖柑者言》，是他很为人们传诵的一篇名作，就是痛骂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美酒），而饫肥鲜”的欺世盗名者的。用这篇文章中的话来说，他称颂的是那些“忿世嫉邪”的人。嫉恶太甚，与忿世嫉邪是一个意思，这当然要招来某些人对他的怨恨。

有这样性格的人，太不懂得圆通做人之道了，是不能久容于朝的，所以刘伯温最后还是受到了暗算，送了性命。当他发觉吃了丞相胡惟庸所荐医生的两贴药，有中毒现象，便立即报

告太祖。据《行状》的记载，“上（太祖）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神道碑》的记载是，“公遽白上，而疾遂益笃”（《明史》本传却把这几句重要的话遗漏了）。看来明太祖是可以保护他，而没有采取措施，以致中了坏人的奸计。过了十多年，刘伯温的次子仲璟朝见太祖，太祖对他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他吃他们蛊了。这起反臣，都吃我废了，坟墓发掘了。那胡家吃我杀得光光的了。”（见《刘仲璟遇恩录》）这是按照太祖口语如实记录的，是第一手的资料。应该指出，太祖不是为了刘伯温而杀掉这些人的；但是这条史料清楚说明，刘伯温在世时，因为刚正不阿，所以孤立无援，终于受害。他虽然享受大名，受到后人敬仰，终究还是一个悲剧人物。

方孝孺的“迂”

方孝孺因为不肯为永乐皇帝起草登位诏书，被杀了头，历来称为“迂夫子”。《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杜慎卿道：“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门、雉门怎么？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的。”杜慎卿在书中是一个风流潇洒、挥金如土的贵公子，可是当唱戏的鲍廷玺向他借钱求援时，他却指使鲍去找正在变卖田产过日的堂兄杜少卿，自己推得干干净净，真是精明极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是个正直的人，决不会把自己对方孝孺的正面看法，借这样一个人物的口发表出来，所以这不是吴敬梓的真实意见。但是杜慎卿说的这段话，却也代表一些讲“实用”的人的主张，在他们看来，方孝孺不懂应天顺人、见风使舵，迂得可厌，确是该杀的。

方孝孺的迂，在于怎么讲，就想要怎么做。儒家提倡的“君臣大义”，一般人只是平时口上讲讲罢了，他却在紧要关头当真实行。这在杜慎卿们眼中，就不仅是迂不可及，而且是愚不可及了。

明初有个案件叫“空印案”，死了很多人，原来是各省府征收钱谷，离中央政府远，先用了印，然后填报数字，习以为例，中央政府是认可了的。但是，忽然一下翻了脸，不认账了，这便成了很大的罪名。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当时是知府，正是这样执行的，就杀了头。方孝孺对这个案件，没有表示过意见，但他对明初的政治，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并不隐讳，在他的文集《逊志斋集》里就有文章谈这个问题，对明初政治有过一个评价：“当是时，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发出法度，悖礼义，朝按而暮罪之。是时守职之官，非精强敏给，有兼人之材，应世之智者，鲜能终三年之久。”（见《送祝彦芳致仕还家序》）这话很明白，指的是明初法网之密。他又说过这样的话：“以诈术啗人，而责人以正，虽战国之世，纵横权数之徒所不为！”（见《读汲冢周书》）这是很有点愤慨的味道了，然而也正点出了明朝统治者的统治术。

从这些言论来看，方孝孺不仅不迂，而且很有见识。但他恪守“君臣大义”，对父亲的冤死，固然很感悲痛（见他为方克勤写的《行状》），然而没有发过一句怨言。

明太祖早就看出方孝孺的才能。明太祖善于用人，他说方孝孺年轻，需要历练，“当老其才”，所以不立即重用。后来有人举荐，明太祖仍说：“今非用孝孺时”。方孝孺做汉中府教授，被蜀王世子聘为师傅，讲的都是儒家一套道理，蜀王把他的书

室题作“正学”，所以后人又叫他“方正学”。一直到惠帝即位，召他做学士，他讲的也还是这一套道理。

燕王起兵，打进京城，夺了惠帝的皇位，照说他也是太祖的儿子，做做皇帝不是不可。但是方孝孺援引“君臣大义”，坚说这是篡位，必须反对，至死不屈，终于杀了头，株连亲属，包括老师，据说夷了十族，这也是古今所罕有的。《明史》传赞，说他“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确实如此，并非过誉。

要说迂，方孝孺真是迂到头了。但是他言行一致，不惜身殉，成了历史上出名的“硬骨头”，所以至今还有人纪念他。杜慎卿之流，在承平时，说说笑笑，甚或慷慨陈词，发点新奇的议论，耸人耳目，是很当行的；一旦有事，变革之际，恐怕就要露出原形，先保身家性命，不见得比方孝孺高明了。

从《游龙戏凤》谈起

《游龙戏凤》是一出京戏，因内容涉及风情，解放后早不演了。这戏讲明朝正德皇帝出游山西，乔装军官，在一家酒店见到女店家李凤姐，青年美貌，调戏了一番，最后亮出皇帝身份，将凤姐纳为贵妃。正德皇帝即明武宗，是明朝出名的一个昏君。明朝的昏君不止一个，打少点算，也有七八个之多。但别的昏君，大都深居内宫，不愿露面，比如嘉靖、万历两个皇帝，各创造了三四十年不上朝、不见朝臣的记录，连宰相也难得召见一次。正德与他们不同，他不耐烦住在皇宫之内，只爱去外地玩乐。当时的边疆重镇宣化、大同，就是他常去游幸的地方，叫作“家里”；而且每到一地，必要找美女作乐。《游龙

戏凤》这点是讲对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事实。《游龙戏凤》之所以是坏戏，是因为它把正德这个荒淫无耻的渔色之徒，演成了风流多情的正角，并且用大量风情戏的表演手法，掩盖了这个昏君玩弄女性的丑恶实质。可见历史剧虽然不必照搬历史，但也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坏人就是坏人，不应随意美化。

正德除了上面所说喜好游乐的特点外，还有一个与别的昏君不同之处，就是他不仅信任重用太监，作为心腹鹰犬，而且信任重用准太监。什么是准太监呢？这是本文新创的一个名称，指虽不是太监，也无太监之名，但所作所为与太监无异，甚或过之的那种人。《明史》把他们归入《佞幸传》，并不完全确切，因为准太监固然必是佞幸，但佞幸不会即是准太监这类人。准太监同太监一样，是君主的贴身奴才，熟悉君主的性情癖好，善窥人意，渗透到君主的私生活中。

正德宠爱的准太监有好几个，权势最为煊赫的是钱宁和江彬。钱宁是太监钱能的家奴，通过太监刘瑾，为正德喜爱。他引导正德去宫外游荡，又在禁内建设一所密室，全用美女陪侍，名叫“豹房”。正德在豹房淫乐酣饮，不分昼夜，醉了就枕着钱宁而睡。百官上朝，日中还不知皇帝在哪里，但是看到钱宁出来，就知道皇帝要驾出了。钱宁执掌锦衣卫，管诏狱，抓人关人的大权，全在他手里。

江彬比钱宁更狡猾阴狠，他出身边将，貌似忠顺，博得正德欢心，统领禁军。他与钱宁争宠，引导正德北去宣化、大同、榆林、绥德、太原等地，南至扬州、南京等地，据《明史》所载，正德在近三年的南北大游行中，“数夜入人家，索妇女”，“掠良家女数十车，日载以随”，“遍刷处女、寡妇”，什么至尊天子，简直就是十足的淫棍。但是因为他是皇帝，人们奈何他

不得，只是百姓苦了。而这一切恶行，都是江彬一手经办的。

太监和准太监，本身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力。他们在一个时期内手操生杀大权，不可一世，这权力是皇帝给的。皇帝死了，他们的权力也完了。

钱宁在正德死前，已受江彬排挤失宠，监押抄家。正德死后，江彬暂时还领禁军，掌握兵权，但很快就被抓起处决了。抄他家，单黄金就有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其他珍宝数不清。准太监作恶多端，下场如此，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明史》专立有《阉党传》，揭露趋附权监门下无耻朝臣的丑恶行径，这在《二十四史》中独一无二，说明修史者是有一定史识的，同时也说明明朝太监势力之盛，连他们的党羽爪牙也多得要为之立传不可。《明史·阉党传》中人，就是从正德朝开始记载的。到天启朝，宦官之祸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凡读历史的无不知魏忠贤这个历史上著名权监的名字，多少忠臣义士为之丧命，崇祯时定魏忠贤“逆案”，仅阉党就有二百数十人。明朝之亡，决不是偶然的。

廷杖 廉耻 气节

廷杖、廉耻、气节，这三个名词，看起来它们之间毫无关系，却形成了明朝一代的风气。三者之中，廷杖作用最大，引起了后面两个问题。

我国君主社会的每个朝代，都有自己一套刑法，犯了罪的被剥去衣裳，鞭打一顿，叫鞭刑或笞刑，这在朝廷刑法中是很普通的。但是廷杖，就是臣子触犯了皇帝，在朝廷上当众扒掉裤子，打一顿屁股，轻则血肉横飞，重则毙于杖下，这却是明

朝独特的创造。在它之前那么多的专制王朝，没有这个刑法；在它之后的清朝，也没有这个刑法。

《明史·刑法志》的初稿，是清初学者姜宸英撰写的。他虽然是一个王朝正统的史学家，对明朝的这种独创的刑法却很不满意，据实而书，受到清朝另一个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的赞许，认为“淋漓痛切，以为后王殷鉴”（《鮚埼亭集·姜先生墓表》）。说明这对专制时代的史学家来说，像姜宸英这样正直的学者，是极难能可贵的。据《刑法志》所载，明初，有个永嘉侯朱亮祖，恃功骄横，明太祖不喜欢他，父子一齐鞭死。又有工部尚书薛祥，犯了罪（什么罪，连《明史》也说不清楚），也被杖死。这就是廷杖之刑的开始，原来也并没有载入明朝王法之中，是由皇帝本人一时喜怒决定的。好处是可以立即执行，用不着由什么三法司来审定，既然祖宗创了例，后代子孙照此执行，就有了根据。正统年间，宦官王振擅权，虽然皇帝信任他，他却怕大臣夺他的权，谁若冒犯了他，不管尚书、侍郎、祭酒，用皇帝的名义，当廷杖责。从这以后，廷杖就成了明朝皇帝处分臣下的常事。宪宗是个自作聪明的皇帝，他任用太监汪直，听他的诬陷，一次就廷杖二十人。南京有几个官员联名的章疏中有个错字，宪宗摘了出来，很得意，立即叫锦衣卫去南京，在午门前每人打二十记屁股，并由南京守备太监监刑。武宗是个荒淫的皇帝，各处游荡，游了北方，还要游江南，臣子们劝他不要去，他一次就廷杖一百四十六人，死了十一人。到了世宗，他是藩王入继登位的，一心要把自己亲生父亲加上皇帝称号，受到一些臣子的反对，叫作“大礼之争”；他一发火，就廷杖了一百三十四人，死了十六人。他在位四十多年，杖杀的朝士，超过前代一倍多。他还有个折辱臣子的办法：打完了屁

股，立即命令上班办事，让这些臣子含羞带愧，在同僚面前抬不起头来。世宗之后有神宗，也是个专横昏庸的皇帝，廷杖不断，一次也有上百的。

明朝皇帝这样滥施刑罚，折辱臣下，所造成的结果是怎样呢？嘉靖年间，有个詹事霍韬给皇帝上了一通奏章，写道：“昔汉光武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其后忠义之徒争死效节。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罪，废之诛之可也；乃使官校众执之，脱冠裳，就桎梏，朝列清班，暮幽狂狱，刚心壮气，销折殆尽。及覆案非罪，即冠带之朝班。武夫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吾系执之。’小人无所忌惮，君子遂致易行。此豪杰所以兴山林之思，而变故罕仗节之士也。”

霍韬的奏章，反映了明朝刑法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惜予人以辱，使廉耻扫地以尽，并且提出了气节的问题。没有疑问，这通奏章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明朝统治者的利益着想，因为君主社会称道的所谓气节，无非是维护王朝正统和对皇帝个人的效忠，所以稍有远见和稍有头脑的统治者是无不加以提倡和表彰的。这对他们有利。但是，明朝的皇帝都是些蠢货，他们会的一顿棍棒，打得痛快，又显威风，把臣子们的颜面、人格和仅有的一点感恩之情全打光了。人无廉耻，还讲什么气节呢？霍韬奏章说得够沉痛，忧心忡忡，为明朝的存亡敲了警钟。但是昏庸的明朝皇帝，怎听得进臣子的忠告，他们只当作耳边风。

一直到明亡，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在农民起义军雷霆万钧般威力的扫荡下，临自尽前，还说出这样无知的话：“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把这个腐朽透顶的明王朝的覆灭命运全诿过于臣下，真是自以为圣明，至死不悟了。

一九七八年

批评家的责任及其他

—

文艺批评家的责任。批评家说：这个问题早解决了。

如果说，批评家的责任只在于适应某一个时期的需要，高则作道德的说教，次则不过成为传声的图解，那么，批评家的责任这个问题不仅已经解决，而且批评家早已是克尽厥职了。

但是，由这样的责任产生出来的批评，显然不能冒称为批评。

由此，还产生另一个问题，即批评与作品的关系。

法朗士有句名言：“批评是灵魂的探险。”三十年代，上海《大公报》的一个副刊《文艺》（沈从文、萧乾主编）曾经就这句话，展开过一场关于探讨批评和作品关系的讨论。法朗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看我们今天也还不妨认真思索一下。能不能这样说：批评应该是，而且只能是一次深入作品或作家心灵的探险。一个卓越的、懂得创作甘苦的批评家无疑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有能力触及作家心灵的奥秘，但是仅此而已；他不应该离开对作品的具体分析而要求作家按照批评家的意图做这做那，更不要说指挥了。批评家的探险，有时可能成功，有时则可能完全失败，甚至贻笑大方。作品的价值，不取决于批评家的褒贬好恶。

夸大了批评家的责任，颠倒了批评与作品的关系，文学就萎缩消亡了。

二

真实性。这是文学的生命力。

文学的真实来源于生活的真实，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文学的真实不能等同于生活的真实，这又是另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外古今的优秀文学作品，无不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它们所描写的人和事，都是根据生活的形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从生活源泉中汲取的人和事，都是些个别的、特殊的、罕见的，甚至是怪异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都是作家根据生活“创作”出来的。

生活的真实中不存在或不完全一模一样存在这样的人和事，但是世世代代的读者却认为这是真实的，愈是特殊的愈带有普遍性，有的还被称之为“生活的教科书”。

有谁在现实的生活中见过哈姆雷特、陶连·格雷、约翰·克利斯朵夫、贾宝玉、阿Q等等和他们所经历的故事呢？没有。但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故事都是人类社会中可能存在过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的经历。这就是文学的真实。

不真实。这是我们的批评家用以指责他所不喜欢的作品的一根标尺，而标尺的标码则是依照生活的真实（即“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和事”）来刻制的。拿这根标尺去衡量作品，当然就不能有合格的作品了。可悲的是，这里暴露了对于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这一规律的无知。

三

现象和本质。

批评家要求作家描写本质。

作家所描写的永远只是现象。可是由于他所描写的现象是如此强烈和集中，它的确反映出了事物的本质。而要做到这一点，即作家所描写的现象能使读者得到强烈、集中的印象，因而透过现象看到某一事物的本质，作家的理解力与艺术才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家描写人生的坎坷，命运的播迁，男女的爱情，欺诈凌辱，愤怒反抗，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哪一件不是通过现象来描写的？但是，这不等于说作家的描写就无法反映本质。杰出的作家通常总是能够抓住他所描写事物的本质，通过多样的艺术形式加以反映。

当然，不同时代和社会的作家在描写这些历代不断重复发生的人和事的时候，必然要同时描写产生这些人和事所处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环境，否则他就是在因袭或模仿前人的作品，但是这同批评家所提出的某种公式化的写时代和社会本质的要求，是绝然不同的两回事。

四

毫无疑问，批评家的责任应该是促进作家的蓬勃成长和作品的繁荣兴旺。

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今天，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了，其势磅礴，排山倒海。作家们冲破以往左的思潮的重重束缚，文学事业达到了三

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盛况。一个伟大的收获业已在望。我们的批评家怎样来响应时代的呼唤呢？作家，还有广大的读者，寄以殷切的期望。

一九七九年

谈《文心雕龙创作论》

一九六三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神思篇虚静说柬释》的读书札记。文章短短二三千字，却对历来注家关于《文心雕龙·神思篇》中“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这个命题所作的阐释，提出了完全崭新的见解。当时学术界在经过一段短暂的活跃后，重又袭来了一阵高过一阵的大合唱式浪潮，这棵小小的“野草闲花”，自然就淹没在这股愈来愈猛浪潮中了。但在一部分对文学理论感兴趣的读者中，是受到了一定的注意的。作者的名字是王元化，熟悉的人知道，这原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理论工作者。

风云幻变，忽忽十五年过去了。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上，刊出了同一作者的《释〈文心雕龙·比兴篇〉拟容取心说》。读者中的有心人高兴地看到，作者别来无恙，而且仍在认真地致力于《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宝库的研究。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独立见解，很快引起了辩难驳论的商讨，作者也发表了坚持自己论点的文章，这是学术繁荣的大好景象。而在前几年，批评非讨伐即判决，是不容许申辩和讨论的。正是经历了漫长寒冷的隆冬，方才迎来了名副其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深埋土中的野草闲花，在春风的吹拂下，终于破土出见天日了。现在，包括这相隔十五年之久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在内的一部《文心雕龙》研究新著——《文心雕龙创作论》，已经由作者王元化写定，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本新著，分为上下二篇。上篇包括三篇论文，分别讨论了《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灭惑论》与

刘勰的前后期思想，以及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下篇包括正文八篇、附录二十一篇，分别探讨了《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八个问题：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艺术想象、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最后是关于创作的直接性问题。

凡对古代文论稍有涉猎的都知道，《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含义丰富，文字凝炼，对它的研究始终面临着两个比较复杂困难的问题：一个是名词用语含义的诠释，另一个是全书所表述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的原有意蕴的阐发。这两个问题密切联系，缺一不可。

从第一个问题来讲，历来的研究者在诠释、诂解书中的概念、名词和术语等方面，曾经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国古代论著用语缺乏科学性，同语异义的专门名词更是屡见不鲜，因此不免常有曲解之处，造成后来者的迷误。认真的研究者一方面固然应该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又决不能无选择地因循（甚或剿袭）旧说，人云亦云。例如一个“道”字，这是《文心雕龙》中至关重要的专用名词，《序志篇》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故《文心雕龙》开宗第一篇就是《原道篇》。但是，刘勰另外两篇著作《灭惑论》与《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也都反复说到“道”。《灭惑论》且有这样一段话：“至道宗极，理归乎一。……梵言菩提，汉语曰道。”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原道篇》和《灭惑论》都是阐明同一个“道”的概念，并进而判定两者可以互训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并不仅是训诂学所能解决，而是首先必须考察《灭惑论》与《文心雕龙》虽属同一作者，但性质各异，前者

是“一篇属于佛教教义的论文”，而“佛学著作，名相纷繁，前人早称难读，原因在于它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特殊用语”（见本书二十三页）。《灭惑论》中的“道”，是一个经过汉化的专门名词，即指佛法，跟《文心雕龙》中的“道”（儒家的道）是内容含义根本不同的概念。只有区别二者的不同，方能正确理解《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体系。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上篇的《〈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一文中，就有极为精辟的论证。

还可再举关于“物”字的诠释，来说明名词用语诠释的重要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一书，详征博引，是同类著作中的巨制，至今很少有人敢逾其规范。范释《神思篇》“神与物游”句，取黄侃之说，作“外境”解，但在释下文“物沿耳目”句时，却作截然不同的“事理”解，这就容易令人产生种种误会。本书作者认为，“物”字若作“事理”解，从训诂说是失去了本义，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说，“只是感性事物（外境或自然）才能够被感觉器官（耳目）所摄取；至于‘事理’则属抽象思维功能方面，决不能由感官直接来捕捉。……说抽象的事理可以通过作为感官的耳目直接感觉到，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见本书七十八页）。如此，《神思篇》中的物字之训，前后并无歧义，即王国维《释物篇》所考“杂色牛”的训释，引申为“万有不齐之庶物”，这才是《文心雕龙》所论心物交融说的“物”字的正确含义。本书作者在《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的附录《心物交融说“物”字解》一文中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有相当说服力的。

再从第二个问题——阐发《文心雕龙》表述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的真实意蕴——来讲，这更是《文心雕龙》研究中的

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既要敢于突破旧说，又要避免用今天现有的文艺理论去任意比附，以致生搬硬套，乱贴标签。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两件工作：一是力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弄清原有意蕴的本来面目，“并从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理论中去追源溯流，进行历史的比较和考辨，探其渊源，明其脉络”（见本书六十八页）。这就是收入本书的《创作论八说释义》，作者称之为“正文”。另一件工作是，“除了把《文心雕龙》创作论去和我国传统文论进行比较和考辨外，还需要把它去和后来更发展了的文艺理论进行比较和考辨”（见本书六十九页），这种比较和考辨同时也包括了外国文艺理论在内。这就是收入本书分别放在正文之后的附录，这是仿照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体例，使作者的意见从多方面得到发挥。附录也是全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看来，《创作论八说释义》及其附录，是本书最有创见的部分，作者有意识地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内引进新的研究方法，这几乎在每篇正文和附录中都表现出来。而正文和附录，又各有侧重：正文主要在于清理，附录则在辨清理论的实质意蕴之后，作进一步的探讨，并进行一定的批判。

这里试以本书《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一组文章为例，来说明作者如何进行清理和批判。这组文章探讨的是艺术的想象问题。《神思篇》说：“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注家向来把“杼轴献功”一语，释为“文贵修饰”。作者独据陆机《文赋》“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认为这指的是文学的想象活动。但二者不同的是，陆机把重点放在想象的独创性上面，而刘勰则把重点放在想象和现实的关系上面。明白这点，就能看出刘勰所以比他同时代其他文艺理论家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的地方。但是，又不能不看到，如本书作者

所指出的，刘勰“并没有始终贯彻这一看法，有时他又片面夸大了想象活动具有突破感觉经验局限的性能”，因而“看不到想象活动必须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这个先决条件”（见本书一百页）。这是一。其次，“同时也必须看到，刘勰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使他不可能不带有明显的神秘色彩”（见本书一〇二页），说明他摆脱不掉时代和社会所给予他的深刻影响。这造成了刘勰自己所提出的想象论的局限性。本书就是通过这样比较深入、细致和严密的科学研究方法，来进行一系列问题的剖析和论证的。

作者在本书《后记》中告诉我们，他这本书是花费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断续写成的。这说明席卷了整个一代人的狂风骇浪，也并没有冲掉他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作出一定贡献的决心和毅力，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这本书在许多问题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开出了一条新路。当然，书中的不少论点和方法，都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读者来说，我们是十分欢迎不同意见的争议和讨论出现的。作者在《后记》中转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中所引伟大诗人但丁的诗句：“走你的路，让人去说话！”我们相信，这本自具特色的著作，将会引起读书界的普遍重视。

一九七九年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

最近，高兴地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出版了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有故人重逢之喜。文化专制主义肆虐横行之日，一切优秀文学作品无不遭到禁锢的厄运，《约翰·克利斯朵夫》自然逃不脱当权者的魔掌。现在，日月重光，《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大书连同它的同名的主人公，又回到我国广大的读者群中间来了。同样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有幸读到了罗大冈的《论罗曼·罗兰》（副题是《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1979年2月出版），提供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者罗曼·罗兰的创作历程和他一系列作品的时代背景。我国学者运用大量丰富的第一手法文资料，独立地对一个法国作家进行研究，写出厚厚的著作，除此书外，就我所知似乎只有解放前李健吾著《福楼拜评传》和盛澄华著《纪德评传》，那可是距今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而广大读者是殷切期望我国学者能多写些这类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出来的。

罗曼·罗兰的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论罗曼·罗兰》中有专章论述和分析这部小说，并且有一节就是专门评论这部小说在中国读者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的。因为我也中国读者之一，所以对这一节提供的情况和所下的论断，饶有兴味。据《论罗曼·罗兰》作者在这节中说：“多少年来，这部有错误观点的外国小说，在我国青年读者中间产生过不良影响”。又说，“一股歪风邪气随着这部小说渐渐扩散，污染我们社会的健康气氛”。对此，我也想从读者的角度，谈谈我所了解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流

传和影响。

我生也晚，不大清楚《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早中译本是谁译的。我所知道的是，敬隐渔曾经译过这部大书的片段，登在三十年代初的《小说月报》上。敬是法国天主教神父收养的一个孤儿，送往法国读书，同罗曼·罗兰相识。敬并且是《阿Q正传》的法译者，罗曼·罗兰之知道鲁迅，也是由于敬的关系。敬不幸早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未曾继续下去。1935年，郑振铎主编出版《世界文库》，宣布了规模宏大的计划，预告许多大部头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如宣称《一千零一夜》等的“将谋全译”云云即是，其中就有罗曼·罗兰这部巨著。那时“约翰”尚译“若望”（黎烈文把这音译成“哲安”），译者是郑伯奇；但是《世界文库》这个计划并未实现，郑伯奇大概也没有真的动手翻译。1936年，商务印书馆没有经过什么宣传，忽然不声不响地出版了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列为该馆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这个译本出来，一下子受到了读书界的欢迎。从此，克利斯朵夫的名字“约翰”这个译名也被确定了下来，得到人们的认可。法文的Jean，同英文的John一样，是个普遍的名字；但是像John那样，把Jean译成“约翰”，则是傅雷的首创。而且有趣的是，翻译界虽然承认这个译名，却只限罗曼·罗兰这部小说应用，别的地方仍用音译，如新近逝世的萨特，他的名字也是Jean，就照法文发音译作“让”了。傅雷早期的译文，有掉书袋的癖好，我记得这第一卷中就有像“行尸走肉”这样的中国成语出现（当然这比在有的译文中出现“情人眼里出西施”或“不管三七二十一”之类的句子，还是要高明些）。《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二、三、四卷，是在抗日战争中、太平洋战争前在上海陆续

出齐的。当时虽然交通困难，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书运进了内地，在桂林、重庆等大城市流传。那时在青年读者中，谁藏有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全套，无不视若瑰宝，争相传阅。

《论罗曼·罗兰》中说：“1946年，这部小说的全译本分四大册出版于上海骆驼书店，不久就成为上海的畅销书，风靡一时。”这是误以抗战胜利后，骆驼书店（生活书店的外围书店）据商务版重排本作为傅雷中译本的初版了。其实，早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时期，傅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已在读者中“风靡一时”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读者中风行，决不是以它的情节曲折离奇，或渲染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来取悦于时。这部小说虽然只是写一个音乐家的故事，但是它所展现的生活场面，却是广阔无垠，气势宏伟。罗曼·罗兰笔下所创造的这个天才音乐家，刚正不屈，嫉恶如仇，容不得半点邪恶不义的事物。小说中描写的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地同周围丑恶的、不公正的社会环境的冲突和斗争。但是罗曼·罗兰也并没有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形象高大”的英雄，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有七情六欲，充满矛盾、苦恼；他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坎坷不平，艰辛备尝。中国的青年读者正是从这里感到了他们同约翰·克利斯朵夫有着感情的联系，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全国解放前国统区的知识青年，大部分有一共同倾向，就是强烈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思想苦闷，寻求出路。共产党和解放区是他们向往所在。许多人就是因为受了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作品的鼓舞和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共产党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所表现的反抗精神，

对生活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尽管书中是作为约翰·克利斯朵夫个人灵魂的“净化”来描写的），无疑对于促进青年读者反对当时的反动统治，参加革命，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当然对这种作用不应夸大，但是也不能一笔抹煞。《论罗曼·罗兰》中说：“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群众，不一定爱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反之亦然。”我很愿意相信，确有这样的读者。但我也相信，只要是要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他就最懂得阅读一切的优秀文艺作品，既爱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也会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两本书中同时吸收向上的、积极的因素。与罗曼·罗兰同时代齐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他的艺术趣味可谓是纯“资产阶级”的了，他就很称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访问苏联的时候，恰逢这部小说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他赶到死者床前表示哀悼，并且亲了死者的额头。虽然纪德后来从苏联回去后发生了令人非议的“转变”，但我相信他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感情是完全真诚的。因此，《论罗曼·罗兰》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应该改做：“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群众，一定爱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反之亦然。”这样就更为全面了。

当我们谈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译本时，不能不提到这部书的译者傅雷。就像我们谈到《毁灭》或《死魂灵》时，总要提到鲁迅一样。对傅雷的译文，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大家是不能否认的，就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翻译事业。其中，他倾注心力最多的是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还从来没有一个翻译家曾经因为不满自己的旧译而重新再译一次，而且又是一百多万字的大书。只有傅雷这样做了。解放后，他全部重新翻译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就是在平明出版社

出版的“重译本”。解放初期，党的政策允许并支持私营出版社存在。平明出版社就是以出版译文质量较高的世界文学名著，得到读者的信任，如《契诃夫小说集》、《安徒生童话全集》、《苦难的历程》等都是它所出版的。《论罗曼·罗兰》中说：“在全国解放后，上海一家私营出版社于一九五三年重印出版《约翰·克利斯朵夫》。”所指的“上海一家私营出版社”，即平明出版社（后于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并入新文艺出版社）。这里需要有一个补充，这不是简单的“重印出版”，而是一个新的译本，即译者傅雷郑重标明的“重译本”。《论罗曼·罗兰》中说到：“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封不动地重印出版这部翻译小说。”这情况完全属实。我只补充一点，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中译本（朱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样也是“原封不动地重印出版的”。《论罗曼·罗兰》接下去又说：“国家出版社隆重地再版这部外国小说，没有批判性的序文，连出版说明也没有，这就可能导致读者发生这样的错觉与误会，以为这部宣扬个人主义和艺术至上论的外国小说是完全正确，值得肯定的。”《论罗曼·罗兰》作者要求书前应有序文，我很赞同；但是“批判性的序文”必须实事求是，倘若你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读者自有抵制的办法，根本不看你的序文，反而浪费了排工、纸张。

在我国近现代的文学翻译史上，有几个人的名字将是不会被遗忘的：林琴南、伍光建、鲁迅，连同傅雷也在内。他们为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所译的大量文学作品，给了社会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没有傅雷的辛勤劳动，我国读者恐怕不可能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读到它的全译本。尤其使我们感到痛惜的是，这位自尊心很强的、

具有惊人的认真负责精神的翻译家，在十年动乱的一开始，面对文化专制主义这伙流氓法西斯暴徒的恶行，义不受辱，含冤而死。这是中国文化事业的巨大损失。当然，一个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是决不会屈服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的，他只能以自己悲愤的结局作为抗议。

新中国成立后，《约翰·克利斯朵夫》进入了新的时代，它所起的作用当然同解放前有所不同了。新社会的读者是不是也能从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身上取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呢？

《论罗曼·罗兰》对此也有一个分析：“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人们发现有一些年轻人，他们的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势不两立的严重地步”。“有人在提高认识之后，在检查自己的反动思想的根源时，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给他们的消极影响”。“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人，拿克利斯朵夫当作知心人，捧着这部小说当作个人主义的教科书。有些人本来不爱好音乐，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开始爱好音乐，自命清高，对于‘庸俗的日常工作’不感兴趣”。这里指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中宣扬所谓的“个人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青年读者的消极作用，我认为强调指出这点，帮助青年读者增强免疫力，是很必要的。但是我还想在指出这点的同时作一些补充，就是这部小说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经历了文化专制主义十年的社会法西斯黑暗统治之后，也还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做一个像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正直的人，光明磊落的人，敢于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斗争的人，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些青年因为讲了点真话，对现实有所批评，因而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如果他们中的某些人确实是受了约翰·克利斯朵

夫的感召，这不是更加证实《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是有积极作用的吗？

照我的看法，凡是经过时间检验证明有生命力的文艺作品，它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永远超过它所含有的消极因素。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有像斯大林所严厉批判过的苏联拉普派那样的狂热分子，才会采取打倒过去一切文化的愚蠢手段。如果把优秀的文艺作品和那些庸俗低级的作品科以同等的律法，不加区别，那恐怕必然导致简单化，粗暴对待。《红楼梦》里所宣扬的色空观念和泛爱情主义可谓不少了，但是这并不能盖过它对今天读者仍然具有的对旧社会进行批判的积极意义。

我完全同意《论罗曼·罗兰》这本著作中提出的，必须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中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个人奋斗、艺术至上主义等等加以批判，《论罗曼·罗兰》的特色，除了它的详尽地介绍有关的资料之外，就是它的批判性。但是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批掉了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应该有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来代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一点不难：有，当然有东西代替，我们有革命的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革命的集体主义，有无产阶级的艺术观，等等。可是林彪、“四人帮”这伙政治骗子，打着“革命”的旗号，以遂其社会法西斯专政之私，把这些全搞颠倒了，是非美恶全被颠倒了。在他们那里，批掉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换来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批掉了个人英雄主义、个人奋斗，换来了吃大锅饭、磨洋工、浑浑噩噩的混世主义；批掉了艺术至上主义，换来了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和愚昧无知至上主义。整个社会的思想全被搞乱了，其后果的严重性愈来愈显示出来了。

本年五月九日新华社的一则电讯，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这则电讯报道，牡丹江军马场中学教师阎强写信给党中央，建议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阎强的信说：“我们把儒家‘仁、义、礼、智、信’批掉了，拿什么代替呢？总不能用‘坑、矇、拐、骗、诈’代替吧！把‘温、良、恭、俭、让’批掉了，总不能用‘奸、懒、馋、滑、偷’，‘打、砸、抢、抄、抓’代替吧！但‘四人帮’时期，就是这样。”阎强这个问题提得真好，真及时！

这样看来，为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还必须进行大量的、艰巨的教育工作。“文化大革命”把人的尊严践踏殆尽，今天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甚至要从最基本的做人道理、最起码的待人接物礼貌开始，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沉痛教训，当然也是历史的惩罚。当前我们既然面临着“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道德大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存在反资产阶级思想的任务，也存在反文化专制思想的任务，那么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能够提高人的精神情操的文学作品，对青年读者来说，肯定是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暂时还不能就此同这部小说和它的作者罗曼·罗兰“告别”（《论罗曼·罗兰》的代序题为《向罗曼·罗兰告别》）。同时，今天世界上既然存在着社会帝国主义和大大小小的反动派，在他们奴役下的人民群众丧失了基本的做人的权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罗曼·罗兰鼓吹的“人道主义”，对他们来说，可能不仅没有“破产”，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斗争口号。那么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应按照它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不宜笼统否定打倒。

一九八〇年

徐铸成的“报海”回忆录

老报人徐铸成，近四五年来，写了几十万字的“报海”回忆录，已经出版的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报海旧闻》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旧闻杂忆》（后一本是据香港三联书店版修订重印的）。这些回忆录，很受读书界的重视。作者是现代中国报业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参加者，又是半个多世纪来政海波澜中许多重要人物活动的见证。他的记载，大都身历目睹，或得之于可靠的传述，称得上是真实史料。

徐铸成是新闻界的前辈，经过了二十多年寒冬风雪的吹打，如今年逾古稀了，但以笔“报国”的壮志始终未衰，像他自己所说，“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总觉得心急火燎似的，想写点什么，以贡献于新的长征”（《旧闻杂忆》自序）。“心急火燎”这四个字用得很好，很能反映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急于为四化服务的迫切心情。

这些回忆录，大致展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者带有自传性质的，从练习记者开始到主持“笔政”，以及几次办报的经历；一是他作为一个记者，广泛接触各界（主要是政界、文化界和新闻界）人士的印象，以及对他们的评价。两方面的内容，自然互有交叉。所占的时间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七年，恰满三十年。其间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作者用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描写他所经历的事件和遇到的人物，观察深刻，文笔隽永，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因为原是便于今日在报

纸上刊载，所以不是照一般回忆录那样写法，具有系统的章节，时间的先后也不求严格，而是一题一篇，自成起迄。打个比方，像是一部“影集”，每一篇都是独立的一张照片，单独看有人物，也有背景；而各张照片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则需要合起来看，方能清楚。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徐铸成三十年的经历，是颇不平凡的。他出身于旧中国办得最为成功的《大公报》，这个报以“文人论政”、对国民党政权进行“小骂大帮忙”，而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舆论权威”。他是这个报培养出来的第二代仅有的两个总编辑中的一个（另一个是王芸生），曾先后担任太平洋大战爆发前的香港、爆发后的桂林和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大公报》的总编辑。《大公报》的“三巨头”张季鸾、胡政之和吴鼎昌都曾寄厚望于他。胡政之对他讲过知心话：“我和吴、张两位，创办了这个报，我们的责任算是尽到了。至于以后的问题，是下一代的事，你的年龄又最轻，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报海旧闻》99页）徐铸成自己说，他“从当练习记者开始，直到主持‘笔政’，中间曾采访从体育新闻到政治新闻，从国内到国外——朝鲜和苏联，并曾编辑过教育、经济、副刊、要闻各种版面，也可说从跑龙套到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扮演过了。”（《旧闻杂忆》自序）《大公报》这个“科班”把他调练成预定的“接班人”。

因此，读者当会饶有兴味地观看徐铸成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大公报》的创业史，发展经过，特别是他对《大公报》第一代的主持人张季鸾、胡政之和吴鼎昌的描写和评议。他并不讳言，他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拔。对张季鸾，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写道：“他对人和蔼、醇厚，谈吐很有风趣，仿佛有一

股吸引力，使我感到他是循循善诱的前辈。”“不拘小节，不修边幅，一派懒散的‘名士气’，而浑厚、自然，没有一点做作。”但是他也指出，张季鸾在性格上有两个弱点：喜欢恭维、重感情。蒋介石利用他的弱点，使他以为蒋“以国士待我”，决心“以国士报之”，以致逐步深入地陷入罗网（《报海旧闻》73、76页）。对胡政之，他称赞他“把全部精力扑在报上，并千方百计组织好队伍”，一定要办好《大公报》，具有艰苦创业，知人善任，并注意引用人才的胆识和气魄。但是他也同时指出，胡政之为人苛察精明，不时暴露他的资本家的面目，最后以“社会贤达”身份投靠国民党（《报海旧闻》78—80、99页）。对吴鼎昌，主要就只写他在官场上的善观风色和投机取巧的历史了（《报海旧闻》67—70页）。从这“三巨头”的身上，徐铸成让我们看到了《大公报》所标榜的“不党、不卖、不做官”的“三不”原则，开始时虽曾起过一些迷惑群众的作用，但到后来就纯然成为骗人的招牌了。

在已发表的回忆录中，徐铸成对《大公报》主要持批判态度，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对《大公报》的办报经验，由于知之深，习之熟，则认为也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譬如说，关于新闻编辑，《大公报》要求把版面编得活泼精致，《大公报》的编辑“总把编好一个版面，比作办好一桌筵席，要把大、小、咸、甜各种‘菜肴’，搭配适当，使读者感到有特色，‘色、香、味俱佳’。”（《报海旧闻》89页）对于新闻采访，《大公报》要求有选择，有准备，“先要摸清行情，然后才能知道哪些是新闻，关键在哪里？”（《报海旧闻》90页）社论写得精辟，是使《大公报》成功的一大特色，徐铸成记下了张季鸾所谈写好一篇评论的“要诀”，这就是：“看问题看不清楚时，应该站得高一点，

‘凌空’来看，联系有关的事件一起来看。没有十分把握时，千万不宜发决断性的议论，多谈可能，少下断语；否则，会在事实面前碰壁，失信于读者。文章要力求流畅易懂，少用怪字僻典；要避免别人常用的词汇和习惯用语；切忌把句子拉得太长，一句话说不清的，宁可分为两句、三句话说。”（《报海旧闻》92页）《大公报》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它所设计的农村调查通信、旅行通信、旅行写生、战地通信等，都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

徐铸成在总结了《大公报》的办报经验后，发表了自己的感想，我觉得很值得一读：

作为新闻学研究，探讨改进我们新闻工作的道路，进一步为党的方针政策，为争取尽快实现四化做好宣传工作，是不是在这堆废铜烂铁中，可以拣出一些可用的、可以借鉴的东西，或者加以“回炉”利用呢？

我曾设想，比如，“小骂大帮忙”，是多年来批臭了的。从立场、观点来说，批得很正确，有必要。但是，从新闻技巧来说，为什么张季鸾以及“之流”能运用得这么灵巧？

如果把“小骂”理解为批评一些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大帮忙”理解为坚决拥护基本方针和基本路线，那末，我认为也有其可以借鉴之处的。（《报海旧闻》92—93页）

这当然只是徐铸成的一人之见，是不是对尚可研究；但这无疑也是一个力图坚持四项原则的忠诚坦率老报人的由衷之言。

《文汇报》的历史，在徐铸成的回忆录中占着重要的位置，

比之于《大公报》，《文汇报》同他更有血肉的联系。《文汇报》是在抗日战争中上海沦为“孤岛”的时期诞生的，徐铸成并未参加创办，但是只有等他开始被邀撰写《文汇报》社论和正式领导它的编辑部，以坚持民族大义，宣传抗战救国为编辑的基本方针后，《文汇报》方才“异军苍头突起”，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欢迎，在中国现代报业史上写下了它的光荣一页。徐铸成没有渲染自己个人的贡献，他写道：“为什么当时的《文汇报》会受到如此广大的读者支持和欢迎呢？我们的编辑来自四面八方，一般说，编报的经验都很少。就我个人而言，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进步思想，又和广大群众缺少联系。相反的，却从旧《大公报》沾染了不少污泥浊水。至多只是一个历史不长的编辑匠，而且是第一次领导一个编辑班子。其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远远抛在敌后的孤岛几百万爱国同胞，需要鼓舞，需要希望，都想从报纸上听到抗战的声音、胜利的声音。”（《报海旧闻》288页）我认为这种对待过去历史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

根据回忆录所记载的过程，徐铸成同《文汇报》的关系，可分成五个时期：一、抗战时初创的上海《文汇报》；二、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文汇报》；三、解放战争时的香港《文汇报》；四、新中国成立至一九五六年春停刊的上海《文汇报》；五、一九五六年复刊至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的上海《文汇报》。回忆录所叙述的，主要是前三个时期中上海和香港《文汇报》的一些史实。可惜的是，我觉得作者对这段历史谈得不够，而且显得零散。譬如说，凡是经过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那一段时期的《文汇报》读者，大概都还记得，当时《文汇报》虽然处于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却是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抵制和反对伪国大的召开。开会期间《文汇报》每天的新

闻报道和评论，或尖锐辛辣，或冷嘲热讽，把国民党和帮闲的两个小党的丑态，揭露无遗，态度、立场十分鲜明，读者无不称快。这对当日民心的向背，不能说没有起着相当的影响，可说是《文汇报》办得最为有声有色的时期。从徐铸成所记他决定与《大公报》分道扬镳时，同胡政之的一席谈话中，我们看到他当时的办报主张已经很为明确，就是“认为应宣扬正义，明辨是非，反对独裁内战，与广大读者同呼吸”（《报海旧闻》99页）。他的这个主张，贯彻于《文汇报》，我的看法是，在反对国民党伪国大召开这段期间得到突出的表现。这段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历史，很值得一写。作者大概留着放进《报海旧闻》和《旧闻杂忆》的续集了。

徐铸成三十年的记者生涯，使他接触大批政界、文化界的各式各样知名人物。记者接触各界人物，是为了采访，为了“记”。他叙述张季鸾对他讲过的一段话：“新闻记者最根本的职责是‘记’，如果当了老记者就忘记了‘记’，那就剩下一个‘老者’，失去记者的天职了。”（《旧闻杂忆》自序）他历数所见过的人物：“在革命领袖方面，毛主席曾接见过我一次，周总理曾三次约我亲切交谈；曾听过恽代英的十分动人的演说；听到鲁迅在师大风雨操场的一次讲话。见到过金日成将军和胡志明主席；也看见过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卡冈诺维奇这几位。至于国民党方面，从蒋氏父子、二陈、孔、宋到正牌、杂牌军人，而政客、官僚，接触过的就更多了。反面人物，和汪精卫谈话不只一次，溥仪和郑孝胥在他们未出关前，也曾有一面之缘。还有幸和赫鲁晓夫谈过一次话。”（同上）以如此的广泛见闻，亲身经历，自然积累下大量丰富的素材。

现代史料中的一个缺陷，就是对有关人物的个性和声音笑

貌，缺少生动的描写，因此也就缺少一定的真实感，读者对此每感遗憾。徐铸成这些回忆录中出现的人物，却能给人以生动的面目。我想作者所以能做到这点，是他善于把所具备的三项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第一，所写的这些人是他所亲自访问过、接触过的，不是得之于稗贩；第二，能抓住同这些人谈话的要点和特征，能从即使是普通的谈话中，观察这个人的性格和某些思想活动；第三，有一支传神的笔，能恰到好处地把所要叙述的情状表达出来，一般说，他用的是白描的笔法，流畅而自然，但又十分简洁。

不妨试举回忆录中所写关于冯玉祥的片段，就可看出他笔下所记，确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那是一九二九年，冯玉祥被阎锡山骗到山西软禁起来，囚禁在五台县河边村。徐铸成经过曲折的关系，找到机会，访问了他。回忆录中写道：

见面时，冯正准备吃晚饭，就请我们用餐。菜很简单，四盆荤素，中间一个火锅。吃饭间，他先问我多大年纪。我说了。他说：“呵，这样年轻，就有这样的才学，我像你这岁数时，还在北洋军扛大枪呢。”接着，我就问：“最近，前方（指冯的西北军）有什么捷报来没有？您看情势怎样？”他笑着说：“我的消息，哪有你们新闻记者灵呀。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说着，把筷子指着桌上的火锅。我听了莫名其妙。他马上以讥笑的口吻解释说：“每次，他们（指西北军）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他们失利了。这是我屡试不爽的。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了。”说罢，他放声哈哈大笑起来。（《旧闻杂忆·冯焕章的风趣》）

这短短二、三百字，把冯玉祥的性格、当时的形势和他的处境，都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在这段叙述会见冯玉祥的谈话后面，徐铸成自己加上了评语说：“这一席风趣的话，其实把他自己的处境，他和阎的关系，以及当时大局的情势，都说清楚了，而且把阎老西的刻毒、狡猾和目光短浅的势利小人的面目，也刻画尽致。”我看，这个评语移赠给他自己写的这些回忆录，也是很恰当的，不为过誉。

以上就是我对徐铸成所写这些回忆录的一点读后感，介绍得并不完全，只是随便谈了点看法。读其书，想见其人。读者是很愿了解一下一本书的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又是怎样的。据一位同徐铸成相识的朋友告诉我，一九七〇年，他有幸同徐铸成同在东海之滨的一个五七干校。那时，徐铸成白天接受全校大会批斗，或是陪斗；但是晚间逢到举行乒乓赛，仍是带着他所惯有的笑容，兴致勃勃地赶到白天批斗他的大礼堂去观战，还不时为双方打出的好球发出微微的赞叹声。我那朋友的“罪行”虽还不足全校大会批斗的规格，但已心情沉重，垂头丧气，看到徐铸成如此的从容态度，不能不表示钦佩。朋友又告诉我，过了十年即一九八〇年徐铸成应邀参加香港《文汇报》创刊三十周年纪念，香港有朋友劝他留下来办一张报纸，徐铸成婉辞谢绝了。朋友说，徐铸成不愧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老报人，这是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的。

这，我觉得也可从徐铸成所写的这些回忆录中，得到证明。“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非爱憎，很是分明，但不作偏激之论，知人论世，又是实事求是的。徐铸成说：“写的都是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不加增饰，不掺入道听途说；既无荣

宝斋的水墨复制，也摒弃罗振玉式的自制古董。对人、对事，都力求其真实。对己，既不妄加油彩，也不乱涂白粉。”（《旧闻杂忆》自序）真实，这大概就是做一个新闻记者的为人信条吧。因此，我觉得他以上讲的这些话是十分真诚的，可以为读者所信任。当然，我们的希望是，作者能很快让我们继续读到他的精彩纷呈的回忆录的续篇。

一九八一年

“准备检讨”与“下不为例”

检讨原是很严肃的事，但在某些人那里，却化为笑谈。“下不为例”这句话原也含有告诫和警惕的意思，但在某些人那里，却变成了明知故犯和免除惩罚的护身符。近年来的漫画和小品文，以这类现象作题材，揭露讽刺，不算少了，有的还是相当辛辣的，但在某些人那里，似乎收效甚微。

我这样讲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根据之一就可举出最近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一则报道。那是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头版的一条新闻，标题是“襄阳地委四书记强占新楼声言下不为例，湖北省委责令检查立即退房”，所据的是新华社武汉五月十六日电。上海各报未见登载，成了《人民日报》独家新闻，电文不长，照录如下：

中共襄阳地委书记王耀、副书记董华生、张安文、沈汉民在中纪委关于纠正建房、分房中的不正之风的公开信发表以后，一意孤行，搬进了超标准、超面积的小楼独院，受到了中共湖北省委的严厉批评，今天已经退出新楼。

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七日，王耀、董华生、张安文、沈汉民先后搬进了新盖的两幢小楼。两户住一栋，每户平均占有住房面积 226 平方米，超过标准两倍多，计卧室 7 间、客厅 2 间、卫生室 2 间、厨房、养鸡房各 1 间。室内高 4 米，有暖气设备，窗子上有公家配备的窗帘。

襄阳地委的干部对王耀等人多占住宅楼反应强烈，都认为

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五月四日，王耀在一个有副县长参加的会议上说，我们准备检讨。但是已经搬进新居了，下不为例吧，从现在起不准在建房、分房中搞不正之风了。

中共湖北省委负责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五月十四日对王耀等四人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责成他们认真检查错误，立即退房。

王耀等 4 人昨天已从新楼里抬出家具，今天搬出了煤炭、鸡笼。

这位王耀书记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运用“准备检讨”与“下不为例”两种手法的灵活与纯熟。“准备检讨”是为“下不为例”铺平道路，而“下不为例”又必须有“准备检讨”作为前提，使这次多占住房的“例”在检讨通过声中合法化。我相信他的检讨一定会很沉痛，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也会挖得很深刻，当然最后是“下不为例”；这次呢，既已做了检讨，就不宜追究了。两种手法各尽其妙，互为配合。最精彩的还在他下面的一句话：“从现在起不准在建房、分房中搞不正之风了。”刚刚还不无勉强地“准备检讨”，话锋一转，立刻就义正辞严地训起话来了。我怀疑这所谓“从现在起”，事实上是并不包括训话者自己在内的。原来党纪国法在这种人那里，不过是为他们的私利服务罢了，怎么说就怎么算。因此，湖北省委负责同志的处理，责令他们立即退房，真是大顺民心。否则的话，让这种人来纠不正之风，岂非与虎谋皮，不正之风终将继续刮下去，愈刮愈凶。还可想到，像这种熟练玩弄“准备检讨”与“下不为例”手法的人，不仅湖北有，别的地方也不会没有，湖北省委对这种人的果断处理，为此做出了很好的榜样。由此我悟出

了一个道理：舆论的谴责对某些人来说，是不在乎的，对他们最有效的办法是法纪的制裁。

这篇短文到此已可结束，但又觉得意犹未尽。为什么呢？仔细一想，还应为这篇报道本身说两句话。应该说，这篇报道写得好极了，好就好在既是一篇及时的新闻报道，又是一篇可读的好文章，用简洁的几笔把某些人的言谈、神态到灵魂，都给生动地勾勒出来了。你只要看那似乎平淡无奇的结束语：“四人昨天已从新楼里抬出家具，今天搬出了煤炭、鸡笼。”多么传神的一笔！对于那些惯于“准备检讨”与“下不为例”的某些人的精神天地、灵魂所寄，不是通过这些鸡笼一类的物件，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吗？如果要选一年一度的优秀新闻报道的话，我请大家千万不要漏掉这篇出色的报道。

一九八二年

“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

——《牡丹亭》一解

《牡丹亭》述说距今近四百年前的封建时代一段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杜丽娘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这是一部反映现实而又充满浪漫想象的写情的戏。这个“情”字作何解释？汤显祖曾在戏中引用唐朝诗人顾况的一句诗“世间只有情难说”，似乎不可解；又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大有无从说起的样子，但接下来还是作了一番说明：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在这里，情是作为理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情理原该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理合乎情，情在理中。我们平时讲话，情理二字就一向连用。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漫长现实进程中，特别是处于黑暗反动的时代，伴随着政治的镇压，理作为统治阶级维持封建秩序的统治思想和手段，处处便要対情进行粗暴的限制、干涉，以至摧残、扼杀，在所不惜。《牡丹亭》的写作，处于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的交替之际，正值明王朝将趋溃亡的前夕。朝政专横腐败到极点，社会风气也淫靡堕落到极点，上下一

片混浊污秽的空气。但是道学家们却仍然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势，抬出理来窒息社会的生机和人性的生机，以维系他们在思想界摇摇欲坠的统治。当日一些头脑清醒的作家，像李贽、徐渭和袁宏道兄弟等，无不希望吹起一股强劲的心灵之风，来荡涤这恶俗的世道。汤显祖以一个才华横溢的戏曲家，以鼓吹情来表示他对这种违反人的天然之情的理的批判。《惊梦》中杜丽娘唱道：“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是汤显祖的自白。他用“天然”这个字眼，表示他一生的追求是什么，反衬出这个社会的种种道德伦理是多么违反“天然”之情。

时代稍后于汤显祖的陈眉公，曾经记载这样一件事：“张新建相国尝语汤临川云：‘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灞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矜所笑？’临川曰：‘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张公无以应。”（《批点牡丹亭题词》）这记载不知确否，幸好有汤显祖自己答复他的老师罗汝芳的一封信，写道：“师言性，弟子言情。”证明汤显祖的确有过这句话，而他的甘心以戏曲家名世（即所谓“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就是为了实现他的“言情”的主张。他在这里所说的情的对立面性，在道学家那里即是理的别称，性理之学即理学、道学。汤显祖高出于他的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对情的执著追求。他说的“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就是企图用情来冲破理的束缚，借一段迷离恍惚的梦境，演数场生生死死的姻缘，写成这缠绵曼衍、情思缠绵的《牡丹亭》。他大概只是想打动同时代千千万万观众的心，但艺术的生命是永久的，后代千千万万观众的心也被打动了，这大概是汤显祖所未曾料到的。

《牡丹亭》所写的这段情，荒唐离奇。哪有梦中定情，鬼

魂婚配，人死了尚能复活，这是“理之所必无”。但是从情来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了这种情，世间任何事都能做到，任何奇迹都能出现。何况梦境奇遇、鬼魂相爱，也即是现实生活中的凡人遭遇、凡人之情，完全合乎情理，又是“情之所必有”。

汤显祖死后七年，亦即天启三年（一六二三），《牡丹亭》已经风行遐迩了，汤显祖的一位友人王思任在他的《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着重提到了《牡丹亭》所写的情，又提出“同”（普遍共有）与“独”（个人独具）的问题，我看尚有一定见地，不妨转录如下：

《牡丹亭》，情也。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有深于阿丽者矣。况其感应相与，得《易》之咸；从一而终，得《易》之恒。则不第情之深，而又为情之至正者。今有形一接而即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其无知之性不本于一时之情也。则杜丽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独也，宜乎若士有取尔也！

对这段评论，要撇开它的迂腐气。把杜丽娘对于情的追求，幽期密约，私订终身，说成什么“从一而终，殉夫以死”，真是迂腐可笑透了；但是也得原谅这位王先生，在他那个时代，非这样说就不能对这段郁勃愤懑而又热烈奔放的情给予最高的评价。情是人们所普遍共有的，但是只有杜丽娘单独体现了这种深情，他这意思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杜丽娘这个独特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对人所共有的天然之情的执著追求。

这样看来，《牡丹亭》述说的虽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但并不限于爱情，也不限于青年男女，它的含义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触及到了情与理的冲突，美好的梦想与严酷的现实的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每个时代都以不同的形式重演；由

此每个时代的观众，都能从中得到相应的启发与感受。故而这部戏的影响就不限于它所产生的当时，而是超越了时代。

对于《牡丹亭》的主题问题，历来似乎并无什么争议，也许是各说各的，互不侵犯吧。但是，按照我上面的理解，这个问题岂不是还是值得再探索一下吗？

一种说法认为《牡丹亭》的主题，应是爱与死，爱战胜了死。诚然，《牡丹亭》写了爱与死的这个题材，但这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尤其到了明朝，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了。早在汉末的长诗《孔雀东南飞》和魏晋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里，我们就已看到爱与死进入了文学的领域，成为许多作品的主题。《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搜神记》中《韩凭妻》的韩凭夫妇，都是生前被拆散，死后坟墓相望。坟墓上的大梓树，根枝交错，传为“相思树”的美谈，显示出爱情的真诚即使是公婆的凶狠、君王的暴力，也摧毁不了。另一篇《吴王小女》，写紫玉对韩重的钟情，生前不能结为夫妇，死后鬼魂还要相从，这简直就是杜丽娘的前身了。到唐人小说出现，这一题材的艺术描写就更为动人。有名的《离魂记》，写男女相爱，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结成夫妻，只能由奇迹来完成：女主角倩娘没有死亡，躯体仍在，而是神魂出奔，最后合而为一，结成良缘。元曲据这故事，有《倩女离魂》杂剧。只要稍加比较，就可看出，《牡丹亭》的剧情，不能不说与它大同小异。尽管题材可以翻新，但因袭的痕迹过于明显了。用这样雷同陈旧的题材来作主题，显然是不能打动观众的。

再一种说法，也是最通行的一种说法，认为《牡丹亭》是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离死合，热情地讴歌了反抗封建礼教，争取爱情自由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倘若举行一次古典

文学考试，题目中有一个是“试述《牡丹亭》的主题”，那么这无疑就是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可惜，这个答案已经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最为方便的公式，到处可以套用，只要把男女主角的名字换一换就行了。前面已经提过的几篇作品，如《孔雀东南飞》、《吴王小女》、《离魂记》等，换上各篇男女主角名字，不是都用得上这个公式吗？

争取爱情自由或婚姻自由，当然是《牡丹亭》所要描写的一个内容。《惊梦》一折中杜丽娘有一段自白，比以含蓄隐喻、藻绘华艳为能事的唱词，似乎更为直率明白地倾吐了封建时代一个深闺少女对于爱情的渴望，却没有受到历代评论家应有的重视，我现在转引在下面：

默地游春转，小试宜春面。春呵，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遣？咳，恁般天气，好困人也。……天呵，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尝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时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如果说仅以《牡丹亭》一部作品而言，关于它的主题是什么，前面所说的那个“标准答案”是完全可以对得上号的，上引的杜丽娘的说白正好用来作这个答案的佐证。但是从中国文学的发展整体来看，反抗封建礼法、争取爱情自由这个问题，是从封建社会形成到持续的漫长过程中，在文学作品里是没有

中断过的。即使封建社会已经彻底崩溃，但只要有封建残余存在的一天，这个问题也还不会消失。因此《牡丹亭》所采用的这方面的题材，以及它所体现的某些思想精神，就决不是它所独有的，更不能说就是它所首创的。至于所谓“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这又是一条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标签，到处可以贴得上，也到处不适用。个性解放是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和上升时期的要求，生活在封建制度十分牢固时代的作家，不可能提出这种超时代、超阶级的要求。杜丽娘追求爱情，在她那个时代，同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制度而提出的要求个性解放完全是两回事。她做了状元夫人，必然也要成为贤妻良母，像她的母亲杜母曾经管教过她的那样，她也将照此不变管教她自己的女儿。在她身上哪来什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呢？

单就题材而论，《牡丹亭》事实上并没有超出《西厢记》的范围。中国古代作家思想的活跃与丰富，丝毫不能掩盖他们作品取材的贫乏与狭窄，即使在第一流作家身上，也所难免。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牡丹亭》有两次提到《崔徽传》，即《莺莺传》或《西厢记》，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题材是惊人地相似，连人物也几乎是一分为二：杜丽娘即崔莺莺，柳梦梅即张君瑞，杜母就是老夫人，春香就是红娘。《惊梦》岂不就是《酬简》？杜母拷问春香，岂不就是《烤红》？柳梦梅状元及第、奉旨完婚，岂不就是张君瑞的翻版？所以，假如根据题材的相同，我们把《牡丹亭》主题的“标准答案”改成：“通过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故事，热情地讴歌了反抗封建礼教，争取爱情自由”云云，以此移赠《西厢记》，不也是同样合适的吗？

由此可见，《牡丹亭》在生和死以及争取自由的爱情结合这类题材的取资方面，都不过承袭旧题，没有能够突破前人的樊

篱。因此它的感人之处，不在于它所描写的这些前人已经写过的题材，也不在于后人赠予它的那些“反抗”或“争取”什么的主题思想；而是汤显祖通过杜丽娘这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表达出来的情——也就是前面已提到过的那个追求天然之情，这个情的内容包含着对青春难再的珍惜，对韶光流逝的惋恨，对纯真爱情的憧憬向往。

不错，《牡丹亭》主要写的是爱情，形式上不脱封建社会一般的才子佳人式的“幽期密约”，但是内容上深化了，而且赋予了人生的哲理意义。少年、青年和将要告别青春或已经失去青春的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人们，都可从中领会到兴奋、流连、淡淡的哀愁、深沉的惋惜、无限的怅惘……使观众无不经受一次感情的洗礼。我想，这或许就是《牡丹亭》的魅力所在吧。

明朝的戏曲评论家吕天成，在他的《曲品》中写道：

杜丽娘事甚奇。而着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叠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他举出《牡丹亭》所特有的“怀春慕色之情”，说明他懂得这部戏的好处在哪里；“惊心动魄”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得出来的，否则一部情节陈陈相因的爱情剧，无论如何加不上这样高级的形容词。可惜他讲得简单了些，需要读者自己加以补充。

《牡丹亭》的真正知音者，我看不是别人，而是林黛玉。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回目叫“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讲的就是林黛玉对这两部戏的观赏感受；特别是对《牡丹亭》，她的感受尤为深刻。熟读《红楼》的红学家们一定早已烂熟这段文字，但既是好文章，再抄引一下也无妨：

……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道：“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

曹雪芹真不愧是了不起的大作家，你看他把林黛玉听曲时的感受和心理活动，一层深一层地写得多么细腻生动。“心动神摇，如醉如痴”，岂是一般体会？这表明曹雪芹借林黛玉所表达出来的对《牡丹亭》的理解是多么深刻，《牡丹亭》经此品评，可称无憾了。

以上卑之无甚高论，聊备一说吧。

一九八二年七月，我观看了上海昆剧团经过改编的全本《牡丹亭》，觉得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英国每年都有莎士比亚戏剧节，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以一看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为荣。我们为什么不能每年举行一次盛大的戏剧节，吸引全世界的观众来看戏呢？上海昆剧团演出《牡丹亭》，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赏，其意义也就不仅限于纪念汤显祖了。

一九八二年

思考、探索与追求

——读《文学沉思录》有感

过去，我曾不止一次地观看罗丹的名作《思想者》（当然只是从照相图片上），也曾不止一次地受到吸引和感动。这座雕像，表现一个坐着凝然不动的人，头向下俯，用右手手背托着下巴，另一只手搭在膝上，双目凝视，神情专注，陷入了沉思。从他身上，我好像看到了古往今来多少哲人志士在认真思考着宇宙真理的奥秘，不倦地进行着探索与追求。一切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他们所以成为这样的人，大概免不了都要经历这一过程。没有他们，人类的思想就停滞了。现在，王元化把他近年所写的论文，合为一集，题名《文学沉思录》，我看很有意义，使我想起了罗丹的《思想者》，虽然作者未必取题于此。沉思，这就是意味着严肃认真的思考，探索与追求。对于一切不甘心靠传疏诠释讨生活的理论家来说，这是太有必要了，否则他就不可能从陈旧僵化的教条主义框套中解脱出来，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创新或突破，而这正是当前日益丰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理论工作者提出的严峻要求。

《文学沉思录》共收录文章十七篇，涉及到了文学、哲学各方面的广泛问题。大多数文章都曾在报刊发表，发表时就曾引起理论界和读者的重视，但是合成一集，就更见其完整与系统，显示了作者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从篇次的排列来看，这些问题可以顺序列举如下：文艺理论体系、艺术形式和表现手

法、知性、形象思维、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规律的一致性、鲁迅研究、人性、黑格尔与美学，以及关于《文心雕龙》、龚自珍、韩非等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触及当前理论战线上存在的重要问题，有的还是十分敏感的问题，王元化在这本论文集里几乎无不正面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读者将会产生很大兴趣，发现他的这些观点和见解，以及他为表达他的观点、见解所采用的具有鲜明个性与严密推理的论证方法与文采特色，倘若说像作者所曾指出的“艺术作品必须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情志”（见本书 25 页）的话，那么这本论文集的“占主导地位的情志”应该就是反对理论的简单化和庸俗化，恢复长期被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包括“两个凡是”）所窒息的生机。当然作者反对艺术作品的“一切都必须从主题出发”的创作方法，这只会造成像臭名昭著的“三突出”那样的创作模式。评论也是一样，这样的评论只会成为牵强附会的分析。但是，反对理论的简单化和庸俗化，无疑是这本论文集的“占主导地位的情志”，这一点，贯穿于全书。作者把这种简单化和庸俗化，作为理论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种痼疾看待。因此这本论集中各篇文章所致力，就是一方面不“讳疾忌医”，另一方面则力图探索如何找出疗治这种痼疾的方法。就前一方面说，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具备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事业的忠诚信念，无所畏惧，决不说违心的话；就后一方面说，就需要有深邃的思考力和广博的学识修养，不作假大空之论。照我看，作者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无法对这本论文集集中的各篇文章，定出甲乙的品第，因为每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论述的方法，都可使读者感到耳目一新，为读者打开知识的窗户，扩大认识的眼界。论文集的每

篇文章虽然各自独立，但蕴含着内在的联系。作者是赞同黑格尔的这个论点的，即“他（指黑格尔）很看不起一部书各个章节之间毫无关联，只是把一堆问题杂凑在一起。他认为有价值的著作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部分和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都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见本书3页）。因此本书不像有些理论家的论文集那样，按写作时间的先后编排篇次，而是写作时间在后的反倒编排在前，我想作者的用意就在这里。

我不准备（也没有必要）对本书逐篇谈出我的看法，但是我还是想举出一两篇来谈谈我的读后感，因为这样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作者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是如何进行思考、探索，并且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例如《论知性的分析方法》这篇文章，就是首先揭示了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长期受到误解的一个重要问题，原来在我们习惯把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两类中间，还有一种知性的过渡阶段，它也能“凭借理智”对具体对象进行分析，但它只能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使事物“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如果把它冒充理性应用到理论上，它就成了简单化的根源。在文艺理论上，停留于知性的分析，就造成对艺术的误解。我觉得这篇文章确实使我们大开茅塞，我们长期所据以指导行动的所谓理性，事实上不过是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的知性，并没有上升到真正的理性。认识论上的这个问题，今天已受到理论界的普遍重视，但首先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探讨知性这个问题的正是王元化这篇文章。对此当然也有不同的甚至反对的意见，这是可以继续讨论的。

我再举一篇《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来谈一谈。这篇文章接触到了当前文艺理论的几个敏感问题，例如关于文艺基

基础理论的研究问题，作者指出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这本书，“水平还很低，也存在不少缺点，基本上没有跳出三十年代的老框框”。由于这本书一向评价较高，并被作为基础教材使用，一般人是不会敢于如此坦率地作出这个评价的。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作者反对采用功利主义（即实用主义）的观点，并引用黑格尔所批判过的实用主义态度，“即理论研究必须立即产生实用价值，否则就把它说成是空疏无用的学究把戏”。我看提出这个问题是切中时弊的。关于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规律的一致性问题，作者指出：“写作要有自由，这是艺术规律。我并不是主张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或提倡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而不顾及社会效果。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效果必须考虑，这是作家的责任。但是作家一旦进入了写作过程，临时抱佛脚式的勉强自己用人工方式，增加一些与作品自然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的标签，这种在主题思想上追求急功近利的作法，是违反艺术规律的。违反艺术规律去追求艺术效果是不行的。”所有这些问题，我相信一个理论家如果没有认真的、深沉的思考，具备探索与追求真理的勇气，是不可能提得出来的。这里用得上作者在《后记》中说的几句话：“这些意见可能有不成熟和不正确的地方，但使我聊以自慰的是，我没有作违心之论，它们本于我的信念，出于我的思考，其中有些问题甚至曾经在我头脑中萦回多年”。我看论文集的全部内容，足够为作者这段真诚的告白作证了。

《文学沉思录》为理论界吹进了一股新风。它说理透彻，论证严密，文字却又那么明净优美，本身就是一部精雅的艺术创作。多年来，我还很少像阅读这本书那样享受在理论王国中的遨游之乐。陶雪华为本书设计的封面，也应一提：书名上方

大胆运用了拉丁字汉语拼音，下方配以小型圆形图案，雅淡庄洁，别具一种装饰美；装帧则采用了涂塑和软衬材料，这都为读者所喜爱。读者对一本书，不仅要求内容好，还要求装帧设计也要好。听说本书初版一万八千册，在不到两月内已告售完，说明本书的出版是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

一九八三年

[附记]

这篇文章，虽只是一篇书评，却曾经历一番波折，未能在当年的报刊发表。先是上海某大报文艺评论版已打样拼版，临时奉命撤下。后是北京一大型文学评论刊物已表示采用，最后仍以退稿处理。我一向对自己文章的底稿或退稿不甚珍惜，随意弃置。这次编这本集子，这篇文章的一份小样却意外发现夹在一本簿子内，得以幸存。回顾写此文时间，正是全国开始反精神污染运动之时，小文而触大网，其不得发表也固宜。附记于此，以见彼时文坛风习。

编辑的地位

本人业操编辑，三句不离本行，谈起知识分子问题，免不了就要想到编辑的地位。谁都承认，近几年来编辑的地位，同教师的地位一样，比起过去来大大提高了，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坚决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但是也同教师至今尚在某些部门、某些地区继续受到歧视一样，编辑的地位问题在某些部门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仍然还有议论一下的必要。

出版部门少不了编辑，学校少不了教师，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事实。当然，出版部门和学校同时也少不了行政和后勤人员，他们的重要性同样也是明白无误的，可以不烦词费。但是，不管你怎么说，编辑和教师总是唱主角的。主角就应该有主角的待遇。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恐怕不会再有人公然出来反对编辑是出版社的主角这一提法了，但是接触到待遇呢，各种阻碍（思想上的、具体实施上的）就来了，而且阻碍的方式是多样的。问题的关键何在呢？我看还是在于编辑的地位并没有真正得到社会和自己领导的尊重与承认。

在某些人眼里，编辑不过是编编辑而已，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行当。尽管有多少文章为编辑呼吁，为编辑的重要性辩护，并多方证明编辑是沟通作者与读者之间不可缺少的辛勤园丁，是学术领域的一“家”（或称之曰“杂家”，然而杂家岂是容易做的），可惜再多说也改变不了这些人固执不化的成见。一年多前，不是有人反对给编辑评定学术职称吗？理由就是编辑工作只是所谓“简单的重复劳动”，一下子便把编辑打入了“游民”

的行列。我完全赞同对一些职称评定工作中的滥乱现象，给以必要的纠正和整顿，但认为编辑根本不该评什么职称，确实是反映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对编辑的轻视与歧视，这其实也是应该纠正的。最近新闻编辑的职称评定工作，在经过了一番曲折之后，终将恢复，凡身为编辑者莫不有“柳暗花明”之喜。但是希望有关主管部门对这一工作能够抓紧迅速进行，不再多变，这对提高编辑队伍的积极性、稳定性，以及端正社会视听，都是至关重要的。

上面讲的，只是外部的因素，还存在着内部的因素。在出版部门中，是不是所有领导都像他们口头上讲的那样尊重编辑的应有地位呢？我看答复将是未必然的。姑举两条为证：

其一，多多少少还存在着“摆平”（且不说平均主义吧）的思想。评先进，发奖金，总怕让编辑部门领先。有时虽然也说上一两句“为编辑工作服务”的话，但事实上不执行。出差买车票，领取和分发办公用品，找招待所，等等，这些最起码的该由行政或后勤部门负责的“服务”，在有些出版社都还困难重重，不易办到。

其二，眼睛只看到外面的人是专家，看不到自己内部的编辑大有人在，有的不比专家逊色。听说有一个某专业出版社，要成立一个规划小组，所提出的推荐名单，竟没有一个自己的编辑在内！但是正是在这个出版社内，有几位编辑是学术界公认的这个专业方面的专家。如此看来，编辑地位之若有若无，似高似低，也并非只是社会上的原因了。

一九八四年

“双百”声中话梁老

我有一个习惯，每当看到一篇好文章，就急着想要告诉朋友们，共同享受阅读的乐趣。最近我看到一篇好文章，就是登在《团结报》762—4号上的《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本以为几个“文摘”报见此佳作，岂有不摘之理？既然未见采摘而又亟想公诸同好，只得由我不揣冒昧，作一介绍。

原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底“批林批孔”的闹剧开场以后，自十一月至次年十一月，历时一年之久，在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联席学习会上，同时也演出了一幕“批林批孔又批梁”的闹剧，批判会每周三至四次，人数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一二百人。今天看来这是闹剧，在当时则是有关身家性命的政治大事。《团结报》的文章好就好在利用当时的记录和手稿，对梁漱溟在这场运动中的言行，作了翔实而生动的报道。这篇文章共分四段：一、梁漱溟发表长篇讲话之前；二、梁漱溟长篇发言补遗；三、梁漱溟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四、梁漱溟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想文章内容不必多事摘引，读者可自找《团结报》来看更清楚。总括起来说，这篇文章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四人帮”法西斯专制淫威统治下，大多数人不得不表态拥护，发各种违心之言，狠批“孔老二”，还生硬地绑上林彪的时候，独有梁漱溟（其时他已八十一岁高龄）敢大唱反调，坚持己见，且不说坚持真理吧。“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对批判会主持人最后要他谈感想时以此作答，真可说是一个绝顶的顽固分子了。但是

我却觉得所引用的古人这两句话，这个时候倒真是凛凛然有点金石声哩。

当前大家不是正在庆祝“双百”方针三十周年吗？在一片热烈的纪念声中，我想《团结报》这篇文章可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提请大家不要忘记在马寅初、孙冶方等几位知名人士外，还有这样一位用自己实际言行来捍卫“双百”方针的老先生梁漱溟。大家知道，早在一九五三年对梁漱溟就曾经进行过一次批判，当时虽然没有在报上公开发表，但后来还是公布了权威性的批判文件。从所公布的看，那次批判火气很大，火力很猛，辫子、棍子、帽子可说一应俱全，有的还涉及到了被批判者的人格。那次批判的问题很多，别的不说，其中至少有一条即梁漱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这个问题。现在看了《团结报》这篇文章，列举的梁漱溟面对“四人帮”威武不屈的事实，该是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了。

《团结报》的“编者按”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以耄耋高年，心情舒畅，著述不辍。”让我也附一笔：为梁老贺，更为国家贺！

一九八四年

改革者与冒险家

——深圳见闻

改革者与冒险家不是一回事。旧上海被叫作“冒险家的乐园”，那时的冒险家，巧取豪夺，尔虞我诈，名声不佳。然而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梁宪在给我们介绍工业区发展情况时，也把自己称为“冒险家”，他把这句话反其意而用之，改变了我们对“冒险家”的看法。原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有冒险家，社会主义也有“冒险家”。社会主义的“冒险家”就是一批献身四化事业的有胆识的改革者，这样的“冒险家”，当然愈多愈好。

但是，改革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这首先必须具备冒险精神。梁宪说，他们常常半夜醒来，心惊胆颤。为什么？因为他们每前进一步，就要同旧的条条框框发生冲突。做得对不对？符不符合政策？会不会犯错误？他们白天做了，晚上害怕。现在不怕了，因为党中央肯定了他们走的改革之路是对的，但是开头两年，他们确实是在“冒险”，这也一点不假。

梁宪，三十多岁，戴近视眼镜，像一个文静的大学生，讲话声调平平静静，没有慷慨激昂的样子，但听得出他对这里的事业充满信心，勇气十足。他大概是管理专家，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这里的平均工资实际达到二百二十元，而他的工资超出一倍以上。我们倒不是为这钦佩他，而是从他身上看到了新一代改革者的气魄。当然这点也叫我们信服，感到“深圳观念”不是空话，体现在各个方面，多劳多得就是重要的一条，谁的

贡献大，谁的报酬就高。照章执行，不含糊，也不打折扣。

我漫步在蛇口的海滨和市区，看到一幢幢新建的和正兴建的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道路，繁荣的市场，熙来攘往的人群，谁能想象，五年前这里还仅是一个四顾荒凉的小渔村。想到这里，我不禁对那些自称“冒险家”的改革者们产生深深的敬意。

一九八四年

好事的另一面

房管所定期派出人，到各个机关打蜡。

我首先表示，这是件好事：第一，表明该地段房管所对保养公共房屋的认真负责态度。第二，免去了机关工作人员的劳动，如果房管所不是定期派人来打蜡，你机关也得自己动手。第三，基于前一条后面的“如果”，倘若机关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就不可能采取打蜡的办法，为了省事，可能就用水拖，眼看着好好的镶花地板会变成乌糟糟的木块，潮烂下去。有此三条理由，当然是好事无疑了。

但好事还有另一面。就拿打蜡来说，每逢打的前一天，我们机关的总务科就得写出“安民告示”，通知各科室预先打扫地板。第二天一早，各科室要把所有椅子搬到写字台上，等候打蜡队（姑以名之）来工作。蜡敷铺之后，还得等它干燥，再可打光，这就要到下午了，因为打蜡队中午也是休息的。这样打一次蜡，我们这个机关起码需要停止办公六小时。倘有要事处理，便只好东躲西闪，找个空档地方去办一下。我们这个机关小，算它一百个人吧，为打一次蜡，就要付出六百个小时工作时间。倘一年打五至六次蜡，付出的代价就可观了。

房管所派打蜡队上门服务，这是好事，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房管所没有想到，它按照自己的办公时间前来服务，被服务的这方就得停止同样的办公时间来接受服务。从被服务的这方来说，打蜡这件好事反而成了负担。这是事情的另一面。我所“有感”者就在于此。这种已成为弊端的“另一面”，何以至今未被重视，不想办法改革一下呢？

我看要解决并不难，只要打蜡不在我们机关的办公时间进行就可以了。虽然这要增加房管所的一些麻烦，但是这同最近社会舆论所呼吁的，希望某些服务行业改变营业时间、便利顾客一样，应该说是可以安排的。

我从机关打蜡这件小事，联想到当前改革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即以我这篇小文所接触到的而言，就可举出如一个部门做的“好事”同它应负的职责区别何在，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位置如何（是服务者为被服务者服务，还是被服务者为服务者报务），怎样看待正常的工作时间和所谓“不正常”的工作时间（即有的部门工作时间必须放在人们的正常休息时间之内），这些在理论上似乎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相反，倒是常常混淆不清，有理变无理。譬如明明是应尽的职责，却被看成是分外的“好事”。做好事就是施予，受施予者除了感谢，当然没有发言权。所以虽说服务者理应为被服务者服务，但在实际生活中多的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某些所谓“不正常”的工作时间恰恰应是这个部门的正常工作时间，但是习惯势力却硬是不承认这点。我所见可能甚小，但这几个问题，我想是值得议论的。

一九八五年

运用小说研究历史

清朝名史学家章学诚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叫“六经皆史”，认为《春秋》、《尚书》、《诗经》、《易经》等儒家称之为经典的著作，都是历史。这个观点不是章学诚首创；在他之前，元朝郝经说过“古有史而无经”，明朝王阳明说过“五经亦史”，李卓吾说过“经史一物也”。到清朝，袁子才也说过大致类似的话。但是，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观点的，则是章学诚。我认为这个观点有进步意义，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视野。不仅“六经皆史”，更应该再扩而大之。

从一个目光敏锐的史学家角度来看，凡是过去时代一切文字的记载，都是历史，至少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其中，我特别要指出，历代的文学作品，都是过去时代生活的丰富生动的历史。而文学作品中，小说尤其最值得重视，是最能体现出历史真貌的图卷。小说的特点是叙事、写故事、写生活、写人物的声音笑貌，比起诗词歌赋散文，显然更能显示时代的全貌。这里有一个问题：小说故事尽管来自现实生活，但情节有真有假，基本上出于虚构；难道虚构的故事也能视之为历史吗？当然不能。谁要是把《红楼梦》当作某朝某时某地某些人真实的正史来研究，不仅要受到历史学家的嘲笑，就是不研究历史的人也会讥之为无知。但是，《红楼梦》的故事虽然有真有假，基本上只能说是虚构的，然而活跃在书中的人物却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其中所反映、描绘的当代生活也是真实的。这在正史如

《清史稿》之类的书上是找不到的。

我决没有贬低或抹煞正史的意思。研究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历史，学习中国历史，到底离不开《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不能用小说取代。但是，我们传统观念里的正史所提供给后代人的，只能说是某朝某代的大事记与人名录，或者是简单的履历表，内容很枯燥。其实，后代人希望了解的，往往是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纵深内容，以及活生生的人物和他们的感情，这是正史中所缺少的，这个缺陷，古代的小说，虽不能全部弥补，至少可作部分的弥补。譬如说，清朝初期的社会生活和人物活动，我想与其通过《清史稿》或箫一山的《清代通史》去了解，不如通过《红楼梦》、《聊斋志异》、以至《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这些产生于清初的小说去了解，比较可以全面、深刻。甚至某些当时存在的制度、设施，正史中来不及记载或是遗漏了，小说中却保存了下来，成了珍贵的史料。

这里不妨举一个有趣的小例子。

“海关”这个名词和职能，今天大家都很熟悉，但中国“海关”起于何时，史书里没有记载。一般总以为是海禁开了以后的事，如新版《辞海》的“海关”条说：“中国在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设江、浙、闽、粤四海关。”《辞源》则不论新旧版都没有“海关”这一条。其实，海关在中国起源很早，小说里就可以找到了，《中文大辞典》“海关”条注意到这点。

汉朝刘向写过一部带有小说意味的《列女传》，书中有一篇叫《珠崖二义》。珠崖即现今的广东琼山县（也可能就是海南岛），当时同内地是隔绝的，贸易往来颇有限制。那地方出珍珠，不许带进内地，设有关卡检查。据这篇小说所载，这个关卡有一

个专门的名称，叫作“海关”。这应该说是最早的关于“海关”的记载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名叫初的女孩子，随同她的继母从珠崖过过去内地，海关官员在她继母的镜匣中查出十颗珍珠，按法就当判罪。其实，珠子是继母的九岁儿子好玩放进镜匣里去的，初和继母并不知道。初以为是继母所放，怕她定罪，便说是自己放的。继母则以为真是初所放的，为了不叫初定罪，也抢着说珠子是自己放的。这一来为难了海关官员，不知究竟应该定谁的罪，最后为母女二人的义气所感动，不加追究，放她们过关了。

这个故事的情节可能是传闻，但是却告诉我们这样的历史事实：一、海关早在汉朝刘向时代，即公元前五〇至四〇年左右已有设立，其名称和职能同今日海关竟是如此相同。二、那时海关的检查很严格，私自携带违禁品入境，是犯罪的行为；这同今天的海关职责也是相同的。由此可见，小说可补正史之不足，这篇小说即是一个例证。

我还可以再举一个更小的例子，说明一向受轻视的小说中保存着不容忽视的珍贵社会史料。元朝人宋梅回写过一篇文言小说《娇红传》；小说本身不过是唐人传奇《莺莺传》的翻版，描述才子佳人相爱幽会的故事，但是，里面有一个地方写到当时政府颁有中表不许结亲的法令，因而使得一对有情人无法终成眷属。这是一个为《宋史》和《元史》所忽略的历史资料。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老早就认识到近亲婚配对遗传的不利影响，并由官方颁布法令，切实执行。

但是我们也看到，后代的政府并没有继续执行这条法令，这也是从小说中发现的：《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也是中表，他们不能结合，原因很多，然而书里所写的多种原因之中，

并没有中表不能结亲这一条。可见在清初，也可能在明代，这条法令已经不存在了，不起作用了。这与我们在近现代所经历过来的婚姻情况和社会习俗是符合的。据我所知，当前在民间，中表结亲比比皆是，并无严格的法令限制。

这里还可再举一个例子。十二世纪二十年北宋之亡，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局，不仅徽宗、钦宗二帝屈辱被俘，广大人民也遭受烧杀抢掠，备受亡国之痛。当时沦陷区的情形怎样，金国政府在占领区施行些什么镇压、统治政策，这在《宋史》和《金史》中都无法看到具体事实。但是，洪迈写的一部笔记小说《夷坚志》，竟有这方面的记载。书中有一篇《侠妇人》，写的是北宋亡国后，陷身敌军占领区的宋朝官员隐匿逃归的故事。其中写到金国在占领区曾经颁布命令，凡是逃亡隐匿的宋朝官员，准许投案，如躲藏不报，被人告发，一概处以死刑。当然，那时也有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奸人，但是更有爱国志士甘冒生命危险，想方设法投奔故国。这篇小说中有一段写到这个心向故国、隐身民间的宋朝官员，怀疑援救他的人，那人威胁他说：“你不依我的办法，天一亮我就把你捆起来，告到官里去！”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真实史料，也是那个时候金兵占领区的现实生活写照。作者洪迈当过南宋使臣，在金国居留多年，他写的这个故事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人物、结构好像模仿唐朝的风尘三侠（红拂、李靖和虬髯客），但是他写的这段金占区的现实生活情景，无疑是写实的。以古喻今，抗日战争时在沦陷区生活过的人，大概也都有这样的经历体验吧。

因此，我觉得读历史如不同时读一点小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读宋朝历史，像这里提到的《夷坚志》自然应该读，就是像《水浒传》这样的小说也不该放弃，这些书给我们提供

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历史真象。

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小说固然可以当作史料运用，终究不是历史，尤其是后人写作的以“历史”为名的历史演义和历史小说，不可作为反映当时的真实历史看待。例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这些历史演义，不是当时人写的，因此名为历史，却不能反映三国时候或隋朝时候的社会真实生活，所以这些小说只具备历史故事、历史知识的价值，而没有历史真实或历史史料的价值。至于现代人写的一些历史小说，他们好像身历其境地写了唐代、宋代、明代的社会生活，他们参考了许多史料、许多笔记，绘声绘影，结果不外隔靴搔痒，因为正像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一样，顶多只是在他的书里组织了一些有关的史料或故事，并不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

二

现代的史学家已经注意到把小说引进历史领域的重要性，并且应用到他们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去。

这方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陈寅恪从一部唐代传奇小说《续玄怪录》中考证出唐宪宗被弑的真相，勾勒出一幅公元九世纪初的一次宫廷政变的真实生动情景。

关于唐宪宗的死，正史上有三条记载：一是《旧唐书》：“上（指宪宗）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时以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一是《旧唐书·王守澄传》：“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志等弑逆。……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又一是《资治通鉴》：“（宪宗）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

人莫能明也。”三条记载所说的都是疑似之言，由于当时专权的内监隐讳事实真相，不许史官如实记录，于是像这样的大事，变得若有若无，成为历史上一大疑案。但是，《续玄怪录》的作者李复言却亲眼目睹了这次骇人听闻的宫廷政变，假托有一个县尉辛公平，为一个阴间迎接皇帝“上仙”的吏员邀去观看这次“人世不测”的事件。辛公平果然看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场面：那一天皇帝正在殿上歌舞作乐，殿下有一个将军带了五十个士兵守卫。半夜时，忽然来一人，将一把匕首交给这位将军，说：“时间到了！”将军手执匕首上殿，一忽儿，左右乱纷纷起来，皇帝头发晕了，音乐停止，扶进西阁，久久不出。又过一忽儿，把皇帝抬了出来，放进轿子，抬出殿门。随从都哭泣拜别，有的攀住轿子，不忍舍去。据陈寅恪的考证，这段描写所记载的事实，就是宪宗被弑的真实情景。李复言假托道家“兵解”之词，故作玄虚。道家的所谓“兵解”，就是肉体被杀，是道家成仙的一种方法。陈氏最后说：“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陈氏的史学家眼光确实是非凡的，能从人们所忽视的“小说家言”中发现宪宗之死的“幸存之史料”。他的这一考证，见于他写的《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现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已成为史学界公认的定论。

另有一位虽不是史学家，而是著名的诗人与翻译家——戴望舒，他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篇极有价值的史学论文《读李娃传》。戴氏利用《李娃传》这篇传诵一时的唐代传奇小说，还有别的几篇唐人传奇中的描写，论证了唐朝元和至长庆年间首都长安的街里组织和夜禁法令对于居民的限制，使我们能够观察到古代长安社会生活的某部分真实情况。这里只举这篇论文对唐代

首都夜禁法令的考证。戴氏根据《唐律疏议》关于“犯夜”所规定的条例，说明一到天晚，起更的时候，顺天门就要击鼓，各坊里关闭里门，官街上断绝交通，不许人行，只可在坊里之内来往。直到五更三筹，顺天门再击鼓，坊门重开，官街始许人行。夜禁中谁要是还在大街上行走的，就是犯夜，按律就得处罚。但是大家知道，法令的规定是一回事，是否执行、如何执行又是一回事。戴氏的功绩就是在于从唐人传奇小说中找到了有关这方面的确切的记载与叙述。

例如，在《李娃传》中，当荥阳公子初至李娃家，推说住处路远，想赖下过夜的时候，李娃的母亲说：“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这是说夜禁的预报鼓声已响了，你乘里门尚未关闭的时候快走吧，迟了就犯禁了。

又如，戴氏的论文又指出，在沈既济的《任氏传》中，故事的主人翁郑六在妖狐任氏那里宿了一宵出来的时候，“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这是说天未亮，夜禁尚未解除，必须等到击鼓解禁的时候，方可行走。还有在薛用弱的《集异集》的《裴通远》条中，记载了裴通远自通化门归来，有个白发老太婆跟着，“至天门街夜鼓将动，车马转速，姬亦忙遽而行。”这是说当时人们在夜间戒严前的匆忙赶路情况。那么，如果正在路上，鼓声停了，怎么办呢？这在小说中也有反映。牛肃的一本小说《纪闻》中就有一条叫《张无是》，说“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跽”。跽，指身体蜷缩而伏。这是说，夜禁的鼓声一停，里门就关闭了，行人只得躲进桥洞去，蜷起身子来捱过一夜。

戴氏这篇卓越的论文，证实了我在前面提出的一个论点：

史学家一旦以史学眼光研究各个时代的小说，他所看到的无不是新鲜活泼的史料。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这是小说的一个特点；但是它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却是真实的，这个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细节，也是真实的。这是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有些小说虽然写的是鬼神狐怪，故事荒诞不经，但它离不开人间生活。只要准确地知道某部某篇小说产生的时代，史学家总能从中找到关于那个时代的许多新鲜活泼的史料。

吴晗是明史专家，他主要根据《明史》、《国榷》、《明实录》以及明人文集等作为研究资料，但是他也很早就注意到小说的史料价值。他的那篇著名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论文，并不是从文学角度落笔，而是一篇史学论文，是一位历史学家通过《金瓶梅》这部小说所描写的社会生活，为我们勾勒出明朝嘉靖至万历年代（即一五二二至一六一九年这大约一百年间）一幅明朝中叶的社会图景。吴晗在这部小说里看到了他在正史中所没有看到或看不真切的许多事情，譬如说，那个时候的佛教的盛衰、太监的威势、皇庄、皇木（内廷大兴建造，派官员分赴各地集办大木）对人民的损害、商人对农民的剥削，地方豪绅同税吏勾结而偷税漏税，同官吏勾结把持内廷进奉而营私舞弊、人民极端贫困而卖儿鬻女，等等。吴晗认为，《金瓶梅》所写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他由此得出了关于这个注定要灭亡的朝代的结论：“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农民的忍耐终有不能抑止的一天。不到三十年，火山口便爆发了，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起义，正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必然发展。”

《金瓶梅》一向被视为“淫书”，但是在史学家的眼中，它的淫秽部分只是一个次要问题，重要的是，它是一部真实反映

明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包含着大量的丰富史料。史学家要研究、认识明代中后期这个时候社会的邪恶、腐化、淫荡、堕落的概貌，是不能放过这部小说的。

三

在历史研究中，应该考虑到历史人物活动的感情因素。我们的历史研究比较重视人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或阶级因素，很少考虑感情因素。理智支配人的行动，感情同样也支配人的行动。战国时的豫让为智伯报仇，漆身吞炭，慷慨就戮，至死不悔。赵襄子问他，智伯名声不好，你这样为他而死，不是很不值得吗？豫让说，我追随过两个主人，范中行以众人待我，所以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所以我以国士报之。我们常说的“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应当看到，豫让为智伯而死，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的因素，不如说是感情的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人的感情是异常丰富复杂的，有时甚为微妙。历史上不管大人物小人物都是凡人，决非超人，他们同所有的人一样，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是很微妙的。有句名言叫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同恨都是感情的表现，这两句话在这个意义上讲，是有道理的。豫让的知己之感，主要是感情问题，谁待他好他就报答谁，至于这个人的品质行为如何，他并不在意。

由于历史人物的某些复杂微妙的感情，造成某些历史性的事件，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明太祖很看重明初诗人高启的学问，他一登位，马上征召高启参加《元史》的编写工作，任为

翰林学士。《元史》修成，又要他做户部侍郎，这就是财政部副部长了，绝非小官。但是，高启从他被征召起，一直郁郁不乐，最后坚决辞官，当然话说得很婉转，什么才疏学浅，年资太轻，表示谦虚惶恐难当重任，事实上是不愿做朱元璋的官。明太祖很恼火，但表面上又无可奈何，只好不露声色，放高启回乡，心里却已暗藏了杀机。不到两年，找了一个机会，在苏州知府魏观的上梁文事件中，说高启是上梁文的作者，逮捕起来，押解到南京，处以腰斩的极刑。一般死刑不过斩首罢了，高启却被腰斩，说明明太祖的愤怒不同寻常。推究起来，高启为什么有官不做，以致招来杀身之祸呢？我以为主要就是出于感情因素。原来高启对于跟明太祖敌对的张士诚政权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本人与张士诚虽然没有个人的接触，但他在张士诚政权的统治下生活了整整十年，跟张士诚政权的一些重要人物有密切的交往，受到他们的礼遇。他参加明太祖倡导的《元史》编写工作，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逼上路的。他虽然替明太祖办事，但感情上始终有距离。这种微妙的感情，高启表面上不敢显露出来（他的诗文是透露了这种微妙感情的），但英明如明太祖者岂会不知，岂不怀恨在心？高启的死因就在于此。

方孝孺是历史上有名的“硬骨头”，他为了忠于建文帝，不肯为成祖草拟登位诏书，被成祖处死，并屠十族。后人批评他为了维护建文帝的正统，不惜杀身，人家成祖同建文是叔侄，一家人夺皇位，关你方孝孺何事？这不是既愚且迂吗？持这个批评的人不懂得，这种愚和迂除了方孝孺的正统思想、倔强性格之外，还有很大的成分是属于感情因素。方孝孺是建文帝的老师，朝夕相处，师徒十分相得。方孝孺为建文争正统，一方面是忠于他的儒家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则显然是出于他同建文

的深厚感情。

这类感情的事例，历史上可以举出不少。可惜正史里面除了《史记》，大都被枯燥的记载所淹没了。我决不是感情决定论者，只是想说明一下感情的作用在历史的研究中应该受到一定的重视。而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小说中，描写感情的成分特别浓重，对于人物的感情表现得特别细腻。所以，一个史学家应该注意各个时代不同类型的小说，从中体会历史人物的感情因素。

用史学家的眼光看小说，比起一般人看小说，自能看得更深，更觉得有意义，不但得到艺术享受（这是一般人共有的），还能得到历史享受（这是史学家独有的）。史学家都有“历史癖”，用史学家的眼光看小说，不但看到了生动的情节故事，活泼泼的人物，还能同时满足“历史癖”。

运用小说来研究历史，固然很有必要，但也有几个前提条件：

- 一、必须判明小说的产生时代和作者的经历情况。
- 二、必须同正史或某些野史的记载比较对照，作比较的研究。
- 三、由此必须分别小说中反映和描写的社会生活，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从而作出判断。

一九八五年

“样板戏”不可忘

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作为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重要手段之一的“样板戏”也应彻底否定，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正如我们不会否定正面意义的革命一样，我们也不会否定京剧改革和现代戏。“文化大革命”和“样板戏”虽性质不同，但在大革文化命的浩劫中，却融为一体。凡是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提到“样板戏”，必然会联想到批斗时的吼叫声、逼供时的拷骂声，以及善良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呻吟声，更多的是充塞在人们心灵上的无声的恐怖。“样板戏”便是这些声音的伴唱曲。“样板戏”本身就是杀气腾腾的，我举一事实为例吧。

大概是1968至1969年间吧，上海一家大报赫然以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登出了“保卫样板戏”的长篇报道。大意是说上海近郊川沙县某一个集镇上，有一个说书艺人把《智取威虎山》改编为评话，添加了许多情节与噱头，歪曲了“英雄杨子荣”的“光辉形象”，当然也就是歪曲了“伟大旗手”“呕心沥血”的原意。因此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阶级敌人向“文化大革命”的进攻云云。随后不久，就听说这位说书艺人以“现行反革命”的罪行被枪决了。一时之间，“保卫样板戏”的口号着实鼓噪了一阵。我不知其他省市有没有同类的事情发生，但因各种原因冒犯“样板戏”而受迫害的人，肯定不在少数。

大家请想：一出普通的京剧现代戏，有什么了不起！改成故事，作了某些润色改动，也是很平常的事，何至于就犯了问斩的大罪？“样板戏”是“四人帮”独裁专政、向人民开刀

的工具，沾满了血腥味，这不是清清楚楚吗？

在那段漫长的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样板戏”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日日夜夜往人们耳朵里灌，要你喜一人之所喜，爱一人之所爱。“样板戏”的精髓归结为一个字，就是“斗”。“文化大革命”驱策于人们的不也正是一个“斗”字？“样板戏”不单逼迫人们听，到后来索性逼迫人们都来学唱。八亿人民同唱“样板戏”，猗欤盛哉！“舆论一律”加上“唱戏一律”，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律”，这就是“四人帮”一伙所谓的“社会主义”“太平盛世”了。

我介绍一点自己的经历：一九七〇年，我从“五七”干校被赶到一个工厂去“战高温”，每天上班都有“天天读”，读前全体合唱“样板戏”，由一个经过脱产学唱过“样板戏”的青工教唱。她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谁唱得起劲，谁就是政治觉悟高。日子一久，没有一个人不感到腻烦的。唱了一阵，实在唱不下去，只得自行停止了。这说明“四人帮”想用政治手段强行推行“样板戏”，其政治目的是明确的。“样板戏”是“四人帮”肌体上产生的一颗毒瘤，对广大人民有害无益。

为“样板戏”作辩护的，大都脱离上述的事实。说“样板戏”在艺术上是成功的，现在还有人爱听，我看这种说法不值一驳：第一，评议“样板戏”怎么可以抹煞它给广大人民所带来的痛苦与不幸呢？如果连江青这几出“样板戏”尚且否定不了，如何谈得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呢？第二，即使从艺术角度来说，“样板戏”也是失败的。它们中的正面人物，不过是丑名远扬的“三突出”的产物，无非是些“假大空”的典型，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牵线木偶。它的唱腔也大都东一段西一段从传统戏里拼凑而成（见《新民晚报》载徐城北记谭富英语）。

当然，有人爱听，人各有所好，那也听其自便。

还有一种辩护：认为江青是窃取京剧改革的果实，是“贪天之功”，而京剧现代戏本身是好的，与她无关。实际上，这些原优秀剧目经江青插手成为“样板戏”后，主题、人物以至唱词等都走了样，早已面目全非了。江青声称，她要“十年磨一戏”。确实，她连最细微处也不放过。举一个极小的例子，《智取威虎山》里不是有一个反派叫“一撮毛”吗？江青“磨”了几年之后，改名为“野狼嗥”。用心之细，可叹观止。这种“呕心沥血”之“功”，真非“旗手”莫属了！不能否认，样板戏与江青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样板戏”在经过短时期的韬晦后，近两年来先是“探头探脑”，接着“大摇大摆”，现在是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了。我看，这倒是好事，提醒人们：“文化大革命”不可忘，而当前，则是“样板戏”不可忘！

巴金倡议成立“文革博物馆”，得到了人们热烈的赞成，这太有必要了。我建议：“样板戏”应该是“文革博物馆”的主要内容之一，要辟专室陈列，展示它的全过程，以教育后代，也教育当代那些已对这段惨痛历史有所淡忘的人们。

一九八六年

不要人为地制造神秘感

——答《文汇报》问

洁本《金瓶梅》完全可以公开出版。《金瓶梅》是一部我国古代文学巨著，它广阔真实地反映了明末社会现实生活，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如果说《水浒》还有一定的传奇色彩，《金瓶梅》则完全是一部世情小说。可以说它是我国另一部世情小说文学巨著《红楼梦》的先驱。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反映了当时明代中期万历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早在三十年代，郑振铎就把这部小说编入“世界文库”，把它和《唐·吉诃德》等世界名著放在一起，这也说明了《金瓶梅》这部文学巨著的地位。要了解中国文学史，缺了《金瓶梅》怎么行？

《金瓶梅》中确有不少自然主义的描写，全本出版当然不太适宜，现在既然出的是洁本，就没必要内部发行，人为地制造神秘感。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了让广大青年读者了解《金瓶梅》这部古典文学名著，正准备出版《金瓶梅》的简写本。

一九八七年

开卷有益

我读书很杂，没有什么系统，只是数十年来养成了习惯，每天非读一点书不可。我很相信古人说的“开卷有益”：第一，我每读一本书便增加一本书的知识见闻。第二，书籍充实了我的精神生活，不读书或少读书，精神便空虚了。所以我主张多读书，多“开卷”，不妨杂一点，不要多加限制。前两年，曾有好心人对“开卷有益”这句话提出批判，怕青少年读了坏书，误入歧途。坏书自然是有的，每个时代都有，但比起好书来，终究只占极少数。而且有了比较，方能分辨好坏，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这点上讲，不必害怕坏书。

“文革”带给人们的灾难和痛苦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不许读书是灾难之一。当时如能从专制的夹缝中，得到一部好书，那喜悦又是倍于寻常的。记得“文革”初期，有一位青年朋友借给我一部他也是辗转借来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部书那时属于“内部发行”，只许高级干部看，一般人本是无缘得读，因为抄家流落出来。厚厚的上下两册，傍晚拿来，限定次日一早便得归还。我不顾第二天批斗命运如何，通宵一口气把书读完了。这部书展示给我一条真理：不管法西斯专制统治多么强大，最后必定灭亡。第二天我强张着困倦的眼睛，进牛棚，挨批斗，但是精神很充实，脑子里还在想着这部书的内容。后来我被发配去工厂“战高温”，一战便是八个年头。批斗算是恩免了，无书可读之苦依然。但也偶有好运气。有一次忽然得到一本也是“内部发行”的爱因斯坦文集，真是如获至宝，几乎是如饥似渴吞读而下。这本书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原来爱因斯坦不仅

是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民主自由战士。这本书也使我从某些偏见与无知中解脱出来。又有一次，意外地借到了一本海涅写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本薄薄的小书，却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和明亮的睿智，看厌了“大批判”式的陈词滥调，这本书就像一股清澈的泉水，洗净了我的耳目。还有一次，通过一位派去整理图书的同志帮助，偷偷地借到一部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这部考据学名著，它那滔滔的雄辩与缜密的论证，也使我在那长夜漫漫的日子里，获得了一次难忘的精神上的享受。我举以上例子，想说明的是经历了书籍的禁锢之厄，愈加感到有书可读的珍贵。

读书之乐无穷，这话许多人说过，但究竟乐在哪里，各人体会不同，说法不一。这也不能强求一律。我的经验仍是一上来说过的，就是多读书，开卷有益。

一九八七年

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

王国维是我敬佩的近代学者之一，前些时，听说海宁王国维纪念馆落成，许多知名人士前往参加开馆仪式，气氛热烈隆重，这说明王国维的学术地位终于得到了普遍的承认，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最近有机会去海宁一行，专诚拜访了这座纪念馆，瞻仰了王国维的故居遗物，徘徊廊庑这下，缅怀先贤，肃然起敬。但是在观览之余，却也发生了一点迷惑不解的想法，置身展览厅中，好像又回到了过去遗老的年代。在展出的图片和生平事迹介绍中，相当突出地渲染了王国维接受宣统皇帝恩赐“南书房行走”这段历史，橱柜中还以显著位置陈列了溥仪“敕授朝奉大夫食五品俸赐南书房行走谥忠懿王公墓志铭”的大幅拓片。恕我直言，这座纪念馆好像不是纪念著名学者王国维，而是纪念前清遗老王忠懿公了。我所迷惑不解的就是：历史难道真的后退了？当然历史是不可能后退的，后退的是人们的思想。这样的纪念方式，即使在解放前，恐怕也要为进步的有识之士所笑的。

照我看，纪念王国维的最好方式，应是如实地反映他一生的成就和局限，不粉饰美化，也不贬低抹黑。王国维是学术的巨人，但政治上是落后的保守的，这点在解放前就已成为一致的定论。他的接受“南书房行走”，以至最后自沉昆明湖（原因说法不一，害怕革命是主要的），是新旧交替时期一位正直学人的历史悲剧。这，大家是原谅他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况且比之于一些易代之际的软骨头文人，其品格之高低又奚啻天壤之

别。这反而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尊敬。所以，指出王国维政治上的落后面，丝毫无损于他那学术巨人的形象。倒是遮遮盖盖，或是故意拔高，甚至是非颠倒，那不仅不是爱护王国维，反而是歪曲了王国维。

这几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讲“实事求是”，这自然是对的。但怎样才是实事求是，显然还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以为只有做“翻案文章”，才是实事求是。其实有些历史已做出了的正确结论，是翻不了案的。保皇党就是保皇党，你不能把他翻成革命党；帝制派就是帝制派，你不能把他翻成民主斗士；汉奸就是汉奸，你不能把他翻成做汉奸乃是出于“救国救民”。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就是政治上的落后表现，你不能翻成他的光荣史，如此等等。因为这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我们现在有点讳言立场、观点了。其实，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还要有个立场、观点的问题。保皇党、帝制派、汉奸、遗老，他们也会讲“实事求是”，那是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上，用各自的观点讲。他们的观点、立场都是错的，有的还是反动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不能顺着他们跑，否则就会迷失是非的标准，彼此彼此，就无所谓历史的功过了。

看来，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坚持，立场、观点也还是要讲的。

一九八七年

奥斯卡奖与诺贝尔奖

谢晋导演写了一篇好文章《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见二月十六日《文汇报》），他谈的是当前电影界的问题。但是，他所议论到的几个问题，诸如红眼病、劣根性等，却带着普遍性，可以称之为社会病，是长期“左”的思潮所形成的恶果。别的且不说，只说他提到的某些人对奥斯卡奖的态度，就很值得我们思索一番。他说：“外国很多演员讲，我这辈子就是要竞争奥斯卡奖。中国人不成，你这个人讲要拿奥斯卡奖，就会说这家伙骄傲、狂妄，不知天高地厚！”谢晋指出这种现象，显然不是为了说明中国人很尊重奥斯卡奖，而是说明咱们中国某些人的反常心理：我没有志气干，也不愿你干；我没有本事干，也不让你干。我看此外还有一种奇怪心理：你奥斯卡奖算什么，我还不在乎呢！报刊上登过的介绍文章，免不了都要批一通奥斯卡奖的商业化和腐朽本质。有了这种心理，拿不到奥斯卡奖自然没有什么不安了。

从奥斯卡奖可以联想到诺贝尔奖。对待诺贝尔奖的态度，好像比对奥斯卡奖的态度要好一些。几位得到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我们的宣传报道都是特殊热情的，他们回国访问无不以国宾待之。甚至把他们在海外发表的某些言论，引用来作为批判国内某些不同观点讨论的依据。那么这是不是表明我们真的很重视诺贝尔奖呢？也不是。因为至少在思想观念上（且不谈物质条件吧）鼓励自己科学家去争取诺贝尔奖，并不表现如何积极。记得两年前有一位青年学者写过一篇文章，不无感慨地希望人们以把女排的胜败视为国家荣辱的关注之情同样地用在拿不拿得到诺贝尔奖

上面，当然他这样说决无贬低女排为国争光之意，倒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观念问题。这个观念问题若不解决，同人家的差距恐怕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去年有几篇谈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和谈话，使人饶有兴趣。大致的意思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平不高，评奖只是少数几个人做决定，许多大作家都未得过奖，不值得过分重视等等，并且一再引据肖伯纳、萨特的拒绝领奖，以证有识之士对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屑一顾的。我看这里面也有点反常心理在作怪，把对方贬低，以显示自己拿不到的有理。肖伯纳、萨特固然很可钦佩，但谁能否认绝大多数领奖者所获得的个人和国家的荣誉呢？

我说谢晋写了一篇好文章，就是因为他引发人们去深入思考一些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问题。

一九八八年

买鸭变鹅记

南京板鸭的盛名，可说尽人皆知，我也是爱食者之一。虽然板鸭的价格，一年贵似一年，但每到春节，总要设法买上一只，作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肴。据内行的朋友介绍，南京的盐水鸭，肥美鲜嫩，可与板鸭并称双美，只因不能行远，所以外地人知道的少。我非老饕，更非什么美食家，听了也不免食指微动。

不久前，搭伴出游，归途中需要路过南京转车，心想这是一次好机会，一定要买一只盐水鸭，带回去与家人共享了。可是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所以一到南京车站，放好行李，立刻跑出去寻找鸭店。运气真不错，就在车站旁边一条小街很快找到一家“个体户”鸭店，摆出的盐水鸭，皮色白洁光亮，标价三元八角，围着买的人很多，大概都是过往的旅客，其中也有我的游伴。有的零斩一小袋，有的买整只，大家拎在手里，无不面有喜色。我也排在后面，轮到我前面一位顾客，听他问：“多少钱一斤？”年轻的女掌柜答：“四块二。”标价三元八角，正式卖价却要四元二角，原因何在，无人提出异议。我想大家的心理，能买到就好，价格多少不再计较。

我买了一只，付款，退出行列，正要走开，忽听边上有人说：“这是鹅，不是鸭。”我犯疑起来，问道：“这是鸭，还是鹅？”女掌柜一面麻利地为下一位顾客打秤，一面很快捷地回答：“自然是鸭子，怎么会是鹅呢？”我相信自己没有上当，高高兴兴提着这只肥肥大大的盐水鸭，回到车站游伴们身边，很有点得胜回朝的味道。却有不相识的旅客说道：“这是鹅呀，鸭子哪有

这么大的！”我争辩道：“店里明明说是鸭呀。”不相识的旅客道：“在南京只新街口才有鸭子，车站四周卖的全是鹅！”游伴们也都聚拢来审视，有说是鹅，有说可能是鸭，但多数鉴定确实是鹅，安慰我道：“鹅比鸭好，可以治癌。”“鸭子油多，鹅的精肉多。”语调里多少带点善意的嘲笑。我也自嘲道：“旧时书生不辨菽麦，百无一用；我今日鹅鸭不分，宜乎吃不到盐水鸭，只能吃盐水鹅了。”但心里仍在企望，最好是鸭，不要变鹅。

回到家里，忙忙叫妻也来审察。妻看看它的头，平平的，说大概是鸭吧。我大为高兴，赶紧叫她去斩了，快快品尝。妻拿去厨房，斩了一盆出来，笑说：“真是鹅呀，还有一半隆起的鹅头藏在里面呢！”至此我只能承认，果然买鸭变成了鹅，不禁哑然自笑，又惘然若失，好像总有点不大对头的地方，想同感者不止我一人，于是提笔为记。

一九八八年

制止名胜古迹庸俗化

——游临潼华清池有感

西安是我向往一游的城市，那里的秦砖汉瓦唐碑，每一块都散发着吸引力。最近得以一游，但在发了一通思古之幽情后，却也发现了一些管理工作上的问题，觉得应该引起重视，加以改进。

今以华清池为例。这里林木葱茏，楼阁弘丽，温泉水滑，加上广泛流传的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故事，给人的印象是美好的。但是有两件事，却大大破坏了游人的印象。第一件，进园门不多几步，墙上钉着一块刻有“周恩来同志沐浴处”的铜牌，使人觉得突兀而好笑。我这样说，决非不赞成为周总理留纪念，而是认为在华清池为周总理立这么一块牌牌，时地不宜，反而亵渎了总理的高尚人品。

第二件，华清池小贩林立，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摊店，简直成了一个闹哄哄的大市场，山林园池无不饱含商业的气息。这里有卖土特产的，纪念品的，吃食的，照相的，等等。这尚不足为奇，最奇的是到处可见卖录音带的摊店，不断地用大音量播放不伦不类的流行歌曲，唱的是什么“从马克思到斯大林，没有一个不抽烟”，反来覆去播放，竟无人过问。许多摊位上还陈列着一种用黑缎制成的清朝人戴的红缨帽；还有瓜皮小帽，帽后还系着一根假辫！我当真看到有日本游客戴在头上！说实在话，看到这种情景，我是感到脸红的。

近年来，我国旅游事业蓬勃发展，使祖国的壮丽河山、名胜古迹展现在全世界游客面前，国家也得到巨大收益，这自然是大好大过的事情。但是管理工作却没有跟上，特别是对名胜古迹环境优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庸俗化的倾向，使游客（尤其是国外游客）产生“一次性”的心理，有的甚至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我举的华清池的这两件“煞风景”的事，自然是个别现象，但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我前年去北京，观光了慕名已久的琉璃厂，看到一条街上所有招牌、门面，无不修整一新，金碧辉煌。要说光彩夺目，富丽堂皇，那是没话说了。但是我原来心目中的充满高雅、文静和书卷气的琉璃厂，却荡然无存了。第二次就不想再去了。我曾将这个印象与北京文化界几位朋友谈起，想不到他们早有同感。有一两位曾向有关部门提过意见，当然没有下文。

因此，倘有人问我：当前名胜古迹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回答两句话：制止庸俗化，救救名胜古迹。两句话其实只要说一句，就是制止庸俗化。这一句办到了，名胜古迹也就得救了。

一九八八年

自觉与强制

——也从上海新客站说起

《解放论坛》刊载的《新客站见闻随想》，指出了对于这个现代化建设项目“能不能管好、能不能用好”的问题；在《新民晚报》上，记者方任有感于新客站某些不文明的“憾事”，则写了一篇《管好和用好》，呼吁旅客“要多一点文明”；建议管理部门“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我完全赞成他们的意见。

但是我觉得要真正“用好和管好”，必须先弄清两者的关系。所谓用好靠的是自觉，所谓管好靠的是措施，而措施总是带有强制性的，所以先要弄清楚自觉与强制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做什么事都强调说服教育，强调自觉。为了启发人们的自觉这自然是一个好的传统。但多年的实践又证明，对于有些事，特别是对于维护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的一些事，光靠自觉或说服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以相应的规章或法令，强制执行。强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启发和培养人们的自觉，使之成为个人行为的准则。自觉与强制，既是一对矛盾，又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

这方面，我想香港的某些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四十年代后期，我去过几次香港。那时的香港，市政建设方面落后于上海，但在执法守法上却胜过上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严禁吐痰，定为法令，违者处以二十元港币的罚款（按当时的币值，是相当重的）。而且不是当街一罚了事，乃是给你

一张传票，叫你在规定的日期去法庭“过堂”（即站在被告席上），要经过由起诉至审判的程序，最后由法官判决。报纸上每天都登出一大串违法吐痰者“过堂”罚款的名单。人们不能不佩服他们执法守法的执著精神。上个月，我又去一次香港，时隔三十多年，香港市政建设已大大超过上海，执法守法精神依然领先，而公共场所的整洁光亮，使我叹服。我没有看到有人随便吐痰，也没有发现有一只痰盂，吐痰好像已不必著为禁令。显然，三十多年前的强制，已产生了效果，形成了人们的高度自觉。香港的朋友告诉我，地铁原来不禁止吃食，结果遍地丢弃包装纸。于是禁止在地铁吃食，违者罚款一千港币。严禁与重罚，人们从被迫遵守到自觉遵守，果然在地铁车站和车厢内，今天已看不到一片纸屑。在地铁车站还看到一家叫作“吉百利”的巧克力广告，整幅画面只有一块大巧克力糖，别无说明，下幅则印有一行文字：“香港政府严禁在地铁吃食，违者罚款一千元，吃食吉百利也是一样”。这种广告术可说相当高明，用的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方法，在宣传政府法令的旗子下，宣传了自己。

不用多说，香港存在许多弊病，不能一味叫好；但是凡去过香港的人都承认，它的市政管理水平是高的，一个万花筒般的社会管理得井井有条，它处理市民的自觉性与政府部门强制性措施之间的关系是卓有成效的，也就是说它解决了公共设施的用好与管好的问题。人家有长处和好经验，为什么不能拿来为我所用呢？

上海现在也在实行一些措施，譬如当街吐痰，就有纠察上来处以罚款，一次五角，开始有所收效，但处罚过轻，日子长了就引不起人们重视。上月我从广州回上海，在上海机场等候

领取行李。这个地方墙上贴着很醒目的严禁吸烟的字条，但是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士却堂而皇之地吸着烟。一位纠察手执发票簿上前叫他罚款，男士神气十足：“不准抽烟？谁规定的？”纠察指给他看墙上的标语。男士无可奈何，把烟用手捂起，说：“好，那我不抽行啦？”“不行，抽了就要罚款。”于是双方开始争执，最后男士只得掏出罚款，但是仍然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好，我交了罚款，我可以抽完这枝烟了。”于是双方又开始争执，最后男士愤愤然地将烟灭了，但嘴里还在叽咕不停，以示不服。这件事说明，即使有一定的措施，但不够严厉，强制性也不强，就难以启发和培养人们的自觉。

我再回到方任的文章，我很愿意补充他的建议，管好新客站必须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但这措施不能只限于多添设几个痰盂就行了，而是整个管理观念必须彻底改变。要看到管理好一个公共场所，必须处理好自觉与强制的辩证关系，方能真正用好和管好。我建议有关领导部门，不妨以新客站为试点，制定一系列规章或法令，强制执行，使新客站成为足以示范的、名实相副的“文明窗口”。

一九八八年

治标不如治本

——为上海市容管理进一言

上海的市容，长期来一直是公众（包括海外来客）议论的话题。作为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众多的脏乱差现象，与上海的地位很不相称，也使上海市民感到苦恼。上海市政当局为整顿好市容，动了不少脑筋，采取了很多措施，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不少措施或只奏效于一时，或只行之于局部，或前紧后松，或枝节应付，大都忙于治标，还未拿出一个治本的良策。试举两个例子：

一、随地吐痰。这是老问题，老毛病，几乎成了国人不治的痼疾。近几年上海为解决这个问题，将街道两旁活动脚踏痰盂，改为固定的挖空水泥痰池，上用铁条盖罩住，每天由清洁工人冲洗。开始时路人称便，但日久生顽，痰池周围痰迹狼藉（就是不愿上前一步吐在池内），果皮废纸充塞池内（废物箱就在痰池旁边），清洁工作也变得时有时无。后来拾荒者开始偷盗铁条盖，便留下一个个大缺口，有的路边痰池，索性用土填没。痰池的这一改进，便以失败告终。

二、垃圾成堆。据估计，本市每日仅生活垃圾就达万吨，前几年采用铁皮圆桶倾倒垃圾，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开始时，油漆得漂亮的绿色圆桶，很受市民欢迎；但日子一久，圆桶容量有限，垃圾在桶旁堆起，苍蝇乱飞，污水横流。圆桶陈

旧生锈，脱头落攀，瘪陷变形，也不见更换。现在全市到处可见的这种垃圾圆桶，大多沦为脏乱的象征。近日西瓜上市，市区生活垃圾大增，怎么办？据报载，一是发动全市环卫职工冒着酷暑，努力清扫；一是市府领导亲临劳动。劳则劳矣，但这种突击大扫除的办法，毕竟非久之计。

以上两例，是市政当局所注意到的问题，还有未被注意到的，更是放任自流。比如在街道旁树上或电线杆上晾晒衣物或被褥、棉絮；面街住宅有阳台者在阳台上晾衣服，无阳台者则特制铁架，无铁架者则伸出竹竿搭在树上或电线上，各种各样的衣服（包括内衣、裤衩、尿布等），于空中飘扬如万国旗！有朋友认为这是居民住房僵仄所致，我看主要还是管理问题。我去北京，见那里面街的公寓，不管有无阳台，都不晾衣服。北京朋友告知，这是北京市府为保持市容所作的规定。上海为什么不可向北京学习呢？

我以为管好上海市容的治本之计，最要紧的是先把老观念改过来，市政当局和全体市民都要树立法的观念。法令、法规、条例、细则，一经订立，执法者要严，守法者也要严。过去我们重视说服教育，做什么事都靠自觉，其实，自觉如果不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这种自觉是不牢固的。

为了彻底改善上海市容，我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尽早订立“上海市容管理法”，作为地方法令颁行实施。凡是不遵守法令的，便课以相应的罚金，而且要重罚，还可采取违法者“过堂”的方法，即由法庭开庭起诉、判决，以此提高法律的尊严，培养执法者和守法者的共同法制意识。这是解决市容问题的主要治本之法。

一九八八年

报纸的独立见解

——一个读者的期望

美国总统布什的就职典礼，就其新闻价值而言，大概不及他当选那天的报道，因此报纸处理这条新闻的方式，可大可小。但是大到上了一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则堪称新闻界的“破天荒”，成了新闻中的新闻。我翻阅了同一天从中央到地方的几家大报，发现对这条新闻的处理，虽则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其位置顶多不过放在头版的下半部，标题也颇简单，有的仅占一行，不脱当年中美开始交往时的“不冷不热”姿态，于此益发钦佩“敢为天下先”者的勇气。林勃撰文，认为这是破了几十年国际新闻编排的“惯例”（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论坛》）。诚然，我愿进申一言：凡事有破有立，破的是“惯例”，立的是“独立见解”。

新闻改革喊了多年，可谓收效甚大，问题尚多。谁都承认，这几年报纸面貌大有改进。但也不容讳言，禁忌不少，阻力重重。读者之间私下评论报纸，通常用的一句话是“有看头”，或“无看头”。可惜近来听到，多的是“无看头”。这原因，我以为就出在面貌雷同，缺乏独立见解。抗战期间，重庆的大公报是读者公认的“有看头”的报纸，就因它比别的报纸更具独立见解。当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投掷爆炸，消息传来，各报皆漠然视之，编在不显眼的地位；独有大公报看出它对二次大战的重大意义，用特大标题编在头版头条。杜聿明出任昆明保安司令，卢汉代替龙云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重庆各报也只有大公

报看出这是国民党政府为结束最后一个军阀割据而采取的准军事行动，编在头版头条，走在了别家报纸的前头。现在大公报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它的办报方针“小骂大帮忙”，解放后且一再作为资产阶级报纸的典型遭受批判，但我想它的某些经验，特别是报纸必须具有独立的“报格”，恐仍不无可供今天报纸借鉴之处。

上面说的仅指新闻报道，其实，发表言论更需要独立见解。“文革”十年，报纸成为“四人帮”的御用工具，那时的大小报纸，天天一篇社论，对人民群众进行威胁恐吓。在中央叫“两报一刊”，在上海叫“三报一刊”。每天早晨，电台广播这些社论，语调恶狠，杀气腾腾，老百姓胆颤心惊。事实上，用报纸社论威吓群众，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已曾实行，那时也是一天一篇社论，责斥各级组织“右倾手软”，督促“加温”。因此，老百姓对长期以整人唬人为能事的报纸社论，充满厌恶之情，是可以理解的。“四人帮”倒台后的报纸，回到了人民手中，顺应民心，一反其道而行之，少写或不写社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除了逢年过节，或有重大会议，人民日报偶有社论外，所有其他报纸全没有社论了。报纸自动放弃表达本社言论、观点的权利，我以为这也是报纸缺乏独立见解的一种表现。目前报纸盛行的每日一篇署名短论，毕竟不能代替社论的作用。中国报纸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敢于议政。内政外交，国际大事，都在评议之列。过去不少报纸，就是以社论在读者中获得声誉。近代许多名报人，如邵飘萍、黄远生、张季鸾、王芸生等，无不以其犀利精辟的社论见称于时。我要向我们的报纸发出呼唤：社论兮，归来！

我是一个看报数十年的读者，对我们的报纸爱之深，故言之切，野人献芹，也许都是外行话，说出来供办报诸公参考。

一九八九年

再谈报纸的独立见解

笔者前作一文，有望于报纸保持“报格”，发挥独立见解，以树立信誉，载二月十七日《解放论坛》。这一阵子看报，又有所感，意犹未尽，再写一个续篇。所感什么呢？就是日本首相竹下登的两次讲话意图推翻二次大战日本罪责，引起各国舆论的强烈反对，遂又不得不巧为辩饰，最后只好作出更正：“不能否认日本在过去战争中的侵略事实”。这次事件目前虽已暂告平息，但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报纸对这次事件的报道方式，我以为不妨稍作检讨，或许有益于今后报纸的改进。

竹下的第一次讲话，我们的几家大报，几乎无一例外，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均以小块形式登在国际版的次要部位，看到的读者，自然义愤填膺，但因为不醒目，忽略过去的读者也不少；还有一家大报当天未登，第二天再行补登的。标题也不显眼，有的标了标题，有的则作为“天皇战争责任”的副题，有的甚至不出标题，仅作为“天皇战争责任”的附带新闻报道。第二天，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谁也改变不了二次大战性质”的不指名的声明，各报方始有所重视，把声明登在头版的下半部位，但尚有报纸不将此声明登上要闻版的。而竹下的第二次讲话，继续鼓吹二次大战“应由后世史学家来评价”，仍未受到所有报纸的重视，我所看到的不少报纸中，只有《光明日报》和《解放日报》表达了自己的独立见解，登上了头版的下半部，标题也还明确醒目。随着我国人大常委会针对竹下讲话所作的驳斥，方有个别报纸发表了一两篇署名文章，对此事件有所表示。但是，迄今为止，

还没有看到一家报纸以本报的名义发表任何评论员文章，更不用说什么社论了。

谁都知道，中国是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对于任何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或翻案的言论或行动，中国人民是最为敏感和气愤的，这是丝毫含糊不得的原则问题。我作为读者一分子，对于我们报纸在这一重大事件上采取的报道态势和反应方式，感到不易理解。相形之下，别的国家认真起劲得多，报纸为竹下讲话发表社论，群众为昭和天皇战争责任上街游行，我们的舆论不是过于见绌了吗？

能不能说报纸因为遵守外事纪律和“舆论一律”的规定，所以在有关涉外事件的重大问题上，不允许率尔表态呢？我看就这次事件而论，恐怕不能这样说。第一，从这次事件的报道来看，报纸有的比较重视，有的只能说相对重视，少数并不重视，全由报纸自由处理，可知不存在什么“纪律”约束。第二，要说遵守“舆论一律”，那么我国外交部已就这次事件严正表态（虽然两次都未指名），报纸舆论不是更应迅速作出反应，表达广大人民的正义心声么？可见不能把责任诿之“舆论一律”。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我看主要还在报纸本身。这里涉及到报纸的主动性、敏感性、新闻意识、群众观念以及在有关国家民族重大荣辱是非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长期以来形成的在涉外问题上的自我约束习惯，等等，都使报纸不敢迈开手足，解放思想，表达独立见解，发挥舆论威力。

感触于这次竹下讲话事件的报道，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愿再次提出一个读者的期望，报纸必须具有独立见解，这是报纸的灵魂。同时也期望于宣传领导部门，应该欢迎和鼓励报纸具有独立见解，得以主动发挥舆论作用。这样的舆论才有权

威。

一九八九年

忌讳何必太多？

——从一篇国际评论说开去

五月七日的《解放日报》国际新闻版，刊出一篇《不得人心的号令》的署名短评，是为配合当天标题“伊朗议长鼓动暴力，公然下令杀西方人”的新闻而写的。虽不过三四百字，却鲜明地表达了对国际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的谴责与憎恶。我为之叫好：第一是写得好，第二是登得好。写得好，因为据我看，它说出了舆论界和广大读者想要说的话。登得好，因为一篇小评论，谈的则是大问题，很有点“闯关”的味道，登出来对于推进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无疑是个好兆头。

国际问题，特别是某些事涉友邦的热点问题，一向是我们新闻媒介的禁区，忌讳多端。这几年，国际新闻报道逐步有所开放，但国际问题的评论，却始终处在有形无形的约束之中，不敢越雷池一步。近如竹下登公开否认日本战争罪责与为裕仁天皇洗刷战犯罪名，世界舆论哗然，而我们的报纸评论却近乎无声。再像恐怖主义与暴力活动，这在国际上早已是舆论声讨，几无容身之地；有几次特大的恐怖阴谋和谋杀活动，举世共愤，我们的报纸因为上面没有表态，只好保持沉默，顶多跟着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造成这种忌讳，责任当然不全在报纸，有多年强调宣传政策和宣传纪律的结果。但是，报纸安于现状，也是一个原因。现在不安现状，提出新闻自由问题，是一大进步。听说“新闻法”的起草，修改多次，定不下来，中心问题是关于新闻自由的界限，意见统一不起来。我是新闻界“槛外人”，

也愿提一条意见，备起草诸公参考：新闻自由应包含报道的自由和评论的自由，不可缺一，否则新闻自由仍将是一句空话。

其实，对国际问题，在新闻媒介固然是一禁区，在其他各界又何尝不是禁区？因为这涉及到政府的外交政策，而向来的规定，外交政策是不容许议论的。但是，我认为这不符合民主的原则，也不符合党中央一再宣称“重大事件让人民知道”的原则。所谓“重大事件”毫无疑问包括内政外交。人民既然有权知政、议政、参政，则他的可知、可参、可议之政的范围，自然不应只限于内政，而是包括外交在内，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长期的禁锢，我们的舆论一直有意避开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我只知道一次例外，那就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例会上，曾对竹下登讲话表示义愤，对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温和反应表示不满，要求取消我国外长参加天皇葬仪的决定。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非政府机构对政府外交政策的辩论，十分难能可贵。遗憾的是，这样一次少有的辩论，大陆的新闻媒介也是由香港报纸“出口转内销”的。许多人对这次辩论不知情。

我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在审议和监督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工作方面，从其职责讲应是无禁区的。我在去年的七届一次大会时，在上海代表团的一次全国会议上曾提出过人大代表审议政府的国防和外交政策问题。但是没有引起注意。今年七届二次大会，我又在小组会上从人大常委会的职责角度提出这个问题。这次总算由大会“简报”转载了我的发言。我的意见是：人大应增设国防委员会，现有的外事委员会应改为外交委员会，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国防政策和外交政策发挥作用，改变把国防、外交视为禁区的状况。当然国防、外交的机密要保守。我不知道我的建议是否适合时宜，也不知道人大

常委会是否给予考虑，但是我想这决不是我个人或少数人的意见。最近赵紫阳同志的一次谈话，提出政府工作应增加公开化和透明度。我表示完全赞成。只有这样，才能以实际行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而不只是口头许诺。

一九八九年

人大归来答客问

人大归来，行装甫卸，就有客来访，见面头句话：这次会开得如何？我说：报上登的，你都看了；你要知道的，大概是报上所没有的。客说：对呀！报上有的大家看到，谁要你来传达。我说：我看这次会开得很好。客说：好在哪里？我说：第一是民主跨前了一步，第二是都有了忧患意识。客说：你详细谈谈。我说：我也只能谈一点所见所闻和个人的感受。你想必已经看到报上发表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其中有一句“要努力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这一句在原来的决议草案中是没有的。加上这一句，来之不易，这是两千多位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的结果。政府工作报告承认在工作指导上存在缺点和失误，分析了原因，认为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代表们说，上年也是这么说的呀，不能年年这么说，年年出失误，难道不应该找一找更深一层的原因吗？从大会所发的简报和会议后期报纸上登出的报道，都可看出代表们的意见集中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个题目上来。我说民主跨前了一步，指的就是代表们敢于坦率陈言，不甘心再做橡皮图章或表决机器，有的意见且十分尖锐；而政府则主动听取代表意见。你已经从报上看到，这次会上表决的各项决议，都有反对票和弃权票，连政府工作报告都不例外。过去谁敢公开不赞同政府工作报告呢？这是民主的一大进步，你看对吗？客点头。我接着说：代表们不仅对政府提意见，对人大常委会也提了尖锐的意见，认为人大常委会对政府监督不力，没有尽到人大应有的责任，这点万里委员长

公开承认“失职”，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客说：经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民主确实前进了一步。但是，这难道全是你们代表的功劳吗？我笑说：你看，现在轮到你来开导我了。民主当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既不是恩赐，也不能急躁强求，必须上下齐心，互相促进。这次大会体现了这种精神。

客说：你讲的忧患意识表现在哪方面？我说：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这次大会的闭幕消息没有用“胜利”二字，破除了历来会议的常规。这次代表们反映的诸多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官倒、社会风气等等，少用或不用“少数”、“极少数”、“个别”、“极个别”等惯用的限制语，而是对这些消极腐败现象作大声疾呼，表达了代表们普遍的、深深的忧虑；虽然他们同时指出这是前进道路上的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央领导和国务院各部委办的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了各个代表团的会议，从他们认真答复代表的质询来看，面对问题不回避，不掩饰，而是积极采取或准备采取多种有效手段来克服困难。我看这就是忧患意识的表现，不再讳疾忌医了。古话说“多难兴邦”，这个“难”应是举国的共识。举国同奋，何事不成，前途光明就不会仅仅是一句套话了。

客说：这次新闻媒介的透明度似乎不及上次大会，有评论说“一平二淡，不透不明”，你的看法呢？我说：在北京住宾馆，只看得到电视和报纸。据我看下来，就透明度说，电视还是做得较好的。我很体谅报纸的难处，记者和总编们做了很大的努力，这只要看报纸后一阶段的报道内容，明显胜过前一阶段，就可知道了。但是我也认为，新闻媒介对人大和政协这样重大会议的报道，随着民主的一步步发扬，应该一次比一次好。两会期间流行一句话，叫“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我看只要

新闻媒介让群众如实听到会议的多种声音，就可肯定没有“白说”。客称是，欣然握手而别……

一九八九年

出书难之我见

出书难已为人们关注。其原因，大家谈得最多的是现行的出版、发行体制。出版社出书主要取决于新华书店的征订，订数少，够不上成本，就只能停印或缓印。由于印制成本（纸张、排工等）成倍增长，而书价不能提高，过去初版书印一万本可有盈余，现已上升到需印二万二千本以上方可不亏。过去重版书多有盈余，现在因书价的限制，也是印一本亏一本。出版社为维持生存，当然不能只印亏本的书。

但这只是出书难的现象而非原因。出书难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大环境中的小插曲。改革、开放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新观念。各行各业，包括老一套的思想意识，都要到“商品化”这座大炉里化一化，经历一段痛苦，然后各就各位，进入新的运转。出版社自负盈亏，又全面展开搞承包，这就使一些出版社不能不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把社会效益作为“兼顾”。目前大环境暂时有点乱，需要整顿治理。出版、发行这个小环境，岂能“一枝独秀”？造成出书难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主要原因在此。

新华书店对于某些书（特别是理论著作和一些专业书籍）的订数，为什么越来越少？责任是否全在书店进货人员身上？事实也非如此，而是因为读者作为买方市场，对于书店的进货，影响越来越大。而在关于出书难的议论中，大家对此似乎估计不足。读者的兴趣、爱好和口味时时变化，书店进货不能不随之而变化。过去我们对书籍，强调的是政治性，其次才是知识性，根本不重视书籍还有寓知识于娱乐和消闲的一面，因此大

部分书籍板着脸孔训人。物极必反。一旦读者获得了选择的自由，他对那些貌似严肃的著作自然是望而生厌了。近十年来，图书市场有过几次冲击波：第一次是侠义公案小说，第二次是新武侠小说，第三次是西方性爱小说。此外还有推理、言情小说的小冲击波。每一次都引起了一阵恐慌，主管部门频频发出禁令，直至采取行政手段，还不知下一次的冲击浪潮来自何方。最近有迹象，新武侠小说又再次迅速升温，仅据上海新华书店去年七至十月统计，上柜的新武侠小说已有四十多种，即将出版的尚有五十多种。个体书摊从其他渠道进货，品种更多。据我所知，在香港和台湾的图书市场上，消闲娱乐书也是大量泛滥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正常书籍的出版。他们那里不存在什么“冲击波”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的图书市场结构一向是平衡的。我们现在的图书市场结构正处在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内，书店和出版社势必还要经受一个又一个“冲击波”的影响，因而造成某些正常书籍的出书难，这至少在短期内恐怕还是无法避免的。

经济压力固然造成了出书难的局面，但也促使出版社在优化选题、调整图书结构方面下决心。这是指出版社处于当前严峻的出版形势下，为了竞争，必须对已有的选题、存稿、约稿以至在制品等，做一番认真的清理。凡是不符合“双效益”的，可停者停之，可缓者缓之，可退者退之。甚至已经开排的，或即将付印的，如是可出可不出的书，也坚决撤回。但这样一来，又成了出书难的一个原因。

出书难的出路何在呢？时贤提了许多建议，如对学术著作实行补贴，建立基金会，对学术著作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对消闲娱乐书籍课以重税，等等。这些建议都很好，但不见得容易

实现。从出版整体看，真正解决出书难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全面整顿、综合治理、雅俗兼顾的方案。枝节的对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一九八九年

说闲书

我是喜欢看些闲书的。闲书的定义颇难下。新版《辞源》有“闲书”条，释云“清闲之书”，并引唐张籍诗“会到白云长取醉，不能窗下读闲书”与王建诗“竹烟花雨细相和，看着闲书睡更多”为证。我觉得这个释义与它的引证贴合不到一起去，把书与看书者的位置混淆了。清闲意为清新闲雅，清新闲雅之书应指书的本身；但引诗所云闲书，乃指看书者对所看之书的称谓，即空闲或悠闲时候所看的书。空闲或悠闲时候看的书，可以是清新闲雅之书，也可以是非清新闲雅之书，但可同称为闲书。如若这个理解不错的话，则闲书的主体不应是书，而应是看书者。闲书的较为正确一点的含义，应是消闲之书。虽同是清闲，但由于各人兴趣、爱好不同，所看之书也各不相同，甲爱看轻松之书，乙爱看严肃之书。在甲看轻松之书为消闲之书，在乙则看严肃之书亦为消闲之书。王建看的书，催人入睡，恐怕内容就不是那么轻松。我想举吕诚之（思勉）先生的读书来说明。吕先生是现代著名史学家，一生熟读史书。他是我的乡先辈，我虽无缘拜识问学，却心仪他的道德学问，习闻接近他的同乡学者所述他的读书情况。一次，一位朋友去拜访，他手执一卷看书，见有客到，忙释书款客。客说：“吕先生真是手不释卷”。吕说：“哪里，没有事看看闲书。”客看书名，乃《二十四史》中的某史，便说：“吕先生看《二十四史》几遍了？”吕答：“惭愧，这是第五遍。没有事消消闲。”这是三十年代的事。吕先生是在五十年代去世的，可信后来《二十四史》又看过若干遍。《二十四史》在一般人看来决非闲书，但在吕先生看

来则是消闲之书。

我请再举一例。提倡幽默的林语堂的书，在冷落了三十多年后，忽然走红起来了，好几个出版社争出他的书。我从前看过他的《大荒集》，也常看他主编的《论语》杂志，大多已无印象，只有一篇谈生活之乐的文章，至今忘不。那篇文章说，最大的乐趣是口衔烟斗，在树荫下垂钓，身边放两本书随手翻阅，一是《福尔摩斯探案》，一是《牛津简明辞典》（其时刚出版）云。我欣赏的自然不是他那故作“绅士风度”的烟斗或垂钓，而是他享受的悠闲读书之乐，所看的书又是那么有趣，那么不同寻常。《福尔摩斯探案》自是轻松的书，《牛津简明辞典》则是严肃的书了，都成了他的消闲之书，亦即闲书。我欣赏的就是他善看闲书，而且敢于将不为文人士挂齿的侦探小说与高文典册的辞书并列，就像李卓吾敢于将《水浒》与《史记》、《庄子》并列一样。

可见“闲书”一词之不应单一解释为“清闲之书”，是很昭然的了。

提到《福尔摩斯探案》，使我想起颜文梁先生，他也是爱看闲书的，《福尔摩斯探案》即是他爱看的闲书之一。颜老是有名的西洋画家，“文革”期间已届八十多高龄，但精神好，谈锋健。我那时在工厂“战高温”，每逢休息时间去看他，成了忘年交。那时谈得多的是他的学画与创办苏州美专的经过，偶尔也谈点读书的事。有一次，我们谈起苏州的近代文人（颜老也是苏州人，说话一口苏白）。我说，我很钦佩一批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苏州作家，他们在抗日战争的敌伪时期无一人“落水”，坚持了民族气节。还说，他们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有贡献，如包天笑译过托尔斯泰、周瘦鹃译过高尔基小说；但是最叫人感兴

趣的是他们十多个人共同翻译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厚厚两大册，世界书局出版，是我常怀念的一部书。颜老立刻说，他也喜欢看福尔摩斯，并且珍藏着一部民初中华书局出版的文言翻译本，共有二三十册，装在特制的木匣里。说着，便颤巍巍地去卧室，把这只木匣捧了出来，打开给我看。颜老是九十二岁高龄逝世的。我为他写过一部年谱（见学林出版社《颜文梁》一书）。

但以严肃之书消闲的，究属少数；极大多数所谓的闲书，还是轻松的或较为轻松的书。这些书可看可不看。我以为还是应该看一点。生活中可看可不看的东西很多，如电影、相声、世界杯足球赛（半夜起床看现场直播）等，不看，丝毫不会影响升级、加工资或评职称。不过那样的话，人的生活就显得单调枯燥，人也会变得乏味了。当然，也有什么都不要看的，照样生活得很好，那也不能勉强，各从所好可矣。

一九九〇年

服务质量还须上层楼

近来，各行各业大抓服务质量，现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如叫车难、打电话难、看病难、报修难、订牛奶难，等等，逐步改观，有的且化难为易。我亲身经历的就有几件。如过去有急事，想叫辆出租车，不知上何处叫，路上招手也无车理睬；现在打个电话，十五分钟车就来了。过去向房管所报修什么的，常遥遥无期，现在不超过三天，便来修理。医院仍然拥挤，但有件事改得甚好，就是查找化验单，报个姓，护士按四角号码找出同姓一叠，比过去百家姓混在一起厚厚一大叠，让你从头到尾翻寻，急得浑身是汗，方便多了。以上这些好像是小事，但纵向比一比，我已颇感满意。我虽未作过调查，不知多数意见如何，但我相信，市民们对这些改进是会表示称赞的。而且我的所见虽小，却可喻大，这体现了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表现了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而此二者，都要求从小事做起。

当然，服务工作不可能到此为止。如果那样，要求就低了。就拿房管所的修理业务来说，“三天必到”的规定比无规定自然进步，但居民因不知三天内的哪天哪时来，双职工的家庭就得轮流请假等候，离退休在家的即使他有事要办也不敢离家一步。其他遇上装煤气、接水管等，大概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像这类服务，最好能将日时定得更具体些，居民就更方便了。或者说：你这样要求不是太过分了吗？我说不然，真正讲服务质量，就应该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常常把服务与“做好事”混同一起，其实两者性质根本不同。服务是各行各业的本职工作，年长日

久一直要服务下去的。上街学雷锋做好事，如果只是临时做些修理、咨询之类的服务，那是降低做好事的意义了。这番道理很简单，大家都懂，只是观念、习惯改不过来。在做者一方，以为我为你服务是在做好事；在受者一方，也以为你为我服务，我是在受恩赐。其实都属误解。

我以为当前除了进一步提高本职工作的服务质量之外，如何多方扩大服务面，便利群众生活，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部分服务则应是有偿服务。如牛奶不必每天清早自取，送到门口，取一定费用。这已实行，并受到市民的欢迎。达种服务，虽然收费，但节省了居民的时间，还增加了服务者的收入，双方都受其利。由此类推，粮食店可开展送米上门的服务，煤球店可开展送煤球上门的服务（“文革”前原有，后停办）。现在液化煤气的用户日益增多，但换筒尚须用户自理，搬上搬下，找运载工具，既费力又不便；据我所知，用户无不希望有换筒的服务，愿意支付相应的劳务费。

有偿服务的项目很多很多，各个行业可以自行开展，街道居委会也可组织待业人员，办服务站或服务公司，扩大为居民服务的范围。朱镕基市长曾说，服务业是上海一大优势，可为上海创造极大财富。我想他这话的意思，不能单理解为仅对上海以外四方来客的服务，也包括对上海本市市民的服务。对市民的有偿服务，也可创造一定的财富。

敝见以为，做好服务工作基本不外三条：一是态度，和气待人，耐心对客；二是效率，办事迅速，不错不乱；三是多为对方方便着想，而不是只图自己方便，颠倒了服务与被服务的位置。有此三条，服务工作不难更上一层楼了。

一九九〇年

呼唤一个协会

报上正在呼吁精简各类多如牛毛的协会、学会，我却要倡言成立一个协会。

“救救青蛙”，每届春夏之际，就变成“热点”，各界人士的谴责不绝于耳，连小学生也来发表对大人们滥杀益虫行为的疑惑。但问题就是解决不了，几成了顽症、绝症。

现在，只要漫步集贸市场附近，便可见众人围观小贩屠宰青蛙。小贩一面双手忙个不停，一面吆喝：“活杀活杀！×元一斤，便宜货，要买趁早！”围观者大都默不作声，津津有味地观赏他的操刀表演，娴熟利索地将活蹦乱跳小生灵开膛破肚，剥皮去头，而留下满地鲜血。购买者则讨价还价，看秤验秤，为短斤缺两争执。这也是每年少不了的街头小景之一。

何以屡禁不绝？当然可归诸管理不善等原因，但更在于源头禁不了，堵不住。有一项报告，在本市市场上市的野生青蛙（包括蛙肉），主要来自外省市，通过车船以各种渠道、各种方法运进本市，然后分散销售。由于各省市政策不统一，流入渠道又多，手法各有巧妙，本市势难禁绝。

那么，是不是束手无策了呢？我看不是。

青蛙市场也是由生产、销售和消费三个环节组成的。因此治本的办法，最好还是禁捕，也就是杜绝生产之源，后面的两环，就消之于无形。但是这个办法由于种种原因，短期内一时还不易办到。再说销售，倘若堵住这个通道，其他两头就无所施其伎俩；但上面也说过，这道环节也难以控制，利之所趋，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即使有所查处，微乎其微，以现有行

政力量只能望之兴叹。最后就是消费了，这对前面的生产与销售也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没有那么多人为了大快朵颐，消费旺盛，谁去冒不法之名捕杀和贩卖呢？但是这个环节却是最不受批评的，更无什么违法之可言。因此目前的情况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我字当头：我捉我的，我卖我的，我买我的，我吃我的。既然对捉方和卖方暂时管不着，或管不完全，漏洞百出，是不是先对一向受到宽容甚至放任的买方和吃方做一些宣传劝说或阻拦工作呢？

办法之一，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成立一个“救救青蛙协会”，其宗旨是：不捉，不杀，不卖，不买，不吃。为求实效起见，可先从不买、不吃做起。凡会员，必须坚决做到不买、不吃；同时要做义务宣传员，参加宣传不买、不吃的活动。参照国外众多的爱护（或保护）各类动物团体的经验，宣传劝说或必要的阻拦活动，以集体（如若干人的小队）形式较为有效。

可以初步设想几项活动内容：

召开成立大会，发表“救救青蛙”宣言，广泛征求会员（年龄不限，小学生也可参加）；

向大小宾馆、餐厅宣传，要求不买青蛙；向用餐的顾客宣传，要求不吃青蛙；向在集贸市场购买副食品的市民宣传，要求不买、不吃青蛙；

选定某一天为“救救青蛙日”，在全市同时开展宣传活动；

制定不买，不吃青蛙的标语，在公共场所张贴；发售“救救青蛙”纪念章。等等。

这仅是倡议，很不成熟，至于这个协会如何发起，如何组织，如何进行活动等，则有待大家讨论。

一九九一年

我看上海报纸的改革

最近，每天一早八点钟之前，上海市民可以看到当天出版的日报了。凡是上海报纸的读者，我相信，对上海报纸的这一改革措施，都会感到高兴、表示赞赏的。起先，许多人对报纸宣布的这项决定不免有点怀疑，不知能不能坚持，会不会又是一阵风？现在一个多月下来，报纸确实按时一早送到订户家门口。这既有报纸的努力，也有邮电员工的辛劳，最重要的还是报纸的决心。具体一点说，就是报纸对自身改革的决心，走在时代潮流前面而不是落在后面的决心。

也许有人说，报纸出早出晚、送早送迟，关系不大；比起报纸的其他改革，这不过是小事一件，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这也是报纸总体改革中的一件大事，上海报纸抓了这件事，付之实现，抓到了点子上。不错，上海的报纸近年来已进行了一系列有目共睹的重大改革，诸如较早打破省市地方报纸数十年不变的四版一贯制，日报增加到对开八版（还将扩充到十二版），晚报增加到四开十六版，这在极大程度上激发了地方报纸的竞争意识，甚至对中央级的报纸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在我们看到，各省市地方报纸纷起扩充版面，改进内容，争取读者。新闻传媒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旺过。但是，如果不随之以出版和发送时间的提早提前，那么所谓的报纸改革，还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我们的报纸，过去唯我一家，现在也要参加市场竞争了；过去以我为主，现在要以广大读者为主，用经济学的用语说，过去是卖方（报纸）市场，现在则是买方（公众）市场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恕

我直言，没有竞争的报纸是充满惰性的报纸；不以公众需要为主的报纸，是没有人要看的报纸。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这样的报纸将无法继续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了。提早出报、提前出报，这说明报纸首先想到的已不再是自己的方便，而是将公众的方便放到了第一位。

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从更深一点、更开阔的角度来看。长期来，“为人民服务”一直是崇高的口号和行为的准则，但由于职能部门事权过度集中，居高临下，这口号中的“服务”常常变成了“赐予”。报纸若尚存有赐予思想，当是报纸改革的最大障碍。我们无论办什么事，都需要学习和借鉴。就拿准时出报来说吧，老年人大概都记得，当年在上海，人们上班前报摊上已摆满了当天的各种报纸了。今天到过国外的人，也都有这样的印象：在早晨上班的电车或公共汽车里，人们大都手执一份当天报纸阅读。可知在我们这里当作新鲜事或优越性的东西，人家那里早就做到了。长期对传统的和国外的办报方法与经验，一概采取排斥拒绝的态度，造成了报纸信息贫乏、内容单调的结果，这不是很值得我们新闻界的深思吗？

当前大家都盼望《新闻法》早日制定颁布，以保障新闻传媒的正当权益；我想，《新闻法》同时也不应忽视公众对新闻享有的权利，因为新闻传播的对象毕竟是公众，而不是别的什么。上海报纸以读者为主的改革，受到欢迎，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九九二年

也该听听中国人民的意见

六月二十五日的此间报刊，登了一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东京电，标题是“大多数日本人赞成天皇访华”，全文如下：

据《读卖新闻》等日本报纸二十四日晚报报道，大多数日本人赞成日本天皇访华。报道说，据日本政府官员二十四日透露，日本政府内阁日前就天皇访华问题对国民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民意调查，其结果是大约有 75%的人赞成天皇访华，持反对意见的仅占 5%。这位官员认为，天皇访华最好获得国民的同意，而这一条件正逐渐成熟。

从这条电文可知，这次日本官方就天皇访华进行的民意调查，除 5%的反对意见，还有 20%的人未表示意见，就是说这 20%的人，对日本天皇访华，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属于弃权。至于那 5%的反对者，为什么反对，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可惜电文最后没有报道，其实这倒也是中国人民很想知道的。这条电文最后报道的日本政府官员的话，“认为天皇访华最好获得国民的同意”，我觉得这也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可以看出两点：一，日本政府对天皇访华一事是十分重视的（不久前宫泽首相在众议院也表态，天皇访华是“可取的”）；二，日本政府对他们的国民的意见还是相当尊重的。两点并一点：日本政府制定政策，还不是由政府说了算，多少要听一点民意。日本实行议会政治，政府法案可以通过执政党多数强行通过；但允许反对意见，所以政府做什么事，多少有所顾虑。

那么，中国人民对日本天皇访华有没有意见呢？从我接触到的人，就听到许多不同意见，其中赞成中国政府邀请日本天皇访华，认为这是增进中日友谊的占多数。但是这些意见，至今新闻传媒未作任何反映，好像中国人民都是一群“沉默的羔羊”。我认为这是很遗憾的。因为中国人民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最深最重，因此对中日两国间的大事也最有发言权。中国人民完全分得清，日本侵略中国这笔帐应算在日本军国主义头上，中国人民愿同日本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而日本天皇访华毕竟是中日关系史上一件大事，应该听听中国人民的意见。

党中央曾多次申明，国家大事要让人民知道，要同人民商量。这是非常英明的决策，我完全拥护。因此我建议就日本天皇访华一事，举行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的方式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局部的，也可以是抽样的；可以由政府的某一部门来做，也可以由民间团体来做。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应该听听中国人民的意见。

一九九二年

大家都来关心这场官司

八月份，上海（也可说全国）新闻界有件大事，这就是上海法制报向河南省高级法院告南阳中级法院侵害记者正当采访权益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是我国新闻单位状告法院，同法院打官司的首例。这个首例开得好，表现了新闻单位有勇气敢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采访、报道权益，这是一大觉醒，一大进步，必将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闻事业带来良好的影响，所以可称之新闻界的一件大事。这场官司得到了上海新闻界和法学界人士的支持，也受到了其他各界人士的注意。据九月一日报载，河南省高级法院已于八月二十六日作出裁定，不予受理；但上海法制报却依法上诉。可见这场官司的前途未卜。是否有可能像引发此案的前案歌星名誉诉讼那样，受到干预，含糊了之；还是秉公审理，得到公正的判决。套用一句新闻报道中的常用语，还得“拭目以待”。

但是，我认为不管这场官司的结果如何，各界人士，不仅新闻界和法学界，都应该对这场官司表示关心。因为从表面看，似乎只是上海法制报同南阳法院的民事纠纷；但从实质看，则是依法保护记者采访权的问题；从深层看，则是权与法、依法与违法的问题。这后面的问题，同全社会都有关系，也同每个公民都有关系。

先说权与法的问题。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办案“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南阳这次审理案件，一上来就受到地区宣传部门的干涉。据记者报道，法院对记者执行的“不准采访，不准记录，不准录音，不准照

相，不准发稿”的五不准，其根据就是宣传部门的指示。事先，记者们也得到了宣传部门书面和口头的“五不准”警告。这说明权大过了法。

再说依法与违法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人民法院法庭试行规则》规定，“公开审判的案件，允许新闻记者采访，记者凭人民法院发出的采访证进入法庭，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和转播”。而南阳法院执行的却是“五不准”，从夺走记者相机，拉出胶卷，扣押记者证，直至驱逐出庭，构成了严重的违法行为。

由此看来，事情的是非曲直是很清楚的。目前虽然还没有《新闻法》，但《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上海法制报对南阳法院的违法失职行为提出诉讼，正是实行《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我说大家都来关心这场官司，就是希望大家关心维护《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从读者的角度，我想就新闻界关心的《新闻法》问题说几句话。新闻界呼吁《新闻法》尽快制订出台，已有好多年了；听说有关部门起草，也已几易其稿。但就是迟迟不能出来，其中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拿不准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多了少了都不好。我觉得当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时机，邓小平同志南巡所说“警惕右，但主要要防左”的讲话精神，为从速制定《新闻法》指明了正确方向。最近北京二〇〇〇年奥运申办委员会提出的宣传口号，第一条就是“开放的中国”，显示了一个坦荡开朗、热情、慷慨的泱泱大国形象。但是真正要成为世人眼中的“开放的中国”，首先要有开放的新闻，

也就是新闻的开放：记者有采访权，传媒有报道权，公众有知情权。开放也不能只对外国人开放，新闻报道上的中外有别现象应有所改观。当然这些话都只是新闻“门外”谈，但作为读者对新闻的某些企望，或许可供参考吧。

一九九二年

儒学古今谈

这几年，有一股“儒学热”在兴起，起先是悄悄地，随着是声势规模愈来愈大了。儒学在近代受到一些挫折。“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使得儒学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批判的地位。但是，“打倒孔家店”只是打掉了笼罩在儒学表面的圣像，并没有消除它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与生活中的深层影响。十年“文革”，批孔批到赶尽杀绝地步，使儒学几无藏身之地，但所谓批判不过挟权势以唬人，触及不到儒学的根本；相反，“文革”所尽力推行的“表忠心”、“万寿无疆”等一套，正好是儒家“三纲”中的“忠君”一纲，且变本加厉，有过之无不及。一个已被打翻在地的儒家学说和主张，却通过宣称彻底打倒它的“革命”来实现，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嘲讽，但从一个负面证明了儒学无所不在的生命力，其影响之广而深，直是跨越了时空的界限。

请问什么是儒学？这个问题可有多种答案，有的也许说得很深奥。我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最简单的答案：儒学是一门哲学，孔子、孟子是哲学家。但是，哲学有许多流派，许多门类，儒学归入哪一派、哪一类呢？儒学不同于一般的哲学。一般的哲学以思辨为能事。儒学虽然也有思辨的成分，但着重研究的是统治者同被统治者或被统治者同统治者的关系（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出发点则不同，儒学偏重于前者）。西方哲学史把研究民众或个人同政府、政权关系的哲学，称为政治哲学，把研究这门哲学的学者称为政治哲学家。例如英国民主思想的先驱霍布斯、洛克、休谟，

边沁等哲学家，都称为政治哲学家。西方哲学突出政治哲学这个概念，能较好地地区别一般哲学与政治哲学的不同，我以为这也适合于儒学和儒家学者。所以，准确一点说，儒学是一门政治哲学，孔子、孟子是政治哲学家。

但是，长期以来，历代的一些学者，包括儒家学者在内，往往把儒学当成一般的思辨哲学来看待。政治哲学这个概念和名称，固然是近代的产物，但是政治哲学的特性，则是与政治哲学的产生而同时俱来的。有些学者对这点混淆不清，便对儒学提出了不恰当的批评或要求。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便是柳宗元对韩愈论点的批评。

韩愈写了阐述儒家政治哲学观点的论文《原道》。儒家的政治哲学，在韩愈之前，可说是分散的、零乱的，作为一个体系完整地、明确地提出来，《原道》是第一篇。柳宗元认为，韩愈所主张的排斥佛、老，特别是排斥佛教，不是儒家的观点。他的理由是：一、佛教的道有合于儒家的道的地方；二、因此不能因佛教是外来的（所谓“夷”）而予以排斥；三、佛教徒不事生产，吃闲饭，这仅是外形，佛教尚有内美，内美胜过外形。所以他的结论是，韩愈求名去实，只看表面，不懂佛教的真义，就像人们知有石而不知石中蕴藏有美玉一样。柳宗元的看法，后来在宋朝，得到了苏辙的响应。苏辙不算哲学家，但他对韩愈的批评，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儒家学者的意见。苏辙还比柳宗元进一步，直截了当说韩愈不懂哲学，“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又说他把佛、老与杨子、墨子同等看待，更是不懂儒家的道。赞同柳宗元（也包括苏辙）意见的学者，后代很多。

抨击佛、老，特别是抨击佛教，不过是韩愈所写《原道》中的论点之一；但因为这个论点，涉及到了思辨哲学，而佛教，

如众所知，它的教义是最富于思辨色彩的一门哲学，《原道》对此一字不提，只提它有关世俗方面的不事生产、蔑弃纲常，自然引起深受佛教思辨哲学影响的学者的不满与责难。但是，造成这些不满与责难的原因，不是由于韩愈的学问不如他们，也不是韩愈不懂佛学（即不懂哲学），而是提出不满与责难的这些学者没有弄清儒家的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思辨哲学，因而用思辨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儒家的政治哲学，就觉得韩愈的论点格格不入，《原道》所论述的道失之于浅了。他们完全不了解，儒家的政治哲学不需要进行这方面的思辨游戏。所以针对韩愈的批评，尽管批评者也是被称为儒家的学者，实是南辕而北辙，偏离了儒学之道，而韩愈所要捍卫的，正就是这个道。

《原道》为儒学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它以最精练的文字、最简短的篇幅和最明确的方式，表述了孔子、孟子所论述的儒家学说的意义。其意义有如下三项：

第一项，以仁义为核心的民本主义。《原道》用四句话概括了这个内容：“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爱人，或者说爱于人，以爱予人，均可。博爱，即泛爱，凡人皆应爱，不分贵贱。义，实行、实践。仁是目标，目标必须通过实行、实践方能达到。道即是仁与义的合成。在儒家看来，道不是什么虚无飘渺的东西。道就是道理或道路，道理是指导人们思想的，道路是指导人们行走的。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路，这就是儒家的道。德表示修养，而且是完成了修养过程的修养。一个人以仁义作为从思想到行动的指南，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与本身浑成一体，而不是倚仗外力的强制，所以说“足乎己无待于外”。

第二项，以纲常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原道》以君、臣、民

三者的关系，说明社会的组织与分工：“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个组织与分工的原则，即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职。君是出令的，臣是行令的，民是执行命令从事工农生产并流通货物的。如果失职怎么办？《原道》指出，君失职就做不成君，臣失职就做不成臣，民失职“则诛”。诛是杀头，也可作责罚解，总之是很重的刑罚。国家社会的这种组织与分工，同样也适用于宗族家庭。三纲五常既是国家社会的构成原则，也是宗族家庭的构成原则。这种和睦共处的国家组织，就是儒家理想的安居乐业社会。在这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必须共同遵守严格规定的等级制度，不容许逾越失职。

第三项，以排他为一尊思想。排斥异端，定于一尊，这是儒家的一贯思想。孔子严夷夏之防、尊王攘夷，孟子拒杨、墨，凡与儒家思想不合的，一概视为异端邪说。汉武帝出于统治者需要，采取董仲舒建议，独尊儒家，儒家思想倚仗政治势力，成为统治思想。佛、老特别是佛教思想的兴起，威胁侵犯了儒学的一尊地位，也打乱了封建社会的组织构成，《原道》指出：“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士农工商之外，又增加了佛徒和道教徒）；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佛、道要同儒家平起平坐）”。这是不能容忍的，《原道》为此要求回到儒家的理想社会：“人其人（人即民，避唐太宗讳），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它要勒令僧徒还俗，烧掉佛经，平掉寺庙，对这些人进行儒家教育，这是极为激烈的主张。韩愈在这里显然是向统治者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采用行政手段来恢复和维护儒学的统治地位。

《原道》不仅清楚无误地阐述了构成儒学的三项基本原则，

而且还揭开了儒学的一个秘密：儒学是统治术。孔子所以成为“帝王师”，所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统治者象征的“天地君亲师”之一而被尊为“万世师表”，其秘密也就在这里。《原道》的三项原则，都是为统治者设计的。第一项，民本主义。一切以民为本。没有民的拥护，统治者就无法维持统治，所以要行仁政。但民本主义不是民主主义，民本与民主是根本不同的两个范畴。马厩失火，孔子问人不问马；孟子倡“民为贵，君为轻”。这都是民本思想，目的是为了维护保持君主的统治。第二项，等级制度。君臣民三者，其人员的组成可以上下变更，但等级却是永恒的，君永远是统治者，民永远是被统治者。《原道》将等级制度描绘成各个等级共同承认、共同遵守的社会分工，这是它的巧妙之处。第三项，一尊思想，理论上的一尊，表示不容许异端的存在，保证儒学占据思想的统治地位，在政治上则是保证统治者的绝对统治地位。

由此可见，《原道》是一篇很重要的著作，我们要想了解儒学的真谛，探索儒学的奥妙，必读《原道》。但是，由于韩愈文章做得好，他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的第一家）的名声超过了哲学家的名声，因而对他在儒家政治哲学上的建树，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原道》也因此只被当作一篇有名的“古文”来阅读了。

儒学曾被称为儒教。儒释道，三教并立，或三教同源，儒也是一教。这是道教徒首先造出来的，为的是抬高道教自己的地位。近代也有人沿袭这一称呼。但是，儒学不是宗教。儒学没有任何规定的宗教仪式，它不信天命，不信鬼神，不修来生。它致力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世俗事务，儒学从形式到内含都不存在宗教的质素，不能称之为儒教。但是，儒学的

影响和作用，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在专制社会，它是统治的思想，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在今天，它仍渗润在人们的思想深处，通过各种形式，起着支配的作用，有的且见之于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虽然不是宗教，却具有宗教的作用，因此也可称为儒教，虽然不无贬义。

今天，儒学披上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这两件绚烂的外衣，迷惑着人们的思想和公众的舆论。在一些文学作品和电视片、影片中，宣扬三从四德、忍辱负重或忠孝节义，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些都是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却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接受，还给它加上一系列善良、正义等等美称。现在看来，如何从思想上、行动上摆脱儒学的束缚，还需要走一段漫长而艰巨的路途。但愿不要永远走下去。

一九九二年

敢于讲话，讲真话

——在一次关于杂文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我认为杂文之称为杂文，至少要具备两种属性：首先是战斗性，鲜明的战斗性是杂文区别于其他文类的标志。这是鲁迅杂文的传统。其次是文学性，就是说杂文也是一种文学作品。

战斗性主要是指批判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拿杂文当棍子唬人、整人，“文革”那一套决不能再搞了。杂文的战斗性应包括这样三条：一、坚持真理，杂文家一定要有正义感，不能违背做人的道理；二、明辨是非，不能老是依违两可，左右逢源或见风使舵；三、最重要的是敢于讲话，讲真话，讲出人们想讲而不敢讲或讲不清的话。这第三点说说容易做做难，时下有些杂文仍然是在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或睁着眼说瞎话。

另外，杂文的文学性也是不可缺少的，杂文创作要讲究艺术性。杂文不文，就只能是一般的思想评论。

一九九二年

称谓的变化

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第一句话就说：“叟，不远千里而来。”这个“叟”，是长老之称，表示尊敬，翻成现代话，就是“老先生”或是“老大爷”。但是，“叟”这个称呼，到后代就变成了一般的“老者”代名词，虽然不是卑称，但已失去了尊称的含义。

所以，称谓，也就是人际之间的称呼，其尊卑亲疏，常是与时推移的。称谓的变化，常常可以看出一个时期的风尚。

解放后，带来了革命的清新之风，旧社会常用的一些老式称谓，如先生、太太、女士、小姐等等，几乎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只保留了一个“先生”的称呼，那也是在少数特定的场合、对特定的人物才能应用。如对鲁迅，不论是口头报告或在文章中，都还尊称为“鲁迅先生”便是。但这只是个别的例子，基本上可说“先生”这个词是销声匿迹了。大家都以“同志”相称，男女老少、长幼尊卑，不分高低贵贱，一律平等，体现了新社会的新风尚。尤其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对“同志”这个称谓特别感到亲切、光荣，认为被称为“同志”，即是承认自己也是革命的一分子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同志”这个词既是相互间的一个称呼，同时也有强烈的政治内涵。这就发生了如下的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家庭中，父母、兄弟、姊妹、夫妇，在革命阵营都是“同志”，彼此通信，也都称起了“同志”。日常谈话，当然可以叫“爸爸”、“妈妈”，但通信就不再用“父亲大人”、“母亲大人”了。有一位学者的孙子为他的祖父编文集，在序言里就是称他

的祖父和父亲为“某某同志”的。另一种是遇到了政治运动，被戴上了“帽子”的人，从宣布戴帽的彼时彼刻起，就被剥夺了“同志”的称号，从此直呼其名，表示开除出了“同志”的队伍。这一种惩戒，日复一日，对人的精神折磨是很严重的，使他时时刻刻都感觉到不齿于人的身份。当然，到宣布“摘帽”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恢复了“同志”的称呼，重又使人体会到了“同志”这个称谓的可贵与温暖。“同志”一词在这里成为一种政治惩罚和奖励的手段。

在一些会议或集会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领导讲话和报告，一上来都用“同志们，朋友们”，这说明同志和朋友是有所区别的。近年又加上了“先生们”，先生与朋友似乎也是有区别的。它们之间区别究竟在哪里，不见得有明确的界定，大概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区别吧。

前两年，盛行用“师傅”一词来彼此称呼，“同志”之称少了，甚或没有了。这引起了某些有识之士的义愤，在报上撰文，大声疾呼，要为“同志”一词正名。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自那以后，情况并未好转，“师傅”一词虽然少用了，但代之而起的“先生”、“小姐”、“女士”却日见泛滥了。现在到一些宾馆、饭店和商店去，招呼女性服务员、营业员，若不叫一声“小姐”，那说明你是太不懂得时下的“新潮”了。

东亚运动会已胜利闭幕了。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主持人介绍来宾时，一律尊称为“先生”，连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与市长也不例外，这在过去是必称之为“同志”的。而现在的致辞者则无不是以“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作为发语词了。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在称谓这个原以政治划线的领域内，已走出封闭状态，开始与国际社会“接轨”了。这是适

应改革开放时代的一大进步。

一九九三年

妇女的命运

这是个老题目，老题目也可引出新问题。照说，新中国妇女解放，彻底翻身，成了“半边天”，命运什么的早已解决。但是，世间少有甚或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妇女问题亦然，这只要看全国妇联在新时期现阶段向妇女界发出的“四自”口号，就可知道。这“四自”是：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这些以“自”为主的口号，毫无疑问，有很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但也说明，新时代的妇女在这四个方面还有做得不够或未曾做到的地方，所以需要作为口号提出来，鼓动激励，作为妇女们奋斗努力的目标。我很钦佩妇女的这种“四自”精神，但又觉得是不是过于“自谦”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造成妇女的这些问题，我们姑且就照“四自”所说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为限吧，并不总是妇女自己所应负责，也不是妇女自己所能解决的。只举“四自”的第一点“自尊”来说，自尊心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做到这点并不难；但是自尊必须有社会和他人的尊重为前提，倘若社会和他人的不尊重，你再多么自尊，也是白费力气，无人理睬。所以我想，妇女的命运固然应该掌握在妇女自己的手里，但全社会都不应逃避应负的责任的。

我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

根据之一，这几年报纸上关于离婚案件的报道增多了，突出了相当一大部分妇女在家庭中的艰难处境与地位。这些离婚案件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由女方起诉的居多，起诉理由感情不合中又以女方受虐待凌辱者居多；二是在离婚诉讼过程中，通常是女方吃亏受折磨的为多，闹出女方致残或人命的也不鲜

见。

根据之二，有一份最新的关于上海地区妇女的统计材料。一九九〇年，上海市妇联接待的一千五百八十一人次的来信来访中，告丈夫殴打、虐待、伤害妻子的占 29%；到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上升到 33%；仅今年一至三月反映丈夫殴打妻子致伤的就有五十多起。另据徐汇区妇联提供数据，该区家庭纠纷中，女方被殴打、伤害案件由一九八九年的 20%，上升到一九九二年的 35%（以上据本年四月八日解放日报第 10 版载）。这份材料所揭露的事实，虽然限于个别省市和个别地区，但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

以上的情况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以为可以说明两个问题：首先，由女方提出的离婚案件的增多，说明妇女正在觉醒起来，为保护自己的独立平等地位而奋斗，尽管有社会的压力和人们的歧视，也在所不惜。其次，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妇女在家庭中受到伤害，除了求助于组织（如女联），申冤告状，还不知道或没有勇气寻求法律的保护，如采用提出离婚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平等权利。

忧时之士说，离婚案件多了总不好，最好先调解，重归于好，避免家庭破裂，这才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我也赞成调解。但如果所谓的调解是以牺牲妇女“四自”为条件，我想觉悟了的妇女是不会接受的。

那么，怎么办？“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这是伟大的鲁迅的话，是为妇女的前途说的。见于写于一九二三年的那篇《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文章，虽然

整整七十年过去了，这话中的精神，至今还没有过时。

一九九三年

“父母官”小议

近来，称呼县市领导同志作“父母官”的，日益多起来了，且有继续扩大之势。称者不倦，受者不疑，已经成了当今官方民间共同认可的一个名号。一位地方官，是亲民之官，群众旧词新用，借古代的称呼，叫他一声“父母官”，以表尊重，记者跟踪报道，传为美谈，原也没有什么不可；但循名责实，仔细想来，却又觉得似乎不单是个称呼问题，也反映出一种思想观念问题。

什么叫“父母官”？儒家的政治教科书《大学》，引《诗经》两句话“乐只君子，为民父母”，给以说明：“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朱熹老夫子注解：“言能挈矩（克尽职守）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之如父母矣。”这便是“父母官”称谓的来历。这里有两个含义：第一，封建时代有远见的政治家懂得老百姓的重要性（叫作“民为邦本”），在教科书里告诫当官的爱护老百姓，而且要像爱自己子女那样地去爱；倘若民心不顺，民心不满，他这个官就当不成了。但是第二，这同时便确定了官与民的关系——父子关系，先还有个前提，你“爱民如子”，我方爱你“如父母”；但既是父子，你不爱我如子，我仍得爱你如父，这是封建伦理纲常所规定的了。这样，互爱的前提便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民是子，官是父，父可任意管教处置子，子则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父，一切唯父命是从，亦即唯官命是从。所以封建时代的官，自居于“父母官”的地位，老百姓亦自安于“子民”的地位，名为官爱民、民爱官，实质是只许民爱官，官爱不爱民就得看

民的幸与不幸了。鲁迅曾说，中国人的历史，不过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或者做不稳奴隶的时代。这自然是极而言之说法，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人也有不乏奋起抗争的时候。但就封建社会的全程来看，中国人是安于并且乐于这种官民父子关系的，由官来为民做主，而不是由民来自己做主，辛亥革命革掉了君主制度的命，但思想观念方面的命，革得不彻底，甚至没有革，有的原封不动，有的不时借尸还魂。“五四”运动革的是思想观念的命，也只能说半途而废，至少“做主”与“自主”这样大的问题就没有弄清楚，常把“做主”混成“自主”，当成了“民主性精华”。一部《七品芝麻官》影片中的咏叹调：“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几乎成了从政者的口号，不断引用，以示“为民办事”的决心。“父母官”之成为时髦名词，也就不足怪了。

前不久，报上发表了新发现的郭沫若书简，其中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的一封信写道：“在‘官僚本位’之下，无论‘贪官’还是‘清官’，有一个根本点是共同的，即他们自命为‘民之父母’，用家长制的包办来‘为民作主’。要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必定要持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彻底埋葬‘官僚本位’的封建残余。”郭老不愧为有睿智的大学者，虽然有时迫于形势，时有“随行就市”的话，所谓“贤者不免”，但这封私信原不准备公开给大家看，所以表达的是真实思想，看问题很透彻，讲的也是真话，拿来作“父母官”这个称号的释义，更是鞭辟入里不过了。

由此看来，“父母官”这个词的用者与受者，在思想观念上都有点“错位”：把“做主”错成了“自主”，把“民本”错成了“民主”。这是不是也应该归入郭老说的“残余”呢？虽然是

无意的。

一九九三年

聊天乃人生一乐

王羲之《兰亭序》，我欣赏这几句话：“晤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曾不知老之将至”。真是道出了朋友相聚之乐。但是朋友相聚，乐在聊天，若相对无言，就乐不起来了。高僧参禅，对坐终日，不着一字，那是另一种境界，非我辈可学。我所喜欢的，清茶一杯，二三其人，互无戒心，话题不着边际，议论全无拘束，何妨东拉西扯，亦可南辕北辙。乘兴而来，兴尽即散，说过的话像空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必担心将来立案审查，揪为辫子。这样的聊天，可称为人生一乐了。

曾记有一寓言，某神仙路遇三位凡人，俱属有缘，让他们各述所愿。一人愿富贵，另一人愿功名，神仙皆颌首云可。至第三人，却无需富贵，也不要功名，只求常有知友倾谈，以消永昼，于愿足矣。神仙大惊，说这般清福连我神仙也享受不到，你凡夫俗子何得有此奢望？自知无法满足世人要求，化阵清风逃逸而去。这虽近于笑话，但尘世扰扰，清闲难得，聊天之被列为清福，自不为过。

聊天要有朋友。聊天难得，朋友更难得。在那政治运动不断的日子里，揭发批判，七斗八斗，人与人都成了乌眼鸡，朋友皆变路人。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那一阵，有一天运动正当深入，一位同事（也是朋友）告诉我，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老先生，很关心我的处境，托他代为问候。我随口说：“他倒古道热肠。”话说一半，“热肠”二字尚未出口，心知不好，说漏了嘴，赶紧咽住，但“古道”二字已经出口，无法追回。果然第二天就在会上被揭发出来，连咽回去的“热肠”二字也要挖

吐出来，作为对抗运动、污蔑运动的“罪行”。从此方知，朋友与运动不能并存，同事与朋友也不能等同一气。没有米煮不成饭，从此只有运动，没有朋友，也就聊不起天了。

但“嚶之鸣矣，求其友声”，人似乎有着嚶嚶求友的本能。不管多么恶劣的生态环境，压抑不住友谊之花（虽然弱小可怜）在石隙岩缝中偷偷地含苞绽放。七十年代初，进入了“斗批改”（事实是“斗批散”）阶段，百业萧条，万物凋零，对我们这些从“牛鬼蛇神”转为“死老虎”的人，管制也就有些松了，得以自由走动。我结识了两位画家。倒不是跟他们学画，而是成了聊天的朋友。他们都是八十岁上下的老人了，名满天下，当然逃不了戴一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其中L大师还多戴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我在工厂“战高温”，经常做夜班，白天便有了时间，常去看他们，主要听他们闲谈几十年前的掌故，为前贤往哲的遗闻佚事、流风余韵而心醉。这时仿佛走进了另一个平和安祥的世界，那时朋友宽袍大袖，高谈阔论，诗酒风流。L大师不因头上有两顶帽子而感沉重，意气自如，谈笑风生，纵论当世画坛群英，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Y大师为人，同他的粉画、油画一样，笔笔工整，刻画精微，而又意韵流畅，如春云舒卷，蕙风微扬。他们都极健谈，不以我为后辈，视同至友，娓娓而言，有如汨汨的流水，遏止不住。但我们不谈政治。旧社会的茶馆酒楼，墙上大都贴一张“莫谈国事”的纸条，鲁迅因此为他的一本杂文集题名“准风月谈”。现在这类纸条没有了，但谈兴一浓，朋友间还是免不了要关心“国事”。如今Y大师仙去已久，L大师以近百岁高龄定居域外，回想那几年的相聚聊天，虽是在夹缝中求乐趣，但也自有其乐，却是恍同隔世了。

改革开放以来，大环境宽松了，聊天不再成为禁区，这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表现，是盛世的气象。我愿为之欢呼。若问我近来与朋友们聊些什么，我说古今中外，天南海北，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在聊中。只是大家越来越老，聊天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一九九三年

中法战争的主战派

一部中国近代史，概括起来，不妨说就是一部主战与主和、维新与保守斗争的历史。如果问谁进步、谁落后，自然可以回答：主战派与维新派代表进步，主和派（也可叫投降派）与保守派代表落后。但是当落实到具体某个人时，事情就复杂得多。保守派常常是主战派，维新派倒常常是主和派。同一个人，他既可代表进步，也可代表落后。一个人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往往因事因时因地而异。

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的中法之战，是清朝政府几次抵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最具辉煌战果的一次，提督刘永福在越南屡败法军，巡抚刘铭传在台湾也英勇地迎击了法国海军的进攻。政府在战争进行中，分成了主战、主和两派。慈禧太后是主战派，李鸿章是主和派。李是直隶总督，驻节天津，北洋海军在他手中，他却拒绝派遣军舰救援台湾，致刘铭传孤军奋战，形势危急。但是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些记载，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李鸿章是主和派，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主战派有过些什么举措行动，最后何以让主和派占了上风，就不大清楚了。最近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冷门书：《贞石山房奏议》和《贞石山房诗抄·释簪草》。作者王邦玺，光绪时的翰林院侍读。两书各印三百五十册，印数虽少得可怜，却具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可补中法战争史事记载的某些不足。王邦玺是当时的主战派，坚决主张与法国侵略军开战，并派军舰援台。为此他上过两次奏章，引起慈禧的注意，由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保送上书房行走。引见的第二天，就由慈禧特旨召见问话。《奏议》卷四

有一篇《恭记光绪十年（一八八四）九月十八日奏对话》，记的就是这次慈禧与他的对话，现摘录他们的主要问答。

慈禧问：“法人占据鸡笼（按即基隆），台湾紧急得很，这事该怎么好呢？”王邦玺答：“此时战局已成，法夷贪狡无信，断无停兵议和之理。台湾是海疆重地，刘铭传独力难支，必须用海防兵轮由海道前往救援，方才有济。”

问：“南北洋都说，咱们的兵轮不能出洋接战。北洋还说，造的轮船小的小了，大的薄了，这不是成了废物吗？他们也是太分畛域呵！”

答：“这是方今第一大病。”

问：“可不是第一大病吗！你可知道有可用的人么？”

答：“臣所知有直隶候补道黄瑞兰，曾当过营务处的差使。臣听得他说，天津轮船亦有二三只可去的，江南亦有两只可去的。刘铭传旧部营勇亦有愿去救台湾的。此人于北洋军务也还明白。”

问：“他愿意去吗？”

答：“这人颇有血性，他说到台湾被困情形，大有忧愤之意。”

接见结束当天，军机大臣即得慈禧谕旨，令黄瑞兰前赴天津，着李鸿章将所拨轮船二只，由黄会同带往福建，速援台湾。可见慈禧完全听从了主战派意见，准备与法侵略军决一死战。但想不到黄瑞兰一到天津，就受到李鸿章的参奏，说黄“并未专办水师营务，于兵船規制用法懵然无所知，貌似质直，举动任性，办事糊涂，语言狂妄，似有心疾”云云。内阁奉上谕：“黄瑞兰着勒令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王邦玺滥保非人，着交部议处。”战和之局，三数日内，兜底起了变化。原来当时不仅李鸿章主和，政府内阁也是主和的。慈禧虽主战，但她只

能依赖有实权的李鸿章和内阁，不能依赖一介书生的王邦玺和血性之勇的黄瑞兰。王、黄之成为牺牲品，乃是必然的。而且后来虽有冯子材的谅山大捷，主和之局已定，主战派再也无所施其能了。

王邦玺，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江西安福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三甲第七十七名进士，但《清史稿》未为立传，《中国人名大辞典》也没有他的名字，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其实中国近代史应记上他一笔。

一九九三年

京城“打的”

北京人叫出租车，称为“打的”。这是近两年兴起的，前两年去北京好像还没听说这个词。“的”即“的士”，算是一个简化了的外来语。“打”字在口语中含义众多，自由搭配，用途广泛，如说笑话叫“打趣”，看人叫“打量”，劝和叫“打圆场”等等，举例的话上百个也不难。“打的”是北京人的创造，就像香港人把合伙叫“拍档”一样，是一个地区性生活用语，外地人听了觉得新鲜，也觉得很有活力。我想将来语言学家也许会考虑作为一条词语收进汉语词典。

北京“的”多，尤其满街跑的“面的”（一种黄色小面包车）多，大街上只见滚滚黄流，可算京都一大“景观”。北京“打的”方便，这些“面的”大有功劳，它们穿街走巷，无处不在。北京的“的”有三等，“面的”车价最便宜，计程也较合理（堵车不计程），受公众欢迎。自“面的”大量涌现，其他“的”面临巨大挑战，有的只得歇业，而公众则受惠。北京那么大，外地人上北京，办事访友，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要不是“打的”方便，行路就难了。

但是，就我亲身经历，外地人在北京“打的”，有两件事恐要受到困扰。

一件，北京的司机似乎都不大识路，或识路不多。你上车，告他地址，得到回答大都是一声：“在哪儿呀？”外地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经他这一问，真像有句北京话说的：“给懵住啦”。心想你司机不识路谁识路呀？只能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地理知识搬弄出来，还是说不明白。最后只好比划一个大致的方

向，让他一路开一路问。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你北京人怎么认不得路？”他说：“我刚上岗一星期。”我说：“你不带张地图？”他说：“带啥地图！”可见只要会开车，就可开“的”，对司机没有什么培训，也没有什么上岗要求。这一来，“打的”的可苦了。

另一件，在北京“打的”也时有可能被“斩”。外地人不辨路途，不晓远近，上了车就得由它开。一次自西郊去市区，打“面的”，司机倒挺和气，说：“走二环行吗？”可怜我不懂该走什么二环三环，只能老实说：“听你的。”后来知道兜了一个大圈子，多付了两倍车费。回来打的是夏利车，又是七兜八兜，还老堵车，也是后来知道多付了三倍价。朋友相告，北京人不坐夏利，这种车拉客不易，所以有机会就要“斩”上一刀。

一九九四年

另一种“价值”

王同亿和他主编的《语言大典》，近来的名声愈来愈大了，知道的人也愈来愈多了。但是，现在的名声与早先的名声，正好相反。早先的名声是吹捧出来的（自我吹捧和他人帮捧），吹得神乎其神，唬人唬了一阵子。现在的名声是揭发出来的，用事实揭露真相，显出了原形，乃是一个假冒的“辞书专家”编出了一部集剽窃、谬误、不通于一体的大杂烩。早先是唬人，现在是惊人，令人感到震惊。当然，大家在震惊之余，还想看看结果如何。

对于告王同亿抄袭侵权的诉讼，法院虽已立案受理，但因此类案件查证费时，短期内当难以审结。不过在道德法庭上，王同亿败诉似乎已成定局。

曾有好心的先生鉴于此书误人的教训，著文“奉劝读者诸君在购买辞书的时候，三思而后行”，莫要上当受骗。他的警告对于以求知解惑为目的的广大读者，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有着“藏书癖”的人来说，则又可能是另一回事了。就像在集邮家那里，一枚印错或印倒的邮票更为珍贵一样，在藏书家那里，一部像《语言大典》这样被称为“谬误大全”的辞书倒不失为历百世而仅一见的“珍品”，说不定有另一种“价值”。我可以具体指出它的“价值”所在：

第一， 供发笑解闷。

我是很喜欢听相声的，我相信同好何止成千上万。人说“一笑，十年少”，相声让人开怀解颐，百听不厌。但是好的相声不多，真能发笑的更少。《语言大典》却可弥补这个缺陷。从已

揭发出来的材料看，所举的一些例子，无不是绝妙的相声段子，足以令人捧腹大笑。起先以为这仅是“个别的”或“极个别的”（这是我们对一些“错误”常用的词语），但找来原书一翻，想不到触目皆是，真可谓无奇不有，匪夷所思，妙语连篇。不论你翻到哪一页，都不会令你失望。比如我随手一翻，翻到了“眼”字，就看到了这样有趣的条目与释义：

眼白 白眼珠儿

眼花缭乱的表演 一种喧闹的、令人眩目的而且常是低级的气氛或表演

眼泪汪汪的 感情脆弱的或好动感情的

眼泪汪汪地看 用泪水模糊的眼睛或似乎是用泪水模糊的眼睛迟钝地观看或观察

我想不用对这些例子一一评论，也不用再多举例（实在举不胜举）。总之这部所谓的“大典”，除了可称之为“谬误大全”，还可称为“相声大全”或“笑话大全”。

第二，可为后世提供一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辞书界大骗局的样品。

我们只知道市场上有伪劣商品，经济交往中有诈骗行为，却没有料到在编辞书中竟也毫无忌惮地用上了这些足以构成犯罪行为的手法，利用此书设置了规模如此巨大的骗局：第一步骗取了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信任，第二步骗取了传播媒介为之宣传，第三步用豪华的外形包装着劣质的产品推向读者，向购买此书的广大读者行骗。其行骗之广，手段之妙，受骗之多，都是空前的。如今骗局败露，估计将销声匿迹，这部书也将日见其少；但是对后世的人来讲，这却是一部辞书界大骗局活生生的见证，可以从中看到当时是如何行骗的，用的又是什么

骗术。不是有人曾为此书主编预言，将是“二百年后仍在众人书案上留名的人”吗？这点倒是说对了，这个“名”是一定会“留”下去的。这样一部将会“留名”后世的书，不也是很值得收藏的吗？

一九九五年

赞神戸市民

这次日本神戸大地震，其震幅之大，灾情之重，伤亡之多，举世为之震动。

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和同情，纷纷慰问，并为救援工作作了力所能及的支援。传播媒体更作了详尽的报道，表示了中日人民息息相关的情谊。

但是最令我们感动并赞佩的，却是数十万神戸受灾市民，在这次大灾难中所表现的沉着冷静与团结精神，这充分体现了—个民族的凝聚力和他们坚韧勇敢的大无畏精神。从电视屏幕上，我们看到，神戸市民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呼天抢地，而是把悲痛埋在心里，默默地平静地应付这场事变。有力者还在砖砾中搜寻幸存的人，而置身旁财物于不顾。老幼妇女在寒风中—排排露宿街头，秩序井然，分工互助，有的生火，有的制作饭团。领取救济物品，排成长队，领到后还鞠躬致礼，看不到—点抢先恐后的混乱现象。像这样具有如此自控毅力的民族，是决不可轻视之的。

有人说这是日本人的“性格内向”，我看不对。这是文化修养、文化素质的表现，也是长期重视教育的结果。

有人把这次神戸公路和建筑物受损之重，称为“抗震神话的破灭”，我觉得这种说法也不够郑重。人类与自然力破坏的抗争，究竟是有限和相对的，将持续无数次的失败与成功过程，不能因—次失败就加以指责或嘲讽。相反，神戸抗震的失败，倒是为人类抗震的成功前景提供了—次有益的教训与经验。

—九九五年

请给书店一席之地

曾经多次搬迁，现栖身于徐汇广场一角的徐汇区新华书店，最近又面临被迫迁移的命运，限令迁去的地段则是一个一般市民不易光顾的“冷角落”。这是本年 11 月 25 日的《文汇读书周报》所透露的消息。该报还配发了题为《但愿这样的事不再发生》的短评和题为《黄金效益》的专栏评论。短评问道：“为什么把书店赶出‘黄金地段’的事会一再发生呢？为什么书店在有些人眼中总是可有可无的呢？”专栏评论则指出：“试看某些一心想把书店逐出‘黄金地段’者，却又兴师动众搞什么广场演出，以显示自己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这又何必呢？”

我完全同意《文汇读书周报》为繁荣上海文化事业所坚持的立场、观点，现即借用该报的新闻标题，作为本文的题目，也为徐汇区新华书店被迫迁移这件事作一点呼吁。

我想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据报道，这次限令书店搬迁的是徐汇区市政建设公司，请问这是什么性质的部门？既名“公司”，当然只是一个商业性质的机构，或是某一个政府部门的三产企业。谁都知道，商业机构或三产企业，在法律上不具备任何行政职能，它没有权力代替政府部门来发号施令。徐汇广场的规划与建设，属于徐汇区政府的职责，怎能由一个打着“市政建设”牌号的公司越俎代庖？应该指出，当前有不少部门和单位，占地为王，变国家所有制为部门、单位所有制，假借名义，任意批租土地、房屋，谋取部门单位私利。此风蔓延未有已，徐汇区新华书店

之被勒令迁移，是否亦属此类，有关政府领导部门有责任查一查，管一管。

第二，这次事件，单靠《文汇报》一家的呼吁，还不够。上海舆论界应该多讲讲话，上海文化界也应该出来讲讲话，而作为新华书店上级领导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更应该出来讲话，不能漠然视之。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和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之得以避免在“黄金地段”拆迁的命运，就在于有了各界人士和领导部门的干预和支持。

本文亦可视为上海市民一分子的呼声。

第三，由此想到，像这样的事如何使之不再发生，单靠良好的愿望也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政策、法规的制约与监督。市民也要有知情权、发言权与监督权，不能让一些部门、机构和单位只顾一己的利益，为所欲为，有损上海市的整体形象。

徐汇区新华书店的迁移，似乎只是一个地区性小问题，却关系着上海市的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也关系着上海的面貌，不可等闲视之！

一九九五年

“国骂”及其他

近来，古书看得腻了，不免找几本新潮文学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果然别有天地，大开眼界。作家们游戏世间，调侃人生，似真似假，有实有幻，真是妙笔生花，美不胜收。别的不说，单是“国骂”如“他娘的”、“他妈的”之类，过去只是作家笔下作为渲染人物的粗俗口吻，偶一用之，如阿Q之说“妈妈的”，李逵之说“鸟”（即屌字，指阳具，作名词或形容词用），如今也出自于作家自己的口吻了。有一本杂志，就载有如下的对话录：

作家甲：你他娘天天卖画卖画卖画的，快成画贩子了。

作家乙：可是也真他娘的邪了门了……

看来这种“国骂”已经成为某些成名作家生活中和写作中脱口而出的习惯用语，否则很难想象在上引的对话录中有什么必要应用这类口头禅。

一般说，女作家的笔下是不大会出现这类特殊词汇的，但是不，这是过时的看法和落后的思想。今天的女作家以不避粗野为风尚了。有一本跻身于“跨世纪文丛”的已成名女作家的专集，就是证明。翻开这本书，里面的男女人物，几乎个个都是熟练的“国骂”能手，他（她）们好像比赛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吐出下面这样的话：

“小婊子养的！”“狗日的们！”“他妈乌龟王八蛋！”

……

如此如此，不用多引了。或说你不懂艺术，这是刻画人物所必需的，这才是艺术的真实。我却不敢苟同。艺术是给人美

感的，岂有叫人恶心的东西，也能称得上艺术？

上海正在大力推行“七不”规范活动，其中一个“不”就是“不说粗话脏话”。我以为这是最难纠正和杜绝的。其他六个“不”都是看得见、拦得住的，唯独这个“不”是无形的，抓不住，禁不了，罚不到。这就需要通过提高教育程度和文明程度，也需要我们的新潮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里净化语言，别推波助澜。不然的话，群众会说：人家名作家都在说呢，对我们干嘛要求那么严！

一九九五年

酒缘

据说什么事都有缘分，我相信吃酒真有酒缘。有的人天生能饮，这便是与酒有缘；有的人滴酒不沾，这便是与酒无缘了。前不久，我参加一次宴会，同桌十人，半数以上都推说不会吃酒；表示能吃一点的，也只说来点啤酒。与我邻座的是钱君匋先生，已近九旬高龄，矍铄如五六十岁人，独说他吃黄酒（即通常说的绍兴酒）。后来为他斟酒，他一杯杯，全不推辞，也不见酒态。一桌的人为之钦佩。有人问他酒量多少，他说过去是五斤，现在年迈，稍减一些。又说三十年代时，他在开明书店工作，下班后便随叶圣陶、夏丏尊、周予同诸先生去四马路高长兴酒店吃酒。每人五斤，习以为常。这几位先生自然是有酒缘的人了。

这使我想起宋朝人一个吃酒的故事。王审琦是宋朝开国大臣，与宋太祖友好，但不会吃酒。宋太祖宴会，因王审琦不吃酒，每为之不乐。一日酒酣，宋太祖举杯祝道：“审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贵，酒乃天禄，何惜不赐饮？”这样一祝，王审琦果然能吃酒了。我看宋太祖说的“天禄”，就是酒缘。但王审琦从不吃酒到能吃酒，大概是心理作用，与天其实是无关的。清朝阮葵生写过一本《茶余客话》，他是爱吃酒的人，他对王审琦的这个故事有一番议论：“是知酒量宽窄，关乎福泽，造物（指天或上帝）所靳惜，不轻予人。”他这话看来近于迷信，但也有一定道理。从欣赏与享受的角度看，吃酒是一种乐趣。懂不懂得这种乐趣，确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的，这就要看同酒有没有缘了。

关于酒的乐趣，古往今来的人写过不少文章，我觉得刘伶

的《酒德颂》还是体味最深。文中几句话形容酒后情景：“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这是很形象的，一吃酒，世间一切事物都不在他的心中眼中了，一切都化繁为简了。

但是，吃酒最大的乐趣，还不在酩酊大醉。倘若酒醉糊涂，或睡或闹，就没有什么情趣可言了。最佳的境界应是似醉非醉之时。宋朝邵尧夫有两句诗：“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这就是美学上的“含而不尽”的意境。有酒缘而又能欣赏此种意境者，当是高层次的酒人。

还有一种人，自己无酒量，不善饮酒，但爱酒并很喜欢看别人饮酒，这种人也是有酒缘的。明朝文学家袁中郎可称代表。他写过一部叫《觞政》的书，专谈饮酒。他说：“余饮不能一蕉叶（酒杯），每闻闻声，辄踊跃。遇酒客与留连，饮不竟夜不休。”我在六十年代编写《袁宏道集笺校》（一九八一年出版），在《觞政》后面曾加按语道：“宏道不能饮，然雅习酒道，自谓趣高而不饮酒，其弟小修亦称其‘不能酒，最爱人饮酒’。是《觞政》乃趣高之作，非酗酒之作也。知宏道者当能辨此。”我自以为是袁中郎知己，也欣赏他对酒的态度，所以特为写了这段文字，也表示我对饮酒的旨趣。

再附带说几句题外话。我在这篇文章中，将“吃酒”与“饮酒”两个词语并用。规范的叫法应说“饮酒”或“喝酒”，但江南的口语，习惯叫“吃酒”。我看《水浒》，梁山泊英雄也说“吃酒”，可知宋元时“吃酒”一词是南北通用的。从词义上说，“饮”或“喝”都包括在“吃”之内，说“吃酒”不能算错。

一九九五年

酒缘续篇

写了一篇《酒缘》，意犹未尽再写一个续篇，主要谈我自己的酒缘。

上次谈到叶圣陶和钱君匋等诸位先生在高长兴酒店饮酒，这个高长兴，五十年代初尚在，还保有昔日风韵。我曾去那里饮酒，店中用的酒器是上粗下狭的直筒锡壶，放在一个特制的铜质旋转圆盘上温烫，一筒装半斤酒，吃毕不收去，再来一筒。桌上酒筒可越积越多。我虽有君匋先生他们的雅兴，却少他们的宏量，只能一斤足矣。桌上只放两个酒筒，以与君匋先生他们每人五斤，面前堆起十个酒筒比，就露着寒俭之相，不免有愧前修了。

高长兴的菜肴也精致，当然指下酒的冷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银蚶和白斩鸡，可以“鲜嫩肥美”四字当之，好像以后从未再能尝到这么好的滋味，这大概同饮酒时的酒店气氛有关。美好的酒与菜肴也要有相等的酒店气氛配合，方相得益彰。如今高长兴烟消云灭，几经“改造”已踪影全无。现在立在旧址上的是上海书店，建起了多层的高厦。但我每次经过那里，总还常常想起，这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小小的令人怀念的高长兴酒店。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都凭证供应，酒也在内，上海当时每户每月配给五加皮（一种上海出产的低度红酒）半斤。有人便厚着脸皮到处向不吃酒的亲友讨这半斤酒票。亲友间来往，半斤酒票也可作为礼品馈赠，受者极表感谢。因为没有酒喝，在酒友中出现了“酒渴症”。《聊斋志异》有两个写酒渴的

故事：一个是某士人半夜酒渴，家中无酒，亦无处可沽，于是以醋代酒，畅饮一番。另一个也是写一士人，也是半夜酒渴，家中仅有一坛误投过毒药的酒，顾不得，拿起就喝，妻子力劝不听，果然饮毒而亡。酒渴时连醋亦可代替，甚至连性命也可不惜，可知酒渴之难忍，是可称之为“症”了。我说的发放酒票的那个年代，虽然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但酒友们千方百计觅酒而饮的狂热之情，却是确切的事实。大概当局也看到这点，后来在按户发放半斤酒票之外，各区开放几个指定的酒店，定时定量供给“堂吃”，即只许在店内吃，不许带走。一般定时在下午二时至四时，定量二至四两白酒（但有时只有果子酒，这要碰运气）。同时供应一点下酒的菜，那就很可怜了，大都是瘦瘦狭狭的带鱼头尾，或相同等级一些剩余鸡骨之类的东西。酒客们经过几个小时的排队，得以进入店堂，对于他们来说，任何种类的酒和食物，都抵得上琼浆与佳肴了。

我坐在这些酒客（以工人和店员居多）身旁，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知道许多“社会新闻”和“民间舆论”，这是报纸和电台上绝对看不见听不到的。我看着他们（我自己也在内）因酒意而红喷喷的脸，滋润的双眼，有滋有味一口口啜着配给的酒，吮啃着一块腥冷的鱼头，我就想人是多么容易满足，又是多么善良呵！

什么时候唱什么歌。那个时候为几两酒而排队“堂吃”的人们，我认为他们是比旁人更有酒缘的；他们从苦中怡然自乐，所以也领会到了旁人所没有领会到的那份酒趣。我也一样。

一九九五年

三十年代书籍广告

我国的现代出版事业，在三十年代可说达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阶段。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虽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但是民心所向，以及地下党的坚强领导，进步文化蓬勃发展，其威力之大，使一切反动文化为之黯然失色。特别在上海，形成了进步文化的中心，出版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鼓吹抗日救国的书刊。大小书店、出版社，几乎每天都有新书出版。出版界有进步的，有保守的，更有反动的，壁垒分明，竞争剧烈，为了争取读者，扩大影响和销路，都很注意利用广告这个宣传工具；因此书籍广告，各出心裁，呈现一派兴旺景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界的斗争。

那时，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总店设在南京，上海的分店门面也很大，但出的书反动落后、腐朽陈旧，很少有人问津。它虽然在《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几个大报上，登有定期的新书广告，但广告文字拙劣，编排单调，很少引人注目。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以它们的历史悠久和资力雄厚，而名噪于出版界。它们不论在编辑、印刷和发行各方面，都有一整套传统办法和丰富经验。它们有时虽也显得行动笨重，老气横秋，但也不时振作一番，有所创新，使人刮目相看。其中尤以商务最为特出。

商务的“每日一书”，尽管所出的书，质量高低好坏不一，却也是出版史上很有气派的创举。它在几个大报上，每天都有固定的广告地位。格式是一个长栏，上面三分之一地位是“每日一书”，有内容介绍，文字简练；下面三分之二地位则是每周

重版书书目，没有文字介绍。“每日一书”在一定时间内发售特价，这也是招徕读者购买的一个方法。

有些以做生意赚钱为目的的小书店，为了牟取暴利，也在广告上大做文章，耸人视听。它们的书籍广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如有一个卿云图书公司，有一次忽然在所有大报的头版，以显著地位由某某“大律师”代表登出启事，声明将要出版所谓《真本金瓶梅》，发售预约；并写明倘若有人指出这不是“真本”，或加以翻印，就要由这位“大律师”代表提出诉讼云云。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删节本，骗骗人罢了，可是不明真相的读者见它说得煞有介事，就容易上当了。这和上海滩上“卖假药”的勾当是同一个性质，像这类骗人的书籍广告，为数还是不少的。

三十年代的出版界，真正把书籍广告当作一件严肃的工作来做，成为沟通读者与书籍之间的桥梁，那是以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即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为代表的进步出版业。

这三个出版社，一般都利用本社出版的各种杂志和书籍，刊登广告。杂志上的广告，大抵放在里封、底封，以及前后的衬页；书籍上的广告，大抵放在底封的衬页。每种广告大都由同类性质的书籍，合成一组，这样既可以加强读者对同类出版物的印象，也可以便于读者综合选购。这些广告的特点是：内容严肃，文字生动，形式活泼。每种广告，可以看出无不经过精心设计，大小搭配，重点突出，美观醒目，雅俗共赏，有的还配以适当插图，使得图文并茂，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件艺术作品。这些广告的作者和设计者，虽是无名英雄，但却是杰出的书籍广告专业人才，开创了一代的书籍广告新风，应当向他们

致敬。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先看《青年自学丛书》的广告。这套丛书的广告，采用两种编排形式：初出版时用综合的形式，主要是介绍丛书的出版宗旨和一、二辑的书目。以后每逢丛书中的新书出版，则用重点介绍的形式，下面开列已出各书目录。如有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禁售的书，书名仍然照开，但在书名下用小号字标出“禁售”二字。比如有一次这套丛书的广告就是这样设计的：上面是两种新书（钱亦石《产业革命讲话》、胡仲持《关于报纸的基本知识》），下面是已出各书目录，但在钱亦石《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钱俊瑞《怎样研究中国经济》、汉夫《政治常识讲话》和平心《社会科学研究法》四本书名下，印上了“禁售”字样。读者一看就清楚，国民党反动统治是如何害怕真理的传播，实施法西斯文化专制了。这种形式的广告，事实上是在向国民党反动派提抗议，然而表面上又是服从你国民党政府的“禁令”，使它无所借口；但是通过这样的广告安排，这些书在读者中的声誉就更高了。在这种场合，广告也成了战斗的武器。

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广告的编写与设计，也是极见匠心的。整个广告的版面，左上角是全书缩印，右侧是通栏锌版书名，书名上是一条横题“现代中国的总面目”，下面是“茅盾主编”四个黑体字。版面的中心是内容介绍，又分成三种字体与形式，用长仿宋体四条：“这里有富有者的荒淫与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女性的被压迫与摧残”。用方仿宋体的也是四条：“落后阶层的麻木，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人员的腐化，土豪劣绅的横暴”。最下面是用六号老宋体的一小方块说明：“从本书十八编中所收的五百篇文章里

面，可以看出中国一日的或不仅限于此一日的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成的一个总面目”。这篇广告的文字，确实是做到了精练有力，深刻地概括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面的旧中国的面貌。这也证明当时进步出版界的书籍广告，不单纯为了“做生意”（当然这也是需要的），而是配合进步书籍的出版，起到了战斗的作用。

书籍广告，不仅内容文字要写得好，还必须讲究编排设计的新颖活泼。有些人认为这种技巧问题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开列一篇书目，顶多加点介绍就行了，谁都能做。这完全错了。看看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就知道当时是多么重视编排设计的技巧。有一套《妇女生活丛书》，出了四本书，登了两次广告，设计就各有不同。一次是以《新妇女论》和《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为重点，版面上端用了一幅插图：一个精疲力竭的妇女拖着沉重的铁链，链端是三个大铁球，铁球上分别写着“无权利”、“厨房”、“迷信”的字样；妇女身边还有一个瘦小赤脚的孩子。另一次是以《在德国女牢中》为重点，书名上端就改用了—个青年妇女关在铁窗中的插图。同样的四本书，而广告却采用了不同的形式，选配的插图也各具特点，鲜明地表达了妇女所遭遇的苦难和迫害。技巧也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文学作品做广告，要有文学意味和文学笔调，不能只是一般的内容介绍。鲁迅为《海上述林》、《铁流》、《死魂灵》和《八月的乡村》等书所写的广告，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看就知出自大家手笔，因此脍炙人口，传诵一时。《世界文库》出了不少文学名著译本，广告也做得很精彩，例如《俄国短篇小说集》的广告：“这里有不可挽救的精神的忏悔，有为残酷的生活所鞭

拊的沉痛的哀诉；这里，可以使人领会到一种悱恻的诗意。同时也可以使人在深沉的愁郁中，感到要推破这黑暗世界的冲动。总之，这是一本把革命前俄国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心情、幻灭和希望，都充分地表现出来的杰作选集。”又如《小鬼》的广告：“梭罗古勃是一个诗人，他的小说也是充满了诗的趣味的。《小鬼》对于他那时代是描写得如何的深刻呵。他虽不多写长篇，而这一个长篇却是不朽的；格调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斯退夫斯基们不同，而其精神却依旧是彻头彻尾的俄国的。”应该说，这些已经不是广告，而是出色的文学短论了。在三十年代写的这样好的广告文字，还可以举出许多来，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是丰富多采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对当时读者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许多广告至今使人印象犹深。今天出版界的同志们，不少是三十年代的过来人，但是更多的是解放后参加出版工作的，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对他们来说，也还可以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如果作为出版史料或文献，集印出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

一九七九年

漫谈书刊广告

大概也是一种癖好吧，由于爱书，我一向喜欢浏览阅读报纸与刊物上的书刊广告。老一辈的文人学者大都经历过某一时期的逛旧书店的乐趣。解放前的许多人一有空就跑三马路。跑进一家旧书店，东翻翻，西看看，偶尔在乱书堆中发现一本自己所要的书，价格又低廉，真是喜出望外。就是不买什么书，光是在书架、摊头留连一番，兜个圈子，也乐在其中了。我浏览、阅读书刊广告所得的乐趣，与此大致相仿。久而久之，养成了一个习惯，每看到一则书刊广告，竟会将它当成艺术品来欣赏，玩味其得失，评判其优劣。看到好的广告，就像读到一篇好文章，令人击节叹赏。看到拙劣粗浅的广告，则令人扫兴。

以上所说，自然只属于我个人的爱好，不可能人同此“癖”。书刊广告的主要作用，还应是广告宣传，是出版界向读书界提供最新的出版信息，是沟通出版社与读者之间信息交往的一座桥梁。我经常给一些青年编辑同志传授“经验”，希望他们随时留心各种书刊广告，养成浏览、贮存的习惯，因为从中可以获取和积累大量的出版信息与学术动态。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积累起来。我们不可能读遍所有出版的书刊，但是书刊广告却是它的快速缩影，为你提供书刊的丰富知识。书刊广告有如此作用，出版社就应该重视这个工作。书刊广告既然是广告，就要讲求做广告的艺术，把它做得生动活泼，吸引读者的注意，诱发他们阅读的兴趣。书刊广告一方面需要有广告的特色，另一方面更需要有书刊本身的特色。同商业广告不一样，书刊广告要尽可能地避免一些“商业气”，多增加一些“书

卷气”。这或许算得上是书刊广告的特殊性吧。

但是，书刊广告要做到具备“书卷气”，而又不至于流入“商业气”过重，或者只会“掉书袋”，以掇拾陈词滥调为能事，也并非易事。一九七九年，我去北京出差，有机会拜会了三联书店的负责人范用同志。他是原生活书店的老同志，我早年也在生活书店工作过，所以虽是初识，却一见如故。闲谈中谈到三十年代生活书店的书籍广告，彼此都有同感，觉得那时的广告今天仍然有许多可以取法借鉴的地方，还互举了一些那时广告做得好的例子。我不过是凭记忆随便谈谈，范用同志却立刻搬出了他所珍藏的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复制件，有近百则之多，供我观赏，使我如晤旧友，眼前又浮起了三十年代出版界的一幅兴盛景象。范用同志见我与他同好，显得很高兴，便提出要我写一篇介绍关于三十年代书籍广告的文章。我一方面钦佩他是重视书刊广告的有心人，另一方面也觉得多年来书刊广告此道不讲久矣，应该鼓吹、提倡一下，便欣然答应了下来，并在旅馆里根据他所提供的资料和我自己的记忆，写了一篇短文章。这便是后来刊登在当时创刊不久的《读书》上的《漫谈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一文。随后范用同志又用“三联书店资料室”的名义，编了一本收录三十年代书籍广告的小册子，把这篇文章做了前言。这本小册子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长沙第一次出版会议上，曾分送与会代表，表示一点提倡的意思，供出版同行们参考。

我举这事想说明：做书刊广告是要动点脑筋，花点功夫的，要把它当作一种“创作”看待，三十年代的出版界就是这样做的。再有，书刊的宣传、介绍与推广工作，广告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三十年代出版界普遍重视书刊

广告的作用，也是促使当时出版繁荣的一个因素，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大家都谈“观念更新”，的确，许多旧观念有了改变。拿宣传说吧，不管是工业产品还是精神食粮（书刊），对广告都开始重视起来了，增强了“商品意识”，比之于“文革”及其以前，把广告视为资本主义作风，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从当前出版工作要求的角度来说，对书刊广告的重视还嫌不够，某些观念有待继续更新，“商业意识”也有待继续增强，虽然出版界的“商业气”是要避免的。

应该承认，多年来，出版部门对书刊广告这个工作，没有考虑在整个出版工作的组成部分之内。这也不能单怪出版社，社会各行业对广告的看法莫不如此。但是现在整个社会的风气转了，广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出版社在这方面若不赶上去，或尚有迟疑，就不能适应形势了。

轻视广告，或认为可有可无，或虽有所重视但不讲究艺术，这是当前出版社宣传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例如说，书出版了，还怕没有人买吗？广告登不登都一个样。读者如要买这本书，你不登广告他也会买；他若不要这本书，你登了广告也没用。还有，广告费越来越高，面对着几百几千的付款单据，负责人签字的手不免感到沉重；签过一次，第二次就要犹豫了。诸如此类等等看法，决不是个别的人，可统称之为“广告无用论”，多多少少影响书刊广告工作的开展。

另有一种情况，他倒并不轻视书刊的宣传，但是认为与其出钱登广告，不如多写点书评或介绍文章，送给报纸登载，既省了广告费，作者还可收入稿费，又起了广告宣传的作用，一举数得，何乐不为。殊不知，书评之不能代替广告，犹如广告

之不能代替书评。何况书评又不是你写而人家必登，即使登了又有多少人看，这个决定权可不在你自己手里。

好多出版社办了“书讯”一类的小报，这对于推广宣传本社出版的图书，无疑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这类宣传品主要采用的是“书评”形式，关于每本书的介绍大都写得冗长乏味，内容则是泛泛的简介和赞誉，有的则堆砌些华丽的辞藻。小小的版面上，几乎全是大块的文章。这类“书讯”，说实在的，称它是“书评”够不上，称它是广告又不像，传递信息更不及时，尽管编者很吃力，写者很卖力，收效恐是甚微的。所以，倘以为不如将广告费用来办自己的“书讯”报，只能说是一种不了解广告作用的想法。报纸销量大，读者面广，传播信息快，这是自办的“书讯”万万赶不上的。当然，“书讯”还是可以办，宣传手段不妨多种多样，但要办得生动、活泼、及时。目前多数的“书讯”是不合格的。

现在一些出版社对书刊广告，大都已经重视起来。特别是各省的一些出版社，在中央级的报纸上登起广告来，经常是半版半版的，个别还有整版的，气魄之大，令人叹服。上海的出版社，好像还缺少这样的气魄。不过，总的来说，当前各个大小出版社的书刊广告，从形式到内容都显得单调。不论是大广告，还是小广告，只限于刊载书名、作者与定价，内容如何，则不着一字。即使遇上有内容介绍的，文采笔调，精彩者殊少。因此就我个人作为一个书刊爱好者和书刊广告爱好者而论，是感到不满足的。

我不知道现在各出版社是不是设有专职的广告人员，我看应该要有专职的广告设计与撰写人员。各个出版社的总编辑应该亲自抓这个工作，至少是要关心这个工作。专职的广告人员，

他的职责是负责各种广告的版面设计与文字撰写，要不断追求创新，独出心裁，甚至标新立异。他应该具有编辑人员的水平，同时也应该享有编辑人员的待遇与业务职称。广告工作与编辑工作虽有所区别，但也有共同点，这就是共同的业务知识与业务水平。一个称职的编辑，就其工作范围来说，广告宣传也在其内。一个编辑，既懂得写审稿意见，又懂得写书评，更懂得做广告，他的编辑业务就全面了。反过来说，广告人员能像编辑那样，他的广告业务也就全面了。

要做好书刊广告，我的看法，基本的要求有“三熟”：第一，熟悉本出版社所出的图书；第二，熟悉这些出版物的内容与特点；第三，熟悉这些书的作者姓名。我发现，有些书刊广告在以上三个方面经常出现差错，有的甚至张冠李戴，闹出笑话，有的只有书名而无作者姓名，这原因就是设计撰写广告时，不是“三熟”，而是“三不熟”。这是做广告的大忌。然而，仅仅“三熟”还是不够的，还要有点美术头脑，艺术眼光，读者心理预测，精练的文字表达能力，等等。但“三熟”是基础，缺一不可。有了这个基础，提高创新就比较容易了。

我谈了这么多的关于书刊广告的重要性，当务之急是什么呢？我看要紧的是应该抓一抓书刊广告专业人员的培养，造就一批有志于此的优秀专业人才。就上海说，上海出版局能不能办一两期书刊广告人才的短期培训班，作为重视与开展书刊广告宣传工作的倡导呢？

一九八六年

辞书分卷出版呈疑

现在，辞书的分卷出版，好像已是理所当然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新《辞源》出版第一册。第二册是隔了一年，于一九八〇年八月出版。第三册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的，而第四册又隔了两年，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方出版。从第一册到第四册出版，前后相隔四年五个月时间。这还仅是根据各册版权页所载的时间。事实上，现在一些辞书版权页所载的时间是不可靠的。通常交书店发售，读者拿到手中，大抵要比版权页时间延迟半年。这就是说，读者买了第一册的新《辞源》，足足要等五六年之久方能买到最后一本第四册。大家知道，辞书是为了查的，不是像别的著作那样为了读的。如果缺少一册，而我所要查的正好在这一册上（这种情况并非属于偶然性，而是有其必然性），那么即使其余各册全有，对我来说，这部辞书也是毫无用处的。

据我所知，解放前，辞书是没有分卷出版的。老《辞源》虽然有正续编之分，但不能算是分卷出版，因为原来并没有“正编”的名称，后来增编了“续编”，乃是单独发售。然后再正续编合成一部。唯一的例外是黎锦熙主编的《国语大辞典》，只出了一本“一”字卷，随后没有下文，就夭折了，至今无人再提。往前推，清朝的大型辞书像《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经籍撰诂》，卷帙浩繁，而且是木刻，也是一次出齐，并非分卷出版。几百年前的辞书编纂者，学问见识及不上今人，但他们有一个道理是懂的，就是辞书的使用价值首先取决于它的“全”，缺一册缺一卷是不行的。

以当前来说，世界各国的辞书，包括许多大型的几十册的百科全书，就我所接触和看到，都是整部出齐，没有一册一册分隔成好多年出版的。

台湾也有大型的辞书出版，我见到的是一部《中文大辞典》，有四十册之多，一次出齐，查起来很方便。

由此可见，不论古今中外，辞书的分卷出版不是辞书出版的通则，而是辞书出版的变例，并且还是我们的“独创”。

当然，辞书分卷出版可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第一是限于编写人力，只能编完一卷发排一卷；第二是限于印制条件，只能一卷一卷地发印。但我认为，这都是只为编纂者和出版者着想，而不是为读者着想。因此当一些大型辞书出版之时，尽管大登广告，征求预订，读者也承认是“巨著”，但一看到或分五年，或分四年，方能出齐（可以预卜到时必定延期），也就不免倒抽一口凉气，有“人生几何”之叹了。

以上所说，不过野人献芹，可能不那么悦耳。我知道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辞书研究》是研究辞书问题的权威刊物，我这个（或许不止我一个）读者的呼声是不是也可以“研究研究”呢？

一九八三年

“请多关照”

从日本的电影和电视片里，常常可以看到男女角色向对方深深一鞠躬，恭敬地说道：“请多关照！”这大概是日本社会通行的客气话，表达一种请求关心和照顾的意思。我们不通行说这种客气话，但是我看，在我们的社会里恐怕有时也很用得着这句话。

警方说吧，最近接连出版了两部大型辞书——《佩文韵府》和《辞源》修订本第四册，而且在书店里有书出售了，这真是嘉惠士林，功莫大焉。但是我在阅读和摩挲这两部书的高兴之余，仍感到有点不满足，很想向出版部门深深一鞠躬，说：“请多关照！”

关照什么呢？说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但作为工具书来说，却是必须多方为读者着想，这就是检索的便利。这次新出的《佩文韵府》是根据原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影印的，内容悉照原样，这是很好的；原装七册，现改装四册，这也是考虑得不错的。可是原本每册书脊上印有起讫页码的做法却被取消了，这样一来，读者根据索引虽然可以查到词目所在的页码，但却无法知道这个页码在哪一册上，运气不好，就得一册册翻过去。

《辞源》修订本第四册后面附有一个全书同音字索引，这也是件大好事，可是每字却只注了所在页码和栏数，没有注明册数。这也苦了读者，他哪里记得这个页码在第几册呢！如果说每册书背上能印一个起讫页码也好，可惜也被忽视了。或曰现在这个索引不注明册数，为的是将来出缩印合订本可以适用，所以还是有道理的。如果这样说，那我又要代表只买了散装本而且

将来不准备再买合订本的读者，向出版部门深深鞠一躬，说道：
“请多关照！”关心和照顾一下我们这些只买了散装的《辞源》
修订本的读者吧！

一九八四年

请莫倒退

小时候背着大人看旧小说，其中有一种廉价石印书，大多是《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这样一些一部就有数十本的末流小说，有光纸，满页密密麻麻的手写体蝇头小字，看得一久，两眼发痛。这类书大抵是清末民初上海几个小书店所出，以赚钱图利为目的，粗制滥印，不管读者看了有害无害。当时家长们最怕孩子看这种书，一来损伤目力，二来荒废时间。待得自己年纪大了，方体会到大人禁止看这种书还是有道理的，别的不说，很早就成了近视眼，就是多看这种书造成的。幸好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有害无益的石印有光纸小字书，逐步在出版界绝迹，后来的家长们也就不再为自己的孩子担这份心了。

但是我的乐观还嫌早了一点，我以为早已绝迹的这种小字石印书，最近竟又公然以社会主义出版社的名义重行出世了。你说不信吗？真是不假。一部书名《绘图施公案》的书现在正在书店出售，上下两册，售价五元四角。一看版权页：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浙江古籍书店发行，一九八五年四月第一版。封内还印着“据光绪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影印”的字样。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家长们又得为自己的孩子安全（特别是目力，还有思想意识）操心了。也许出版社要争辩说：我出这本书不是给孩子看的，是内部发行专给大人看的。我说，书一上市，到读者手里，你就无法再管内部外部，谁许看谁不许看了。目前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再说这种拙劣恶俗的版本，不过是过去出版物中的垃圾货，有什么参考、阅读的价值，非得浪费当

今如此紧张的纸张、油墨去影印呢？我看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赚钱。那不是倒退到清末民初那些唯利是图的书贾一伙里去了吗？请莫倒退吧！

一九八五年

格律很重要

——介绍《诗文声律论稿》

古典诗词，它的文字、意境之美，这是我们大家都能领略欣赏的。读一点唐诗宋词，是生活中的一种享受，可以提高人的情操和思想境界。近年来，各种诗词鉴赏辞典风行一时，充分说明广大读者十分需要有关古典诗词的辅助读物。但是古典诗词的构成，有不可缺少的格律或称声律限制，这就是它的平仄声调和对偶、韵脚等条件。古典诗词的优美，同它这些严密的格律是不可分的。所以，欣赏古典诗词，最好同时具备一些格律音韵方面的知识。倘要动手去做，如报章上常见发表的今人所作旧体诗词，那就更应讲究格律了。

关于诗词格律知识的书籍，出版的不多，我现在向读者推荐一本这方面的专著——《诗文声律论稿》。这本书的作者启功先生，是诗人、古典文学专家，又是名书法家。这本书只有四万字，文字通俗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对诗歌声律问题作了删繁就简、去芜存精的工作，揭出其中的规律，并进一步帮助读者了解和掌握这些规律。所以虽然出版在十多年前，至今仍是一本很切实用的书。

这本书一共讲了十三个问题，即：四声平仄和韵部，律诗的条件，律诗的句式和篇式，两字“节”，律句中各节的宽严，古体诗，拗句与拗体，五言七言句式总例，永明声律说与律诗的关系，四言句六言句，词曲中的律调句，骈文韵文中的律调

句和排列关系，散文中的声调问题。关于散文的声调，这是作者的创见，他认为散文中也有平仄相间、声调抑扬的问题，并举出丰富的例证。所有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古典诗词（包括骈文、韵文和散文）格律中的关键问题，本书对每个问题都反复举例说明，标出句式和平仄，何者是正格，何者是变格，何者是“失粘”（不合律），等等。读者从中既可得到基本的格律知识，又不难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我相信爱好古典诗词的读者，会欢迎这样一本由专家学者撰写的通俗性知识读物。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全书由作者手写制版（这是因为有些符号难以排印），使本书更显可贵了。

我有幸与本书作者相识。一九七九年，我为《中华文史论丛》去北京组稿，特慕名拜访启功。路途不很熟，在公共汽车上向站在身旁一位圆圆面孔的胖老先生问讯。他说他就住在那个胡同，可以同路。我遂问：“有一位启元白先生可熟悉？”圆圆面孔老先生说：“我就是启功。”相视大笑，互称有缘，就此订交。我们谈了很多话，以后并多次相会，他那渊博的学识，幽默的谈吐，加上纯正爽脆的京白，都使我如沐春风。但他一次未提这本嘉惠士林、沾溉后学的著作（本书于一九七七年出版），真是谦素不伐的君子之风。

而我看到这本书，也还是前不久的事情。我一向认为大学者写通俗性小书，是最应提倡并表示钦佩的。套用佛家的话说，这是“大发菩萨心”的善举。王力先生也写过一本通俗的诗词格律讲话，也是很切实用的书，但侧重各有不同。启功先生这本书与之可称并美了。为此我欢喜之余，写了这点介绍，并向又有几年不见的启功先生致意问候：能在书事之暇，再发菩萨心，为青年学子写几本专门知识的书吗？（《诗文声律论稿》，

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出版)

一九九一年

成都觅书记

十月的成都，时晴时阴，不冷不热，宜于出游。我受邀去成都开一小会，我感兴趣的，还在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去逛书店，寻找有书摊的地方去转悠，看看有没有什么上海所看不到的书。我的看书，说有目的可以，说无目的也可以：一是找自己想买、愿买且买得起的书；二是找一些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老定价的书，这些遗存下来的书，虽然比较冷门（热门的早已卖光，重版的则定价有翻至数倍者），老定价便宜，自有购存价值。抱着这种想法的看书，有一个思想准备，即不一定看到找到什么，得看机遇，所谓可遇而不可求也。但不管有所得或无所得，看书的心愿总是满足了，乐亦即在其中。

这回成都看书，共有三次：第一二次是无意的，第三次是有意的。下榻处成都科技大学的后门，有一条长街，两旁小吃店林立。我忽然发现，夹在这些小吃店中间竟有几家小书店，脚步自然就被吸引了进去。这些小书店也是做大学生生意的，卖的全是流行的文学书和武侠小说，能中意的并不多。我买了一本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余斌著《张爱玲传》，这在上海尚未见到。令我高兴的是买到了三本荣孟源主编的《近代稗海》，虽然只是残本（六、七、八三辑），却是老定价的书，精装六百多页的书，定价只有 6.31 元，这在今天的新书是不可想象的。又买了一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法国文学译丛》（2）《火烧莫斯科》，也因它是老定价，669 页，定价 4.04 元。但翻开第一篇第一行，就看到这样的译文：“阿尔芒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使我立刻想起最近翻译界为《红与黑》译文该不该用

中国成语的一次激烈论争（似乎是三十年代直译与意译之争的继续），我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因为以外国小说而滥用中国成语翻译，就像穿西装却头戴瓜皮小帽、脚登圆口布鞋一样的滑稽可笑。但我还是买下了这本书，因为它便宜。

当夜，我就看了《张爱玲传》，觉得这本书的写作态度相当严肃，引用材料丰富，评论也颇公允，有学术性，不是一本赶时髦、抢浪头的书。归来与陈子善教授通电话，他是研究张爱玲作品的专家，我向他谈起这本书。承他见教，现在市上已有四本写张的传记，他认为以这一本为最好。我很高兴，没有买到伪劣产品。

无意间的购书，还有一次是在杜甫草堂。那里也有书摊，除了一些导游之类的书，也陈列一些其他方面的书。我买了一本湖南出版社出版的《蒋经国自述》，收集蒋的《我在苏联的生活》等六部日记，都是解放前的版本和台湾的版本。自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三年，已印行三次，印数达四万七千册。我在上海没有看到这本书。本书出版说明说：“个别地方略有删节，余皆力求保持历史资料的原貌。”这是矛盾的说明，既有“删节”，何来“原貌”？但作为读者，当然是无法表示异议的。

听了成都朋友的介绍，去成都的“书店街”春熙路转了一圈。这是有意去觅书了。这条路其实是成都的南京路，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但新华书店、古籍书店都在那里，还有一处较大规模的个体书摊集中地名为“龙江书肆”，这是因刻印佛经闻名的龙江寺旧址所在而得名的。新华书店和古籍书店的书，品种不多，几无可观者，店堂里显得空荡荡的。龙江书肆的书摊却占了春熙路的整整一条支路，约有五十米长，背对背，三四十家一字儿摆开。说是书摊，不如说是书篷。木板搭成的小屋，

正反两面，各自经营。屋内不能容人，一块搁板，上面堆满书籍，摊主（我看到大都是二十几岁左右小姑娘）就坐在这些书的后面。只是书摊虽多，所有书籍却大同小异，流行书、港台翻印书、武侠小说和古旧小说等，看了一个书摊，其他书摊有些什么书也大抵了解了。看来只有等待旧书业的何日再度兴起，方能真正激起人们的淘书欲望。

不过，从这些看似平庸的书摊的书丛中，我终于觅出了两本我所想要的书，也可说不虚此行了。这两本书：一本是敦煌文艺出版社今年三月出版的《苦茶——周作人回想录》，573页，定价19.80元。版式颇讲究，四周加框，版面疏朗，不顶天立地，所用纸张亦佳，这是可喜的。虽未细读，翻阅所见，尚未看到错别字，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但令我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用“苦茶”这一书名？作者生前将他这些文章，先题《药堂谈往》，全部完稿后易名《知堂回想录》，香港版即以此定名。现在出版社擅自改名《苦茶》，还想画蛇添足地加上一个副题《周作人回想录》，倘作者有知，我想是不会同意的。

另一本书是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于一九九四年八月出版的《'93断想——谁是丑陋的中国人》，309页，定价9.80元，初版印五万册。作者在后记中有一个声明：“本书出版时，经协商，对原稿作了局部删节与修改。”这倒与《废都》以方框代删节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说这也是一本畅销书，与《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同受到国内外舆论界的关注与评议。现在《第三只眼睛》在书摊上到处可见（上海、成都皆然），这本书却从书摊上消失了。我在龙江书肆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孤零零一本夹在许多书中间，一点也不显眼。摊主一面收钱，一面说：“只剩这一本了，再找不到喽！”可知是一本漏网之书。我对这

本书中所发的议论，并不觉得新奇，有些对现实的牢骚，在某些公共场合都可听到。众口一传，据说成了“禁书”，大家看不到这本书，反抬高它的新奇感了。我注意的是这本书的文字风格，属于粗放型，有些特殊的用字习惯，如“打报不平”（我们平常只说“打抱不平”）、“即便”（编辑看到都要改正为“即使”、“即便”的）之类。排校亦有错漏，如“大不韪”都误为“大不讳”等。全书用小四号字排，看起来省力，这是一个特点。

五六天的成都之旅，觅到了这么几本书，也是一个小小的收获吧，爰为记以志此行。

一九九五年

闲话《茶余客话》

本报（指《新民晚报》）《夜光杯》辟有“茶余客话”专栏，据我所知，这是赵超构老社长建议的，刊载一些遗闻轶事、掌故笔记的文章。赵老的这个题名，我想可能源于清人一本有名的笔记《茶余客话》。我同这本书却有一段因缘。这本书的作者是阮葵生，江苏山阳人，乾隆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客话》是他平生读书论学与记述见闻的笔记，内容极为广泛，举凡政治史地、科学工艺，以至花木鸟兽、饮食起居，无所不有。这本书在作者生前未曾刊行，后来由他的旧日同僚戴璐选为十二卷印行。这个本子曾被收入《艺海珠尘》丛书，《笔记小说大观》也曾收录，《丛书集成》初编收的就是这个本子，所以看到的人很多。但是这不是全本。全本有二十二卷，也曾印行，但流传不广，因此几乎不为人知。

一九五八年，我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前身是古典文学出版社）任编辑。一天，编辑室负责人吕贞白拿了几册铅排小字本的线装书给我，说是北京张次溪拿来的，要我看看有无出版价值。我一看，正是二十二卷本的《茶余客话》。张次溪我也是知道的，是一位娴于掌故并富于收藏的名家（中国戏剧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他辑录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二厚册），他收藏的文献图籍一般都是外人罕见的。我于是拿戴璐选的十二卷本对了一下，发现二十二卷本共有一千七百多条，十二卷本仅选三百二十余条，只得五分之一多些。这自然值得出版，便列入了正在陆续出版的一套《明清笔记丛刊》，并由我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

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社责任编辑，责任比今天的多得多。以古籍来说，就得负责全书的整理、标点、校勘和撰写出版说明等工作。我对《茶余客话》，还多做了一项工作，就是把每条都加上了标题；全书一千七百多条，我便拟了一千七百多个标题。标题要求简明贴切。书中记述人物，大都用他们的字号，这对今天读者查考不方便，我就利用题目标出他们的名字。当时的责任编辑从不署名，做这些工作好像都是分内应做的，从未想到以此获取什么名利。

《茶余客话》的出版说明也是我写的，那时写出版说明总要对这本书和作者批上几句，最常用的是“历史局限性”。特别对一些古籍中称农民起事叛乱为“贼”、为“寇盗”，那是必须指出和批判的。所以这本书的出版说明也免不了加上两句：“我们在肯定他的（指阮葵生）某些进步思想时，也必须要认识到他的这种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立场。”如果没有这样的套语，当心自己也得挨批了。虽然如此，上海编辑所的领导李俊民、陈向平、戚铭渠三位都有相当的学者风度，容许几位编辑在学术范围内有限度地自由发挥。同事周华严（即小说《炼狱》的作者周楞伽）是位聋哑人，聪颖绝顶，最爱作长文章，他写的出版说明常常洋洋万言（如《中州集》、《张煌言集》等），也都基本获得通过。我同他说笑话（以笔代口）：“你的文章可称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大杂烩。”他不以为忤，自得其乐。因是以教条开路，所以他的修正主义长篇大论在当时严峻的政治气氛中，未为专伺人过的鹰隼厉眼注意。

忽忽三十多年过去了，世事缤纷，上面提到的原上海编辑所几位同仁已先后逝去。往事历历，只可供茶余的谈助了。

一九九五年

书趣文丛……⑤

第二辑

《中山狼传》的公案

《伊索寓言》里有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虽是外国传来的，却为大家所熟悉。同这个故事寓意相类似，我国则有东郭先生救中山狼的故事。中山狼的故事，大概很早就已流传，但到明朝方始成型。《红楼梦》里有支曲子唱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可知中山狼这个人格化了的畜牲，在清初已经广为人知，成为忘恩负义之徒的代名。但是，谁是真正的毒蛇，谁是真正的恶狼，有时不是由经过检证的事实本身来判明，而要凭权势者指定，人民不容分辩。明明自己是毒蛇恶狼，惯会咬人，却以受害者自居，反噬一口，这在前些年是非颠倒、人妖莫辨的日子里，正是大有人在。中山狼这个故事，连同《红楼梦》里那两首曲子，在十年浩劫的漫长岁月里，在大小文痞们的笔下，也成了打人的棍子，任意挥舞，用来诬赖袭击毫无防范之力的善良人们。这在《伊索寓言》和中山狼故事作者创作的时候，大概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中山狼故事的原作是《中山狼传》，关于它的作者，有说是唐朝姚合，有说是宋朝谢良，现在已被公认是明朝的马中锡，清康熙贾棠刊印的《东田文集》收有这篇文章。《东田文集》里还有一篇《里妇寓言》，其中的主角也是东郭先生，写的是汉朝“汲黯使河南，矫制发粟，归恐见诛”，向东郭先生求教解救的办法。东郭先生给他说了有一个女人既要结婚又怕生孩子的寓言，寓言里的邻妇对那个女人说：“古称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汝嫁矣，乃不嫗养子之道而云云乎！”汲黯不等听完，“出户不俟驾而朝”。这个东郭先生，比《中山狼传》里的同一位先生聪

明多了。可见马中锡是颇爱用东郭先生这个人物形象写寓言的，这也可作为马中锡确是《中山狼传》作者的一个旁证。

马中锡这人，官做得不小，历任巡抚、侍郎、都御史，但做官很讲气节，《明史》本传说他“居官廉，所至革弊任怨，以故有名”。他不避权贵，挨过廷杖；又敢同宦官作对，为刘瑾所恨，关过诏狱。最后奉命讨伐山东刘六、刘七的叛乱，他主张招抚，为忌者诽谤，下狱而死。一生遭际不凡，死于非命，算得上是明朝历史上一个颇可称道的人物。他的诗文也做得不错，钱谦益评他“为文有隼才，刊落凡近，于诗尤工”（《列朝诗集小传》）。他在官场几经浮沉，看得忘恩负义的人和事多了，把感慨寄托在《中山狼传》这篇寓言里，应该说是很自然的。

但是，就在马中锡死后不久，开始有人认为，《中山狼传》是讥刺李梦阳有负于康海而作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出明人阙名所作《嵩阳杂识》中说：“李空同（梦阳）与韩贯道（文）草疏，刘瑾切齿，必欲置之死，赖康浒西（海）营救而脱。后浒西得罪，空同议论稍过严，人作《中山狼传》以诋之。”《提要》又举清初王士禛的说法，说王指实《中山狼传》的作者乃马中锡，是“为刺李梦阳负康海而作”。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考，明清人流行的这一说法，除《嵩阳杂识》外，大抵来源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史乘考误》所载黄佐（正德十五年进士，做过翰林学士，是康李后辈）的一篇文章（《董大理传》）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载黄佐的一首诗（《读见素救空同奏疏诗》）。《辩证》虽然指出，“或者谓黄佐之言，恐亦得之传闻，未必可信”，但结论仍肯定，“则中锡此传，果为谁作，可不言而喻矣”。《辩证》的考证，素称详博精审，此说一出，《中山狼传》这段公案几成定论，以至有的《中国文学史》

在谈到《中山狼传》和《中山狼》杂剧这两个作品时，也要这样带上一笔了。其实，这是一件历史错案，有必要辨明一下。但是所以发生这一错案，也不是没有来由，而是事出有因。

李梦阳和康海，都是明朝大作家，名列“前七子”，《明史》把他们同归入《文苑传》。他们二人的立身行事和文学主张，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李梦阳是弘治六年进士，有一次他上奏章说，外戚寿宁侯张鹤龄怙宠殃民。张鹤龄向弘治皇帝哭诉，把李梦阳关进锦衣狱。出狱，二人在大街上遇见，李梦阳乘醉唾骂，挥鞭击落张鹤龄两枚牙齿，张鹤龄只敢隐忍不响。足见李梦阳是一个嫉恶如仇、不顾安危的人，外戚权贵也要让他三分。

康海是弘治十五年的状元，名望很高。他最为人称道的事迹，就是在正德二年冒着同宦官刘瑾交结的嫌疑（这是为士论所不许的），援救李梦阳出狱。关于这一事迹的经过，有关康海传记都加记载，但详略不同，以《列朝诗集小传》所记最详。

《小传》说，李梦阳为了怂恿户部尚书韩文驱逐把持朝政的“八阍”（刘瑾为首），代韩起草了奏章，可惜功败垂成，朝政大变，朝臣罢官的罢官，坐牢的坐牢，李梦阳第三次被关进诏狱。刘瑾恨极，这次执意“必杀之”。

李梦阳从狱中带出一张纸片给康海，写道：“对山（康海的号）救我！”陕西人都说，只有康海去见刘瑾求情，李梦阳方可活命。康海慨然道：“我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于是求见刘瑾。刘瑾大喜（《明史》这里的描写是“为倒屣迎”，极力渲染他的喜出望外，以此反衬康海声名之高）。刘瑾盛赞康海是“真状元”，为关中乡邦增光。康海说：“我算不上，今关中自有三才，古今少有。”刘瑾惊问是谁。康海说：“三才就是老先生的功业，张尚书的政事（指原南京刑部尚书张敷华，

据《明史·张敷华传》载，刘瑾恨敷华，‘欲坐以赃罪，修撰康海过瑾曰：“吾秦人爱张公如父母，公忍相薄耶？”瑾意稍解’），李郎中的文章。”刘瑾说：“李郎中不是李梦阳吗？该杀无赦！”康海说：“这样，关中少一才了！”第二天，刘瑾就把李梦阳放了（《明史》对这件事写得十分简略，只有“海因设诡辞说之，瑾意解，明日释梦阳”三句）。等到刘瑾失败，康海便成了“瑾党”。《明史·阉党传》的第一名是焦芳，在焦芳传后说到，“当刘瑾时廷臣党附者甚众，言官交劾”，其下列举被劾的廷臣名单，内中就有康海，名列翰林院的第二名。康海从此闲废终身。

像康海这样屈节救友，无疑是值得称颂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康海被作为“瑾党”受到“言官交劾”的时候，却没有记载说曾经受到康海救命之恩的李梦阳，曾经出来为朋友声辩，这就不免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与不满。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反映了人们对友谊和交友之道的珍视。康海既然牺牲自己救了李梦阳，李梦阳为什么不该在急难时报答康海呢？我在前面说过，人们所以相信《中山狼传》为刺李而作，乃是“事出有因”，其“因”即在于此。

李梦阳未能救康，诚然是一憾事，但是我们只要查一查历史，就可知道，康海被劾罢官的时候，李梦阳尚未复官，并不在朝，何从救起。从刘瑾被捕到处分党与，政局急转直下，前后只有四、五天的时间。《明史·武宗本纪》载得很明白：“正德五年八月甲午（按本月甲申朔，甲午为十一日），刘瑾以谋反下狱。戊戌（同月十五日），治刘瑾党。”李梦阳是在刘瑾诛后起官的，等他到京，大局已定，康海早已罢官了；而且他自己不久也被落职闲居，与他的朋友同一命运。他在朝廷上也是受

排挤的。他之无力援救康海，或虽为朋友辩护而无济于事，原是可以想见的。

所以我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引述了《嵩阳杂识》和王士禛的话后，论断说：“然海以救梦阳坐累，梦阳特未营救之耳，未尝逞凶反噬如传（《中山狼传》）所云云也。疑（马）中锡别有所指，而好事者以康李为同时之人，又有相负一事，附会其说也。”朱彝尊也说：“考之康李，未尝隙末。”（《静志居诗话》）这都是很有见地的，也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从康李二人的著作中，也可得到证明。

康海放归之后，在与朋友的信札中，几次提到他被罢官的原因，《对山集》卷二十一有《与彭济物书》，说得最详细。书中说他自己“不可（即不合）于当世者有五”：一是性喜嫉恶，闻人之恶辄大骂不已；二是懒放怕动，不能奔走执政门下；三是爱面诤人过；四是爱批评他人无病呻吟的诗文；五是不能对人讲好听的话。总起来说就是恃才傲物，因而招人妒恨。这里没有一句话说到他的罢官是由于朋友的出卖或忘恩，或者暗示有这样的事。

《对山集》卷十九又有一篇专门讨论朋友之道的《友论》，文章主要说，应该交结能“使我日就于圣贤君子之域”的朋友。文章中并没有一句话说到或暗示须要提防那种忘恩或卖友的人。

康海写过一本《中山狼》杂剧，陈继儒对此剧有很高评价，说：“读此剧真救世仙丹，使无义男子见之，不觉毛骨颤战。”可见同《中山狼传》一样，这本杂剧也是揭露斥责世间那些忘恩负义之徒的。但是，剧中借那个杖藜老人的口说：“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列举了各种负恩的行为，其中关于负友的一段话道：“那负朋友的，受他的周济，亏他的游扬，真是如胶似漆，

刎颈之交；稍觉冷落，却便别处去趋炎赶热，把那穷交故友撇在脑后。”可见康海在剧中所指责的负友行为，不过是“趋炎赶热”，把朋友“撇在脑后”，并没有像中山狼那样反面无情，要把救命恩人一口吃掉。因此《中山狼》这本杂剧，并不像王士禛说的那样，“以为讥献吉（李梦阳），理有之”。所谓“理有之”，只是揣测之词。顺便说一句，王士禛还把这本杂剧的作者错成王九思了，说明他对康李之交的评论，大都得之传闻。

李梦阳的诗文集名《空同集》，有六十六卷之多，基本上是他手自编定的，卷十一有《寄康修撰海》五言古诗二首，对我们辨明康李之交的真相颇有用处，选录如下：

晨步城西冈，遥望终南岑。荆棘高蔽天，白曜翳以阴。鸡食鸾凤饥，蛾眉谗妒深。葑菲遗下体，一别成飞沉。出门眺四郊，莽莽悲风吟。海水有可测，伤哉谁谅心！

少阴盛霜雪，崎岖鸿雁饥。荷斧入林谷，日暮谁共归。林树窈冥冥，径路多虎黑。北斗横塞岑，郃野风振悲。欲往河无梁，念子忽如迷。荣耀在须臾，亡没谁无知。思附玄鹤翼，从子以高飞。

诗题称康海“修撰”，这是以官代号，《空同集》卷二十五还有一首《康状元话武功山水》，都不是实指在做这官。详这两首诗的内容，只能是康海罢官之后，李梦阳的寄赠感怀之作。诗中用荆棘、阴翳、家鸡等来比喻险恶的环境和谗妒的小人，用天日、鸾凤、鸿雁来颂美朋友的高洁，诗中充满了对康海的崇敬与怀念，同时也表达了对贤人放逐、小人得志的愤懑，诗意是很显豁的。如果李梦阳真的在朋友危难被谗时，不一援

手，甚且落井下石，他能在事后写出这样真挚的诗，而且厚颜编进集子吗？这是绝不可能的。这一对朋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性格高傲，鄙视凡俗，但又忠于友谊。这是只要一读《空同集》和《对山集》就清楚了。

如果说，所有这些都还不够充分证明《中山狼传》不是针对康李之交而作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查一查历史，看看马中锡可能是在什么时候写成《中山狼传》这篇作品的。这里先说一个前提，就是《中山狼传》如确是为刺李而作，就只能而且理应是在刘瑾失败，康海罢官之后这段期间。反之的话，这个结论就不能成立。我想，这是讨论这一问题最起码的前提。据《明史·马中锡传》，马中锡是在“瑾诛，起抚大同”的；《武宗本纪》说，“正德五年八月戊申，刘瑾伏诛”，马中锡做大同巡抚就在此时。但是次年三月，“贼刘六等起，吏部尚书杨一清……乃荐中锡为右都御史，提督军务，与惠安伯张伟统禁兵南征”；由于政策剿抚不定，出兵失利，朝廷“乃遣侍郎陆定督师，而召中锡、伟还”（《马中锡传》）。而据《武宗本纪》，陆定于正德六年八月己卯受命，马中锡是同月丙戌召还的。中锡被召，即“下狱论死”，《明史》未载死日，《列朝诗集小传》说“逾年以疾卒”，知死于正德七年。这样，马中锡从刘瑾被诛到死于狱中，不过一年多光景，而且这段期间他都是或在边境重镇，或在军中，最后又被关在监狱里，请问他有什么时间和心思来写《中山狼传》呢？这岂不完全可以证明《中山狼传》与康李之交无涉，而是写在刘瑾被诛之前的作品吗？当然这篇作品，马中锡一定是有感而写，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如此含义深刻的寓言了。

马中锡的悲剧是，他写《中山狼传》时，似乎看清了某些人的面目，但是想不到他为明朝统治者尽忠竭诚，出力卖命，到头来仍受自己笔下创造出来的这种恶狼的诬陷（《明史》说他因“僉事许承芳忌之”，作弄定罪），丢了性命。同时，他更没有想到，他写《中山狼传》会给李梦阳带来蒙受负友卖友之名的不白之冤，这又是历史的另一悲剧。但是，历史事实具在，后人是有责任为历史判明是非曲直，不应人云亦云的。

[附记]

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四库提要》误为《居易录》）关于《中山狼传》一条中说，康海和李梦阳都是马中锡的门生，不知有何根据。按马中锡做过陕西提学副使，但李梦阳原籍虽是陕西庆阳卫，寄籍则是河南扶沟（见《明进士题名录》），不见得回陕西去入学应举。此点待再考。又《对山集》卷十八有《读〈中山狼传〉》一诗：“平生爱物未筹量，那知（王士禛引作计）当时（王引作年）救此狼。笑我救狼狼噬我，物情人意各无妨。”王士禛和《辨证》都认为这就是指李梦阳而言，但是康诗可能只是泛指，或虽有所指而与李梦阳无关，对此，前文许多话已可说明，这里就不深考了。

一九八一年

小说戏曲人物谈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俞伯牙摔琴的故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再鼓琴，因为世上再也没有像钟子期那样的知音了。这大概是战国时候颇为流行的传说，表达了古代人们对知心朋友的珍视，也寄托了知音难得的感慨。人物和故事，都叫人极为感动，因此虽然不见史传，却仍然成为有名的典故，为后代人所写诗文不断引用。电影《知音》这个片名也就取之于此。

把这个知音故事写成小说的，是明朝大小说家冯梦龙，题目就叫《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收在他编的《警世通言》内。冯梦龙编的这个故事，有两大贡献：第一是用生动的文字，把这个简单的历史传说，写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第二是明确点明了俞伯牙的籍贯——楚人，鼓琴的地点——汉阳江口。尤其这后一条很重要，人们虽然不知道冯梦龙的根据何在，但因此可以找到一个关于这个历史故事发生的确切地点，便于凭吊一番，发一发思古之幽情。

事实也正是如此，从清朝以来，在湖北汉阳的月湖边上，有好古的人建起了一座高台，名为伯牙台，一名琴台，据说就是俞伯牙鼓琴、钟子期听琴的故地所在。这座高台成了武汉三镇的名胜之一。最后，我有幸去武汉一游，登上伯牙台，俯瞰汉江，旁揽月湖，气象开阔，令人心旷神怡，引发出高山流水的想象。这时我就想到，冯梦龙真是大有功劳的，他促成了这

一古迹的建成，起到了启迪人们缅怀先贤、瞻望未来的美好作用，而考证古迹的真假有无，便是多余的了。

谁不希望得一知音？但是像钟子期那样的人，究竟是得之不易的。冯梦龙在小说中有一首诗写道：“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这是就过去时代说的，今天我们全国上下有着共同一致的奋斗目标，同心同德，知音就遍天下了。

程咬金三斧头

“程咬金三斧头”这句话，日常生活中常听到，谁都能懂。要是给它下一个定义，就是指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开头很有两下子，接下来就没本事了。当然，要是挡不住的话，这三斧头也是满厉害的。

三斧头的典故，出在程咬金的身上。程咬金不是等闲之辈，《旧唐书》和《新唐书》都给他立传。但是如果要把“三斧头”作为条目收进词典，找它的出处，正史里是没有的，只能从小说里去找。

这个典故出在《说唐全传》里：程咬金身长力大，却不会武艺，记性又不好，学了就忘。有一天忽然做梦，来了一个神仙，教他六十四路斧法。醒来练习，练到一半，被人冲破，便把后面一半忘了。所以他同人对阵，只能使出这三斧头的本事。

读者不免为他惋惜，如果半路不被人冲破，或者他自己记性好一点，那就不止学到那三斧头，而是六斧头，他的本事就不可小看了。但是世间总不是尽如人意的，而且这样一来，群众的生活语言中就将缺少这么一句含义丰富的成语了。

在舞台上，程咬金是一个逗乐的角色，是由丑角来扮演的。这对他有点委屈，因为他在正史的地位是同秦叔宝、尉迟恭等人并列的。他是保唐太宗做皇帝的几个大功臣之一，他的图像画在凌烟阁上，死后还陪葬在唐太宗的陵墓——昭陵——旁边，这都是当时臣子最高的荣誉。

程咬金在正史中的名字是“知节”，这大概是他发迹后，觉得微贱时的小名不好听而改的。不过正史仍记他一笔“本名咬金”，后人叫他这个名字并不错。正史没有说他会使斧头，却说他“善用马槊”，即长矛。但是几百年来，人们更相信小说的记载，谁都知道程咬金的本事就是三斧头。

太白醉写

记得大约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冬之间，在上海举行过一次传字辈老艺人的昆曲会演，地点在丽都剧场，剧目中有《太白醉写》。这出戏我慕名已久，对老先生表演艺术之精湛，叹为一代宗师；但是对《太白醉写》这个剧本，却有不足之感。同去观剧的老友文怀沙，问我的观感，我说：“表演艺术可称观止，只是剧本好像不够完美，风神秀朗、气宇超逸的李太白，成了一个呕吐狼籍的酒徒醉汉。”怀沙是号称懂戏的，他沉吟了一下，点头表示这外行之见尚不无道理。

不久前出版的《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收有昆曲《太白醉写》条，注明这出戏是“据明传奇《惊鸿记》第十五出《学士醉挥》改编，曲词与原著有所不同”。这使我想起往事，知近代演出的本子原是后人改本，不过我觉得应该还可以改得更好些。如能把剧中因突出“醉写”而涉及庸俗的部分删去，恢复太白才行

不羁、粪土公侯的高洁形象，结合艺术家的出色表演，那就相得益彰了。

由此看来，收在《警世通言》里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不失为一篇比戏曲写得好的作品。这篇小说主要就是能够抓住这位大诗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特点，把他的形象描写得放旷坦率，神逸气高。小说中精彩之处也在于“醉写”。同样是金殿赐酒，杨国忠、高力士磨墨脱靴，但是就没有戏曲表演中那种东倒西歪、不断呕吐，甚至受到高力士们奚落的狼狈相，倒是着力描绘了太白“飘飘然有神仙凌云”的神态，而这正是符合历来人们心目中的李太白形象的。《隋唐演义》中有一回，也是写同一个故事，与《警世通言》所写大致相同，但是不及《警世通言》这一篇的生动紧凑。

《隋唐演义》中有一节是写李太白从囚车中救拔郭子仪的故事。郭子仪是后来讨平安史之乱的名将，做到天下都元帅，封汾阳王。这故事出自民间，说明民间传说中的李太白，不仅仅是才华横溢、斗酒百篇的大诗人，而且具有识拔真才的远见。相形之下，戏曲《醉写》中的太白形象就更见逊色了。

秦琼卖马

《秦琼卖马》是京剧表演大师谭鑫培的拿手好戏之一。最近看到中国唱片厂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大戏考》里，收录了谭鑫培和名丑王长林合演的《卖马》唱段，可知这出戏的唱片尚留存人间，称得上天壤绝响了。

谭鑫培的艺名是小叫天，我生也晚，没有能赶上“满街争说小叫天”的盛况。就是稍后的谭派名角言菊朋也没能赶上，

但是言菊朋的唱片《卖马》却是听过不止一遍的，那一声“店主东，带马”的叫头，苍凉悲壮，饱含着失意英雄穷途末路的悲愤辛酸之情，其绕梁余韵，似乎至今还能在耳际清晰回荡。

秦琼即秦叔宝，是历史上的名将。他是保唐太宗登位的功臣，《旧唐书》和《新唐书》里都有他的传。正史的传文总是比较简略的，但是也着重记载了秦叔宝的骁勇和胆略，他能“跃马负枪”，刺敌人于万众之中；晚年多病，自己说：“我从年轻时打仗，经过两百多阵，屡次受伤，前后出血也有好多斛了，能不病吗？”话中也是带有壮士暮年、雄心未已的悲怆之感的。

卖马的故事，正传未见，但在小说《说唐》和《隋唐演义》里都有大段描写。旧时有句俗话说：“一钱逼死英雄汉。”小说所写，证实这句话是大有道理的。其中写店小二的势利刻薄，秦琼的忍气吞声，都能绘声绘形，见到世态的炎凉。

关于秦琼的民间故事，是相当多的。他既是历史的真实人物，又是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有的故事恐怕并非全是向壁虚构，而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例如小说中写他对母亲甚为孝顺，正史中曾说他从军时丧母，隋朝大将来护儿特派吊唁，并赞他“此人勇悍，加有志节”，说明孝母是实。戏曲《桃花扇》里提到明末大说书家柳敬亭，他的一个有名的说书段子就是“秦叔宝见姑娘”，可见他还是曲艺中的名人。

秦叔宝后来同尉迟恭一起，变成了门神。他之所以被委派担任这一光荣职务，是《西游记》的功劳：唐太宗每晚被泾河龙王的鬼魂吵扰不宁，叫秦叔宝和尉迟恭把守宫门，果然平安无事。于是就把他们的像画在宫门上，成了门神。相沿成俗，解放前还能看到人家大门上贴着他们的画像，一白一黑，分守左右。其实古代的门神，是另有其人的，叫神荼、郁垒，可是

民间是把他们革职了。

薛仁贵与薛平贵

在小说、戏曲里，薛仁贵一家的故事虽然不叫薛家将，但名气不在杨家将之下。

小时候看薛仁贵故事的连环画，从跨海征东，到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出世，闹花灯，薛刚反唐等等，看得津津有味，薛仁贵一家的“历史”也深深印入了脑海。

后来，上海冒出了一家“立达图书公司”，专出二三流以至不入流的旧小说，不管定价多少全打一折，所以叫“一折八扣书”，其中即有薛仁贵至薛刚的小说，那是把《说唐全传》的后半部，割裂成独立的几本，以此获利。但是不及看连环画时那样令人感兴趣了。

京戏舞台上，有不少以薛仁贵一家为题材的戏。但是很奇怪，除了薛仁贵，又出来一个薛平贵，名字只差一个字，又同是唐朝人。薛平贵的戏也不少，从《彩楼配》到《大登殿》，总名《红鬃烈马》，有名的叫《薛八出》。中国传统的历史演义和历史戏，人物大抵有些来历，不见于正史，也能见于野史，或者民间传说。这个薛平贵却是来历不明，简直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三十年代有个熊式一，用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写了一个英文剧本《王宝钏》，使得薛平贵不仅是中国舞台上的名人，而且名扬海外。

薛仁贵的戏与薛平贵的戏中，有一出十分相似，就是《汾河湾》与《武家坡》：剧情同是一个出外从军、富贵还乡的丈夫，乔装军官模样，回寒窑相会离别十八年的妻子。丈夫对妻子进

行试探、相戏，妻子坚贞自矢。两出戏的对白与表演，几乎完全相同，除了《汾河湾》有一个未出场的儿子。因此我很怀疑，薛平贵这个人，就是从薛仁贵变化来的，他的故事有些也是从薛仁贵那里窃取过来的，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薛仁贵的来历则是清清楚楚的，他一生戎马，为国东征西讨，战功显赫，称得上是唐朝的民族英雄。薛仁贵的儿子曾挂帅征西，也是不假，不过名字不是薛丁山，而是叫薛讷。

尉迟恭单鞭夺槊

单鞭夺槊，说的是尉迟恭救唐太宗李世民性命的故事。唐太宗被王世充手下大将单雄信追逐，眼看有性命之危，幸得尉迟恭赶来，夺过单雄信的武器——槊，解开此难。这是小说《说唐》中的一个精彩场面。《说唐》是这样描写的：“雄信一槊打来，被尉迟恭一把接住，回手一鞭打来，雄信把槊一放，空手逃走。尉迟恭一手举鞭，一手拿槊，飞马紧紧追来，这唤做尉迟恭单鞭夺槊。”鞭和槊都是古代武器名称。尉迟恭用的鞭称为竹节钢鞭，系用钢铁打磨而成，鞭上刻作一节一节，故称竹节鞭。单雄信用的槊，就是矛，长古尺一丈八尺，是用于刺杀的武器。《三国演义》中写张飞用“丈八蛇矛”，所指就是槊，既称蛇矛，可知槊头呈弯曲形，便于刺中对方后接着旋转，增强杀伤力。

尉迟恭的善于夺槊，不是出于小说家的虚构，正史里也特别予以记载。据《旧唐书》说：尉迟恭善于避槊、夺槊，他每每单骑冲进敌阵，敌军用槊攒刺，终不能伤他；他却能夺取敌人的槊，回过来刺杀敌人。有一次唐太宗问他：“夺槊、避槊，

哪个难，哪个容易？”他答说：“夺槊难。”太宗命他同善于使槊的齐王元吉比赛，元吉一心真要刺死他，却被他连夺元吉的槊三次。元吉素以骁勇著称，也不能不表示佩服。

在小说、戏曲中，秦叔宝的名气比尉迟恭来得大，但事实上在保唐太宗做成皇帝这件事上，尉迟恭的功劳比秦叔宝大，所以正史把尉迟恭的名字放在秦叔宝之前。唐太宗做皇帝的关键一仗是玄武门之变，而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重要人物，正是尉迟恭，是他事前坚决主张“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日夜劝说尚在犹豫不决的唐太宗，然后定计除害的。在玄武门之变中，唐太宗射杀了建成，尉迟恭射杀了元吉。所以事定之后，论功行赏，尉迟恭与另一个谋臣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元吉的府邸、财币、器物，全部赏给尉迟恭。在太宗朝的武臣中，他的爵位也是最高的。

唐伯虎三笑姻缘

三十年代时候，有一位著名的通俗小说家程瞻庐，写了一部《唐祝文周四杰传》，由朱凤竹插图，在上海一家小书店出版，成为一时的畅销书。程瞻庐是苏州人，属于“鸳鸯蝴蝶派”。他与徐卓呆齐名，长于写含有谐趣滑稽意味的小说。“鸳鸯蝴蝶派”作者所写小说，以趣味为主，供读者茶余饭后的消遣，缺少社会现实意义，所以无法与新文学抗衡，但它适合一般群众口味，影响大，作者也颇负盛名，因此不能一笔加以抹煞。

程瞻庐的《四杰传》，是在苏州评弹《三笑》的基础上编写的，可说是集民间有关唐祝文周传说的大成，故事情节也具备评弹引人入胜、欲罢不能的特点，同时他还做了点考订工作。

比如他在序言中说，“四杰”的最后一名周文宾，并无其人，应该让位给与唐伯虎同时的苏州另一才子张灵；又指出唐伯虎生有“骍指”是一误传，祝枝山才是六个指头云云。可见他的写作态度还是相当认真的，只是整部小说未能免于庸俗，但如果要考察唐祝文周故事的源流演变，这部书还是可以看一看的。

唐祝文周故事中，最为有名的当然是唐伯虎的三笑姻缘了。至今评弹演唱仍受欢迎。前两年，香港拍了一部电影《三笑》（就是根据程瞻庐的小说改编），人们也很爱看。推查这个故事所以受到群众的喜闻乐见，历久不衰，主要是两个原因：一、这是一个情节曲折动人的喜剧故事，不同于一般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的陈腔俗套；二、其中的人物性格，都极活泼有趣，像唐伯虎的藏头露尾，秋香的聪明机智，大呆、二呆的愚笨自负，都是富有生活气息的。当然，历史上的唐伯虎并无这段“艳遇”，据某些笔记所载秋香或有其人，但同唐伯虎也没有任何关系。

尽忠报国话岳飞

上海京剧舞台上演出了新编历史剧《岳云》，很受好评。岳云的戏，离不开岳飞。岳云得以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少年英雄，全是出之于岳飞的严格教育。《宋史·岳飞传》后附岳云传略，所记岳云短促而光辉的一生（被秦桧杀害时，只有二十三岁），除了写他十二岁起就参与岳飞所指挥的各次战斗，“数立奇功”，此外主要就是写岳飞对他的管教。岳飞治军严，每到一地扎营，不多休息，仍要将士们穿上全副铠甲，进行名为“注坡跳壕”的军事训练。这是宋朝人的用语：跳壕容易懂，跳越壕沟；注坡则是骑着马从斜坡疾驰而下，以此练习骑术。一次，

岳云注坡，马跌倒，岳飞大怒，处以鞭罚。岳飞不因岳云是自己儿子，应享特权，而姑息手软。没有岳飞这个“严”字，岳云是不可能如此成材的。

岳飞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宋高宗问他天下何时太平，他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就太平了。”这话说来不难，但他真的这样做。他被秦桧诬陷下狱，自己扯开衣裳，露出深刺在背上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表明对祖国的忠诚热爱。近千年来，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岳飞始终是一个受到高度崇敬的爱国主义形象，鼓舞人们的爱国思想。至今矗立在西子湖边的巍峨岳王祠，正气长存，万人瞻仰。前不久，北京电台播放评书《岳传》，老少争相收听，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真是盛况空前。长篇小说《说岳全传》也是近年来的畅销书，尤其受农村读者欢迎。这些都可见到人心所在。

对于岳飞、秦桧等人的是是非非，历来却不时还有争论。就在南宋当时，有个史官熊克，写了一部《中兴小记》，就说岳飞以武将而常议论朝廷大事（如和战、立嫡等），祸由自取云云。后代也有些附和者，虽然说法各有不同，但这都是徒劳的。历史具在，忠奸分明，岳飞的民族英雄形象，岂是随意就抹煞得了的？

裴航蓝桥记

最近商务印书馆重印了好多部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世界文学名著，林译书名皆用意译，如《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柏菲尔》）、《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等，颇能总括原书的精神，我觉得

有胜于直译之处。过去我国放映外国电影，片名也大都采用意译，虽然也有译得庸俗不堪的，但著名的几部如《蝴蝶梦》、《翠堤春晓》、《一曲难忘》、《金石盟》、《谪仙怨》等，不仅文字优美含蓄，耐人寻味，而且同影片内容也甚贴切。最叫人赞赏的一个片名，是把《柔蜜欧与幽丽叶》译成《铸情》，称得上是传神之笔。《魂断蓝桥》这个片名也译得好，运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典故，融化无迹，如果照原名译成《滑铁卢桥》（伦敦泰晤士河上的一座桥名），中国观众将感索然无味了。

“蓝桥”这个典故，出在唐人小说《裴航》里面，叙述书生裴航在蓝桥与仙女云英相会的故事，神话与现实交织一起，令读者产生美丽的想象。云英为了考验裴航的爱情是否真挚，要求裴航以百天为期，得到玉杵臼而来；裴航诚心访求购求，果然如期携带玉杵臼来到蓝桥。云英很高兴，但又要求再为她捣药百天，方议姻好。裴航日间捣药，至夜休息，听到内室又有捣药声音，偷偷一看，有玉兔也在捣药，雪光耀室，可鉴毫芒。经过如此一番周折，裴航终与云英结成婚姻。故事情节应该说十分动人的，因此历来很受人们喜爱，元明两代都曾编成戏曲，元曲有《裴航遇云英》，明传奇有《蓝田记》、《玉杵记》，近代舞台上也常演出。

蓝桥实有其地，在陕西蓝田县的蓝水之上。至于蓝桥，由于裴航遇云英故事的流传，则成了情人们有缘相会的象征地点。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五代，梁唐晋汉周，是历史上一个大动乱时期，“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正史中的《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记载的

就是这些“英雄好汉”的发家史，给人的印象，叫作“强盗史”也未尝不可，因为他们差不多都是盗贼出身，经过吞并残杀，建功立业，取得荣华富贵，成了历史名人。

宋太祖赵匡胤出来，统一了全国，结束了这个长期纷争的局面。宋太祖也是“群雄”之一。《水浒传》一开头就说：“我朝太祖武德皇帝，一条杆棒，打下了四百座军州。”足见宋朝的天下得之不易，因此关于他创业过程中的民间故事也极为丰富。千里送京娘故事就是其中有名的一个，为小说戏曲所传述。故事情节是说，赵匡胤未发迹时，避仇太原，从强盗手中救下美女赵京娘，与她结为兄妹，千里相送她回蒲州。京娘见匡胤英雄正直，愿以终身相许，为匡胤拒绝。到家，京娘兄嫂疑她和匡胤有私，京娘无以自明，自缢而死，以明心迹。这个故事主要是颂美京娘的贞节和赵匡胤的正直无私、恪守信义。

故事不一定真的属于赵匡胤所有，但是这个故事如果真在五代时就已流传，却多少可以反映当时人们对赵匡胤品德的评价，他比起那些朝秦暮楚、几无丝毫信用节义观念可言的“群雄”来，确实要高明得多，这就使他获得了民心，从而统一天下。

有趣的是，收在《警世通言》里那篇《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小说，在它的“入话”里发了一通议论，假托有老少二儒和一个隐士的谈话，谈论宋朝创业成功的原因，一个说“修文偃武”，一个说“历朝不诛戮大臣”，最后隐士不同意他们说法，说“惟不贪女色最胜”，即举送京娘一事为例，其他二人也就服了。但是照我看，他们三人没有说到要点上，宋朝创业之始，应该说是“惟讲信义最胜”，例子也可举送京娘一事，即使仅是民间传说，也可看出“民心所向”来。

八仙过海

在上海文化广场的旁边，有一家不太显眼的小型剧场——上海戏曲学校实验剧场，每次我路过它的前面，就常常想起六十年代初期，它所给过我的愉快的艺术享受。那时这里是俞振飞校长主持下的第一届京昆学员的实验演出场地，丰富多彩的剧目，以及学员们生气勃勃的演技，吸引了无数的观众。这些才华出众的青少年学员，今天都已是著名的演员，并且自己也在担负起培养新一代学员的重任了。

《八仙过海》就是他们很受观众欢迎的一个剧目，虽然是一场武打戏，却充满了谐趣，八仙各显神通，火烧东洋，与龙子和虾兵蟹将们对战，事实上是优美的舞蹈。

八仙是民间传说中流传很广的人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已经成为常用的俗语。八仙的名字是：铁拐李、汉钟离、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记载他们成仙得道的一部小说，名《八仙出处东游记》，收在《四游记》里面，五十年代时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增经重印。这部小说写得并不好，文词芜杂浅陋，但是透过它的荒唐的外表，内容却还不失为一部有趣的神话小说，因为八仙各自具有自己的个性、嗜好、情欲，负气争胜，并不比凡人高明多少，所以他们的故事很有人情味。民间喜爱他们的故事，这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八仙的故事，同道教大有关系。铁拐李原是一个相貌堂堂的炼丹士，因为神游出壳，躯体被徒弟所烧，神魂只能附在一个倒毙的乞丐身上，这是道家的“尸解”。吕洞宾是道教中的“纯阳祖师”，扶乩请仙，总少不了他。韩湘子是唐朝大文学家韩愈

的侄孙，就是那篇有名的《祭十二郎文》十二郎的儿子，做了八仙，便成了道士。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八仙故事的宗教色彩几乎是不存在的。

搜孤救孤

京戏《搜孤救孤》，原名《八义图》，戏中三个主要人物是程婴、公孙杵臼和屠岸贾。戏的本事出于《史记·赵世家》，以赵朔遇祸后留下的孤儿为中心，展开了搜捕与反搜捕的戏剧性冲突。司马迁是写故事的能手，这个故事虽着墨不多，也极有声色，最生动的是程婴和公孙杵臼的对话，试译一下。公孙杵臼问：“保全孤儿与死，哪个困难？”程婴说：“死容易，保全孤儿困难。”公孙杵臼说：“你受赵家的恩大，你勉为其难，我做容易的，我先死吧！”孤儿成长，报仇雪恨，程婴说：“我要去地下告诉公孙杵臼，事情办成啦！”便自杀了。

这个动人的故事，先被元朝剧作家纪君祥写成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十八世纪中叶，法国来华的传教士把这部元曲译成法文，传到欧洲。法国大文豪伏尔泰读到后，赞美备至，认为中国戏曲堪与希腊悲剧相比。京戏《搜孤救孤》，是被谭鑫培后又一京剧大师余叔岩唱出名的，他据旧本改编，创设新腔，韵味浓郁，回肠荡气，因此成为余派剧目的代表作，名噪一时。余派的传人孟小冬，也擅长此剧，由于她不常登台，所以偶逢演出这出戏，都被视为京剧界的盛事。四十年代后，孟小冬告别舞台，隐居香岛，此剧几乎绝响了。听戏迷们传说，孟的剧目都曾录音，秘不示人，但大家相信总有重返人间的一天。前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上海著名须生张文涓，为大会演出了这

出戏，余派典型犹存，大为观众所赏。

《搜孤救孤》这个戏，主题可用四个字概括：忠信义烈。这四个字，同时也是别的许多传统戏所程度不等地表达的主题，不过《搜孤救孤》显得更为集中。封建时代提倡愚忠愚孝，是为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陈腐落后的道德观念，自然应该批判；但是古人那种讲信义，重然诺，甚至不惜以生命为殉的自我牺牲精神，后人还是可以择其可取者取之，不必一概排斥。否则的话，那么多宣扬忠信义烈的传统戏，还有什么可保留的价值呢？

公主与驸马

唐德宗时有个文人叫赵璘，写了一本笔记《因话录》，记载当日见闻。其中有一个故事说：汾阳王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娶的是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夫妻吵架，郭暖骂公主说：“你仗父亲是皇帝吗？我父亲嫌皇帝不要做哩！”公主又哭又气，立刻乘车进宫告状。代宗说：“你不懂事呀！他父亲真是嫌皇帝不要做，要是他不嫌，这个天下还是你家的吗？”叫公主回去。外面郭子仪可骇坏了，已经把郭暖捆绑起来，押到朝堂听候治罪。代宗把郭子仪叫进来，安慰说：“俗话说得好：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俩口子房间里讲的话，你去相信它吗？”

这就是戏曲《打金枝》故事所本。当然剧情有所增饰，比如郭暖不仅骂了公主，还打了她一记耳光。公主是所谓金枝玉叶，所以剧名《打金枝》。六十年代初，北京和上海的京剧团，都曾演出这出戏，观众认为很有意义，因为唐代宗处理这件事，有器量，顾大体，压制了公主高人一等的思想，保全了君臣关

系。唐代宗引用的那句俗语，大家也觉得颇有点处世为人的哲理意味。这里顺便做一个小考证：“阿家阿翁”现在都被省为“阿家翁”或“家翁”，家字读为家庭之家。其实阿家就是阿姑，指婆婆，家应该读为姑。

《打金枝》的主角升平公主和附马郭暖，据新旧《唐书》所载，十多岁就定下了婚姻，一直受到皇帝的宠爱。这个公主除了恃宠撒娇，看来还是一个爱霸道弄权的人。她在泾河上壅断水利，设置水磨，害得民田不得灌溉。德宗时犯过事，在宫里关过禁闭。宪宗登位，她献歌女讨好，被宪宗退回。在唐朝的豪门贵族里面，这个公主也是有点名气的。

留取丹心照汗青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宋朝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过零丁洋》诗的名句，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千载之下读了犹能令人感动振奋。《正气歌》当然是文天祥更为有名的作品，这是在元朝统治者监狱中写的，表现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为“孤岛”。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组织剧团，演出话剧《正气歌》，演的就是文天祥抗敌不屈的故事，轰动一时，连演数月，卖座不衰。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观众们通过文天祥这个爱国主义形象，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和对祖国的热爱。这件事很叫日本侵略军和他们的走狗感到惊慌，想不到一个历史人物，会对中国人民起这么大的作用。他们完全不理解，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周信芳，也在这时演出了他编导

主演的大型京剧《文天祥》。他这是根据京剧老戏《三尽忠》改编的。三尽忠指的是文天祥的从容就义，张世杰的战败自尽，陆秀夫的背负南宋小皇帝蹈海而死。过去写文天祥的戏不多，元朝作家有忌讳，明朝朱九经写了传奇《崖山烈》，清朝蒋士铨也有传奇《冬青树》。周信芳自编自演的《文天祥》，吸收了这两个戏的精华，又发挥了麒派艺术唱做并重的特点，沉郁顿挫，酣畅淋漓，几乎声泪俱下，观众也为之感泣。那时老一辈爱国的表演艺术家，在敌伪统治下，不甘同流合污，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周信芳演《文天祥》是其一；梅兰芳蓄须明志，也是其一。在北京，侯宝林用相声讽刺敌伪丑态，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又是其一。历史上众多爱国志士的高风亮节，无疑对他们有着重要影响。可见历史不可不读，气节也是不可不讲的。

杨家将在舞台上

在戏剧舞台上，大概很少有像杨家将那样，历演不衰的了。直到今天，杨家将的戏仍为观众爱好，还在改编或新编，不断上演。

早在老一辈京剧大师谭鑫培、刘鸿声等活跃时期，杨家将的剧目，已经成为他们演唱的代表作。刘鸿声的《辕门斩子》称为一绝。《李陵碑》是谭鑫培的杰作，他把杨老令公身处绝境、报国心切的忠愤之情，演得淋漓尽致，溢于戏外。唱腔的悲壮激烈，自不必说；就是在一些细微动作上也一丝不苟，有独到功夫。如令公决心殉国碰碑前，掀去头盔，一般要过一暗场，谭则在台前将头微微一扬，头盔就顺势飞去，稳稳落在检场的手中，干净利落，叹为绝招。《李陵碑》久已不见演出了。抗战

期间，我在川东一个小镇上，看过一次川戏《五台山》，那是杨五郎的戏，台上自始至终只有一个角色，就是充满家国之恨的醉酒莽和尚，连舞带唱，却把全场观众的注意力深深吸引在他身上。这场戏给我的印象至今不忘，可惜后来就没有再看到第二次的机会。《四郎探母》在解放后是一出有争议的戏，但在过去却是杨家将戏中演出最多的，那个时候的名须生几乎无不保有这个剧目，而戏迷也大概都会哼上几句“我好比……”的唱词。

解放后，传统剧目大都经过整理、改编，弃去糟粕，发扬精华，大放异彩。杨家将戏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更大的发扬，特别是杨门女将的戏更显得活跃。佘太君、穆桂英、杨八妹，连天波府中烧火的丫头杨排风，全都成了观众们所熟悉喜爱的舞台人物。

学者们写过不少关于杨家将故事的考证，这个老令公杨业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是杨家将故事大部分出之于虚构。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会成为民间传说中如此著名的民族英雄？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关于杨家将的小说，近年有两三种出版，明朝人所作，有叫《杨家将演义》，有叫《杨家府演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高。

三国戏中的周瑜

周瑜在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称得上文武全才。他还精通音乐，虽一音之失，也能辨析，立即朝奏乐者瞧上一眼，示意缺误，所以当时就流行民谣说：“曲有误，周郎顾。”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立，孙策、孙权政权得以在东吴奠基立国，

周瑜的功劳最大。他二十四岁做中郎将，三十四岁做东吴大都督，这一年发生了有名的赤壁之战，他是孙权、刘备联军的统帅，以少击众，破曹操号称八十万的水陆大军。从此孙权三分天下有其一，得以建立吴国，雄峙江左。刘备也乘曹操败亡之余，从容谋取西川，建立蜀汉基业。周瑜死时年仅三十六岁，应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青年杰出将领。人们常形容富有文才的武将为“风流儒雅”，周瑜可谓当之无愧。

三国戏中最为热闹的几出戏，像《黄鹤楼》《甘露寺》《群英会》等，几乎都同周瑜有关。三国戏中的周瑜，主要写他同诸葛亮的斗智，这的确有声有色，妙计迭出，引人入胜。但是三国戏中的周瑜，同史传记载中的周瑜，大相径庭。舞台上周瑜的形象，是一个志满气得、心胸狭窄、甚至是妒贤害能的人。“三气周瑜”，因气而死，说明器量之小。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形呢？

我看这除了历史剧或历史小说不能等同于历史事实之外，还有下面三个原因：一、史传中的周瑜，大概只写了他品格的美好一面，而以他这样一个少年得志、建功立业的人，恐怕免不了骄矜之气很盛，民间口传的历史中保存了这段史实，并且反映到小说、戏曲中。二、三国戏主要是照《三国演义》改编的，演义全书贯串着尊刘备蜀汉为正统的强烈观念：三国人物的好坏，都看他同蜀汉的关系而定。曹操在舞台上成了个大白脸，周瑜也免不了同一命运。三、《三国演义》艺术描写的成功，使得人物性格栩栩如生，足以令人信服；三国戏在这个基础上加工，同样能令观众信服。

但是，我认为不必为周瑜翻案。正史《三国志》，可与《三国演义》和三国戏，各存其真。

高加索灰阑记

包拯善断疑狱，是小说戏曲中广为传诵的人物。元曲《灰阑记》，作者李行道，写包公用计判明两个妇人争认一个五岁孩子的案件，表现了中国古代法官的公正贤明与智慧。包公想出的智谋，是叫差役用石灰“画个阑儿”，即画一个圆圈，让孩子站在圈内，两个妇人分边同时拉拽，“若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得出来；不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不出来”。果然，一个妇人用力要把孩儿拽出灰阑，另一个妇人则不忍用力，怕损伤了孩子。包公由此判决，后一个妇人才是亲娘。他说：“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其中真假，早已不辩自明了。”

十八世纪，《灰阑记》与另一部元曲《赵氏孤儿》同被译成法文，传到欧洲，包公的智慧立即吸引了异域的读者。现代德国大戏剧家布莱希特，根据这部剧本，于一九四五年写成了他的著名话剧《高加索灰阑记》，带有歌唱，在楔子里由一位歌手向观众说明：“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它叫《灰阑记》，从中国来的。”当然，故事情节改变了，地点从中国搬到了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但是故事的高潮，仍是两个妇人争夺一个孩子，由一个格鲁吉亚民间传说中的贤明法官阿兹达克做出公正的判决，他“用出了著名的灰阑妙计，确定谁是真正的母亲”。这一次布莱希特把两个妇人的位置做了巧妙的颠倒：抚养孩子长大的农妇不是真正的母亲，但真心爱孩子；总督夫人是孩子的母亲，但她爱的是孩子继承的遗产，并不爱孩子本人，她用力把站在粉笔画成圆圈内的孩子拉到自己身边。农妇放开手，叫道：“他是我养大的！我能把他撕毁吗？我不干！”法官阿兹达克代表法

庭，就此断定农妇是真正的母亲。一个纯朴的劳动人民的真诚的爱，战胜了贵族的贪婪无情。布莱希特的《灰阑记》比起李行道的《灰阑记》，显然进了一步，证明天性之爱还不是绝对的，人的社会地位才决定他爱什么。

《旧约》中记载古代以色列王所罗门，也曾审判过两个妇女争夺孩子的案件，他宣称用刀劈开孩子，分给各人一半。假母亲欣然同意，真母亲却骇坏了，情愿放弃要求，保全孩子生命。所罗门据此做出判决：孩子是后一个妇人的亲生。这个故事同《灰阑记》十分相似。中外文学题材常有交叉发展现象，这是一例。

关云长义薄云天

《三国演义》写了一两百个人物，对关羽的写法与众不同。别人大都直称名字，对关羽则称关公，表示特别崇敬。《三国演义》的倾向性是十分鲜明的，宣扬正统观念和忠义思想。关羽在书中是义的化身。关羽的这个义，既含有朋友兄弟之义，又含有君臣主从之义。在封建社会，人民群众处在被压迫地位，很需要这种义来团结互助；统治阶级觉得对他们有利，也乐意提倡。这就叫各取所需。这样一来，关羽的地位就越来越高，最后成了“关圣帝君”。

过去在民间，关羽成了神，关帝庙到处可见。演戏演到关公戏，必得先在后台悬像祭拜，才可演出；不然的话，就要遭殃受祸。这固然是迷信，但也反映出人们对关公的崇拜敬畏。我小时在江南乡间，外祖母常领我走很远路去看“草台班”，关公戏也常看到。有一次演《走麦城》，开戏不久，忽然轰隆一声，临时搭起的戏台塌了，台上台下乱成一团。外婆告诉我，这就

是戏班子对关公不够诚心所造成的，她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海外华侨对关公也极尊崇。有一个中国血统的美国女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写了两部以美国华侨为题材的小说，最近一期的《外国文艺》转载了其中的一篇，描写她家餐厅里挂着“一张战神和文学之神关公的画像”。译者加了一个脚注，说这是指关羽坐着看《春秋》的画像。我看这个称号大概是华侨中第二代或第三代所加上的，第一代去海外闯世谋生的华侨，他们之所以崇拜关公，主要还是在于他的义。如果关公仅仅是战神或文学之神，就不值得他们那么尊崇了。

正史《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关羽的评论是“刚而自矜”，这不能说错。关羽的骄傲和刚烈，是促成他败亡的原因。但是，陈寿只是一个正统的史官，他看不到关羽一生的主要一面是他的“义薄云天”的义，从这点来说，陈寿的见识及不上《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

漫话诸葛亮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大诗人杜甫咏叹诸葛亮的诗，表达了后代人们对诸葛亮公忠体国精神的敬仰，也含有对他所从事的事业中途而废的惋惜。在《三国演义》流传以前，对诸葛亮的评价，主要是肯定和赞美他的政治节操和治国才能。陈寿号称“良史”，他的评论是：“亮才于治戎（带兵）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又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不受陈寿的影响，他把诸葛亮描写成为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和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的军师。

诸葛亮所想出的计策，以及他所指挥的战役，几乎都无往而不胜。自小说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军师形象，差不多以后出来的长篇历史小说中都少不了有一个诸葛亮型的人物，像《说唐》中的徐茂公，《飞龙传》中的苗义，《水浒》中的吴用，《英烈传》中的刘伯温，等等。甚至三十年代出版的一部描写太平天国的长篇通俗小说《红羊豪侠传》，里面也有一个不输于诸葛亮的军师钱江。钱江虽然实有其人，但写法也明显是袭取《三国演义》。

舞台上的诸葛亮形象，完全是按照《三国演义》所写的模型来扮演的：羽扇纶巾，谈笑从容；料事如神，决胜千里。流风所及，舞台上出现的徐茂公、苗义、刘伯温等人，也全成了这么个打扮和模样。

因此，对于诸葛亮，可以说向来存在着侧重点各有不同的两种看法：历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民间则把他看成智慧的化身。深入人心的，是后一种看法。提起诸葛亮，真是家喻户晓。但是人们所熟悉的，不是别的，正是《三国演义》塑造的诸葛亮。

近代有些学者，很想用历史家的眼光，重新评价诸葛亮，为此写了不少文章。如有的说诸葛亮事无大小都要亲决，因此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又有的连篇累牍的考证《后出师表》是贗作，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有名的话，恰恰出在《后出师表》里，倘若连这句话也得取消，那怎么还能成其为诸葛亮呢？

唐明皇与杨贵妃

前些时，观看上海昆剧团计镇华演的《弹词》，这是《长生殿》中的一折，演唐朝著名歌唱家李龟年，于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为听众弹唱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欢离合故事，将一代盛衰兴亡的感慨，寓之于苍劲沉郁的唱腔之中。这出戏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全靠演员一人的独唱，吸引全场观众的注意。因此是昆剧生角很见功夫的戏。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在唐朝当时和后代都广泛流传，但它成为历史上的有名爱情悲剧，主要则是因为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长诗《长恨歌》，接着传奇作家陈鸿又写了一篇小说《长恨歌传》，使得李杨爱情成了传诵千古的佳话。《长恨歌》中写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小说《长恨歌传》中写牛郎织女相会之夕，明皇与贵妃“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这当然只是文学家笔下的想象描写，前人就已有指出，两个人夜半的私誓密语，谁听来着？但此情此景，仍不能不使人为之感动。

我曾经发生过一个疑问：封建帝王同他的后妃之间会不会产生真正的爱情？我查了一下历史，好像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可能是一个例外。据孙伏园回忆鲁迅文章所说，鲁迅曾有意写一部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为主题的历史剧，并说长生殿的一幕，实际是表明明皇已开始变心，所以要用誓语来安慰贵妃。可惜鲁迅没有写成此剧，如果孙伏园所记不误，则鲁迅认为明皇与贵妃之间原来也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爱情的。

但是，马嵬坡之变，却是检验这段爱情的试金石。在这生死关头，明皇并没有保护贵妃，而是像《长恨歌传》所写，“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表明他在选择权位和爱情的最后紧急时

刻，仍然还是以牺牲爱人来保存自己。浪漫的爱情游戏，终究敌不过严酷的生死搏斗。这样看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所以成为悲剧，不在于二人的生离死别，而是原来就是自我欺骗，信以为真，经不起现实考验的。

刘玄德独得人和

一部《三国演义》，着力描写刘备的宽厚仁义、至诚待士，把他作为汉朝皇位的当然继承者。这固然出于作者的正统观念，但是综观刘备的一生，他之得到这样的赞誉，也是确有根据的。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异姓结拜兄弟，重点在义。后人常把这个义字归之于关羽为多，但是如果没有刘备的真诚手足之情，关羽的义是不可能如此维持始终的。“诸葛大名垂宇宙”，诸葛亮之成为千秋贤相，如果没有刘备的倾心信任或者刘备稍存猜忌之心，那么诸葛亮再忠诚也是做不成他的丞相的。所以《三国志》作者陈寿虽然认为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曹操）”，但也不能不赞叹说：“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而这都还是仅从他至诚待士的一面而言。

据史传记载，在三国的统治者中，以刘备最得人心。襄樊之役，刘备受曹操大军的追逐，危急万分。诸葛亮劝他袭取刘琮的荆州，他说：“我不忍心。”老百姓情愿跟随他撤退，竟达十多万人。有人劝他舍弃百姓快走。他说：“做大事必以人为本。老百姓跟我，我能忍心丢下吗！”走到当阳长坂坡，被曹操骑兵追上，他只能抛掉妻子，带着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突围而走。京戏《长坂坡》，演的就是这段历史。晋朝史官习凿

齿，对这段历史评价很高，说刘备能在颠沛险难、势逼事危的时刻，“恋赴义之士，而甘与同败”，就是说，刘备的心目中，真有老百姓存在，他平日标榜的仁义，不像别的统治者那样，只是为了欺骗人民。

这一点，诸葛亮早在隐居南阳时，就对当时三个统治者作出了正确的估价。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就对他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得天时；孙权袭父兄基业，据有江东，得地利；您将军一无所有，但信义著有四海，得人和。我看，得人和最不易。什么叫人和？就是民心归向。民心可是不能用巧言无信、机诈权术来获取的。

后人论史，常说刘备虚伪，举例有当阳之战赵云救阿斗，刘备掷阿斗于地；又白帝城托孤，对诸葛亮说：“嗣子可辅，辅之，不成才的话，您可自取。”据说这都是刘备的做作。我不是“正统派”，但不同意这种看法。换了曹操、孙权，能做到吗？尚论古人，恐怕是不应如此苛求的。

伪君子张生

最近看到一篇文艺评论，说张生跳墙，跳过的是一堵封建礼教的墙，象征着反封建的进步意义。这一说法，好像也由来已久。我不敢妄议文艺评论，但总觉得评论家对某些古典小说戏曲中爱情描写的肯定，是不是过于慷慨了一些？大家都承认今天社会还存在封建残余，包办婚姻屡见不鲜，新的张生跳墙可能也有发生，这是不是也有所谓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呢？这样一想，我就糊涂了。

以上只是浅陋之见，不值方家一笑。不过本篇也想一谈我

对莺莺和张生的看法。这个故事的原本——唐人小说《莺莺传》，不可否认是一曲青年男女的优美恋歌，用不着再给它加上“反封建”的桂冠，自有其永存的价值。但是作者元稹在小说的后半部，为了掩盖男主角张生因道德过失而产生的愧疚心理，反复宣传他的封建说教式的辩白，大大损伤了小说前半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因此这篇小说，流传虽广，对后世戏曲诗文等的影响极为深远，但在唐人小说中不能占有很高的位置。

尽管如此，小说中莺莺这个形象，仍是中国文学最富有生命力的女性典型之一。她是那样一个有教养的名门少女，知书达礼，矜持庄重，洁身自爱。但是她有一颗热烈的心，蕴蓄着纯真的爱情。她知所克制，但是热情奔放，一旦打开感情的闸门，就用上自己全部的身心。然而她又是那么高傲，早就觉察张生不是可托终身的人，她宁愿自己暗泣受苦，不屑乞求对方的爱怜。元稹的原意是希望读者通过他的描写和议论，支持他的“始乱终弃”的观点，并把莺莺看作是“尤物”、“妖孽”。作者的这个企图显然是失败了，读者的同情却是在莺莺这边，张生在读者眼中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罢了。据前人考证，小说中的张生，实际就是作者元稹自己，鲁迅说他“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这评论是极对的。

根据这篇小说写成的《西厢记》诸宫调（金董解元）和《西厢记》杂剧（元王实甫、关汉卿），摒弃了这段“恶趣”，所以成为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但是在戏曲中，张生和红娘得到了突出的描写，莺莺的戏反而不及他们多了。

怕死鬼吕布

王司徒巧施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这是《三国演义》精彩的回目，其主角就是吕布与貂蝉。

吕布此人，正史《三国志》有个评语，叫作“骁勇无谋，轻狡反复，唯利是视。”我看还可加上“庸懦”二字。这种人平时威猛傲狠，一旦遇上生死关头，为了活命，很快就会降志屈节，哀告乞怜。《三国演义》写吕布，就是着力刻画他这种反复无常的性格，怎样从一个勇士到懦夫的过程。吕布生命的最后一幕，是白门楼被擒，他向曹操求饶，又向刘备求情，不仅受到曹操的嘲弄，连他的部将张辽也瞧不起，骂他：“吕布匹夫，何怕死也！”

但是在连环计、凤仪亭这个有名故事展开之时，吕布扮演的角色，还是一个英俊威武的青年英雄。他英姿焕发，多情莽撞，终于中了王允和貂蝉精心策划而设下的连环计。这一计奇妙无比，由此出现了一连串富于戏剧性的场面。貂蝉，后代好事者列她为“四大美人”之一，但是在史传中并无其名。只在《三国志·吕布传》里有一句话说：“布与董卓侍婢私通。”这个侍婢是谁，没有说明。罗贯中凭这一句话，编出了一大段花团锦簇的情节，真是写故事的高手。因此貂蝉这个才智出众的美丽少女，以及她的动人故事，完全是《三国演义》作者的创造。《三国演义》所叙历史称为“七实三虚”，貂蝉的故事就是属于这虚构的“三虚”之内。

貂蝉的结局，《三国演义》在吕布死后提了一笔，说曹操“载回许都”。后来下落即无交代。地方戏有《关公月下斩貂蝉》的剧目，据说是曹操命貂蝉以美色诱惑关公，惹起关公挥动大刀。我想这大概多少有点封建脑袋作怪，把美人看成“祸水”，非一

杀不足为快吧。

张飞有国士之风

张飞一向与关羽并称，《三国志》的关张《传赞》说：“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这里所说张飞义释的严颜，就是文天祥《正气歌》里提到的“严将军”，他被张飞擒获，宁做断头将军，不做降将军，劲脖子很硬，因此名传后世。而张飞懂得敬重这样有骨气的人，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到的，所以陈寿赞他“有国士之风”。国士，就是这一个时代的国家杰出人士。

陈寿还用两句话比较了关张二人的优缺点，这也写在《张飞传》里：“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这就是说，他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张飞的长处在于“爱敬君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视知识分子。史传记载很明白，张飞雄壮威勇，是一员猛将，所谓“万人之敌”，但书大概是读得不多的。以距今一千六百年之前的这样一个赳赳武夫，又是擅生杀之权的大军统帅，却能懂得爱重知识分子的道理，不能不说难能可贵。足见义释严颜，不是张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这件事之成为千古美谈，也是理所当然的。

《三国演义》写了张飞荐贤的一个故事，所荐的就是号称“凤雏先生”的庞统。刘备嫌庞统貌不出众，派他做一个县令。庞统故意不理政事，张飞受命查办；等他了解庞统果有才学，便向刘备力荐。这可算是张飞“爱敬君子”的一个例证。

当然，张飞“不恤小人”（不知爱护士卒），是他极大短处。尽管有刘备的经常告诫，仍然不改，终于招致杀身之祸。他与

关羽，同样死于非命。陈寿总结他们悲剧结局的原因，认为“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也是历史的殷鉴之一。

但是后人对于张飞是十分喜爱的，因为《三国演义》将他的形象塑造得如此活泼生动，只要有他出场，言语举动，无不叫人痛快。张飞在舞台上，也是一个可爱的人物，虽然画了个黑黑的花脸，粗犷中却有其妩媚之态。有些笔记小说还记载他已成神，专为人间打抱不平，伸张正义。《聊斋志异》中就有几篇写到他的显神灵应。

扶不起的刘阿斗

阿斗是刘禅的小名，史传上称为后主，十七岁继承父亲刘备皇位，至五十七岁投降魏将邓艾，足足做了四十年的蜀汉皇帝。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资质愚钝、庸懦无能的皇帝。但是，他之成为后世的笑柄，倒不是因为他在位期间的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他还是任用一些贤臣良将如诸葛亮、费祋、蒋琬和姜维的，而是由于他投降后的表现。

司马昭设宴招待他，歌舞于前，问道：“颇思蜀否？”他说：“此间乐，不思蜀。”蜀臣郤正偷偷教他：“倘然再问，应该哭着回答说：先人坟墓在蜀，无日不思。这样才能放我们回去呀！”吃了一会酒，司马昭又问：“颇思蜀否？”后主便照郤正的话回答，想要做出哭泣的样子，挤不出眼泪，只能闭上眼睛。司马昭说：“这不是郤正讲的话吗？”后主张开眼睛，惊慌说：“诚如尊见！”左右大笑。司马昭喜欢他诚实，不猜疑他。俗话说“扶不起的刘阿斗”，指那些不争气的人，出典就是这件事。

过了十多年，后主已死，晋武帝平定吴国，吴主孙皓也投降，朝见武帝。武帝赐坐，说：“我设这座位等你好久了。”孙皓回答：“臣在南方也设这座位等待陛下。”同样都是亡国之君，孙皓敢于顶撞，更显得阿斗的窝囊了。但孙皓是一个暴君，动不动就要凿人目，剥人面皮。从当时老百姓角度看，恐怕宁愿要无用的刘禅，不要残忍的孙皓吧。

半个多世纪前，陈独秀为汪原放标点的《三国演义》写过一篇序，大意说《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普及了历史知识；第二是几百年来使市民阶层中的广大失学者、青年学徒和店员们，从中学会了书写应用文的能力。这是对《三国演义》十分恰当的评价。我看，作为通俗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三国演义》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几百个人物，忠奸善恶，智愚美丑，都照得清清楚楚，人们从他们身上可领悟不少做人的道理。为阿斗画像，不过是书中可资鉴戒者之一而已。

“姜太公在此”

旧时在一些人家的门楣廊柱上，常可见到贴有“姜太公在此”字句的红纸条，有的下面还加上“百无禁忌”四个字。这是为了借助姜太公的威名，镇恶祛邪，保护家宅平安。研究民俗学的都知道，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守护神，随着文明进步，当作古老的风俗保存下来。很明显，姜太公成了家宅的守护神。

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很漫长，历代那些怀才不遇者的志气，八十岁的老翁尚且能够待时而用，可见“天生我才必有用”是不错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他人钓鱼用弯钩，还得加上鱼饵；唯

独姜太公钓鱼用直钩，表示他直道而行，品格高尚。后人补充一句“愿者上钩”，便成了生活中含有借喻意味的成语，可以供不同的人在各种场合运用。

姜太公这个人，在正史里也是个传奇人物，说他干过宰牛的屠夫，又摆过小饭摊。据一篇文章考证，他在担任周军的统帅之前，曾在商朝首都朝歌，为周文王做过间谍，刺探情报。后来武王伐纣，周军的进兵路线，便是根据他侦察的结果。所以《孙子兵法》里《用间篇》里，特别提到“昔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吕牙即姜太公的名字。这样说来，姜太公除了是中国军事学家的始祖，还是干谍报工作的始祖。

姜太公在民间被尊为神，始于何时，尚待查考。但是我想，这同《封神演义》这部光怪陆离的神魔小说的流行，一定大有关系。《封神演义》是一部神的通俗百科全书。过去民间关于各种神的知识，比如五路财神、四大金刚等等，他们的姓名、来历和有些什么神通，可说差不多全是从这部奇幻荒唐的小说中获得的。姜太公在这部小说里是一个主角，天上地下大大小小的神，都是经他封出来的；而且必须经他一封，才有了合法地位，享受到建祠立庙、绘图塑像和人间香火的权利。奇怪的是，姜子牙虽然封了那么多的神，他本人该封什么神，在《封神演义》里却没有交代。由于作者的这一疏忽（也许是有意安排），姜子牙在神的世界里，便几乎占不到位置。但是，民间并没有忘记他，请他来做了家宅守护神，使他的名字妇孺皆知。我认为，比起别的神来，这反而是更大的荣誉。

祢衡与曹操

祢衡在《三国演义》里，像一颗一闪而过的流星，刚出现就陨落了。“打鼓骂曹”把一个封建时代狂傲刚直、不畏强暴的文人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明朝戏剧家徐渭写了一本杂剧《狂鼓吏渔阳三弄》，演的就是这个故事。他异想天开，让阴间的判官拘来了祢衡与曹操的鬼魂，重演一次历史上这个罕见的场面。京戏《打鼓骂曹》是须生的行当，好多著名演员都以擅演这戏见称。京韵大鼓也有这个唱段，是当年“鼓王”刘宝全的杰作，我虽无缘亲聆，但据说声容激越，尤其一手鼓打得如疾风骤雨，很能表达祢衡骂曹时的激愤之情。

打鼓骂曹在历史上虽然实有其事，但其实是分别发生的两件事。据《后汉书·祢衡传》记载，打鼓是一件事，祢衡在曹操席间一共打了两次鼓，第二次方是当众裸身而立，从容换上鼓吏制服，再作《渔阳》三挝（挝是击鼓的棒槌，这里解作击鼓的手法）。曹操笑道：“我本来要侮辱一下祢衡，想不到反被他侮辱了我！”骂曹乃是另一件事，那是孔融劝说祢衡再去谒见曹操，操有意延迟接见时间，祢衡气不过，坐在营门口，用手仗敲着地大骂；具体骂什么，史书上并没有写，只说他骂的话，曹操视为“言语悖逆”。所以《三国演义》所写的这段情节，是把前后发生的两件事，捏合一起，加上艺术的增饰，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例如祢衡骂曹操“欺君罔上”等等一番话，就是《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创作。当然这也是合于当日情理的，曹操视为“悖逆”的言词，离不开就是这些话。后来徐渭的《狂鼓吏》，更进一步，把曹操的“逼宫杀后”都写上作为祢衡骂曹操的内容了。

祢衡这个人，青年高才，他见曹操的时候还只二十四岁，孔融已经称赞他的学问“升堂睹奥”；又说他的品行“忠果正直，

志怀霜雪，见善若惊，嫉恶若仇”。他仅存的一篇作品《鹦鹉赋》，现在收在《昭明文选》里，那是他被曹操放逐后，在江夏太守黄祖的儿子黄射席上“笔不停缀，文不加点”而写成的，词采华丽，寄托了自己的身世遭遇。赋中所说“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好像也还是了解自己的缺点，不是那么目空一世的。但是他“嫉恶若仇”的性格，使他最后还是遭到黄祖的杀害，死时只有二十六岁。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才，死得如此年轻，又是如此无辜，真是太可惜了。应该说封建时代文人像祢衡的不幸遭遇，不止一个；但祢衡的悲剧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后汉书》为他单独立传是有道理的。

曹操当然是封建统治者中一个杰出政治家，不仅雄才大略，就是在文学上也是第一流作家。他特别为人称颂的是懂得赏识人才，用人不拘出身资格，打破门第等级观念。但是从他对待祢衡的这件事上，看得出他是外示恢宏，实际上器量不是那么大，容不得对自己讲不顺耳话的人，即使是真正的人才也不行。他对孔融说：“祢衡这小子，我杀他就像杀只麻雀、老鼠；不过他有虚名，别人要说我不能容人，把他送给刘表去吧！”这用的是“借刀杀人”之计，自己却不担杀人之名，手段是够狠辣的了。还有一个荀彧，原是曹操的头号智囊，又是亲家，因为不大赞成曹操进魏公、加九锡，曹操就迫他自杀。孔融也是被杀的。杨修才智过人，曹操表面上自叹不如，心里却忌他，终于找个罪名，把他杀了。历史上一些号称有才或是自诩有才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大概都犯这种爱听好话和妒嫉才能的毛病。我看前些年为曹操“翻案”，恢复他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虽有些道理，但是他玩弄机诈权术，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残忍无情，都是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那是翻不了的，再你粉饰也是

掩盖不了的。

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一年

《封神演义》漫话

——为钟惺评本《封神演义》而作

《封神演义》是一部神魔小说

《封神演义》，一名《封神传》，通常也称《封神榜》，是我国流传很广的一部神魔小说。神魔小说这个名称，是鲁迅给提的。鲁迅在论述产生这类讲神魔之争小说的时代背景时说：“当时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道释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糊的彼此之争，我就总括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叫做神魔小说。”（《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神魔小说的代表作有三部：《西游记》、《封神演义》和《三宝太监西洋记》。前二部名气最大。《封神演义》的艺术成就不及《西游记》，但影响同样很大，书中的神魔，几百年来已成为民间家喻户晓的人物。

神魔之争，也就是说神与魔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表现形式有单斗和群斗。神代表正道，魔代表异端。神代表正义，魔代表邪恶。斗争的结果，自然是正道压服异端，正义战胜邪恶。魔指妖魔，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对于神的概念，却不十分明白。我们今天讲到神，习惯用的一个词是“神仙”。其实神与仙是有区别的。古人对神的定义是：“天地生万物，物有主之者曰神。”（《说文》徐灏笺）换句话说，凡是对万物享有管辖权的，称之为神。对仙也有一个定义，叫作“老而不死曰仙”（《释名》）。也就是说，仙所指的是长生不老的修道之士。神当然也

是长生不老的，但神有职位，要管事；而仙则无职位，不管事，逍遥自在。神与仙的区别即在这里。汉朝刘向的《列仙传》，记载的就是后一种人。神仙合称，是后来道教兴盛后，方始叫起来的，指的是经过修炼得道、不吃人间烟火物的仙人。晋朝的葛洪写了一本《神仙传》，记载的就是这类仙人，神与仙合而为一。《封神演义》所写，有仙有神，还有西方佛祖，但主要写神。

但是，在《封神演义》里，神与魔的界限并不是壁垒分明的，相反，正如鲁迅说的那样，“是极模糊的”。开始，只有仙，因众仙犯戒，杀罚临身，“故此三教并谈，乃阐教、截教、人道三等，共编成三百六十五位成神，又分八部：上四部雷、火、瘟、斗，下四部群星列宿、三山五岳、步雨兴云、善恶之神”（本书第十五回）。这是掌阐教道法的元始天尊所主持，命令姜子牙去执行的。书中这段表白，说明原来并没有以魔为一方的阵营的存在，只是后来武王伐纣，助武王一边的阐教代表了正道，而助纣王一边的截教则成了邪道，亦即魔道。有意思的是，有资格上“封神榜”的许多神，绝大多数是截教的弟子，这些原来也是仙界中人，但为纣王卖力，便成了魔。可见仙、神、魔，在《封神演义》里他们的关系是一笔糊涂帐。

再说“三教并谈”，也不是传统所谓的“儒释道”三教。“人道”大约指人间君臣父子，当是指儒教（其实，儒家不能称教）。阐教与截教，教主分别是元始天尊与通天教主，他们同是洪钧老祖的弟子，可知同属道教。道教中这两个派别，是《封神演义》作者的创造。为何取名“阐”与“截”，据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讲稿中的解释：“这‘阐’是明的意思，‘阐教’就是正教；‘截’是断的意思，‘截教’或者就是佛教中所谓断见外道。”鲁迅的话很有道理，我补充一点，因“截”也有

齐一的意思，而截教门下，品类很杂，妖魔精怪，旁门左道，兼收并蓄，一视同仁，所以称之为截。不像阐教的收徒严格，教规要规矩得多。

道教出于附会和想象，虚构并安排了自己的神仙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众多的神官，各安其职，各司其事，执掌着人间官员所无法掌握的神权。自然界的种种现象，诸如四季运行、万物生长、雷电风雨、年岁丰歉、生老病死，等等，古代人们无法解释，总以为有一位什么神在天上掌管其事，没有神也要造出一位神来。道教提供的神仙世界，有名有姓，满足了人们的要求，便在民间流传开来，在民间的习俗、生活中取得了地位，并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

当然，神不全是道教所造，民间也不断造神。例如在民间的传说里，像汉朝的关羽，唐朝的唐明皇，这些人都成了神，并各有专职。民间演“关公戏”，必先祭告关羽；唐明皇是戏班班子的祖师爷，长期供奉。这类例子多极了。但道教所造的神最完备，班秩有序，职司明确。《封神演义》的功绩，便是把这些神集中起来，叙述他们的来历故事，描写得有声有色，使得这些神的名字和事迹更加深入人心。

因此，《封神演义》既是一部神魔小说，又兼有通俗的诸神百科全书的作用。

不过，道教的思想是很混杂的，它把儒、释、道三教调和起来，认为同出一源，作为自己的教义。这在《封神演义》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书中除了仙神魔外，还出现了“西方圣人”即佛，但都不称佛或菩萨，一律变成了“道人”，如如来佛称为接引道人，观音菩萨称为慈航道人等。儒教的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都是书中所有神仙所遵循

和宣扬的主导思想。书中第七十七回，元始天尊关于“封神榜”有一段话，将仙、神、人分为三等：“根行深者，成其仙道；根行稍次，成其神道；根行浅薄，成其人道，仍随轮回之劫。”这最后的“人道”，即儒教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而“轮回之劫”，则又是佛教的说法了。三教同源，以道为主，这就是道教的思想。《封神演义》宣扬的，也是这个思想。

作为一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充满奇异的想象，寄托了人类超越自然、上天入地的愿望。人可以有三只眼睛、两只翅膀，头可以任意取下遨游太空，身子一晃就可钻入地底日行千里，坐骑大都是各种兽类如墨麒麟、四不相、狮象虎豹等，怪怪奇奇，层出不穷。这些对于不同时代的读者，几乎有着普遍的吸引力。《封神演义》之具有永久性的魅力，这是主要的原因。

封神的由来

姜太公封神的传说，由来已久。《史记·封禅书》记载：“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这里的“或曰”可解释为传说；“太公”，即齐太公吕尚，民间俗称姜子牙；“作之”，意思是制造或设置，相近于“封”的意思。八神将是：天神、地神、兵神、阴神、阳神、月神、日神、四时神。除兵神是蚩尤外，其他都是自然之神。

元人话本《武王伐纣平话》，应是《封神演义》的前身。《封神演义》中许多人物和故事，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已略具雏形。例如妲己的故事，雷震子的故事，姜太公的故事，等等，在《平话》中都已有所展开。封神在这里还未成为全书的主题，但封神的传说，已时有出现。如写纣王太子殷交（《封神演义》

作殷郊)，“只因王打玉女，天降此人，此人便是太岁也”。殷郊在《封神演义》中封为“执年岁君太岁之神”。又写胡嵩是游魂神(又称灵胡嵩)，鰕吼是大耗神，佶留是小耗神，魏鬼、魏岁“此二人是剑杀二神也”。又写荡州太守，“此是吊客神也”。所有这些神，虽然没有写明是何人所封，但可以相信他们是民间早有的传说，不是说书人的凭空捏造。但是《平话》的神仙色彩还不浓厚，还没有进入道教的三教同源的神仙世界。

真正确立道教的三教同源神仙世界的，现在可见的有刊行于元代和明代的三部“搜神记”：一、元刻《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前后集，二、明刻《搜神记》六卷(无图)，三、明刻《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现有叶德辉重刻本)。从这三部书里，可以看出神在民间是逐步完备起来的，从少到多，最后汇总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元朝的《搜神广记》中，神的人数还只有五、六十位；到了明代，《搜神记》所载已增加到一百七十位左右；到了《搜神大全》，又增加到二百位上下了。这些神都有来历事迹，成了神管什么事，都记载得很清楚。譬如赵公明(民间叫他“赵公元帅”)，三部书里都有他的名字，他管的是：

公讼冤抑(《搜神大全》作“讼冤伸抑”)，神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祷，无不如意。

民间称这位赵公元帅为“财神菩萨”，就不是没有根据的了。至于这位赵公元帅的服色，据《搜神广记》的解释：

头戴铁冠，手执钢鞭者，金遘水谑也。面色黑而胡须者，北谑也。跨虎者，金象也。故此水中金之义。……而帅以金轮称，亦西方金象也。

这个解释，显然就是道教造出来的，金在五行属西方，西方是白虎之象，但因是“水中之金”，水在五行属北方，北方尚黑，所以赵公元帅是一片黑，连坐骑也是黑虎。赵公明在《封神演义》里，是一个邪正不分，莽莽撞撞，有勇无谋的仙人，是被陆压道人用魔术稀里糊涂害死的。

神是逐步造出来的，如哪吒，《搜神广记》和《搜神记》都还没有他的名字，到《搜神大全》方才出现。《封神演义》所写的哪吒故事，《搜神大全》基本皆已具备。在《封神演义》里，哪吒没有参加封神，但在《搜神大全》里，他是有封号的：

灵山会上，以为通天太师、威灵显赫大将军；玉帝即封为三十六员第一总领，使天帅之领袖，永镇天门也。

这里提到灵山会和玉皇大帝，说明哪吒是佛、道的共同产物，但主要应是道教的产物。《封神演义》夸大了他的叛逆性格，使哪吒的形象更为突出。

总而言之，《封神演义》里的神，绝大部分是有根据的，这从三部“搜神记”中可以考见其大略。叶德辉为重刻《搜神大全》写的序说：

诸神履贯事迹，大都杂取小说及二氏（指释道）之书，其文不见于史乘，亦不可据为典要。特六七百年民间风俗相沿之故，古昔圣王神道设教庸民为善之心，是故考古者所当知也。

他这段话，最重要的是指出这些神，乃是“六七百年民间风俗相沿之故”，是民间在长期的风俗习惯中所形成的神。

《封神演义》的作者

关于《封神演义》的作者和成书经过，有这样的说法：明代一位“名宿”，为长女办了丰盛的嫁妆，次女有怨色。父亲安慰她说，别发愁。于是撰写了一部小说，作为嫁妆，赠与次女。女婿拿这部小说刻印出来，风行遐迩，大获其利。这部小说即是《封神演义》。但这是传说，不足为凭。

关于作者，历来有二说：一是鲁迅据日本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载日本藏明刻本，题许仲琳编。但这部明刻舒载阳刊本，仅卷二题“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许仲琳始末不祥。另一是孙楷第据《传奇汇考》中《顺天时》解题，定为陆西星作。西星，字长庚，兴化人，诸生，后出家为道士。柳存仁赞成此说，并陆续发现许多有关陆西星资料，可以证成他是《封神演义》的作者（见《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二辑）。

或者陆西星作一说可能性较大，因陆西星是道士，《封神演义》正是宣扬道教的书，作者身份与全书思想正好吻合。但这也未能成为定论，目前仍沿旧说作许仲琳编，也是可以的。

钟伯敬评语

钟伯敬，名钟惺，湖北竟陵人。晚明诗派竟陵派的首领。竟陵派主张寻味古人微言奥旨，绝出时俗，提倡深幽孤峭的诗风。明代自李卓吾起，在文学领域里兴起了一股反复古的革新思潮。这批新思想的作家，敢于冲击传统观念，开始重视原为文人学士不屑一顾的小说、戏曲，把它们提高到与《史记》、《汉书》、《庄子》等并列的地位。李卓吾为《水浒》作评，引起了很大反响。书坊为争取读者，纷纷邀请这批新思想名人为小说、戏曲作评，以至出现了冒名模仿的现象。冒充李卓吾者有之，冒充袁中郎者有之，冒充陈眉公者也有之。因此遇上以名人评语为标榜的小说、戏曲，对评语的真伪，应有一定的鉴别。

钟伯敬是不是评过《封神演义》，在他的诗文集《隐秀轩集》里，一无踪迹可寻。《封神演义》现存的几个明、清刻本，每回后皆有评语，分“总批”与“又批”。最早的《封神演义》明刻本题作“钟伯敬先生批评”，清四雪草堂刻本题“钟伯敬先生原本，四雪草堂订正”。第一百回后全书最后一则评语是这样写的：

《封神》一书，其说由来甚远，事无可稽，情有可信。语云：“生为大柱国，死作阎罗王。”是又因人而可决者。况忠臣义士，气可贯虹，心可穿石，死后岂得泯泯无闻耶！然考其诸神名号，虽未必尽符其时，而穷之后世，又未见其人。其为当日有是事，亦未可知。余因伯敬先生所家藏缮本，又详其考订，其信与否者，咸听之耳。

这则评语中重要的是最后几句：“余因伯敬先生所家藏缮本，又

详其考订。”这显然不像钟伯敬自己说的话，“余”是何人呢？“祥其考订”，指正文还是评语？这都会使读者产生疑问。

但是，《隐秀轩集》里虽然没有直接与《封神演义》有关系的文字，却收有二十八篇“史论”，尤善评论人物，从汉高帝至荀彧，都有评述，但立论不是很高，见解也不新颖。有一篇题《善为国者取于人事》，提到了武王与姜子牙：

昔者武王问太公曰：“天下安定，国家无争，战攻之具可无修乎？守御之备可无设乎？”太公曰：“战攻守御之具尽于人事。善为国者，取于人事。”

姜子牙这里说的话，重视“人事”，与《封神演义》中他所采用的战术，可说大相径庭。《封神演义》的姜子牙，是以攻战杀伐为能事的。但是也不能据此判定《封神演义》的评语，不是钟氏所作。一个人的论点不能一成不变，此处这样说，彼处那样说，是常有的事。倒是《隐秀轩集》里有如此多的论史的文章，而《封神演义》的评语主要也在评史，所以这些评语果真出于钟氏之手，也是可能的。即使是托名，也是极力模仿钟氏文风，使之乱真，就像人们熟知的叶昼模仿李卓吾文风托名评论《容与堂水浒》那样，仍有一读的价值，因为可以看出当时对某一作品的评论标准与评论水平。因此，评语作者的真伪若能考出，固然很好；若不能考出，也不妨碍我们对此书评语作出评论。

《封神演义》这些评语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书中所出现的事件和人物（这二者事实上是互为关联的）作出分析或评论。至于小说对事件的描写是否合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生动，则不在评语作者的视野之内。评语作者更多地是从伦理道德的

角度发议论，而不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评论小说的得失。因此，迂阔陈腐之谈是不少的。

例如第三十回写纣王调戏黄飞虎妻贾氏，致贾氏坠楼而死，飞虎被激反出朝歌，评语写道：

贾氏烈妇也，宁死而不受君辱，虽见之真，然事出一时，不暇筹画，所以竟成其是。飞虎忠臣也，不肯因一妇人而失其节，此见极是。殆至沉思迟疑，须来周纪之激，毕竟成其叛逆。闻仲谓：“君有负于臣。”极是。及至转一议，便生出无限事端，不能曲全其美，良可悲矣！

这里仅就夫妇节义、君臣大义，发一通感慨，没有什么新颖的议论。

又如哪吒，评语写道：

哪吒顽劣，不亚美猴王；而一念忠孝，慷慨激烈处，有似花和尚、铁牛，此传固当与《西游》、《水浒》并传。

按哪吒之为读者喜爱，在于他是一个永不长大的顽童，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叛逆性格，评语却称赞他的“忠孝”，真是南辕而北辙。他与花和尚、黑旋风是两路人物，以之并列，也未免有点比拟不伦。

不过也有写得较好的评语，这就是作者借题发挥，对世情有所讽谕，如第七十七回对通天教主的评论：

余常笑世人耳朵软，专信婆子搬唆，无有丈夫志。今日通天教主为神仙领袖，犹自听徒弟戳舌，便动无明之火，连自己做的事都反悔了，不但不可做神仙，连丈夫也做不过。世人所以怕老婆，故不敢不听其指使，难道神仙怕徒弟不成！果徒弟乎，老婆乎？余不解此意，请问有徒弟者。

像这类评语，稍带幽默，尚能引发读者兴趣，可惜不多。但不管怎样，看看明朝人是如何评论这部神魔小说的，总不会毫无所得吧。

一九八八年

稗边闲评

近为《三言》之一《醒世恒言》作评。为旧小说作新评，是一种尝试。过去旧小说，大都有评，有眉批、夹评与总评等形式，有的还有“读法”等名目。既云“新评”，总得评出点新意。我在《新评警世通言》（已出版）的“评点者的话”中曾说，新评要“注意用文学的眼光审视这些小说，因为它们首先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注意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这些小说。小说中包含着大量的史料，透过小说的艺术外衣，可以看到某一个历史时代的真实的、活泼泼的社会生活，这是任何历史教科书所没有的”。今应美国《中外论坛》之约，选《恒言》新评两则，题曰《稗边闲评》，亦同《新评通言》之例，略贡刍见，为读者闲中读稗一助，亦有望于指正云尔。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这篇正面做道德说教，可称之为道德小说。中国传统道德，即儒家的道德。儒家道德的核心，一个是仁，一个是义。仁指爱人，义指仁的实践。本篇写两位在职县令，争相帮助一位已故县令的孤女，这种行为出于仁心，予以实行，因此合乎义。义固然是人人应该做的事情，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做义事总得牺牲点个人的利益。像两位县令，钟离义要为素无瓜葛的月香备办妆奁，高原要娶贫苦无依的孤女做儿媳，一般县令从本身利益、地位与财产考虑，就不一定能做到。贾公用银赎取月香和养娘，还领回抚养，贾婆就做不到；不仅做

不到，还将她们骗卖掉，以免损害自己利益。义的对面是不义。义所要求的做人道理是舍己助人，不义的做人道理是损人利己。本篇主题宣讲义，同时也反映不义。用不义来衬托义，使义行更显突出。

但是，道德小说由于它的说教意味的浓重，在艺术上总显得苍白无力。这篇小说的主旨是“竞义”，即争着做好事，主要的人物便是争做好事的两位县令钟离义和高原。而他们的义行的表现，乃是通过往复的四通骈俪体的书札来完成的。这些书札，咬文嚼字，引经据典，很有点酸腐气。这是小说的薄弱之笔，看得出是作者急于表达他的道德说教而不顾艺术手段所采取的简捷方法。有一个细节描写，颇能说明这篇小说的勉强成篇。月香灌水取球这个故事，原是宋朝名臣文彦博儿时的故事，历代流传很广，是人们所熟悉的，现在却嫁到了身份极不相称的一位县尹女儿身上，目的虽是显示月香的聪慧，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这样的移花接木并不自然，并且也缺乏新鲜感。据这篇小说的蓝本《东轩笔录》所载，月香球戏是“穴地为球窝”，挖一个洞，其父教导她滚球为戏，颇有点像今天玩高尔夫球的情形，并无灌水取球情节。小说又写月香父亲问女儿：“你有甚计较，使球儿自走出来么？”月香答道：“有计了。”这也不合一个八岁女孩的口吻。这些都看出这篇小说的拼凑痕迹。倒是贾婆和养娘，还有那个张媒婆，写得较有神色，言谈心态，颇肖其人，这才是话本作者独擅胜场的地方。

小说中贾婆骂月香和养娘为“瘦马”（“那老亡八（指贾公）把这两个瘦马养着”），这是明代市井俗语，指卖身作妾。张岱《陶庵梦忆》有《扬州瘦马》条，描画入微，可作为这个特殊名词的注脚。

本篇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都入选《今古奇观》，足见受到重视。十九世纪后叶，赫斯特译为英文，传之海外，改题《中国灰姑娘的故事》。如果说，月香也可称为灰姑娘，那是完全中国化了的灰姑娘。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本篇许武事迹见于《后汉书·许荆传》，当然比较简略，没有小说那样叙述婉转周祥，描写细腻熨贴。《后汉书》只在许武大会宗亲，泣诉自己忍辱负重一片苦心后，写了两句道：“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只有一个故事骨架，没有血肉内容。小说就不同，它代许武立言，让他对两个弟弟说：“只因为你两个名誉未成，使我作违心之事，冒不韪（贪恶）之名。”又说：“吾暂冒贪饕之迹，吾弟方有廉让之名。”这就将《后汉书》所未曾记载但许武在情理中应有的心里话，表露得透彻无遗。所以这篇小说虽然把一两百字的一篇“正史”记载，添枝加叶地敷衍成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其中不免有虚饰虚构的成分，但基本上可说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

但是我们今天来读这篇小说，却应该有一个“读法”问题，也就是说应该有一个是非问题。这个是非问题，也就是如何评价许武这个历史人物。

范晔和冯梦龙，一个是《后汉书》作者，是史学家；一个是这篇小说作者，是文学家。他们年代相隔遥远，但对许武的评价则是一致的。在他们笔下，许武舍己为人，品德高尚，是一个堪为道德楷模的正面人物。

范晔离我们将近二千年，冯梦龙也有三百多年，都是古人，他们有他们的看法，完全无可非议。但是若按今天的角度，我认为，应该从反面来看待许武这个历史人物。

此话怎么讲呢？我们可以首先问一个问题：许武是不是诚实人？回答只能是不诚实。他为了两个弟弟成名，不惜使用手段，弄虚作假，欺骗世人。他的“作违心之事，冒不韪之名”，实行的是一条“苦肉计”，先受点损失（蒙受恶名），期待更多更大的收获。“让产立高名”，“让产”不过是暂时的损失，“立高名”却是永久的收获。这就是欺骗手段。儒家讲恕道，但对欺骗行径则深恶痛绝。孔子说：“吾谁欺，欺天乎！”这个“天”，可解作“一手遮天”的天。子路问“事君”，孔子回答说，首先不能欺骗，然后犯颜谏诤。许武以欺骗达到目的，只能是一个伪君子，直率点说还是一个高级骗子。

接下来还可再问一个问题，许武这样做是为公还是为私？从表面看，他不惜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当然为公。这也就是从范晔到冯梦龙，又从冯梦龙也许一直到现在，人们对许武以及像许武这样的人给以肯定赞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既然许武的所谓“为公”是建立在欺骗手段上的，他这个“为公”的性质不过是欺世盗名罢了。许武“让产”的最大受益者，实质上并不是他的两个弟弟，而是他自己，他得名最高，做的官也最大。有一个时期，有一种广为宣传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处世哲学，倘要从历史上寻找这一哲学的先进人物，许武可首当其选。

所以读这篇小说，不可跟着作者走，应保持自己的看法和独立见解。岂止这篇小说，读古今任何书，莫不皆然。

卖油郎独占花魁

这是一篇宋人话本。宋人话本的特点是，故事动人，描摹细腻，其最擅胜场处，尤在后者。这篇的故事，一个微贱职业的卖油郎，以他的痴情和不懈的追求，终于赢得了花魁女的爱心。这样的爱情故事，是大家所喜爱的。但是，如果没有高超的描写，再好的故事也吸引不了人。这是文学的规律，艺术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或命令（例如规定“艺术第二”）为转移。

这篇的艺术描写功夫，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人物形象的维妙维肖。小说里重要的是四个人物，按次序排：卖油郎秦重、花魁女美娘、鸨母刘四妈和王九妈。秦重诚实小心，善体人意，但又不脱市井小商人的本色。美娘是高级妓女，才貌双全，心胸豁达，然而举止分寸上又看得出来不是大家闺秀；她这时正处于她的烟花生涯的盛期，结交皆权势，往来尽富户，故而骄气与娇气并存，但说到底仍是一个弱女子。刘四妈与王九妈同为鸨母，却个性各异，刘巧嘴利舌，能言善辩，真有将白的说成黑的、死的说成活的能耐。王则比较木讷，不善言词，虽然视美娘为摇钱树，但尚不穷形恶相，惟利是图。刘的关于“从良”的一段说词，层层解譬，条分缕析，长达一千四百字，别辨明白，说理透彻，是白话小说中最为精彩的道白之一，直可与《水浒》中王婆说风情的一段道白并肩媲美。在中国文学长长的画廊中，群星璀璨，妍媸分明，各极其妙，像刘四妈、王婆这样活跃的人物理应有她们一席之地。

第二，细节描写的细腻与真实。古人写人，贵在传神，所

谓“颊上添毫”，指的就是这一手法。请看本篇写秦重听九妈嗔他不知好歹，妄想与花魁娘子相处一宵后的情状：“秦重把头一缩，舌头一伸，道：‘恁的好卖弄！不敢动问，你家花魁娘子一夜歇钱要几千两？’”这把秦重此时此地的做作表情，真是写得活龙活现。“头一缩，舌头一伸”，这是故作惊讶状，他明知一夜歇钱是十两银子，自己袖中带有十六两银子，绰绰有余，心中笃定；心定而缩头伸舌，又恰是市井细民的习惯表情，符合秦重卖油郎的身份。同是嫖客，身份不同，郑元和或王金龙就不会做出这种表情。再看写鸨母九妈，着墨不多，却在她陪同秦重饮酒吃饭等候美娘归来时，闲闲一笔：“鸨儿量高，不用饭，以酒相陪。”这一笔看似不经意，其实也写出了一个鸨母的身份，平日养尊处优，颐指气使，饮食起居颇为讲究，“量高”反映的就是这一种高级鸨母生活。写美娘的醉态，是全篇的高潮，这分四个层次来写。美娘大醉回房，醉眼矍矍，不愿接什么秦小官人，照一个面，转身便走。这是第一个层次。九妈连哄带推，美娘进房，对秦重产生疑惑，心中不悦，默不出声。这是第二个层次。接着，美娘借酒使性，一连吃上十来杯，还说“我不醉”，终于酩酊大醉，倒身而卧。这是第三个层次。秦重小心伏侍，用道袍承接美娘呕吐，递茶漱口。这是第四个层次。有此四个层次的描写，一个娇生惯养、倚酒任性女儿的声态笑貌，全出来了。

从这篇小说，我们还可看到两个历史现象：一，南宋虽则偏安一隅，但与金国媾和后，社会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经济的繁荣，促进消费的增长，像王九妈这类的上等妓院便应时而起，“往来的都是王孙公子、富室豪家”。但是，表面的繁荣，潜伏着隐藏的危机，北方强敌虎视在侧，南宋朝廷上下花戏，

以苟安为国策，已经播下灭亡的种子。当时一位诗人所咏：“春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本篇所写为此作了注解。二，南宋是理学家占统治时代，妇女“从一而终”，贞洁成为严格教条。但贞洁观在当时社会，并不像后世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说一不二，特别在市民社会，并不苛求。本篇的花魁女，没有因她的妓女身份而影响她后来的社会地位。倒是金钱和财富，起着决定的作用。

灌园叟晚逢仙女

这是一篇写花的故事，也写花仙、花精，但主要写的是花。因花而又写到爱花、惜花和某些摧花、残花的人，以及相关的一些社会生活，由此便编造出一个离奇而又美丽的故事。最早的英文译本，题目就叫《花仙》，也有译名《爱花人与花仙》。

先作两点小考证。

第一，这篇小说是宋人作品还是明人作品？几位话本研究者（如郑振铎）都没有对这篇作品定出时代，但至少有三个地方可作为判断这篇作品为宋人话本的依据：一是小说自称出在“大宋仁宗年间，江南平江府东门外长乐村中”，不说“故宋”、“宋朝”而说“大宋”，这是说话人对本朝的称呼；“江南平江府”，这也符合北宋的地理建置，平江由军升府。二是小说中几次用了“小子如何如何”，这是两宋说话人一贯习用的口吻，明人的“拟话本”不用这种口吻。三是叙述上的某些惯用熟语，可以看得出两宋说话人间的承嬗渊源，如本篇入话的“那青衣启一点朱唇，露两行碎玉”，这在较早的宋人话本《碾玉观音》中就有相同的描写：“朱唇缀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西

山一窟鬼》中则不过把“樱桃”改作“天桃”而已。有此三端，故本篇可确定为宋人话本。

第二，校勘的问题。古代白话小说也有一个校勘问题，但目前除了《红楼梦》外，其他的白话小说包括《三言》的校勘未受到重视，以致常被任意改字，以讹传讹，不以为非。以《三言》而论，如“丈丈”之被擅改为“丈人”（《金明池吴清逢爱爱》），“（挡）风酒”之被擅改为“烫风酒”（《卖油郎独占花魁》）之类，可说比比皆是，此皆由于未谙话本所用方言俗语之故。本篇也有这个情况。本篇入话写封十八姨听了红裳女子与白衣女子的歌，说了一番话，其中一句道“歌旨又深刺予”，这个“予”字，所有通行的排印本（包括通行的《今古奇观》排印本），都被改成了“干”字。有一个注释本还对“刺干”作为一个词语加以注释：“刺，讽刺；干，冒犯。”这不能不说是望文生义。“予”同“余”就是“我”；“刺予”就是“讽刺我”，这是很明白的。“刺干”则是生造出来的词语。于此可见，白话小说的校勘岂可轻视哉！

这篇小说的引人入胜之处，我以为主要还不在它的故事情节，情节不过是善恶有报，而在于写出了个爱花如痴如命的倔强可爱的老头儿的形象。这位秋公，你看他栽花，侍花，葬花，浴花，还有医花，真是花的知己，花的知音，花的守护神。他的葬花，比林黛玉早六七百年。虽然没有黛玉葬花那样激动人心，但也不能让黛玉专美于后了。再有就是这位小说作者对花的渊博的知识，正话中那一段关于秋公园中名花异卉的描写，以及那篇咏花的韵文对各种花的不同形容，都使人如入花丛，目迷五色。昔人说读《诗经》可使人“多识草木虫鱼之名”，我说读《三言》亦可使人增加各方面的许多知识，如本篇即可

使人增加对花的品种的知识，了解多种花的不同特性。本篇对朝天湖的一段描写，短短二三百字，写出了湖光船影的四时风光，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可以录下共赏：

这湖东连吴淞江，西通震泽，南接庞山湖。岸傍堆土作堤，广植桃树。每至春时，红绿间发。沿湖遍插芙蓉，湖中种五色莲花。盛开之日，满湖锦云烂漫，香气袭人，小舟荡桨采菱，歌声泠泠。遇斜风微起，偃船竞渡，纵横如飞。柳下渔人，舣船晒网。也有戏鱼的，结网的，醉卧船头的，没水赌胜的，欢笑之音不绝。那赏莲游人，画船箫管鳞集，至黄昏迴棹，灯火万点，间以星影萤光，错落难辨。深秋时，霜风初起，枫林渐染黄碧，野岩衰柳芙蓉，杂间白苹红蓼，掩映水际。芦苇中鸿雁群集，嘹唳干云，哀声动人。隆冬天气，彤云密布，六花飞舞，上下一色。

这给读者的愉悦，不是超过了故事本身吗？

本篇中写到洛阳牡丹冠于天下，提到了武则天的四句诏诗：“来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百花连夜发，莫待晓风吹！”因牡丹独不承诏，则天大怒，遂将牡丹贬于洛阳。后来《镜花缘》第四回也写了这个故事，当然更热闹一些。按这四句诏诗，《全唐诗》曾收录，仅个别字与本篇所载有所不同，如“来朝”作“明朝”，“火速”作“火急”，“百花”作“花须”。《全唐诗》所收的诗题作《腊食宣诏幸上苑》，题下有注：“天授二年腊，卿相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云云。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后托术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大凡后之诗文，皆元万顷、崔融等为

之。”未注明出处，当是采自宋人笔记。这里只说宣诏催花一夜齐发，没有提贬牡丹于洛阳。武后贬牡丹去洛阳的故事，最早见之于北宋高承编的《事物纪原》：“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洛阳牡丹冠天下。”本篇与《镜花缘》所写，都来源于此，这大概是唐宋民间流传甚广的传说。

一九九四年

袁宗道论

——为标点本《白苏斋类集》写的前言

《白苏斋类集》二十二卷，明袁宗道著。宗道字伯修，号石浦。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卒于万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终年四十一岁。公安三袁中，伯修是长兄，一生享年不永，但科举仕途则称得上一帆风顺。他十二岁入学，十九岁中乡举。万历十四年（一五八六）二十七岁时参加进士考试，举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授庶吉士，入翰林院授编修，这是所谓清华的官职。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充东宫讲官，历春坊中允，至右庶子，终于官。倘不是早死，伯修官位升擢之隆，是可以预卜的。

三袁兄弟，都是早熟的天才。二弟中郎（宏道）四岁，着一只新鞋，舅舅龚仲敏见了戏道：“足下生云。”中郎应声道：“头上顶天。”仲敏为之骇异。三弟小修（中道）十岁就能作赋五千余言。伯修也是如此，十岁即能作诗，二十岁即通读先秦两汉之书。当时盛行李攀龙、王世贞诗文，他一阅悉能熟诵，写出文章，即肖其语。有天才，不等于有成就。但有成就，而又确有天才，也应该承认。

公安派文学的主将，毫无疑问是中郎，小修起推波助澜作用。但首开风气的，不能不推伯修。这不仅因为他年长官尊（这也有一定因素），而也是因为他率先举起打倒王李模拟之风的旗帜。《白苏斋类集》卷二十收有《论文》上下篇，从题目看，是一篇大文章，虽然内容不算精深，说理部分也显得稍嫌单薄。

但从当时来看，这篇文章指名道姓，毫不容情，力排当代文坛盟主李梦阳、李攀龙和王世贞这几位大名人的复古模拟主张，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应肯定它是一篇力作，绝不输似中郎的《叙小修诗》、《雪涛阁集序》等这些为公安派树声气、奠根基等有名篇章。譬如伯修认为文字与语言是不能分离的，各个时代有不同的语言，因此亦有相应的不同文字，“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诂为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论文》上）他指出《左传》未尝同于《尚书》，《史记》又未尝同于《左传》，虽然它们的时代相去未远。“至于今日逆数前汉，不知几千年远矣，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同上）中郎的见解亦是如此，他也认为古今语异，不能相袭。他说：“已简安用繁，已整安用乱，已明安用晦，已流丽痛快安用聱牙之语、艰深之辞？……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与江进之》）再譬如伯修说：“空同（李梦阳）不知，篇篇模拟，亦谓反正。后之文人，遂视为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语不肖古者，即大怒，骂为野路恶道。”（《论文》上）又说：“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项学问，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丝意见，徒见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说，又见前辈有能诗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纸，入此行市；连篇累牍，图人称扬。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鸿钜之裁，自非行乞左、马之侧，募缘残溺，盗窃遗矢，安能写满卷帙乎？试将诸公一编，抹去古语陈句，几不免于曳白矣。其可愧如此，而又号于人曰引古词，传今事，谓之属文。然则二典三谟，非天下至文乎？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词乎？”（《论文》下）这与中郎所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

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又说文坛这些人，“粪里嚼查，顺口接屁，……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札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与张幼于》）他们兄弟二人的言论，如此榘鼓相应，真可说不是不约而同，而是有约而同时了。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根据就见于伯修的《答陶石簠》书中的一段话：

中郎极不满近时诸公诗，亦自有见，三四年前，太函（汪道昆）新刻至燕肆，几成滞货。弟尝检一部付贾人换书。贾人笑曰：“不辞领去，奈何无买主何！”可见模拟文字正如书画贋本，决难行世，正不待中郎之喃喃也。

可知兄弟立论相同，正是所见相同。《论文》上下篇没有著明写作时间，但可以相信当在中郎立论之前。钱牧斋（谦益）说：“伯修在词垣，当王李词章盛行之日，独与同馆黄昭素（辉）厌薄俗学，力排假借盗窃之失。”（《列朝诗集小传》）这说明他早在中郎之前，就在反对王李的“俗学”了。所谓“俗学”，就是“假借盗窃”，也就是模拟剽袭，也就是伯修自己所说：“惟戏场中人，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论文》下）模拟是对立于独创而提出的。反对模拟，即意味着提倡独创。我请求读者不要小

看伯修将反对模拟、主张写真情实感（不要“强笑”“强哭”）作为他的《论文》上下篇的主旨，因为从另一面看，《论文》上下篇的主旨正就是提倡独创。这在当时前后七子霸占的文坛上，在当时“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的文风笼罩下，就是对权威的一种挑战，预示着一股新鲜的文学旋风将要掀起了。牧斋又说伯修：“其才或不逮二仲（指中郎、小修），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同上）伯修在公安派中的地位与成就，牧斋这话说得最为明确，我要借此为牧斋和他的《列朝诗集》说两句赞语，历来对牧斋和这部书的估价与重视都很不够。牧斋气节人品固有可议，但不能因人废言。我认为牧斋是明代最有见识最有眼光的一位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编选撰写的《列朝诗集》及其各家小传，既是明朝一代卓越的诗史，也是明朝一代卓越的文学评论史。他目光锐利，辨识精微，论断确切。从他对三袁兄弟的评论，读者就可看到他的见解的精辟。

同他两位弟弟一样，伯修的思想深受李卓吾（贽）的影响，二人交谊甚厚。不妨说，卓吾实是三袁兄弟亦即是公安派的精神上的导师。卓吾的对传统的批判、出儒入佛等一系列新颖议论，对伯修兄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启迪了他们的思路，开拓了他们的心胸。卓吾对袁氏兄弟也极相推许，称伯修“稳实”，中郎“英特”，“皆天下名士”。伯修所受于卓吾的教导，主要在禅学方面。他很早就在研究心性之说，尝试以禅诠儒，探求两家合一之旨。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他们兄弟三人同访卓吾于黄州龙潭，向他“问学”，所问的即是这方面的学问。对禅学的沉迷与陶醉，实质上是对儒学的不满与背叛，企求打破传统的桎梏，获得心性的解脱。即使后来悟得了所谓儒佛合一之旨，这个儒已是沾染了佛的儒。反映到文学上，要求摆脱束缚，

仙鹤能为台榭点缀光景，然决不能耕田负重；猫能护衣筐，鹰隼能致野味，然不能禁其食腥膻。通此，则满世界皆人才矣。”景鲁亟赏之。（《白苏斋类集》卷十四《嘉鱼纪游》）

伯修这段议论，以及他还有针对时事的诗句“噉名多局面，谋国半嗔心”（《月夜登楼偶成之二》），说明他对世事是极为通达的，不是只解文学的书生。姚士麟曾据此说伯修若活到白乐天、苏东坡的年纪，也将免不了他们的贬逐命运（见《白苏斋类集序》）。小修说他：“大都量与识皆全者也，天不假以年，未得尽抒其用世之略，惜哉！”（《石浦先生传》）这对伯修才识为人的评论大抵是不错的。

公安三袁中，伯修的文学成就显然逊于二位弟弟，前引钱牧斋的话已经说过。再看小修对他诗文的评论：“诗清润和雅，文尤婉妙，然性懒不多作。”（《石浦先生传》）这话大抵也不错。入了翰林院，总不免有点馆阁气，伯修诗文之缺少如牧斋所说中郎那样的“疏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列朝诗集·袁宏道传》）的功力，也是很自然的。虽然如此，伯修仍有其本色所在。如果说，中郎的特色是清新，有如夏日清晨的露珠；小修的特色是奇诡，有如秋日蓝空的白云；那么，伯修的特色是温雅，有如春日拂面的轻风，同时有一种雍容和平的气度。而求新创新，不袭陈言，不落旧套，又是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姚士麟评伯修诗文，就着眼一个“新”字，称之“情情新来，笔笔新赴”；“提人新情，换人新眼”。这是他为《白苏斋类集》写序的话。给人写序免不了有溢美之词，但也不能随便乱说。

伯修爱慕白居易、苏轼，故以“白苏”名斋。中郎说：“伯

修酷爱白、苏二公，而嗜长公尤甚。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二幅，倦则手一编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识伯修遗墨后》）《白苏斋类集》于伯修在世时已有刻印，见于伯修自述：“中郎见弟近作，谬相称许，强以灾梨。”（《答陶石簠》）伯修逝世后，书坊又续有刻印，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小修会试中式那年，曾在北京见到（据《游居柿录》）。现传《白苏斋类集》刻本，前有姚士麟序，每卷题下均有“弟宏道、中道参校”字样。士麟与胡震亨同学，一生不遇，但享年甚长，崇祯间尚在；晚年常访牧斋作长夜之谈，已九十多岁。中郎、小修都没有谈到请士麟为《白苏斋类集》作序的事，这个本子可能是天启、崇祯年间书坊所刻。另据小修记述，伯修有小词乐府与传奇二种，“置之笥中，为鼠子嚼坏，竟不存于世”（《石浦先生传》）。本来作品就不多，又遭此损失，从后人来看，无论如何也是可惋惜的。

一九八六年

散文大家袁宏道

——为顾易生主编《十大散文家》一书 而作

袁宏道这个人，是明代中后期文学革新派——公安派——的领袖。他的更为人们所熟悉的名字是袁中郎（中郎是他的字），我在下面也这样称呼他。他是公安（今属湖北）人，所以叫他所领导的文学流派为“公安派”。他生于明朝隆庆二年（一五六八），卒于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活了四十三岁，年寿不高。他一生的成就，一是文学创作，一是从政，也就是做官。他的官做得不算大，但文学成就很大，转换了一代的风气。他的文学成就一是诗，一是文，既是诗人，又是散文家。他是一位热爱自然山水风光的旅游家，一生爱好游览，每到一地就写下优美的游记，所以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游记占了相当的数量；其他记传、书信、随笔也有许多。比起他的诗来，他的散文更为人们所喜爱所阅读。因此称他为大散文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一 从学童到进士

袁中郎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二。哥哥名宗道，字伯修；弟弟名中道，字小修。三兄弟都中进士，都有文名，人称“公安三袁”。他们还有一位姐姐。中郎从小就聪明。四岁的时候，着一双新鞋，舅舅龚仲庆看见，出了个上联“足下生云”。他应

声答了个下联：“头上顶天。”四岁就能对对子（这是古人读书的基本功），而且又快又好，出语不凡，使得舅舅大为惊叹。他六岁丧母，孩子们归庶祖母詹氏带领。这位庶祖母很慈祥，遇到冬天寒夜，便烧起一炉火，叫孩子们围火取暖。大哥伯修最善谈吐，会说故事，读的书也多，这时便把书上看来的古话新事说来有声有色。他们的姐姐虽然不读书，但是最爱听这些书上的故事，怕伯修停止，专门煮茶让伯修一面吃一面讲。伯修又编些鬼神奇怪的故事，有意描绘得恐怖可怕，说得活灵活现，吓唬他们。窗外的北风呼呼地叫，窗棂纸簌簌地响动，室内的灯火忽悠悠地一明一暗，真像鬼怪破窗而入。姐姐同两个弟弟胆小，吓得胆战心惊，小修怕得哭起来，投入姐姐怀抱。伯修见自己编的故事收效如此灵验，高兴得拍手大笑。姐姐和弟弟定下神来，想想刚才害怕的可笑样子，也都开心地笑了起来。这位姐姐记性好，伯修讲的故事她都记得。有一次，她同中郎、小修一起在厅堂后面听盲艺人演唱《四时采茶歌》，有好几百句，后来中郎兄弟只能记诵一半，但姐姐全部背出。姐姐同他们兄弟的感情真挚亲密，但童年相聚时间不久。那是因为外祖母要把失去母亲的外孙女接到县城抚养。离别的那天，中郎和小修正在书塾上学，从窗缝缝里看见舅舅抱着姐姐骑在马上，风吹得姐姐的袖子飘动。他们的马走过书塾前面，舅舅叫两兄弟出来同姐姐告别。姐姐在马上哭着说：“我去了！弟弟好生读书吧！”两兄弟也都下泪，但是碍着塾师，不敢哭出来。姐姐的马走了，两兄弟奔到后山，目送着人影马尘逐渐远去，望不到踪迹，方才郁郁而归。后来小修把童年时兄弟姐妹相聚的这些情景写在他的回忆文章内，显得很为动人。童年生活的悲欢离合，无疑也给中郎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郎十五岁进学，这便是做秀才，是古代文人考取功名必不可少的第一步阶梯。秀才主要学做八股文，又叫“时艺”。中郎约了一些志趣相投的秀才，组织了一个“城南文社”（顾名思义，这个文社的聚会地点在公安县的南城），专门揣摩时艺，练习八股文（又称时文），以备应举考试之用。中郎自任社长，社友中有三十岁的老秀才，也都听他的话，受他的约束。可见中郎在少年时已有一副文坛领袖的气概。这个文社，办得很有成绩，社友的“揣摩”相当成功。十年之后，中郎有一首诗追记当年社中的辛勤学习情况：

宿昔城南约，苍茫十载情。
交游悲喜尽，文字揣摩成。
古屋繁阴入，空阶冻鸟行。
终年惟搦管，辛苦是书生。

这首诗译成新诗，大意如下：

从前，在城南结了一个文社，
遥遥地过去了十年，至今还在想念。
同游的社友失意的得意的全已散尽，
虽然文章的揣摩总算有成。
回想那时在古旧的房舍里——
夏日灼热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照射入室，
冬天冻得吱吱叫的鸟儿来到空荡的阶前取暖。
我们拿着枝笔终年坐在这间古屋，
多辛苦啊这些孜孜于功名的书生。

应该说明，八股文虽是一种形式主义文体，除了应付科举考试外，似乎别无他用，但八股文可以锻炼文笔，培养思维能力，所以要做得好，并不容易，需要浓厚的经书功底和极高的文学技巧。有些人做一辈子，也做不好。因此，做八股文也有名家、大家。有些人，既是著名的文学家，同时又是时文的名家。像大戏曲家汤显祖，在当时就是一位做八股文的大名家，有专门的时文集子于世。中郎也是如此，他的八股文也是做得好的，所以有资格做文社社长。

二十一岁，中郎考取了举人，这叫作乡试。做了举人，第二年就可以上京城去考进士，但是如果考不取，就得再等三年。考进士固然要靠学问，但是也有运气好坏。有的人才学很高，运气不好，就是考不取。考取的都是幸运儿。第一次中郎没能考上，过了三年，到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这年他二十五岁，考上了进士。他也是幸运儿之一。这是封建时代文人十年寒窗的最高报酬。六年前，他的哥哥伯修考中进士，那年伯修二十七岁。中郎比他哥哥还早了两岁，算得是少年得意了。

二 以李卓吾为师

李卓吾，名贲，晋江（今属福建）人。明代大思想家，反对束缚人性的道学，倡导“童心”之说，不惜与世俗和传统决裂，因此被目为“异端”、“妖人”。他做过知府，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与学说，弃官不做，专心讲著述。万历十八年（一五九〇），春天，他来到了公安柞林，寄住在野庙里。袁氏兄弟慕名去拜访他，一同住了三个多月，日日谈论，互相启发。袁氏兄弟从李卓吾那里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议论，启迪了心胸，开

拓了眼界。

下面摘录他们当时谈话的部分记录，这都见于小修写的《柞林纪谭》，用的是“语录体”，基本上是口语，但个别文言成分浓的则改成白话。

伯修问：“学道遂不怕生死否？”

李卓吾答：“别人怕不怕不可知，我却怕。”

伯修说：“怕亦有根器生定怕的，如我从少年便怕放铳(枪)。不知怕生死之怕与怕放铳之怕，是一是二？”

李答：“怕从小从自，难道不是一样？”

伯修说：“可见这胆气也是生定，由不得人的。”

李答：“对。”

中郎说：“不然。比如三家村里童子，见人便恐骇；及到闹市，住了二三年，见人都不怕了。可见这胆气，又是充拓得的。”

李笑答：“人只是一个见识，见识大了，胆自然大。”

十五夜，月色明，坐于堂上饮酒。

李说：“今日饮酒无以为乐，请诸君各言生平像何人。”

伯修说：“我最爱苏东坡，然也不似。庶几白乐天乎？”

中郎说：“我最爱竹林中人嵇康。”

小修说：“我从来只爱齐人，家有一妻一妾，又终日觅得有酒肉。”

李说：“诸公将我闲评何如？”

伯修说：“李耳。”

李说：“当不起。”

小修笑说：“公即盗跖。”

李笑说：“盗跖也不容易。我记昔在黄安，与诸人论学次，

亦是如此闲评。有友人笑指我说：‘公即林道乾’。林道乾，乃大盗。我说：‘不容易。渠往昔在海上，横行各郡县，人不敢问。直到家中，官兵围之，他与众人饮酒高会不顾。一夜遂失所在。他视朝廷大小官员，如一群小儿，任其播弄，听其出入，亦大胆了。’”

中郎说：“公似李膺。”

李说：“我骨气也像李膺，然李膺事，我却有极不肯做的。”

中郎论人不宜太畏事。

伯修说：“不畏事，必坏事。”

小修说：“畏事非不是。比如行舟，风波宜畏。如风恬波静，却又回顾踌躇，恐有覆舟之厄，则终身无登舟之日矣。比如走马，疾坂危桥宜畏；如平地康庄，又愁马蹶，则终身无走马之日矣。”

李说：“也是。只天下学问非一途，古今豪杰也有终身畏而不用的。”

伯修笑说：“这样人也好。”

李说：“此天下第一等有筋骨人，这样人狠不可言，如李耳之流是也。”

李卓吾把伯修比作后汉时的黄宪、管宁，把中郎比作春秋时的鲁男子，把小修比作唐朝的刘禹锡、柳宗元。又说伯修稳实，中郎英特，都是天下名士。又说中郎识力胆力，超过世人，真是英灵男子，可以担当大事。总之，李卓吾是极为赏识袁氏兄弟的。中郎从见到李卓吾后，方才知道自己过去一向受传统框框的拘束，守着世俗的见解，在陈词滥调里兜圈子，死在古

人讲过写过的语言下面，本人的一段精光却得不到披露。他受到李卓吾的教导和启发，就像鸿毛遇到了顺风，大鱼纵跃于波涛之中。心灵豁然开通，自己能主宰心，而不为心所缚；能使古人为我所用，而不被古人牵着鼻子走。于是说话、作文，一一都是从自己胸襟流出，随心所欲，再不受任何羁绊拘束了。

李卓吾是明代后期思想解放的大师，中郎在思想上终身以他为师。

这里附带记一段插曲。中郎曾经给他同榜考中进士的好友王一鸣写过一封信，说自己生平有三次别离之苦：一次是“少时江上别一女郎”，一次是“湖上别一长老”，一次是与王一鸣之别。“湖上别一长老”，批的就是李卓吾。中郎把他同卓吾的分别，比作少年时与恋人的分离，可见他对卓吾感情之深。因为少年时的恋爱，是珍藏在人们心中的最纯真的感情，轻易不肯透露，这是无分古今中外，人所共有的。只是古人大都拘于礼教，不愿著之文字，宣之于众，因此他们的少年时期的这段爱情，不大能为人所知道。中郎的少年恋情，也不过只是露了这么一句，更多的情况就只能埋藏在他自己的心中了。

三 不愿做官的吴县县官

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但恐五百里粮长，来唐突人耳。吏道缚人，未知向后景状如何，先此报知。

上面这封信，是袁中郎考中进士后第一次做官——吴县县令，一到任写的。吴县就是今苏州，有名的美丽城市。中郎是讲究风

雅的人，并且以此自负，所以这封信一上来就表示有他这个风雅的人来做这个风雅城市的县令，真是相得益彰。但是中郎又把自己比作一个“大粮长”，就是主管催粮征科的小官吏，不过是一个庸俗的人而已。可见他一上来就是不大愿意做官的，虽然他在短短的两年县官任内，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个十分能干的官员，并且廉洁奉公，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苏州是富庶的地区，赋税也重。衙门里的胥吏，欺负老百姓，上下其手，额外征收，饱入私囊。历来的县官，或者同流合污，贪赃枉法；或者书生无知，受胥吏欺骗，自己蒙在鼓里。中郎一到任，就想革除这个弊端。他把按照法令应该征收的赋税项目，与现在实际征收的赋税项目，细细对照，就看出了其中的奥妙。

“这一条税征来做什么用？”

中郎升坐大堂，把税册摊开，点着一条税目，问经办的胥吏。

“这，这……”经办的胥吏讷讷地答不出来。

“这什么！”中郎的声音严厉起来。

“这，这是额外的税收。”

“额外的？额外的合法吗？”

“不，不合法。”

“既不合法，好，这条取消，以后不许随意征收！”

“是，是。”

这样，中郎连连指问了十多条，胥吏不敢隐瞒，只得一一承认都是弊端，愿意服罪，清理出来的非法税收数达巨万。中郎把清理出来的这笔钱，用作减免税收，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老百姓当然感到高兴。

封建时代的县官，除了是催缴田粮钱赋的“大粮长”外，同时还是全县的最高法官，每天或者隔天都得登堂审案，不管刑事还是民事案件都得由县官审理判决。衙门里的师爷和差役，便靠打官司来敲诈老百姓，勒索钱财。中郎在这方面也不是胡涂官。他审理案件，问明白原告与被告，告的什么事，是非曲直，当堂立断，很快就把一件案子了结。若是民事纠纷，断得清，断得快，所以老百姓称中郎审案是“升米公事”，就是简单容易，从不让老百姓劳民伤财。遇到刑事案件（如偷盗奸杀一类案子），除非是情节特别严重的，需要监押罚款，其他一律杖责，以示惩戒，当堂发落了事。总之一句话，中郎治理吴县，采取的是“政清刑简”的政策，让百姓不受苛扰，过安定的生活。

吴县的县衙门前变得冷冷清清，因为打官司的人少了，甚至没有了，原来靠打官司人来人往做生意的酒店饭铺，没有生意可做，只好搬走了。县里的差役，原来也是靠打官司来敲诈勒索，养家活口，现在没事干，断了财路，连温饱也顾不上，只好逃走去当农民了。

袁中郎忽然接二连三地接到一封封的匿名告状信，心里很奇怪，叫差役查访，也查不出什么踪迹。一天，他随意踱步到衙门口，见到衙前摆了一张算命摊，算命人一副狡猾伶俐的样子，很令人心疑，心想莫非匿名状就是这个算命人所写。于是叫人把他唤进衙内，说是老爷要算命。算完命，中郎给他纸笔，叫他写下来。一对笔迹，果然与匿名状一般无二，立刻讯问，算命人承认是他捣鬼。这件事说明袁中郎做官精细敏捷，判断一些疑难事情能做到准确无误。

中郎利用公出勘灾和丈量田地的机会，游览了洞庭东西二

山和虎丘、上方等名胜地区，事后写了十八篇关于苏州的游记，这里选录一篇《荷花荡》，可看出他描写的手段：

荷花荡在葑门外，每年六月廿四日，游人最盛。画舫云集，渔刀小艇，雇觅一空，远方游客，至有持数万钱，无所得舟，蚁旋岸上者。舟中两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帟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苏人游冶之盛，至是日极矣。

中郎所写游记的特点，既写景色，又写游人，而且还把自己也写进去，同时不时还带点幽默感。他六次登虎丘，最后一次登虎丘，却把正在那里赛唱民歌的歌手给吓跑了。他对同去的朋友慨叹道：

“真想不到啊，我一顶乌纱帽如此横行，我带来的衙役如此俗不可耐！我对月发誓，我将来罢了官，一定再到生公石上来听歌！”

他同朋友共游阳澄湖，这样描写：

放舟湖心，披襟解带，凉风飒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头如髻。按麈高谈，不知身之为吏也。少顷，邮者报台使者至宝带桥，客主仓惶，未能成礼而别。

你看，知县游兴正浓的时候，一声报告巡按御史来了，慌得这位七品地方官手忙脚乱，打断游兴，赶忙奔去迎接，多么可怜！中郎如此写，读者当然欣赏到了他的幽默。

他写的《百花洲》游记，更是有趣：

百花洲在胥、盘二门之间。余一夕从盘门出，道逢江进之，问：“百花洲花盛开否？盍往观之。”余曰：“无他物，惟有二三十粪艘，鳞次绮错，氤氛数里而已矣。”进之大笑而别。

百花洲徒有其名，成了粪船集散地，臭气飘扬好几里，中郎却照样写成游记，真是妙不可言。此文说的江进之，名江盈科，任长洲知县，也是一位与中郎有相同情趣的名士。

做了两年的县官，中郎深深地感到厌倦了。苏州自然是个好地方：有画船箫鼓、歌童舞女，但这是为豪客享受的，与知县无关。有奇花异草、危石孤巖，但这是备幽人观赏的，与知县无关。有酒坛诗社、名胜古迹，但这是为游客享乐的，与知县无关。知县面对的，是鹑衣百结的粮长，是簧口利舌的刁民，是虬蚤满身的囚徒。这样的知县，像中郎自己所说“长日折脑俯首，去所好而从所恶”，他不愿再做下去了。恰好公安来了家报，从小抚养他的继祖母詹氏病危，他便趁此呈请解职，接连上了七次禀牒，方才得到批准。无官一身轻，他充满喜悦的心情，把这消息一一告诉朋友们。他形容自己解除官职，“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世上有些人嘴上不愿做官，心里却热中得很，这种人古往今来不计其数。但中郎的实际行动，证明他是心口如一的。

四 辞官漫游

辞去了吴县知县官职的袁中郎，偕同他的好友陶望龄，开始了吴越的漫游。中郎感到自由极了，开心极了。每到一处山水，他就狂呼乱叫，表示他的高兴。他们先游览了美丽的西湖。游六桥的时候，他们躺在桃树下，桃花落下来，遮在他们脸上，谁受的落花多就浮一大白，受花少的就唱一支歌。一会儿，有一只小艇从湖面过来，是寺里的和尚送茶来了。于是各饮一杯，登舟唱歌而返。接着他们游览绍兴，来到城外的西施山。陶望龄赋一首诗，诗中有句是“宿几夜娇歌艳舞之山”。中郎对他说：“这诗应当注明，指的是山，不然要牵累你归天后得不到‘文恪公’的谥号了。”陶望龄一面笑，一面说：“你这人，做过馆娃宫的主人，整天鞭扑吆喝，唐突西子，还有什么面孔来浣溪道上行走？”中郎说：“不妨事，浣溪道上目今只有东施娘子，不怕了。”他们一路游览，一路说笑，游遍了西湖和天目山的胜地，观看了五泄的瀑布，登上黄山、齐云，饱览了风光岚岚，心闲意逸，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中郎这次漫游，有一意外收获，就是发现了奇人徐文长。从此，他成了徐文长的热情宣传者、鼓吹者，使徐文长的名声和著作大噪于时。

中郎的发现徐文长，是偶然的事情。游罢天目等山归来，中郎住在陶望龄家的楼上。一天晚上，他随意从书架抽本书看，见是一册粗纸抄写的诗稿，名《阙编》。他凑着灯光翻阅，忽然惊跳起来，叫着陶望龄，拉他问道：

“快说！这《阙编》的作者是谁？是今人，还是古人？”

陶望龄被中郎的模样也吓了一跳，道：

“这是我们绍兴徐文长先生写的书啊。”

这天夜里，两人又跳又叫，在灯影下读了叫，叫了读，把

书僮、仆人从睡梦中惊醒，以为主人和这位客人都疯了。

中郎叫道：

“我出生三十年，今天方才知海内还有位徐文长先生，相识太晚了！”

中郎为什么如此推崇徐文长呢？这是因为徐文长是明代文学革新的一位先驱者，中郎从他的作品中感觉到了推动文学革新前进的气息和呼喊，所以欣喜若狂。明代的文学革新目标，简单点说，就是反对因循模仿，主张表现个性。但是保守派、守旧派的文学主张恰好相反，而且统治文坛，笼罩当世，势力很大。革新派就是要打倒这股保守、守旧势力，建立清新的、活泼的和具有强烈个性的文学。徐文长正是一个极有个性的文学家。他从过军，做过谋士；好饮酒，好游览山水；患过疑妒症，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击杀自己的妻子，因而进监狱，判死刑，幸得解救方免死出狱。中郎称赞他“胸中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说他的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说他的散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说他的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说他的画，花鸟“皆超逸有致”。但是这样一个奇才、天才，长期埋没不闻，因为“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以上都是中郎在发现了徐文长的诗集《阙编》后，采访了有关他的生平事迹，所写《徐文长传》中说的话。这篇传，事实上也是一篇文学革新的宣传书。中郎借徐文长其人，宣传自己文学革新的主张。

中郎发现了徐文长，就像天文家发现了一颗新星那样兴奋，朋友们都知道他心目中的文坛作家只有徐文长一人。就在这一

年，中郎与陶望龄从绍兴来到杭州，住在朋友虞淳熙的家中。淳熙招待他们品尝新上市的杨梅。

中郎把杨梅揉碎，用笔蘸着赤红的鲜汁写字。淳熙故意问道：

“你看当世的文章，谁称得上第一呢？”

望龄斜睨着中郎，忍笑说：

“你想必必要告诉长孺（虞淳熙的字），只有徐文长称得上第一吧？”

中郎一本正经说：

“照你说，难道他只算第二吗？难道要让元美（王世贞的字，当时的文坛盟主，拟古派领袖）家的钝贼（笨蛋的意思）做第一吗？”

他这话一出口，惊动了躲在屏风后偷听的学生们，叽叽喳喳，传出了声音。中郎立即跳起来搜索，嘴里喊道：

“这里有元美家的贼党，快驱逐出去，叫他们僵死在中原白雪中！”

虞淳熙于是相信朋友们的传说不假，徐文长的囊中果真藏有一位袁宏道，尊奉徐文长居然像一个南面王了。经过中郎的评定，徐文长在文坛的崇高地位，终于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五 从教官到吏部主事

袁中郎是极不愿做官的，这，前面已讲过。但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除了做官，别无出路。经商、作工、种田，没有这个本事，也从来不想。中郎从吴县知县任内下来，不过三十岁，退居林下显得过早，父亲和兄长也不同意。因此漫游了

一年多，仍回北京去候选。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他被选任顺天府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这都是教官。又过了一年，他升任礼部主事。因为兄长伯修去世，中郎对政治又感到厌倦，坚决辞官，回故乡公安闲居。他在这里一住七年，享受了一些闲淡恬静的生活，不想再与官场结缘。但是他父亲的功名心，却比儿子的来得重，总希望在生之年看到儿子的飞黄腾达，要求儿子重返宦途。中郎不忍违背老父的期望，只得在万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的秋天，再次去经历一番做官的生涯。他在临行前给朋友苏潜夫写信道：

弟此一条懒筋真难拔，大人（指父亲）颇以为言。自思入仕十五年，丝毫无益于白发（指父亲），而又重其怒，真不成人也。夫弟岂以静退为高者哉？一亭一沼，讨些子便宜，是弟极不成才处。若谓弟以是为高，则弟之眼如双黑豆而已！

这里说明了他再次做官的苦衷。

他进京后，先做礼部主事，后转吏部主事。吏部是六部之首，专管官员的任免升降，权势很重。但实际权力操在办事员一一叫做“都吏”、“当该”一一的手里，袁中郎形容这些吏役“平日瞒天作弊，招权纳贿，无所不至”。

他亲眼看到吏部一个都吏名朱国梁的公然营私舞弊。一次，吏部将要公布选官名单，这个朱国梁忽然闯进来说：

“每次选官，我们都吏照规定可以求一两个名次。现在有某某两个缺，有应选驿丞刘邦太愿意给我们都吏一百两银子，求这个缺，请望答应了吧！”

中郎不理他，朱国梁大不高兴，退了出去。一会儿又回来，

说道：

“现有渔阳，不过值四十多两银子，这个缺可以赏给我们都吏了吧！”

中郎见他如此肆无忌惮，又惊又气，急忙命令他走开。等到选官抽签（这是明代委派地方官员的一种方法）的时候，这个朱国梁靠公案站着，故意与选人推推搡搡，一个转眼，那个出钱买缺的刘邦太，果然被他抽到了渔阳的缺分。明显是朱国梁做了手脚，但是又抓不着他的把柄。

中郎深深感到吏部的黑暗，决心除去这个朱国梁。他与同官商量。同事说是不是先上奏疏，批准后再抓他起来。

中郎说：“这种狡猾的胥吏，只有一面置之于法，一面上奏疏，这样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他即使有后台，也用不上了。”

于是照中郎的办法，写好奏疏上报皇帝，待朱国梁一进衙门，立刻叫两个差役押解他去刑部候审，对他说：

“去，去！送你进刑部，你活不了啦！”

朱国梁错愕不知所措，终于受到应得的惩罚。

中郎在吏部做了两年官，对于一些积弊和官吏的考核方法，做了点清除和改革的工作，当然也只是一点细微末节方面的兴革。封建官场几百年的陋习，像垂危的病人，奄奄一息，他是无能为力的。

这几年，他写了好多游记：湖南桃源诸山、北京近郊、华山、嵩山等等。这些游记，色泽鲜明，都是散文的上乘之作。

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中郎请归。回家不久，就发病去世了，年寿短促，在人间只停留了四十三个年头。

六 懂得生活情趣的作家

晚明作家的特点是要求表现个性，要求表达个人对生活的各种真实感受。作家的创作，原是艺术性的活动，它的基础就是生活，难道有不懂得生活情趣的作家？确实有不懂得生活情趣的作家，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干巴巴，他们的作品板着面孔、枯燥无味。他们不懂得大道理与小乐趣的关系：既要懂得大道理，也要懂得小乐趣，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生活。生活情趣有高低雅俗之分，人们赞赏的是高雅的生活情趣。在袁中郎之前，许多大作家都懂得生活情趣，也表现在作品里，但是他们不公开提倡生活情趣，怕“不登大雅之堂”。不如他们的人，就只知道说些门面话、违心话，不真实，离生活愈来愈远了。袁中郎首先出来公开提倡生活情趣。他自己不仅懂得生活情趣，而且懂得享受生活情趣。因此他的作品，充满生活情趣。

中郎有一封信，谈人生有五快活，那是写给他的舅舅龚仲庆的：

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泛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

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然可无愧，死可不朽矣。

这五快活，中郎不过说说罢了，人是不能尽有的。中郎自己顶多只能做到其中的第三快活，即聚知心友，读书著作吧。但他举出这五快活，表明他对生活的一种看法，也可说他对生活看得很透，希望由此而懂得生活中到处皆有情趣。你看他举出的第五快活，是在一个人享尽快活之后的悲惨下场，依靠乞讨度日，这是人生极不堪忍受的生活，他却仍能从中领会它的“快活”，这不是把生活看透了吗？

中郎有一篇文章，叫《识张幼于惠泉诗后》，很能说明他对生活情趣的态度。文章不长，又充满情趣，录之如下：

余友麻城丘长孺东游吴会，载惠山泉三十罇之团风（地名，在湖北黄冈）。长孺先归，命仆辈担回。仆辈恶其重也，随倾于江。至倒灌河（在湖北麻城），始取山泉水盈之。长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即邀城中诸好事尝水。诸好事如期皆来，团坐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磁瓯，盛少许，递相议，然后饮之，嗅玩经时，始细嚼咽下，喉中汨汨有声。乃相视而叹曰：“美哉水也，非长孺高兴，吾辈此生何缘得饮此水！”皆叹羨不置而去。半月后，诸仆相争，互发其私事。长孺大悲，逐其仆。诸好事之饮水者，闻之愧叹而已。

又余弟小修向亦东徇，载惠山、中泠泉（在江苏丹徒）各二尊归，以红笺书泉名记之。经月余抵家，笺字俱磨灭，余诘弟曰：“孰为惠山？孰为中泠？”弟不能辨，尝之亦复不能辨，相顾大笑。

然惠山实胜中冷，何况倒灌河水？自余吏吴来，尝水既多，已能辨之矣。

偶读幼于此册，因忆往事，不觉绝倒。此事政与东坡河阳美猪肉事相类，书之并博幼于一笑。

在生活中每有如此趣事，对号称名特产的东西，不问真假，一概称好；或者对不懂的事物，冒充风雅，点头播脑，妄加评论。丘坦（长孺的名）的朋友们，吃了假的惠泉水，还要细细嗅玩，慢慢吞咽，表示懂行，就是这类趣事之一。对这类事，若是连呼上当，大发脾气，那就无味了。若是一笑置之，或是相顾大笑，那就是懂得如何在生活中化气愤为欢笑，变苦恼为快乐了。所以前面曾说中郎是一个具幽默感的作家，就是因为他懂得并享受生活中的各种情趣。

据小修记述中郎的为人，“好山水，喜谈谑。不能酒，最爱人饮酒”。中郎爱山水，写下了近八十篇游记，他是古代的旅游家，他的游记是古代旅游文学的杰作。中郎自己不能吃酒，但却懂得吃酒的乐趣，所以喜欢看别人吃酒，而且对吃酒颇有研究。他写了一本很有趣的关于饮酒的小书，叫《觴政》。他说“余饮不能一蕉叶（指小酒杯），每闻闻声（温酒的水沸声），辄踊跃。遇酒客与留连，饮不竟夜不休”。中郎自己说，“袁中郎趣高而不饮酒”。这也说明他对生活中的乐事采取的是“趣高”的态度，而不是庸俗无聊的作乐。

小修又记载，中郎“意兴无日不畅适，未见其一刻皱眉蒿目、居柳浪（中郎在公安的住地）六年，睡或高歌而醒”。你看他多么会享受生活的乐趣，连睡梦中也会唱歌。古代作家中恐怕只有陶渊明和苏东坡可以同他相比，但是陶、苏不公开提倡

生活情趣，这方面中郎还要稍胜一筹。

小修记述又说，中郎“好修治小室，排当极有方略”。室内布置，也是一种艺术——生活的艺术之一。中郎对室内装饰没有留下著作，但他写了一本专谈插花艺术的小书《瓶史》，总结了他“以胆瓶贮花，随时插换”的经验。他举出配合赏花的十四条“快意”事：明窗，净几，古鼎，宋砚，松涛，溪声，主人好书能诗，门僧能烹茶，蓟州人送酒，座客工画花卉盛开，快心友临门，手抄艺花书，夜深闻鸣，萋萋校花故实。这些虽然都是封建士大夫闲适生活的反映，但不能不说它是人们生活乐趣的反映。任何人都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爱好从生活中寻求乐趣，当然首先必须懂得生活中原是存在各种乐趣的。按照中郎的意见，一个人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没有一点癖好，他的生活就太没有意味了。

中郎的散文作品，占了他留下的作品的约三分之二，其中以书信、游记、杂著为多。这些散文作品，文字清新活泼，思想敏捷锐利，充满生活的情趣，是古代散文宝库中的珍品。中郎本人，除了是诗人，同时也是散文大家，这也是人们所公认的。

一九九〇年

袁中道论

——为标点本《珂雪斋集》写的前言

—

这里，呈献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书——《珂雪斋集》，是明代公安“三袁”兄弟之一袁中道的全集，包括他的诗、文、杂著、游记、书札和日记。公安派“三袁”：大哥袁宗道，字伯修；二哥袁宏道，字中郎；袁中道是最小的弟弟，字小修。三袁兄弟的名字每易相混，原因是三人的名字里面各有“中”字或“中”字的谐音。大哥宗道与三弟中道几乎同音，二哥宏道则以其字中郎著称，又有一个“中”字。因此人们习惯用字称呼他们。

三袁兄弟中，小修享年最长，著作的数量也最多。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小修四十六岁，这一年，他经过二十多年的场屋之苦，好不容易考取了进士，使他喘过一口气，如他自说的“叨得一第，聊了世法”（《与愚庵》）；或换一个说法，“卑卑一第，聊了书债”（《寄王以明居士》）。这时他想到有必要清理一下自己积年所写的诗文，为自己的文集做一个总结了。他给朋友钱受之，也就是有名的钱牧斋，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弟前岁（指万历四十二年）一病几殆，故取近作寿之于梓，名为《珂雪斋集》。盖弟有斋名珂雪，取《观经》“观如来白毫相如珂雪”意也。近转觉其冗滥，不欲流通，正思取一生诗

文之精警者，合为一集。时方令人抄写，完后当寄一帙受之，为我序而传之可也。日记系另一书，目下亦未可出耳。诗文之道，昔之论气格者近于套，今之论性情者近于俚，想受之悟此久矣。……

这段话分解开来，含有几件事情：一、说明将文集取名《珂雪斋集》的由来。珂雪，谓玉与雪，以喻洁白。佛经所用，也是这个意思。小修信佛，所以他强调这个名调乃是取之于《观经》（即《佛说观无量寿经》简称）以珂雪形容如来佛相的一句话。二、看出小修对自己一生写了那么多的诗文，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估价，“近转觉其冗滥”，这是十分爱惜自己羽毛的话，因此打算选其“精警者，合为一集”，且已着手。这应该就是后来在新安郡学刻印的《珂雪斋集选》二十四卷，这是作者经过删汰而自定的。小修原来的诗文，远不止此数。这只要看他《答蔡观察元履》书所说“检少时诗文，先后几四十余卷”，即知倍于此数。三、这部《珂雪斋集选》，作者原来想请钱牧斋作序，“当寄一帙受之，为我序而传之”，但此事未曾实现，现在通行留存的这部诗文集只有作者自己写的序言。四、除诗文外，作者自述还有一部“日记”，但“系另一书，目下亦未可出耳”，其时尚未考虑刊行。按这部“日记”，即《游居柿录》，后来作为《珂雪斋外集》，也是在新安刻印的。五、在经历了明代中后期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学革新与守旧之争后，小修用两句话概括了公安派与复古派之间的争论，这就是信中说的“昔之论气格者近于套，今之论性情者近于俚”，复古派讲求气格，钻进了因袭模拟的死胡同；公安派主张发抒性情，但流于鄙俚浅俗。应当说，这算得上是持平之论。其时伯修、中郎早逝，公安派主将自然

非小修莫属，他能看到并直言本派之短，这正是小修通达高明之处。关于小修在这方面的一些见解与议论，下面还要专门谈及。

牧斋对小修这封信有无答覆，不得而知，即使有，也没有留存下来。但《列朝诗集小传》里的《袁中道传》，牧斋记下了他与小修的一段对话，却正好是与小修此信提出的几件事相呼应的：

余尝语小修：“子之诗文，有才多之患。若游览诸记，放笔芟薙，去其强半，便可追配古人。”小修曰：“善哉，子能之，我不能也。吾尝自患决河放溜，发挥有余，淘炼无功。子能为我芟薙，序而传之，无使有后世谁定吾文之感，不亦可乎？”小修之通怀乐善若此，而余逡巡未果，实自愧其言。

牧斋高才卓识，目光如炬，他的议论见解为同时人所钦服，所以小修要请他删定文稿，“序而传之”。但这两件事，牧斋都未能做到。值得注意的是，牧斋对小修作品的评论，说他的游记之类，有一半需要“放笔芟薙”，不必保留，未免要求过苛。牧斋这篇小传写于小修身后，他应该看到《珂雪斋集选》是已经小修自己删定的，不能要求他再“放笔芟薙”了。小修现存的游记，包括《游居柿录》（这其实也是一部排日作记的游记），是小修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这些作品大都写得色彩绚烂，文情并茂，引人入胜，足以传世。要说“才多之患”，牧斋自己也是不免的，看他的《初学集》、《有学集》，各都是一二百万字的巨著，长篇短章，巨细不遗，真要“放笔芟薙”，也不是不可有所删落的。恐不仅牧斋，别的名家文集亦莫不如此。比较下来，牧斋称小修“通怀乐善”，倒不是虚语。

二

小修的文学见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阐发公安派的文学观，这就是反对剽窃雷同，主张发抒性灵。他把中郎倡导的文学革新之功，比之于唐代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认为这乃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向。他说：

文章之道，本无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后。唐、宋于今，代有宗匠。降及弘、嘉之间，有缙绅先生（指前七子），倡言复古，用以救近代固陋繁芜之习，未为不可，而剿袭格套，遂成弊端。后有朝官（指后七子），递为标榜，不求意味，惟仿字句。执议甚狭，立论多矜。后生寡识，互相效尤。如人身怀重宝，有借观者，代之以块，黄茅白苇，遂遍天下。中郎力矫敝习，大格颓风。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谓八代以内，都无才人，但以辞多意寡，雷同已极，昌黎去肤存骨，荡然一洗，号谓功多。今之整刷，何以异此。（《解脱集序》）

小修觉得这样说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强调搜讨心灵的重要性，不怕奇，不怕变，甚至不怕缺陷，只要有自己的真面目，诗文的精光就出现了，就足以垂之不朽。请看他写的下述一段话：

自宋、元以来，诗文芜烂，鄙俚杂沓。本朝诸君子，出而矫之，文准秦汉，诗则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后也，剽窃雷同，如麇鼎伪觚，徒取形似，无关神骨。先生（指中郎）出而振之，

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而诗文之精光始出。……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即方圆黑白相反，纯疵错出，而皆各有所长，以垂之不朽。（《中郎先生全集序》）

小修认为，模仿是诗文的大敌，不唯复古派的古不能模仿，即是革新派的新也是不能模仿的。他要求世人服膺中郎，但“请胸中先拈却袁中郎三字，止作前人未出诗文，偶见于世”。因为中郎也不能学，“不得其源，而强学之，宜其不似也；要以众目自虚，众心自灵，不美不能强之爱，不爱不能强之传”（引语同前）。反模仿，即是主性灵。性灵因人而异，但离不开一个“慧”字，发挥到极致，便产生公安派所崇尚的趣：

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至于人，别有一种俊爽机颖之类，同耳目而异心灵，故随其口所出，手所挥，莫不洒洒然而成趣，其可宝为何如者！（《刘玄度集句诗序》）

趣是公安派标举的一种出之于自然的高级文学成就，中郎也一再提到趣，他说“诗以趣为主”（《西京稿序》）。又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叙陈正甫会心集》）小修所发挥的，就是中郎的理论。

但是，小修固然是公安派文学的倡导者与鼓吹者，却不一味为本派叫好，他对公安派的功绩与弊病，看得很为清楚。他的文学见解的第二个方面，便是能跳出本派之外，对公安派的功过作出客观的评价。首先，他认为“天下无不变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未流，有未流还有作始。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则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之”（《花雪赋引》）。变总是进步的，但至末流就停滞了，又得再变，这在公安派也不能例外。他说：

国初何（景明）、李（梦阳）变宋、元之习，渐近唐矣。隆、万七子辈亦效唐者也，然倡始者不效唐诸家，而效唐一、二家，若维若颀。外有狭不能收之景，内有鬱不能畅之情，迫胁情境，使遏抑不得出，而仅仅矜其馥率，以为必不可逾越。其后浸成格套，真可厌恶。后之有识者矫之，情无所不写，景无所不收，而又未免舍套而趋于俚矣。（《蔡不瑕诗序》）

小修在这篇文章中，还特别指出“今人好中郎之诗者，忘其疵；而疵中郎之诗者，掩其美。皆过矣”。中郎的弊病，除这里所说的俚，还有易。“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刊去套语，间入俚易”（《答须日华水部》）。所谓俚易，换句话说，即是“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而诗道又将病矣”（《阮集之诗序》）。这最后一句是已经见到公安末流的结论。在小修的心目中，“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淡成集序》），而公安派末流所能做到的，只是取中郎“少时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譬之百花开，而荆棘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乌焉三写，必至之弊耳”（《中郎先生全集序》）。这一批评是中肯的，而出之于作为

公安派领袖人物的小修，不妨说小修的自我批评精神还是很不错的吧。

第三个方面，小修不但批评了公安派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弊病，而且也批评了后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的弊病。在公安派趋向末流的时候，竟陵派崛起，标举深幽孤峭为宗旨，转移了当时文坛的趋向。这也是一种变，但由于走的是俚率僻涩的路，因而愈变愈下，求深而弥浅，求新而转陈，其弊又甚于公安派末流。这点小修在竟陵派盛行时已看到了，并且准备给以揭露抨击。牧斋记载他的话说：“小修又尝告余：‘杜之《秋兴》，白之《长恨歌》，元之《连昌宫词》，皆千古绝调，文章之元气也。楚人（指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何知，妄加评窜，吾与子当昌言击排，点出手眼，无令后生堕彼云雾。’盖小修兄弟间师承议论如此。”牧斋接着对于后来世人把公安派降与竟陵派等同看待，一律排斥，表示不能同意。他说：“而今之持论者，夷公安于竟陵，等而排之，不亦过乎！”（《列朝诗集小传·袁中道传》）他的立论的根据，即是小修对竟陵派的严厉批评，虽然小修没有来得及将他这些意见写成文章。

从以上三方面的议论来看，小修可称一个有眼光、有见地的文学家。只是过去他的文名为其兄中郎所掩，受人重视不够。其实他是可以与中郎相颉颃的，至少文学见解方面不弱于中郎。

三

要瞭解小修的文学思想与文学成就，必须先瞭解他所受当世的影响。他生平最服膺的两位人物，给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乃是其兄中郎及他们兄弟奉之为师的大思想家李卓吾。小修是

这样推尊他们二人的：“本朝数百年来出两异人，识力胆力，迥超世外，龙湖、中郎非欤！然龙湖之后，不能复有龙湖，亦不可复有龙湖也。中郎之后，不能复有中郎，亦不可复有中郎也。”（《答须水部日华》）中郎对小修的影响自不用多说，李卓吾则是他的思想启蒙老师。他有一段与李卓吾对话的记载：

昔晤龙湖老人于通州，予问当如何作工夫。龙湖曰：“参话头。”予曰：“某子甲半生参话头，而了无消息者，何也？”龙湖曰：“不解起疑也。夫疑为学道者之宝，疑大则悟亦大。予近来尚有余疑，可惜不遇大作家，痛与针劄一番耳。”（《书月公册》）

李卓吾拈出一个“疑”字，作为启导，下面小修便谈了自己的体会：“予心佩其言，见世之学者终日恬然，其稍敏捷者，随口领略，自谓已得。始知老子（指卓吾）所谓不解起疑者，真可见也。古人云：薄福之人，不生于疑。又云：不疑言句，是谓大病。今看古人因缘，其穿凿者无论矣，稍有所见，浅者作逗塞情识会，深者作探竿影草会，作仙人手中扇会，远之远矣。”他的结论是：“疑者参之宝也，理者参之仇也。所悟在理，必不得力，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耳。”疑便是对一切传统的观念与说教表示怀疑，进而作出独立的探索与独自的判断。这种怀疑、探索与判断的精神，正是这个时代反传统的新兴思潮的精神，成为公安派反对复古派的思想理论支柱。要知道，李卓吾不仅是公安三袁兄弟思想上的前驱，同时也是文学上的前驱。小修写的《李温陵传》，是《珂雪斋集》中的杰作之一，其中有写到卓吾文学的地方：

……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擘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

这里可见，卓吾读书评论，作诗作文，都是一空依傍，独抒己见。公安派所奉行的，也就是这一宗旨，不过更有发展，如提倡“性灵”即是。小修在兄弟中受之于卓吾的，恐更要多一些。他在卓吾歿后写给梅国桢的信中说：“自觉心疏胆薄，终亦无益于世。悔往者亲遇至人，不能细心窥其机用之妙，用世出世，都成当面蹉过，良可叹也！”（《与梅衡湘》）其中所谓“至人”，指的就是卓吾。他虽说未能细心领悟卓吾的用世出世机用之妙，其实他说这话，已经是领悟到卓吾思想行为的真谛了，否则他就说不出这样的话。当然，领悟是一回事，实行又是另一回事。小修立身处境条件不同，有自己的思想行为准则，不能要求他做卓吾同样的事。

小修早年的诗，大抵冲口而发，以平易率直为主，因此竟境造句都颇浅近，而少含蕴。这点小修很有自知之明，他自谓“大都输写之致有余，锻炼之功不足，都无言外之意，而姑吐其意中之所欲言”（《答蔡观察元履》）。又说：“至于作诗，颇厌世人套语，极力变化，然其病多伤率易，全无含蓄。盖天下事未有不贵蕴藉者，词意一时俱尽，虽工不贵也。”（《寄曹大参尊生》）质直浅露而少锻炼含蓄，这原是公安派的通病，中郎尚能以才情救之，小修才情不及中郎，自然又得下中郎一等。中郎对小修的诗，曾有一段评论：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叙小修诗》）

这段话写于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小修是年二十六岁。中郎出于对“粉饰蹈袭”的痛恨，出语每易偏激，因此对小修的“疵”——“劲直而多忤，峭急而多露”，也持赞赏的态度。他在同一文中又说：“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直而多忤，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

但是，中郎的主张，弊病很多，只可奏效于一时，难以行之于久远，小修也未能信从到底。中年以后，小修的诗风就开始转变了，有意识地转向了幽深奇崛。写于万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的一首《雨变诗》，就是小修诗风转向奇崛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年他三十七岁。这是首长诗，可节录一段：

长安风俗近好奇，不爱尘土爱涟漪。但喜宅中多贮水，那闻床下便穿池。使君蹑屐趋衾榻，小妇登床送酒卮。酒后耳热仰天卧，屋漏直滴口边髭。浮床忽如青雀舫，谓是蔡姬荡耶非。未闻满朝拂衣去，胡为家家水上载西施。莫是尽学东平籍，坏壁颓墙任阒窥。釜中闻 喁，灶下听鼓吹。郗成分宅今多见，楼缓同餐馆更稀。昨闻张京兆，置妻八尺梯。自上梯边为画远

山眉。又见待诏金门狂李白，长安市上醉淋漓。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今为水师。烟波钓徒张志和，不复泛家浮宅雪 间，只来铜驼陌上坐钓矶。谢安不造浮海装，海道近日在金闺。天子有道公卿贤，胡为乘槎学宣尼。或云天子怒，公卿罚作陞楯郎，皆令立雨中，不及侏儒有休时。又云岁星精是小儿，上帝付与三天司命咨，却来银浦恣游嬉。雕云屑雷，檄龙命鸦，引水作花溪。致令天河水奔溃，茫茫陆地走蛟螭。……

这种诗体，在公安派诸作家中是罕见的。事实上，岂止小修有变，就是中郎，也不是一成不变。小修曾指出，中郎秦中之游后，“所著游记及诗，浑厚蕴藉，极一唱三叹之致，较前诸作，又一格矣”（《中郎先生行状》）。又说中郎“学以年变，笔随岁老，故自《破砚》以后，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中郎先生全集序》）。这都说明小修、中郎随着年岁的增长，学识的积累，阅历的丰富，已不满足于早期的游戏俳谐、率易浅露之作了。其中，小修转变的自觉性，表现更为明显。

小修的散文，其成就实胜于诗。文中有几篇传记，如《梅大中丞传》、《李温陵传》、《江进之传》、《赵大司马传略》等，生动叙述人物的声音笑貌，并忠实反映社会现实，皆是有分量的作品。游记是小修的专长，他用的是画家重笔渲染的手法，山情水意，浓涂细抹，各尽其宜。中郎的书札是有名的，小修在这方面也不逊色。小修的书札，很有个性，但因功名不遇而发的牢骚话也不少，尽管文字如何尖新活泼，这些话说得多了，也会使读者生厌。

四

小修生于隆庆四年(一五七〇),卒于天启三年(一六二三),终年五十四岁。伯修寿四十一岁,中郎寿四十三岁。袁氏三兄弟,小修的年寿最长了。但两位兄长功名早达,伯修二十七岁举会试第一,中郎二十五岁登进士第。小修则迟至四十六岁对科第已几濒绝望时,方考取进士。所以中年以后,他诗文中的失意自伤情绪是相当浓厚的。

中郎曾经这样描写他这位弟弟: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叙小修诗》)

小修这人,少年时以豪侠自命,走马击剑,呼卢喝雉,常聚众痛饮达旦。中年后嗜酒纵欲,事后又不断后悔,经常自责。《答钱受之》书说:“自念生平,无一事不被酒误。学道无成,读书不多,名行不立,皆此物为之祟也。甚者,乘兴大饮后,兼之纵欲,因而发病,几不保躯命。”这类自怨自艾的话,在《游居柿录》中也多处写到。伯修、中郎的早逝,从病情看,与酒色也是有关的。他们虽然不像小修那样嗜酒如命,但各有姬侍数人,不自检束,因而致病不起。小修得年稍长,也不过中寿罢了。

五

小修的诗文，刊刻行世，最早是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在吴县为他所刻的诗集。见《叙小修诗》所云：“弟小修诗，散逸者多矣，存者仅此耳。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这本诗集，未知卷数，今已不传。随后，他的诗文都由自刻，大抵是随得随刻。如说：“新刻诗二卷，附寄览。此集共十余卷，今尚在校刻。承兄见教，弟已不多把笔，然前此诸作，尚是敝屣遗簪，不忍弃去，不得已典衣市宅，寿之于梓。虽著中颇有发千古所未发者，六月中可毕功，当附便羽寄入京华也。此外又有《素史》二册，极可观。”（《答王章甫》）又如：“拙诗一册，旧刻二种请教。”（《答董思白太史》）像这种寄呈已刻诗文求教的话，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是屡见的。小修现存的诗文，包括《珂雪斋前集》、《珂雪斋近集》、《珂雪斋集选》以及《游居柿录》，都是他在世时即已刻印传世的。现合为一集，总名《珂雪斋集》。

附带一说，《珂雪斋近集》后附有袁祈年诗二卷，祈年是小修之子，出继伯修。关于其人其诗，牧斋亦有记载评论：“小修子祈年，字未央，余改字曰田祖。出为后于伯修，举乡书。诗笔有家风。秀而不实，余深痛之！”（《列朝诗集小传·袁中道传》）祈年早夭，所以牧斋“深痛之”。祈年的诗“有家风”，但显然是不能同他的父辈相比拟了，有的流于轻佻浮薄，已不能免于公安末流之讥。但作为研究公安派文学流变的一种资料，还是可以一看的，所以仍附印在这部《珂雪斋集》的后面。

一九八五年

身留异域，神归中土

——为《俄藏敦煌文献》写的序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既发愿搜辑编印宇内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光遍及全球。首先受到注意的，则为原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之藏品（以下简称“俄藏”）。这是因为俄藏虽为当今敦煌文献四大藏家之一（其他三家为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及中国北京），藏品近二万号，其藏品情况自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以来，陆续有所透露，但一鳞半爪，无从窥其全豹，绝大部分藏品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一九六二年王重民教授编著《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问世。荟萃世间敦煌藏品，一一为之列目，号称繁博，但俄藏之品目尚只能付之阙如。直至一九六三年及一九六七年，孟列夫教授先后主持编纂出版原苏联亚洲博物馆（即东方研究所之前身）《苏联亚洲博物馆馆藏敦煌文献叙录》二册，列目至二千九百余号，俄藏面目始大略为人所悉，但亦仅及俄藏总数之六分之一；且仅有叙录，未睹真迹，终为敦煌学之一大遗憾。八十年代，台湾黄永武博士主编之《敦煌宝藏》有意网罗海内外公私藏品，集印成帙；然于俄藏，亦仅据间接所得辑印若干，徒兴“欲觐无从”之叹（见该书自序）。于此可见，俄藏为世人企望之殷，想见之切，有非言辞所可形容者。

正当我们通过多种途径探寻俄藏踪迹之际，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教授为我们介绍认识了正在上海访问的原苏联

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总编辑德列尔教授与列宁格勒东方研究分所研究员孟列夫教授，德列尔教授与列宁格勒东方研究分所有着密切的业务合作关系（德列尔教授已在一九九二年三月退休，目前已由基谢廖夫继续德列尔教授的工作，相信中俄关于敦煌文献出版各方之间的合作会有更大发展），而孟列夫教授正是《苏联亚洲博物馆馆藏敦煌文献叙录》的主编，迄今仍在从事及主持俄藏的整理编目和研究工作。他们闻悉我们的计划后，欣然表示赞同，愿为促成此项宏伟的出版工程，予以协助。在他们的努力下，几经函电往返商讨，于一九八九年八月，应德列尔总编辑和列宁格勒东方研究分所彼得罗相所长的邀请，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组团访问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访问团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接待，但我们访问的重点则在列宁格勒美丽的涅瓦河畔的东方研究分所。承彼得罗相所长和孟列夫教授的妥善安排，在那里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阅览了俄藏敦煌收集品，从完整的卷帙到零缣残片，从已编号著录的到尚待整理归号的藏品，几乎全部过目，如入宝山，目不暇接，欢喜赞叹，不可言说。

过去，学界传言，俄藏敦煌文献搜集既晚，碎片又多，未必精彩。至此我们才知道，这批文献内涵极为丰富：有为历代大藏经所未收的佛教佚籍，有可与英伦藏品联缀合璧的著名变文，有《诗经》、《礼记》、《左传》、《论语》、《老子》、《庄子》、《史记》、《唐律》、《切韵》等传统四部典籍古写本，还有数百件官私社会文书。而如王梵志诗，署唐大历六年（771）五月纪年，是同类写本中抄写年代最早的；《文选》的抄写年代可定为初唐，注文出六臣之外。凡此等等，均可称惊世秘籍。

此外，我们还同时观览了馆藏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书，包

括汉文与西夏文的，其数量之多，卷帙之齐，品位之高，亦是稀世之宝。西夏的木刻版汉籍，亦有相当多种。

历史告诉我们，在七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俄罗斯学者阿历克谢耶夫、弗鲁格、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等，为敦煌文献的整理、修复、编目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孟列尔教授对敦煌文学的研究，丘古耶夫斯基教授对敦煌经济文书的研究，尤为国际敦煌学者所称许。但是由于俄藏敦煌文献卷帙浩繁，内容纷沓，情况复杂，如欲待考证清楚、分类齐备后再依照完整的分类体系编印出版，必将旷日持久，造成一二代敦煌学者不能亲睹俄藏文献真面目的遗憾。因此如何加快速度，将俄藏敦煌文献尽快完整地编印出版，已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和出版界的迫切愿望。

在中俄学者取得共识以后，经过坦诚的会谈，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原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及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达成了合作编辑出版全部俄藏敦煌文献的协议。随后于一九九〇年十月和一九九二年二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派出两个工作小组至东方研究所，会同分所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摄影、研究和著录工作。

中俄双方学者在阅卷、编辑和研究过程中，对于文献的缀合、定名及其内容价值，又有不少新的认识和补正，为提高俄藏敦煌文献的学术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次编辑出版中，正文图版一依原收藏编号为序，图版说明文字亦尽可能简洁明确。全书之后，则编制叙录和分类目录，以利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当然，创业维艰，宏图待展。现在，作为《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主体部分之一的《俄藏敦煌文献》，将陆续分册精印出

版。至此沉霾近一个世纪的俄藏敦煌文献的珍品，虽身留异域，而神归中土，终将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以奕奕焕发的容光，化千百身，展现在世人眼前，为世人所共有共享。谨此为序，以当祝愿。

一九九二年

爱国诗话

爱国诗人林则徐

林则徐是民族英雄、禁烟功臣，一生为国事奔忙，以从政之暇写诗，没有想做诗人。但他早年做京官的时候，已同龚自珍、魏源等进步爱国人士，结成宣南诗社，做诗唱和；并有诗记载他们当日相互唱酬情况：“千秋人海几升沉，如此朋簪良不恶”，“偶喜追陪饫文字，敢擅风骚附述作”（《题潘功甫舍人宣南诗社图卷》）。后来即使在奉旨查办广东禁烟事件，与英帝国主义兵船接触开火，又要办外交，又要筹军务，他的诗兴还是很浓，不忘吟咏。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中秋那天晚上，他同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同登沙角炮台，名为饮酒赏月，实是参议抗敌机谋，写了一首长诗歌咏此事，洋溢着他满怀爱国热情的战斗决心。诗中有几句写道：

是时战舰多貔貅，相随大树驱蚍蜉（喻敌舰）。炮声裂山杂鼓角，樯影蘸水扬旌旒。楼船将军肃钤律（指关天培），云台主帅精运筹（指邓廷桢）。大宣皇威震四裔，彼伏其罪吾乃柔。军中欢宴岂儿戏，此际正复参机谋。莫疑秋暑酷于夏，晚凉会有风飏飏。蛮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这四句表示胜利信心）

再看他这天写的日记：

午后，制军（邓廷桢）来，即同舟赴沙角，在关提军舟中查点日来调集兵勇各船册籍，计前后排列兵船火船共八十余只；并携酒肴邀关提军、黄镇军同赴沙角炮台上小饮，月出后同登山顶望楼上，玩赏片时，仍与制军乘潮而返。是夜见义律（英国领事）覆澳门同知信，乞诚尤切。

这是大战即将爆发前夕，他的军政事务那么繁忙，对手又是凶残狡猾的英帝国主义分子，需要全力应付，他仍能以“余事为诗”（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足见他气度从容，才情横溢，是一位杰出的诗人。由于他的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昂扬的斗志，发而为诗，因此又是名实相副的爱国诗人。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五月，昏愤无能的清政府面对帝国主义的坚甲利炮，畏缩退让，在投降派的操纵下，先是将林则徐革职，接着又遣戍伊犁。他在遣戍途中所写的诗，几乎每首都流露了对英国侵略者的愤恨和对国事的忧虑。如：“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河干呈别蒲城相国》）“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次韵答姚春木》）“闻道狼贪今渐戢，须防蚕食念犹纷”（《次韵奉谕程方伯》）“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次韵答陈子茂德培》）这些诗感慨沉郁，悲壮苍凉，有很强烈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写这些诗的心情，可从他在遣戍途中写给友人姚春木和王冬寿的信中窥知：“自念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唯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逐，安能委诸不闻不见？润州失后（指英帝国主义侵占镇江），未得续耗，不知近日又复何似？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但是他不怕洋人，信中说：“徐（自称）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怕与不

怕是他同投降派的根本区别。这种坚强不屈的信念，贯穿在他的许多诗篇中。

自西安登程赴伊犁，他与家人告别，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很有意思的：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前四句还是他一贯的对待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态度，就是“自念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有一种说法，认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两句诗，是委婉地表现了无罪遭遣的不平；但是从林则徐的光明正直、忠君爱国的思想品质来看，这两句诗还是应从正面理解为是。我倒觉得，就其表现的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气概而言，直可与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两句诗相比。这首诗的后四句则带有自嘲的意味，“试吟断送老头皮”用的是宋朝杨朴的典故，见于苏轼《志林》：“宋真宗闻隐者杨朴能诗，召对，问：‘此来有人作诗送卿否？’对曰：‘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着，放还山。”把自己比作捉到官里去的“老头皮”，正是显出严肃认真的林则徐，也还有着豁达幽默的一面。这使我们想起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在英雄失路、报国无门的环境中，也用这个典故写了一首《山花子》词，自称老头皮：“记得飘泉快活时，长年耽酒更吟诗。蓦地捉将来，断送老头皮！”一位是爱国词人，一位是爱国诗人，用同样的典故自嘲遭遇，可谓先

后辉映。

《驿马行》也是林则徐诗的名篇，骏马神骥受到剥削鞭笞，长年奔驰，就像人才受到压抑摧残，屈居下位。整篇犹如对现实不平的控诉：“吁嗟乎！官道天寒啮霜雪，昔日兰筋今日裂。临风也拟一悲嘶，生命不齐向谁说！”林则徐重视人才，他在《复邵蕙西书》中，特别论述人才的重要性：

夫为国首以人才为重，此扼要之谈也。然人之才地各异，亦因用之者为转移。有才而不用与无才同，用之而不使之尽其才与不用同。且当其未用之先，犹有所冀也，及用之而不能尽其才，或且以文法绳之，猜忌讪之，则其人之志困而不能自伸，而天下之有才者，闻之亦多自阻。自古劳臣忠士之不能竟其用者此也。

这是十分深刻痛切的话，击中了腐败的清王朝的要害，《驿马行》则是用艺术的比兴手法，使之形象化。

林则徐留下五百多首诗，编为《云左山房诗钞》。

前两年新出版一本《清诗精华录》，连反对戊戌变法的张之洞的诗也作为“精华”被选进了，但是一代爱国诗人林则徐的诗却一首不见。林则徐无意做诗人，也不需要谁来封赠；就如不应忘记他的禁烟抗英功绩一样，但是我们后人是不应该忘记他的诗的。

江左少年夏完淳

柳亚子称明末民族烈士夏完淳为“江左少年”，完淳慷慨就

义，年才十七岁，自是少年。郭沫若则将夏柳同称“江左奇才”。柳亚子也是早熟的天才，少年时即以救国为己任，故对夏完淳倾倒备至。他年未十八，就写有《题夏内史集》一诗：“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我亦年华垂二九，头颅如许负英雄。”意气奋发，不可一世。抗日战争，上海沦为孤岛。有一段时期，上海文化界与大后方文化界遥相呼应，兴起了一股“南明史热”。这中间，柳亚子、阿英、郭沫若等人都是主要角色。柳亚子在《宇宙风》、《人间世》等刊物，连续发表多篇论述南明史的长篇文章；阿英以“魏如晦”的笔名写了好几个以南明历史为主题的话剧剧本，演出时引起轰动；郭沫若则在陪都重庆写了以夏完淳为主角的剧本《南冠草》，演出时也在山城盛极一时。他们都是借南明故事讽喻现实，用南明小朝廷的庸懦无能影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激励人们对侵略者的痛恨。

在明末的爱国烈士、爱国诗人中，夏完淳无疑是旷古的奇才。五岁通《五经》，九岁善诗赋古文，有“神童”之目。十五从军，十七殉国。这么壮丽的一生，却如此短促一闪而过。犹如一颗灿烂的明星，在茫茫黑夜，划破长空，遽然殒落，令人之为仰望感动，不能自己。屈大均与完淳同时，他赞美完淳：“天地之所赖以长存，日月之所赖以不坠，江河之所赖以无穷，乃在一成童之力！”这评价够高了，但在完淳，我看是当之无愧的。完淳的一生，体现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正气。中华民族之所以长存不坠，以至无穷，诸多仁人志士的这身正气，难道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吗？

完淳的诗歌，贯彻着抗清复国的主旨，如热血之沸腾，如火山之喷发。他面对面与敌人作殊死斗争，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例如他的《鱼服》一诗：

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励志鸡鸣思击楫，惊心鱼服愧同舟。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

这是完淳在参加兵部主事吴易的抗清军中所作，首句以班超喻吴易。励志一联，鸡鸣与鱼服对举，鸡鸣用的是《诗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典，喻神州如长夜之难明；鱼服用的是白龙鱼服的故事，喻抗清志士之变服潜行，发动义军起事，诗也以此为题。击楫与同舟，指的应是同一件事，击楫中流，表示恢复故国的决心；同舟指参加义军的同志，“愧同舟”是自谦之词，也是自勉之词。结句“缟素秦庭矢报仇”，直用申包胥哭秦庭故事，毫不隐瞒地向世人宣告战斗到底的志向。“矢报仇”，这是不妥协、不屈服、不投降的坚定不移的檄文。全篇悲壮沉痛，大义凛然，用典贴切，气势昂扬，是历代爱国诗篇中的力作。

据同时代人记载，完淳“有韵之文，自谓无敌”，足见完淳对自己的诗甚为自负。“有韵之文”也包括赋，完淳的《大哀赋》曾被誉具有史诗意义，俯仰一代兴亡，壮怀激烈，哀国之痛溢于言辞。时人比之庾信《哀江南赋》，但近人则有以为高过庾赋者，“一代文章缘气节，江关羞杀庾兰成”，信然！

顾亭林咏精卫诗

前年以九十一岁高龄去世的王遽常先生，其道德、文章、书法为世所称。《顾亭林诗集汇注》是他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

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大量史料为依据，逐篇笺释背景本事，着重阐发了亭林诗歌所包容的抗清复明爱国思想，可作为一部可歌可泣的晚明兴亡史读。《汇注》还特别指出，亭林标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遗响所及，在近代历史上，不仅震荡了辛亥革命，而且激励了抗日战争，即在将来，也必会有深远的影响”。这是很精辟的见解。

亭林的爱国诗篇，大都有为而作，激昂慷慨，悲壮苍凉，读之令人奋起。他有一首咏精卫的诗，题目就叫《精卫》，虽然借寓言以寄托，我却以为最能表达亭林一生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操。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精卫是古代传说中的小鸟，传说它是炎帝的少女女娃游东海溺死所变，常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这么微小的力量，海是永远填不平的，但精卫不停地填下去。精卫填海与愚公移山同是寓言，十分相像，同是体现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亦为之。前者还容易做到，后者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亭林这首诗以精卫自况，诗中用“我愿”、“我心”，充分说明这点。第二句的“尔”字，虽指精卫，其实也说的是自己。这首诗就是借精卫之名，一方面吐露自己热爱故国、为复国斗争不懈努力的心情，另一方面则是提倡知其不可为亦为之的精卫精神，精神所注，暂时虽然失败，但最终必将成功。

亭林自三十二岁至四十九岁期间，曾三次参加抗清义军，均告失败；两次拟南行投奔南明永历王朝，以图北伐，亦因道路梗阻，未能成行。他的一腔爱国热忱，于是只能转为北游的壮举，五年之中，往来二三万里，一年中半宿旅店，所到之处，实地调查研究，考察地理形势、民情风俗，目的也就是等待时机，图谋恢复。他的复国壮志难酬，爱国雄心长在，这首《精卫》诗当即写于这个时候。

诗一上来就说“万事有不平”，这自然指的是国事颠簸，恢复希望渺茫；所以接着设一疑问：“尔何空自苦？”想来当时有许多“识时务”的人，见到明朝气数已尽，大势已去，不愿再做徒劳无功的活动；自己不做，还要讥嘲亭林这批爱国志士的作为，说他们何苦空忙一阵。因此，自“长将一寸心”至“我心无绝时”四句，既是亭林的回答，也是亭林表示爱国决心的誓言，真是铿锵有力，字字掷地可作金石声。末二句则带有谴责意味，对那些纷纷投靠新朝猎取一官半职的人士，投去轻蔑的一瞥。这些人，大概当初也曾信誓旦旦，决不做背叛故国故君的事，但是一旦大局已定，复国无望，也就置气节于不顾了，所谓“一队夷齐下首阳”，就是当时一些士大夫的写照。

爱国离不开气节。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首先坚持的是气节。作为诗人，顾亭林继承发扬的正是这一传统。《精卫》诗即是以气节自励的诗，同时贯注了他的爱国的精诚之情。

郁达夫的爱国诗

郁达夫是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也是出色的诗人。他的诗，是他思想感情的真实反映，出之以哀婉的情思，常予人一

种凄迷朦胧之美的感觉。他的一组《毁家诗纪》，共诗十九首、词一首，脍炙人口，陆续写成于一九三六年春至一九三八年冬，主要记述他的家庭婚变和个人行踪，哀感悱恻，情溢于词。每首皆缀有本事，不须后人之为再作郑笺。最后一首《贺新郎》词，上阕末说“姑忍辱，毋多事”；下阕末说“先逐寇，再驱雉”。自注：“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为我们的民族复仇！”在写这组组诗之前，他曾有诗说：“国破家亡此一时，侧身天地我何之？”还处在彷徨的境地。在写完这组诗后，他不再纠缠于儿女情怨，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虽远走海外，其志始终不懈。他的诗风也随之一变，多以国事为重，虽然不作慷慨激昂的呼号，也少豪言壮语，但爱国忧民之情是跃然如见的。

郁达夫于一九三八年末到新加坡，是应《星洲日报》的邀请，担任副刊主编。他初抵星洲，便有诗道：“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圻在星洲。”这是表明坚决抗日、矢志报国的决心。他在海外四年，现存诗约一百多首，基本上可称之为爱国诗。其中最可见其爱国忧民之情之志的，当推一九四一年六月应冯玉祥六十寿辰之求而写的祝寿诗，诗题是《冯焕章先生今年六十，万里来书乞诗为寿，戏效先生诗体》。诗云：

马二先生真好汉，能屈能伸能苦干。
昔从西北练精兵，今到中央弄笔杆。
莫嗤丘八变诗人，杜甫伤时涕泪新。
萁豆相煎何太急，英雄虽老岂轮困。
抗战今年将胜利，加强团结全民意。

同室操戈大不该，先生呼吁声声泪。
六十年间教训多，从头收拾旧山河。
预期直捣黄龙日，再诵南山祝寿歌。

冯玉祥当时在重庆，他是带惯兵的人，曾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还与蒋介石拜过把子，义结金兰，但蒋实际很忌他，只给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空头名义。除了偶尔去前方慰问劳军，就是赋闲在家写他的自传《我的生活》，还写一些白话诗，自称“丘八体”，所以郁达夫说“莫嗤丘八变诗人”，隐含英雄末路之叹。既是“戏效”其体，所以这首诗明白如话，用典也很普通，与郁诗一向的凄转迷离风格又自不同。这首诗细加辨析，可以看出内含三层意思：一是对冯玉祥的赞颂，二是对国共加强团结抗日的呼吁，三是对抗日战争必胜的希望与信心。

先说对冯的赞颂。这是寿诗，当然要说说些赞美的话，但诗中不提他过去的勋绩与威风，只说他“能屈能伸能苦干”，“今到中央弄笔杆”，“杜甫伤时涕泪新”，写出冯的处境之不得意。这也反衬出蒋介石对冯的不信任，不肯委以军政实权，更不肯让他带兵，英雄报国无门，只能在大后方做个“丘八诗人”。

次说对团结的呼吁。诗中用“萁豆相煎”、“同室操戈”，这是指当年一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惨案。这次事件，中外震惊，举国同愤。诗中称赞冯玉祥“将军虽老岂轮囷”，“轮囷”义谓屈曲，是说冯不屈从国民党政权对此事件处理之专横与事后的诡辩，主持正义，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又说“先生呼吁声声泪”，是说冯为这次事件慷慨陈辞，奔走呼号，要求停止内战，共同对敌，从这里也反映了郁达夫本人的立场态度，“何太急”、“大不该”明显是对国民党政权的谴责。

最后说抗战必胜。这点在我们今天看，似乎理所当然；但在当时，特别是抗战尚处于艰苦相持、前途未卜的阶段，悲观论、投降论始终起伏不断，甚嚣尘上，因此如何鼓舞斗志、坚定士气也一直是不容懈怠的工作。这首诗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充满乐观情绪。“抗战今年将胜利”，这在一九四一年虽然说得早了点，却是大家的希望。又说“预期直捣黄龙日”，这也是抗战时人们常说的祝愿的话。值得注意的是“六十年间教训多，从头收拾旧山河”这两句，“教训”是什么？谁来“收拾旧山河”？我认为这说明达夫对国民党政权已完全失去信心，寄希望于一个新中国的出现。在达夫的心目中应是意味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从头收拾”。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达夫在当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就写道：“近因日帝国主义者强占满洲，一步不让，弄得中国上下，举国若狂。然预料此事必无好结果，因中央政府早已与日本帝国主义签有密约也。总之无产者的专政时期不到，帝国主义是无从打倒的。”同日又写道：“卖国政府当局诸人，实在应该被百姓来咬死。”这里“无产者专政”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卖国政府”指的是国民党政权，应是明白无疑的。他在新加坡的交游和患难之交叉大都是进步人士或中共党员。这些都可用来作为上面两句诗意蕴所在的注释。

一九九三年

谈张爱玲注译《海上花》

听说有这样一本书，却无缘得见。市上“张爱玲热”历久不衰，还出了“文集”，却不见此书踪影。出版商（包括某些文化人）“炒”港台书已到热昏程度，却漏过这一本也可成为“热销”的书（在台湾是多次重版的），不能不说眼光尚有不到之处。老友 W 兄自纽约归，在那边华文书店买到这本书，带回借给我，使我方有一读为快的机会。

重读《海上花》小说，不免有旧友重逢的感觉。初读这本小说，还在三十年代，星移斗换，如今只记得一个轮廓，内容情节全已淡忘。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全用“吴语”（即道地的苏州话，亦称苏白），流利生动，神态毕现。胡适说它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又说作者韩子云是“第一流的作家”。这已成为不移之论。张爱玲的注译本恰恰在小说早有“定评”的这个部分，大动了一番手术，将书中的吴语对话全部改译成了普通话。从注译本书前的“译者识”和书末的“译后记”可知，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让不解吴语的读者看得懂；二是为了使本书得以普及。译者把 1926 年胡适为亚东书局版汪原放标点本《海上花列传》写的序，放在注译本的首篇（含有“导读”的意思），自己的“译者识”则退居胡序之后，这说明译者是十分尊重胡氏的见解与观点的。但是胡适并不赞成改译，胡序举书中两段对话作例（现引其中一段，长的从略）：

“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

胡适把这段话，改成了“官话”（普通话）：

“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现在这样子坐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

胡适说：“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多多了。”他还进一步申述：“方言之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文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精神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我们不妨对照一下注译本对这段话的解释（见本书 576 页）：

“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这时候这样一块坐着说的话，你可记得？”

这同胡适批评的“神气减少多多”的“官话”翻译，除个别字句外完全一样，不是把“自然流露的活人”变成了“做作不自然的活人”了吗？我举出这一点，不是批评注译本的译文不好；除非不译，要译大概也只能如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海上花》的吴语部分是不可译的，也是译不好的。当然，因译者是名小说家，要求可高些，但过高即不切实际。我只想，看了胡适的意见，再看这个注译本，读者都会产生该不该译的疑问。译好还是不译好，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

张爱玲不明确表态，她不说胡适意见不对，只采取实际行

动也就是译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这需要有一股勇气，因为要同她所敬重的权威和以权威为代表的流俗意见直接对抗，她的聪明之处便是只做，不争论。为了使这本小说达到普及的目的，只有改掉书中的方言。胡适也承认“方言文学读者太少”。但是改译失去神韵，势难两全。尝试总是有缺陷的。我想我们不必担心，做小说研究的人或愿读原著的人，不会拿这个注译本作依据，来评价本书的价值和作者韩子云的地位；他们可以找原书来看，就像现在盛行古文今译，而古文原书照样存在并不妨碍阅读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注译本的译固然是本书的特色，也见出才女的勇气；注则更有特色，既具勇气，更具灵气。因为本书的注，事实上带有批点的意味。《海上花》的世界虽已消逝，但却是张爱玲所向往的和怀念的。她沉浸其中，她的批点自能独具慧眼，深入肌理。金圣叹批《水浒》，张爱玲批《海上花》，不一定能相比，也可说各有千秋。

不管是注是批，先要看一看批注者对书的总的看法。“译后记”中有两段文字，最能看出她的观点。

苏俄赞美狄更斯暴露英国产业革命时代的惨酷，那是典型的共产主义的观点。其实尽有比狄更斯写得更惨的，狄更斯的好处不在揭发当时社会的黑暗面。

这是反对从政治角度看待文艺，自然也适用本书。另一段是：

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

分别。书中这些嫖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并不是从前的男子更有情性，更是“习惯的动物”，不想换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与性同样必要——爱情。

可见全书的批注，既重情，也不避性。《海上花》是写性情的小说，我们历来讲性情，只指人性和人情，其实同时含有性欲之性与爱情之情。过去有意避开这方面的问题，爱情尚可一谈，性则绝口不提。这个批注本多少冲破了这个禁区，试举几例。

94页“随后小阿宝来请翠凤对过房间里去。……子富直等到翠凤归房安睡”条下注：

对过房间向作招待同时来的另一嫖客之用。小阿宝来请翠凤过去，显然是请去陪客，而且也是住夜的一——当时已经快天亮了。……子富与她定情之夕，竟耐心等待她从另一个男子的热被窝里来，在妓院虽是常事，但是由于长三堂子的家庭气氛，还是使人吃一惊的对照。

同页“子富醒来，见红日满窗，也不知翠凤那里去了；再要睡时，却睡不着”条下注：

明知对过房间有客，她不会不一早溜过去再渥一会，叫他怎么睡得着。

137页“陆秀宝一见朴斋，问道：‘你一早起来做什么’”条下注：

昨夜朴斋第二次请客，显然就是替秀宝开苞——书中作“开宝”——但是她借故呕气，大概整夜跟他“扭手扭脚的”（《红楼梦》中贾琏语），欺他没有经验，他根本无法行事。因此一大早赌气走了。

222 页“这时候让你去快活，等会打牌，顶多多输点”条下注：

性是晦气的。

356 页“阔毛”条下注：

北方妓院男仆俗称“捞毛”，想指阴毛，因为妓女接客后洗濯，由男仆出去倒掉脚盆水。

这些批注，都接触到性，又出自一位女性作家之手，可能会引起我们这里一些道学先生的非议或大惊小怪。但是我认为这里面没有丝毫的诲淫诲色，有的是一个冷静旁观者的态度。或许这种批注方式不大对我们的路，那是因为我们不习惯。

有的注，则可看出批注者的学养，如 323 页“你拿《里乘》《闽小纪》来看，那就‘快刀’‘霸产’包你都懂”条下注：

二书均见《笔记小说大观》。手边无书，疑是《里乘》（清人许叔平著）记菜市中斩犯头落地犹呼“好快刀！”《闽小纪》述一冤屈事，堪比孔子弟子颜回被诬霸产。“好快刀”事有几分

可信性，参看得普立兹奖新闻记者泰德·摩根著毛姆传。一九三五年名作家毛姆游法属圭安那，参观罪犯流放区——当地死刑仍用断头台——听见说有个医生曾经要求一个斩犯断头后眨三下眼睛；医生发誓说眨了两下。

这条注说明注者不想装做考据家，而实事求是，不讳言手边无书不查书了。按“快刀”一语出典其实见于《聊斋志异》卷二《快刀》，写一死囚被斩，头“豁然落，数步之外犹圆转而大赞曰：‘好快刀！’”张爱玲这条注的精雅处在于后段所引毛姆传。

本书版式，也可一述。小32开，小五号字，直排正文上下栏。这可节省纸张，降低定价。全书608页，共五十二万字，装成一册。由于纸张、油墨、装帧都属优质，故版面疏朗，字体清晰，无简陋寒酸之相。这对我们这里竞印简装普及本古旧小说逐利而不顾印制质量的某些书商来说，正可作一比较。

一九九五年

书趣文丛……⑤

第三辑

十年噩梦今似醒^①

小引

十年浩劫，一场噩梦，中国人今日算是醒悟过来了。但是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种人是真正醒了，痛感不能再让这类噩梦重现，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下决心，用大力，根绝其产生的原因；具有这种认识的人，是民主和法治的坚决拥护者和实践者，中国若想真正实现“四化”，主要靠这种人。另有一种人是似醒未醒，开头曾经醒过一阵子，觉得照过去老样子下去不行，他们从亲身遭难经历，知道那样岂仅自身难保，连老婆、儿女也将不免；但是后来官复原职，一般且多加官晋爵，比前更为安富尊荣，又觉得还是原来一套办法行之得心应手，于是又迷糊了；当然，迷糊还不等于入梦，等到有所行不通时，可能再次清醒过来。还有一种人则是根本未醒，凡三十年的不倒翁和十年中的既得利益者，或“四人帮”垮台后的失去利益者都属此类，他们等待时机，以图有朝一日风云突变，重温“好梦”。这三种人遍布各界，情况大同小异。这篇文章专谈上海出版界，大致也有这样三种人，情况并无例外。题目不用“今始醒”，而用“今似醒”，似者，或然之辞，读者当能领略其意。

说起出版，上海一向是全国文化、出版和印刷事业的中心。到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市出版局领导下的各专业出版社，计

① 这个题目原有副题“上海出版界文革劫难小记”，共写三篇，今录“小引”及第三篇《一代文人有厄》。

有：上海人民、上海文艺、上海文化、上海人民美术、上海少年儿童、上海科技卫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辞海编辑所、朵云轩、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等十家。这几个出版社，规模大小不等，但几乎网罗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的所有人员，其中许多且是知名之士，加上后来新参加的，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自“反胡风斗争”后，历次运动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上海各出版社被称为“藏龙卧虎”之地，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运动一来，自然首当其冲。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上海各出版社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就有近三百人之多，比例之高，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超过其他各界。这批“右派”（即相当于斯大林时代“人民公敌”的称号），从此打入“另册”，受尽凌辱折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出版界因过去向来是各次“运动”的重点，自然在劫难逃，知识分子受祸之烈，冤假错案之多而酷，真可谓血泪斑斑，几天几夜诉说不尽，足可写一本厚书而有余。古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里剪辑上海出版界十年噩梦中的几个镜头，不假虚饰，概从实录，如鲁迅所说“立此存照”，非求垂鉴于后世，庶几有望于来哲云尔。

一代文人有厄

《儒林外史》是一部专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洋相”的小说，但是在它那板着脸孔说笑话的讽刺外衣下，却隐藏着一个严肃的主题，这是为向来的读者和研究者所忽略了。这个主题概括在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回的“楔子”这段描写内：

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惊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原来《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作者吴敬梓，虽然把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描写形容得淋漓尽致，而且尽情地嘲笑、揶揄他们一通，但是他充分体会到这些处在专制高压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其命运是多么可笑可悲可怜，这些他全称之为“厄”。王冕看到天象“贯索犯文昌”，贯索是牢狱星，文昌是文星，文人碰着牢头禁子，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他发出了“一代文人有厄”的叹息。这才是《儒林外史》的真正主题。

说老实话，我看许多知识分子本来是不很可能瞭解这部小说的这个主题的，只有经过三十年的实际体会，结合他们自己的遭遇，又看到周围同类人的一系列遭遇，方才有可能逐步得到这个认识。特别是每当一个政治运动的开始和终了时，他们方有可能会想起《儒林外史》的这段描写，会感到不寒而栗；会钦佩吴敬梓真是了不起的预言家，他不仅看到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可笑和悲惨的命运，而且他的预言还一直应验到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不是完全适用于称之为“四人帮”的垮台前知识分子的境遇吗？

自然，吴敬梓对未来是寄予希望的，这就是王冕说的，“天可怜见，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可惜就是“我们是不

及见了”。今天的知识分子恐怕也有同感吧：经过三十年的折磨、凌辱以至摧残，岁月、精力消磨殆尽，这一代人是完了；但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出来“维持文运”，不要再重复上一代人的苦难，虽然“我们是不及见了”。

以上所谈，看似闲文，其实不然。这说明世上许多事物，必须亲身经历，方能领会它的真实意义。隔岸观火，虽然看到河那边起了火，但是火烧掉多少房屋器物，伤害多少人，必须亲自去现场看一看，方才知悉。同时他的感受，又肯定没有身罹其灾者的沉痛深刻。本篇前两节所谈虽都是上海出版界十年劫难，但只及于党员领导干部，即所谓“走资派”，人数还是不多的；这一节要谈普通群众了，他们才是人数众多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即所谓“臭老九”，所有大小知识分子全在其内。如果说“一代文人”，所指应是这部分人；如果说“一代文人有厄”，所指即是这部分知识分子所受的深重苦难。引《儒林外史》这段描写作为本节的开场白，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楔子”吧。

但是还需要再弹一支前奏曲，因为对知识分子的忌与整（这有个专门用语叫“批倒批臭”，换句直接了当的话就是“廉耻扫地，身败名裂”），文化大革命时期固然到达登峰造极，但也并非凭空而来，不妨说其渐久矣。较远的如《武训传》批判、思想改造、《红楼梦研究》批判等且不说，到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波及面就越来越大了（官方的数字是一万多人）；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就扩大到了全国范围，官方公布的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数字是四十五万人，实际当超过一倍以上。家属亲友受株连的，更不计其数，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在这两个运动中被戴上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帽子的人，都属于所谓“敌我

矛盾”性质。就是说，这么多的上百万人一下子都变成了像苏联大清洗的恐怖时期那样被官方宣布的“人民公敌”。

上海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在这两个运动中都曾遭受严重的清洗、冲击。

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斗争，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即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是一个重点。在分三批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新文艺出版社被点名的就有八人之多。有社长、总编辑、副社长、副总编辑和编辑等。这些人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开头都被关押起来，有的监禁长达十年之久，等到放出来，妻子也死了，家也没有了，真是家破人亡。有的虽然审查半年一年放了出来，也都受到降职降薪的处分，而且永远带上一顶“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揪出来当反革命分子批斗一番。有的人虽同胡风的关系不深，只是因为公布的材料“批语”中点了名，就被加重处分。还有吃冤枉官司的。新文艺出版社有个青年考取了厦门大学读书，这本是好事，他却请后来定为“胡风分子”的为他写两封介绍信。胡风案件发生后，他们写的介绍信就成了他的罪证，也被当作胡风分子关押，审查了半年方才释放，从此在他的档案袋里就装上了“胡风集团影响分子”的结论，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在上海出版界称得上规模宏大，战果辉煌，“挖出”了近三百个右派分子。除少数善于保身者外，稍露头角的知识分子几一网打尽。这里且以上海文化出版社为例。这是一个以出通俗文学、艺术、音乐等为专业的出版社，是由几个私营出版社合并组成的。原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西风》杂志主编黄嘉音、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

许君远，都在这个出版社工作，都被打成右派。因编《现代作家书简》、鲁迅为之作序而出名的 K 君（某名作家亲戚），曾任某私营书店总编辑，也并进这个出版社，他素有“大炮”之称，原已被出版社的反右领导小组划成右派，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则碍于名作家的情面，不予批准。但是这个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 W，出于私怨，非把 K 君打成右派不可，连续呈报三次。最后一次石西民发火了：“是你做部长，还是我做部长！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W 方不敢作声，K 得以免此一难。就是这个反右功臣 W，一九五九年却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别人的批斗，自己也尝到了挨整的滋味，从锦江饭店九层楼跳下来，一命呜呼。

有一出版社有两个党员副总编辑和三个党员编辑，全被打成右派。一位“胡风分子”的夫人，自丈夫被捕后在这个出版社做个小职员，养活两个孩子，只因随便讲了两句话，也划入右派，受不住当时环境的残忍压力，投河自杀，丢下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还有由于“爱人”即妻子“大义灭亲”，揭发丈夫许多枕边“私房话”，而成为右派。这种事例在几十年来纯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时代，并非少见。仅以一九五七年说，公开登在报上的，就有“大右派”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儿子揭发父亲的新闻。至于妻子揭发丈夫的，报上登载更多了，当时都是极为时髦的革命行动。

今天大家已经清醒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点也不“完全必要”，但是从它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展看，则是“非常及时”的，因为按照这种斗争哲学“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规律走下来，其必然的结果，一定要来一次总其成的文化大革命，而且一定是以其彻底失败而告终。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一向声称，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事实证明它同以前多次运动一样，纯然是一场自上而下生搬硬凑制造出来的。这只要看它所安排的步骤和节目就明白了：工作组，批判资反路线，清队，工、军宣队进驻，批《水浒》，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各界各单位，无一例外都依此安排进行，人们可以觉察到，这个表面混乱的十年里，每一步都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有条不紊地调拨——很得意，但是每一步都在走向自身的毁灭。玩火者必自焚，不可一世的江青之流即是。

上海出版界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高潮，从开始到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多次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它完全不是由原有的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而是由造反派——一般都是由狂热的青年党员和群众组成——来领导。各行各业都有一个或两个造反派司令部。上海出版界的造反派组织叫“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版司”。后来又出来一个“版联”与它抗衡，但势力及不上它。各个出版社的造反派，大体就归这两个司令部管。对所谓走资派和大批知识分子总称为牛鬼蛇神的专政、定罪等等，就是由这伙自称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的造反派，再加上工、军宣队干的。

对知识分子实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集中在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个阶段，那是根据一九六七年底江青的一次谈话后开始的。在那以前，知识分子已经倒霉了，但程度还没有这么厉害。从清队开始，对知识分子的凌辱、管制、虐待、酷刑、诬陷，变本加厉，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那一阵以上海来说，两个大报天天发表社论，督促对各种“分子”加紧清查，不许心慈手软。尤以其中某一大报最为猖狂，煽风点火，

凶相毕露。此大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受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控制，等于是中央文革的机关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意图、部署常常由此报先行透露，地位甚至超过《人民日报》，而作恶尤甚。徐景贤任上海市委书记，专管文教，是张、姚一手提拔的一条忠实走狗，嗅觉灵敏，专会噬人，上海文化界受他之害最深。如一个在煤气公司工作的青年桑伟川，只是写了一篇对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有不同评价的文章，逆了徐景贤的意，就被他作为反革命，不仅在报上批，还押到各单位“游斗”，最后把他逼疯。在张春桥的示意下，此一大报把早已撤职调离的此一大报创办人兼总主笔的徐铸成，又从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揪回来批斗，说他翻案，并在报上用头版头条新闻刊载“批斗老右派徐铸成”的新闻报道。以后只要是新闻界和出版界开什么批斗大会，徐铸成就要被拉上去陪斗，还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原《国讯》（抗日战争期间黄炎培创办的刊物）主编S君，也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与徐铸成一同贬在上海文献资料编辑所做个编辑，也被公开给以点名，称之“右派翻天”。此大报不点名，像S君也逃不了，但经它一点名，罪名就更见加重，苦头吃得更多。

“牛棚”这个名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创造，应该编入百科全书的条目，备后人查阅。曾被鲁迅称为“赵老爷”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有一次被单独反锁在一个房间内，这个房间就是牛棚。一个造反派不知里面关的谁，敲门问：“里面是哪个？”

“牛！”老实的赵教授瓮声瓮气回答。

“到底是谁？”造反派有点生气了。

“真的是牛！”赵教授不敢谎报身份。

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关的是被称为“牛”的一些人。“牛”，就是牛鬼蛇神的简称。此外还有所谓“羊棚”，比牛棚稍高一级，圈在里面的一般算是问题不很严重的人，待遇比牛棚为优，不实行专政，不参加劳役，可以同革命群众一道开会等。牛棚中人对某些人能身处羊棚是很羡慕的。

牛棚大小不一，上海几个出版社，大概每一个牛棚关二、三十人左右。牛棚的日常课程：每天一早，提前上班，打扫办公室、走廊、楼梯和厕所；向毛主席像请示，朗读《毛选》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三呼“毛主席万岁”；接着由造反派主持开会，互相批斗；“牛”与“牛”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原应相濡以沫才是，但在造反派监视下，只能相互残杀，抓住对方一点，咬住不放。如不开批斗会，就是无穷尽地学习《毛选》，每人正襟危坐，目不邪视，眼睛盯住《毛选》，做出专心一志的样子。经常造反派来叫某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人被单独提审；审些什么，吃了些什么苦头，回来一声不敢响，别人也不敢问。好容易挨到晚间，要等造反派来宣布可以走了，再排队站在毛主席像前，这叫“晚汇报”，同样要朗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表示已到“山穷水尽”地步，然后三呼“毛主席万岁”，一个个像囚犯出狱那样，急匆匆地赶回家去，家里妻子儿女正提心吊胆地等着他呢！日复一日，古人说“度日如年”，该如何解释，牛棚中人算是实地领会到了。

有一位写过一本流行小说的作者 Q 君，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编辑，以德国法西斯特务的罪名（四十年代，他曾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任职）关在牛棚里。他每天面对《毛选》，实在厌了，竟异想天开，向老友 L 君借了一部《西游记》，放在《毛选》下面，等造反派不注意，就翻过来偷偷地看。他旁边一条“牛”

发现了，为了邀功，向造反派告密。这一下子 Q 君罪上加罪，批斗不必说，《西游记》没收，还要他交代这部“大毒草”的书是哪里来的。他胆小害怕，只得老实说出老友的名字。等到批斗结束，回到家里，心里万分不安，怕造反派去找老友麻烦，对不起他。妻子也怪他不该实说，连累他人，于是夫妻叫儿女连夜去关照老友，告知此事，叫他有所防备。老友却是古道热肠，随女孩子一同来 Q 君家，不仅不怪他，反安慰不要担心，造反派若来查问，他会自己承担责任。Q 君感激涕零，想不到今日世上还有如此厚道的朋友，悲从中来，抱住老友大哭一场。

这当然还算不上卖友求荣，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卖友求荣的事例，到处可闻。名画家丰子恺，担了一个上海画院院长的虚衔，因为画过几幅讽刺社会相的漫画，便成了上海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之一，被牵来牵去加以批斗。造反派写的大字报、大标语（“打倒反动分子丰子恺”、“打倒黑画家丰子恺”之类），贴满他住家的大门口。造反派还勒令他自己抄写这些大字报，自己张贴。过路的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蓄着三绺长须的白发老头儿和一个小脚老太，拎着一桶浆糊，搬着一条长凳，吃力地往墙上张贴大字报。这就是丰子恺夫妇。有一次，丰老正站在长凳上，双手举着一张打倒自己的大字报，准备往墙上贴去，一个重心不稳，连凳翻倒在地，折断了一条腿骨，只好卧床不起。这倒是因祸得福，可以不拉出去批斗了。但是好景不常，他的一个学生（也是书画名家），交代出了丰子恺写给他的“反动诗”，于是丰子恺又被作为“黑线回潮”、“翻案妖风”的代表，重又揪出来批斗，一直到死。丰子恺是弘一法师的弟子，虔信佛教，中年以后即茹素，戒杀生。佛以慈悲为怀，他临死前当已宽恕他的那个使他增加灾难的学生。

当时告密之风盛行，人与人不敢交往，更不敢倾吐心里话，连至亲好友也互不相信。也确有需要戒备的人，有一个老干部，为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马天水、徐景贤所看中，选他做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党委书记。他难免受宠若惊，竭力想要报答知遇之恩，便密告自己的儿女亲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党委书记）有“反动言行”，使这个亲家一直以反革命的罪行关押受审。此人密报有功，接连升官，做到上海市革委会“文教办”（文化教育办公室）主任，掌握上海文教界生杀大权。一声霹雳，北京抓起了四人帮，上海人民群情激昂，奋起追查四人帮余党。最初并没有查到他身上，在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还让他坐主席台。但他自己心里有鬼，坐立不安，心惊胆战，回到家，写了绝命书，说“无脸见人”，跳楼死了。当然没有人可怜他。

据粗略统计，上海出版界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的（不包括像做爪牙的这种人），达到五六十人之多。这些都是冤死的。

原任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俞鸿模，反胡风斗争时被作为胡风分子关禁过，因为他原是海燕书店老板，海燕书店曾经在解放前出版过一些胡风的书，因此俞鸿模也成了胡风分子。俞鸿模是一个梗直的老实人，气不过，在监禁中吞大头针自杀，幸而发现早，救活转来。这次文化大革命，又算他老账，把他关押起来，隔离审查。他又气不过，愤极，再次用自杀表示抗议。他这次用的是上吊，果真死了。一死，造反派立即刷出大标语，声讨他“畏罪自杀，罪该万死！”

有一个青年编辑，平时喜欢收辑鲁迅的佚文遗稿。文化大革命中流传出来很多毛泽东未发表过的讲话、文章、诗词，他就像收集鲁迅遗稿那样，大事收集毛的作品，而且用多种文本

加以校订、增补。越做兴趣越大，简直成了“毛著迷”。照说这是忠于伟大领袖的表现，谁知使他几乎丧生。毛写的文章，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前后常有大幅度修改，最忌人们看出他的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工宣队认定他收集毛未发表过的著作，居心不良，是“整毛主席的黑材料”，这就是滔天大罪了。这个青年编辑被逼得连续自杀四次，其中一次求死心切，竟跳进了五七干校的大粪坑，幸未灭顶，被人捞了上来。他虽然四次自杀没有成功，但也死去活来，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的办公室主任，是党员，解放前参加上海学生运动，但这时却也成了罪名，说他有叛徒嫌疑，拘押审查。每次提审，凌辱不堪。他愤不欲生，在一次提审之后，从设在楼上的囚室窗口跃下，立时殒命。有一阵各出版社跳楼成了风尚，有一个出版社竟先后发生四人跳楼自杀事件。

自杀是人生至不易的事。人非到绝境，走投无路，是不会轻易采取这一下策的。但是也有人从一开始就预见到这个运动来势不善，宁求义不受辱，或过去受过辱，这次义不再辱，尽早采取自杀这个极端办法，一死了之。如名翻译家傅雷，是有名的硬骨头，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他不承认；一九六二年要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他也不接受。他的儿子傅聪，是有名的钢琴家，在波兰留学，出于无奈，逃往英国避难，成为叛国分子，傅雷也不在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傅雷就决定不能再受侮辱了，夫妻二人双双服毒而死。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平心，受上海某大报的骗，名为约稿，实是“钓鱼”，也叫“引蛇出洞”，平心还真以为是学术讨论，写了关于清官问题的文章，被文痞姚文元化名劲松，在此大报上指为“自动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平心是个性格刚烈的书呆子，

一生除了读书写作，研究学问，连生活也不知自理，其实是不懂什么政治的。他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很有汗马之功，但全国解放后也只是让他在大学教教书，并未受到多大重视。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受不住那种任意诬陷的批评帮助（现在有个名词叫“无限上纲”），气得用根本棒打头，把自己击昏，虽未死去，从此得了头痛毛病。思想改造运动时，上海文化界有副对联：“刘大杰跳黄浦，李平心捶脑袋”。指的就是此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他幸免于难，但是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大关过不去了。某大报上公开点了他的名字；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在全市万人大会上把他列为全市六大“反动学术权威”之一，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即“三反分子”；他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贴满了揭发他的大字报，声言要揪他去公开批斗。平心一笑，对保姆（女佣）说：“我不会让他们称心的！”保姆不解他什么意思。当夜，平心一人独处的时候，开煤气自杀了。第二天发觉，送医院抢救。上海市委指示，这是“黑帮分子”，一定要救活，否则批斗就少了一个活靶子。但是中毒已深，无法救活，果然没有能使这些革命左派们“称心”。保姆方才懂得了平心说那句话的意思。

处在专制淫威下的知识分子，手无寸铁，他们所能对抗暴政的唯一武器，就是摧毁自己的生命。写《燕山夜话》的邓拓，在论到明末的东林党人时，有两句诗道：“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岂止东林，何代不然！邓拓本人就是一个证明。从东林到傅雷、平心、邓拓……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着同样的命运，可悲也夫！

文化大革命中对知名的知识分子公然开杀戒，也是上海开的先例。这就是上海乐园的名指挥陆洪恩。陆洪恩在遭受批斗、侮辱至忍无可忍时，喊了一句“打倒”的口号，立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并在全市公审大会上宣判死刑，押赴刑场枪毙。还有一个上海著名西医梁俊青，他是以前同济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第一名留德的，对中国文学也很有修养。一九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随同几十个高级右派一起，被发遣下乡改造。独他最受农民爱戴，因他免费尽心为农民看病，几十里外的农民都闻讯赶来求他医病。农民都赞他是“好人”。就是这样一个农民称为“好人”的人，忽然被造反派发现写有“反诗”，于是也像陆洪恩那样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并且已经内定枪毙。但是这些杀人犯，虽然嗜血成性，却想把杀人的责任推给老百姓，发明了一种叫“群众定案”的方法，就是把陆洪恩、梁俊青这种政治犯性质的案件，混在一些抢劫犯、强奸犯等一起，四、五十人一批，写成“反革命案例”，印发给全市各行各业，组织群众讨论，根据案例情节，提出判刑轻重。群众根本不知内情底细，讨论时一窝蜂地“胡调”，管你什么轻的重的，一概“枪毙，枪毙！”这就叫作“群众定案”。梁俊青连囚衣也已换好，将要绑赴法场了，就像京戏里忽然降下一道“刀下留人”的圣旨一样，忽然有道命令下来不枪毙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这全靠“千古相业唯一人”（赵朴初诗）的周恩来总理的干预，是他获悉了陆洪恩枪毙的事，感到这个杀戒开不得，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多少还能派点用场吧，杀光了不像韭菜那样还能再长出来，因此赶紧下令制止。梁俊青因此得逃一命。

最近三、四年来，许多追悼会的悼词、报刊发表的怀念文章、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新闻报道等，凡是提到某人“含冤而死”，那就是指这个人是自杀或受迫而死的了。

上海出版界的轰动一时的惨案，是J君活活被打死的事件。J君是某一出版社的女编辑，关于她有一件花木兰式的传奇故事。她是云南人，在全国解放前夕，女扮男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在湖南的游击队。她嗓子粗，走路跨大步，又抽烟，又喝酒，很像个男子，所以无人识破。她后来不愿干了，要求离队，临走时要求队长发支勃朗宁手枪，作为参加游击队的纪念。队长没有给。她到上海参加文化工作，派到出版社做文学编辑，始终还是男装，以男子自居，别人也不怀疑。她同一个老编辑合住一间宿舍，有两三年之久，那老头子对她的性别竟懵然无知，说明她的伪装是很成功的。

一九五五年，上海出版社开展反胡风运动，她因同“胡风分子”交好，怕受连累，向党组织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和性别，也谈了那支手枪的事。党组织代她保密，不在群众中宣布，所以她继续还是男装。直到有一次，她被汽车撞伤，抬到医院去，接受检查，这次无法保密了，只得泄露了女扮男装的真相。所有认识她的人，无不感到惊奇，但也感到有趣，称她为现代的花木兰。这以后她恢复了女装，但是扮演男的时间久了，所以形态、走路还带着扮男子时的痕迹。关于那支手枪的事，党组织暗中派了人事科一个干事去湖南调查，找到那个游击队长，证明她所说是实：她要过手枪，但并未给她。人事干事回来写了报告，归入档案，此事已了。

可是就是这个人事干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互相贴大字报揭发的阶段，贴出大字报说这位花木兰私藏手枪未交。群众

不知底细，以为管人事讲的话总是可信的。J君根据事实反驳。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叫“批资反路线”，资反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一些当权派制造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以便自己脱身。这个人事干事也是受批判者之一。J君在批资反路线大会上站起来责问这个人事干事为什么抛材料，整群众？人事干事低头不语，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到了清队的阶段，J君因为曾女扮男装，又有手枪的事，这个故事离奇曲折，因此是清查对象。这个人事干事怀恨J君当众责问过他，使他难以下台，便向造反派头目密报，说她确私藏手枪。他是人事干事，掌握档案材料，人们不能不信。于是对J君严加拷问。J君有只箱子寄藏在一个中学女校长家中，二人是好友。这事又只有人事干事知道，他便又向造反派提供线索，说手枪可能就藏在这只寄存的箱子里面。这里应对私藏枪支问题的严重性有所说明。私藏枪支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算什么，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属于反革命的罪行。因此由一个简单的推论得出的结论，便是：只有反革命分子才会私藏枪支，所以凡私藏枪支的便是反革命分子。历次政治运动都附带有一个号召，交出私藏枪支，鼓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赏。J君既有人事干事作证，但她又矢口否认，便成了非追查不可的大案。出版社造反派的三个头目，会同那所中学的红卫兵，把J君押解到那所中学女校长家，一面抄家，一面讯问，两样都无结果，便把J君和女校长酷刑拷打，自夜间到清晨，活活把两个无辜的女人打死了。可想而知，打法是极为惨毒的。同时还有三个中学党员教员，平时因和J君有来往，也被拷打重伤，成为残废。在那段疯狂恐怖的日子，造反派、红卫兵打死人是无罪的。江青讲过：“坏人打好人，反革

命；好人打坏人，活该！”她这话广为宣传，奉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使得一批以“好人”自命的狂热分子有恃无恐，而受打者却不敢有丝毫的反抗。J君等人虽然死的死，伤的伤，自然不在这些造反派、红卫兵的心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且动手拷打的人那么多，大家都有份，怕什么？打完了，兽性得到了满足，这伙造反派、红卫兵一哄而散，扬长而去。这样大的死亡案件，发生后数年之久竟无人过问。凶手逍遥法外，有的心安理得地恋爱，结婚，还生了大胖儿子，建立起美满幸福的小家庭。

直到这批凶手的靠山四人帮覆灭后，J君的惨死案方才得到审理，凶手方才得到了惩罚，但是也还经过一段周折。起先凶手们出于“义气”，互不认罪，也不供认作案的经过。法院仅判三个参与其事的造反派头目很轻的徒刑，并且一律缓刑，就是说只在名义上给他们一点刑罚，至于他们的工作、生活和自由受不到什么影响。还有那个抛材料的幕后肇事者人事干事，被他们这帮“小兄弟”保护起来，根本没有触及。群众当然不满，议论纷纷，法院第二次审理了这个案件。三个造反派头目迫于形势，交代了案情经过，把那个一直躲在幕后的诬陷犯人事干事也咬出来了。法院经过查证，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分别判处这三个造反派头目以二十年、十年和三年的徒刑，不再缓刑。那个人事干事以诬陷罪判处两年徒刑，但是缓刑两年。在查问案件的经过时，那个人事干事方才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我今天才知道，想不到我一句话造成了这个案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何其如此之多，大家从这个挟嫌诬告、陷人致死的凶犯如此轻飘、无耻的话语里，或许可以知其原因的大概了。

上海出版界另一件大冤案，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六人反革命集团案”。这个案件完全是由造反派“逼供”逼出来的，堪称得上造反派制造冤案的一大杰作。所以案件制造成功后，别的单位的造反派都来“取经”；本单位的造反派也派人出去做报告，传授“深挖反革命”的经验；还写成文章，登在造反报上。造反派一片欢呼，然而，知识分子惨矣！当时有句名言，说是“革命群众开心之日，乃反革命分子难过之日”，造反派的开心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是这样制造出来的：造反派猜测某几个中老年编辑，平时闲谈，可能会有涉及“中央首长”——特别是关于江青的闲话，先“各个击破”，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话，给以恐吓性的警告，譬如说：“我们已经掌握材料（其实根本没有），你有诬蔑中央首长的言论（不说哪一个首长，也不指出说过哪些话），已经有人交代（根本没有），现在就看你了（以虚套实，使对方心慌意乱）。罪行是客观存在（一口咬定实有其罪），就看你的态度如何（这句话是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用过见效的，不过文化大革命时用得更为广泛），是不是老实交代（不坐实罪名）。党的政策你是懂的（其实谁也不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骗人的诱饵）。现在给你时间，你去好好考虑吧（暂放一马，使对方寝食不安，神疲力尽，胡乱承认）！”

除此之外，这个出版社的造反派更有新的创造，在出版社内安置了高音喇叭，对准牛棚，每隔几分钟喊话一次，或是宣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对这些嫌疑犯进行心理战、神经战，使他们时刻处在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的紧张境地。最后，就在某一天夜里，不许这些人回家，把他们集合在一起，面对一座毛泽东的大塑像，每人一张课桌，纸笔俱全，命令他们交

代罪行。整整一夜，许多人受不住这种使人心胆俱裂的恐怖气氛，只得从实写下所谓“罪状”：自己对某人讲过，或是某人同自己讲过，诸如江青原名蓝苹、拍过电影、在杭州六和塔同唐纳结婚等一些话。有一个人交代，他曾将江青拍电影的影片，给某人看过。就是这样一些今天看来普通之极的“言论”，造反派如获至宝，公安局也据此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行”，一共定了六个人的罪，将其中二人判刑逮捕（一个十年，一个七年）；一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三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原单位监督劳动。这六个人中，有一个是名学者，出版社的社外编辑，是清末某军机大臣的幼子，少年时即有才名；曾任华北政府时的国史馆馆长。他被判十年徒刑，被捕时已年过七十，后因病保外就医，未滿刑期就死了。还有一个在判刑前神经已陷崩溃，跳楼自杀，脚骨折断，也未能幸免，照样把他抬到宣判大会上，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后来稍能起立，就勒令到五七干校养猪。一个被判七年刑期，坐满了七年牢狱，原应释放回家，但因他的家是在大马路上，时有外宾车队经过，按照公安控制条例，沿街不能有刑满分子居住，于是把他放逐到安徽劳改农场去，在那里又关押了三年。造反派和公安局都认为反正是反革命分子，多判几年是无所谓的。当时的办案原则是：没有错抓，没有错判，也没有错关。

一代文人有厄！

一九八一年

“文革”的一幕

每个人在“文革”的遭遇，无不可以写成一本书。这里写我在“文革”遭遇的一幕。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颁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简称“十六条”，是指导“文化大革命”进行的纲领。据一本一九六九年一个造反派司令部编印的《读报手册》的说明，这个决定“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共十六条，其基本精神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猛烈开火，进行一场真正的、彻底的、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这个十六条中的所谓相信、依靠、放手发动群众云云，其实就是煽动群众起来的狂热性。所谓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其实就是准许一些暴徒施用各种残忍手段，对手无寸铁的善良人们进行摧残拷打。这个十六条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的那天夜晚，我记得正是酷热的天气，那年显得特别的热，使得处在政治运动前夕的人们更为烦躁不安。我赤着膊躺在铺着草席的床上，听着广播员用恶狠狠声调传出的一句句充满杀气的文句，一面心里打颤，知道可怕的日子又要临头了！这时自己心里最害怕的，就是我曾写过的两篇历史小说（一篇《小忽雷》，一篇《长命女》），将会给自己带来的罪名，还有随之而来的灾难，一家老小都要跟着自己受苦了。做了右派，已经连累了他们，眼看现在又有不测之祸来临。妻见我忧急，倒反安慰我：“听天由命吧！”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向造反派组长交上了登载这两篇小说

的刊物，听候审查。我是“老右派”，平时又不大服管教，强头倔脑的，属于“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也是当然的“牛鬼蛇神”。《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各个部门都建立起了“牛棚”，把牛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关进“牛棚”。规定每天早来晚走，定时汇报思想。后来发展到“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早晨上班，这些牛鬼蛇神先肃立在毛泽东像前，三呼万岁，朗诵《毛选》中的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晚上下班，照演一次。牛鬼蛇神随时可以被拉出去批斗，或同时集体批斗，或个人批斗。

过不多久，批判两篇小说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一张是一个掌权的造反派所写，另一张是一个“革命群众”所写。他们的批判集中在两点：一是我借小说中两个女子的不幸遭遇，寄托做了右派的怨恨；二是我在小说中写了两个皇帝，指其中一个皇帝起始贤明，后来却懈怠了，这是影射攻击伟大领袖。

我无权为自己辩护，但心里却暗自好笑。我写的是坏皇帝，为什么一写到皇帝的“坏”，就要由伟大领袖来承当呢？这样的比拟岂不是你们在诬蔑伟大领袖吗？事情的可笑还不止于此。说皇帝坏是攻击伟大领袖，那么说皇帝好是不是就是赞美伟大领袖呢？也不是。说皇帝好也不对，这是为封建帝王涂脂抹粉，以达到反对伟大领袖的目的。有一位历史学家刘大年写了一篇《论康熙》的论文，将康熙与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路易十四相比，就受到了这样的批判。骂皇帝不对，赞美皇帝也不对。“大批判”之足以置人于死地，它的奥妙就在这里：白的可以说成黑的，黑的也可以说成白的。

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后，有一个时期，“造反派”的两派忙于“打内战”，争抢领导权，我们是“死老虎”，

暂时免于天天批斗，勒令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反动思想。于是每人面前各摊一本“毛选”，每天闷着头看书。日子一长，“牛棚”中窃窃交谈起来。原来的领导干部，这时成了“走资派”，也关了进来，只得屈尊同我们坐在一起。大家成了同病相怜的难友，便也无话不谈。我们问那位领导清官讨论的支部书记，当时是不是有意“钓鱼”。他老实相告，是在“钓鱼”，但是他也是出于无奈，他不卖力去“钓”，他自己也要被上面“钓”去。但是，当这位书记，一旦被造反派看中，实行“三结合”（即老中青搭配），结合进“革命委员会”，重又担任领导工作，为造反派呐喊助威，脸一翻便不认我们这些难友了。他批斗我们起来特别卖力，以示他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

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大概都经过“八十一难”的煎熬磨炼。程度有高低，痛苦有深浅，但受难则一。在我所经过的许多“难”中，有一次几乎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是其中的一“难”。

这是一个大案件。“文革”前上海市各机关，规定星期四是义务劳动日，这一天所有工作人员都得去一个需要动动体力的地方劳动。我这个工作部门把我们几个文弱书生组织到苏州河边旧书仓库，去帮着整理旧书。有几个人一面理书，一面闲谈。闲谈，天南地北，东拉西扯，不外文坛轶事、名人趣闻之类，这中间就难免有牵涉到当今风云人物的地方。我吸取“言多必失”的教训，只听不响，有时有意离他们远些，连听也不听，免得招惹是非。“文革”开始后，便有人想要从这种谈话中挖掘出有没有涉及伟人和江青的内容，这是当时最为犯忌的话题，要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论罪。曾有多事的“革命群众”找我探听谈话情况，并要我揭发立功。我理所当然回答我不知

道。事实上，我也确实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讲过什么不该讲的话。想不到这件事被造反派接了过去，当作一件大案来办，而目标中也有我在内。

那正是炎热的夏天，挥汗如雨，凡是在那个仓库参加过劳动的人，都被分别审问，勒令交代，并要求互相揭发。突然一天下班前，把我们五六个人叫出来，在一座毛泽东大石膏像前，每人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纸张。

“你们必须老实交代你们的罪行！”一个凶神恶煞般的造反派头目对着我们吼叫。“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们确凿的作案证据，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交代，不许回家。谁先交代，就先放谁回家！”

大家像绵羊一样乖乖坐下，都怀着听候宰割的心情。我心里却相当坦然，因为我自己早有戒心，知道什么话都可讲，独有涉及伟大领袖的私生活的话绝不能讲，这点我自信不会出问题。我拿起笔，但一个字也不写。看看旁边的人，有的振笔疾书，有的愁眉苦脸，拿着笔发呆。过了午夜，厨房送来了一大锅面条，作为夜宵。一个造反派头目赤着膊，露出一身横肉，像刽子手一般，对我们说：

“吃吧！吃了再写！”

果然有那不争气的人，站起来盛面，一人一碗，吃得津津有味。那个赤膊造反派头目叫我吃，我回说不要吃。

“不吃？不吃也要交代！”他吼叫着，一身横肉颤颤抖抖，活像一只恶狼在伺机扑食。

吃过面，赤膊造反派头目宣布：

“某某交代得好，现在放他回家。你们听着，某某是你们的榜样，谁先交代，谁先回家！”

那个某某，带点优越感似地，朝毛泽东石膏像深深一鞠躬，开门退了出去。我心里感到一阵羡慕。

“你为什么你不写？”赤膊造反派头目指着桌上的空无一字的白纸，叫着。

“我只有歌颂毛主席的话，没有诬蔑毛主席的话。”我回答。

“没有？揭发材料全在，你想赖吗？”

“那就请宣布好啦。”我低着头说。

“好！你不肯交代，死路一条！”

别的人陆续交上了所写的交代，陆续被恩准发放回家。只有我不写一字，一直挨到天明。他们看逼不出什么，只好放我回去，但勒令八点钟仍须赶回，听候批斗。

我顶着晨曦，如丧家之犬，快快奔走。妻因不知我的吉凶，急得一夜未睡。我告诉她，我没说任何可以构成罪名的话，请她放心。她说：

“我相信你！但是如果你说过什么话，也是活该，你自作自受！”

她这是气话。我戴了右派帽子，已给她和一家带来巨大的不幸，这个家怎么还承受得住新的不幸呢？

在这个案件中写了交代的人，包括那个因交代得好而优先释放回家的某某，都由公安局来宣布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有的还被判刑，关进提篮桥监狱。直到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得到平反，我方才知道他们所犯的“罪行”，就是因为说过江青是三十年代演过电影《王老五》的蓝苹！如此而已。

一九六九年，全国掀起了“五七干校”的热潮，机关即所谓上层建筑的工作人员，除了极少数留守外，全部下放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也全部押送下乡，监督

劳动。一九七〇年，从农村抽调一部分人去工厂“战高温”，我快快报了名，希望远远离开这个使我厌恶、窒息的环境。在工厂做了八年小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人也老了。一九七八年，重又开始了后半生的生活。

一九八九年

“牛棚”纪事

这里说的牛棚，当然不是什么真的饲牛之棚，而是圈禁牛鬼蛇神的场所；牛鬼蛇神，也不是如新版《辞源》所说的什么真的牛头鬼、蛇身神，而是一种被特定的具有“坏人”身份的总称。

牛鬼蛇神这个词，源自唐朝诗人杜牧为另一位诗人李贺诗集作的序：“鲸呿（张口）鳌掷（跳动），牛鬼蛇神，不足为其（指李贺的诗）虚荒诞幻也。”后来这个词也偶尔为人所用，如《聊斋志异自序》：“牛鬼蛇神，长爪郎（指李贺）吟而成癖。”《老残游记》：“牛鬼蛇神，无所不有。”但用得如此普遍，以至家喻户晓，老少咸知，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功绩。毛泽东博览群书，最善于借用古人成语，别出心裁，赋予政治性的新意，使之成为政治运动的口号和群众的熟语。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所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就两次用上了“牛鬼蛇神”这个名词：“记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去，才便于锄掉。”“文化大革命”既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有关于这次运动的口号和用词自然也是由毛亲自拟定。即使有的是由他人提出，也必得经过他的审定和批准。李贺是毛极为喜爱的一个诗人，也只有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会从杜牧的序文中注意到“牛鬼蛇神”这个词，拈出来作为“反右”和“文革”所要打倒并“踏上一只脚”的各类“坏人”的总代称。“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许多人

虽然不幸（反过来说，不是也很有幸吗）由人变成了“牛蛇”，还是不得不对这个词的运用之妙表示赞叹。

“牛鬼蛇神”这个词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官方标准用语，则是始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的北京《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虽不能肯定即是毛泽东所写，但至少是秉承他的意旨并得到他的审定的。据同年七月八日毛自“西方的一个山洞”（今知乃韶山的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中透露：“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可知“横扫牛鬼蛇神”的用语，实出自毛的一贯想法。其时“文革”风暴已如疯狗之势席卷全国，《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为之火上浇油扬风助威：“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大量牛鬼蛇神。”这里牛鬼蛇神的范围还限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条”（中共《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增加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林彪作政治报告，牛鬼蛇神的范围已扩大为“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了，包罗了所有需要清洗的“敌对分子”。于是，凡被冠以牛鬼蛇神称号者苦矣危矣！

有了牛鬼蛇神，视人同牛，随即便产生了关“牛”的“牛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牛棚不出自“钦定”，据说是群众的自发创造，源自北京“红卫兵”，一夜之间就传遍了全国。那时

只要是“整人”的花样招式，各处无不闻风而动。于是大大小小的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社团都建起了牛棚，把一些“专政对象”集中起来，画地为牢，圈禁在一起，由造反派专人负责监督管理。所谓牛棚，也就是大小不一的这一单位中朝向、设备最差的一间房舍，或房舍中的一个角落，甚至密不见光的地下室。

有一次，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牛棚里关了一位教授，他就是小说、戏曲专家赵景深（一九〇二——一九八五），属于“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曾被鲁迅、瞿秋白痛斥过的将“银河（Milky Way）”译成“牛奶路”的“顺译”家，这也成了一项罪名。其实，“牛奶路”之译并无不可。“银河”，银子（色）的河流？“天河”，天上的河流？也只是形象说法而已，其名不副实，与“牛奶路”并无二致。监管他的一个造反派临时走开，便将他反锁在牛棚内。另一个造反派走来敲门：“里面有人吗？”先不应，后再叫，内答：“没有人！”这个造反派诧异：“你不是人吗？你是谁？”内作牛鸣，答：“我是牛！”另一说，赵景深独留棚内，为服从“不许乱说乱动”的训令，将自己绑缚在椅子上，故而无法起身应门。朋友们都知道，赵是一诚实君子，从这两件事可看出：一是尽管鲁迅骂过他，但他对鲁迅仍深怀敬意，纪念鲁迅时，写文章怀念。二是他上课与众不同，连演带唱；他讲戏曲，会当堂唱上一段昆曲《长生殿》的《絮阁》，让学生一饱耳福，人笑他有失教授体统，他却不以为意，怡然自得。可知他在牛棚自承为牛，决不是出于故意或敌意，而是真正承认自己已经变成牛鬼蛇神之牛。庄子做梦化为蝴蝶，醒来恍恍然，不知自己是人还是蝴蝶。久关在牛棚中的人，在周围肃杀气氛的影响下，也会恍恍然，不知自己是人还是牛。这样的心理状

态，并不是个别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研究“异化”问题，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异化”呢？

各个牛棚各有不同的管教规定，但有一个规定是共同的，这就是“早请示，晚汇报”。牛棚中的牛，清晨进棚前，都先列队站在毛泽东石膏像（或纸印像）前，鞠躬，三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然后齐声诵读《毛选》中的那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晚间出棚，再如式来上一套。开始大家捧着《毛选》读，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文章不长，也就背熟了，琅琅上口，特别是读到文章中“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想和他们（指反动派）靠拢是没有希望了”等句，为了表示投降认罪的诚意，这些“罪行深重”的牛们，无不提高声量，抑扬顿挫，表达出“群众专政”的威力。一旁监视的造反派，见到这种场景，也会点头赞许，认为这批牛确有改悔之心。

但是，关于这篇在“文革”中用来敦促牛鬼蛇神们投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著作权，却有不同的说法。照说收在《毛选》中的文章自然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这篇《投降书》的编者按语也说得明明白白：“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一个广播稿。”这还能有疑问吗？但据说“文革”后，原任中共上海市委部长的石西民（一说是陈其五）曾对人说，他在牛棚中天天诵读的这篇《投降书》，乃出自他的手笔。他以牛鬼蛇神身份每天朗诵自己写的文章，表示悔罪认罪，真是“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是耶？非耶？这就有待于历史学家的考证了。最近又有一个传说，有一位知名人物编自己的文集，将已收在《毛选》中的文章（一九四七年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也编进去了，幸得出版社的编辑及时发现，作者承认疏忽，赶紧抽掉，避免了一次“政治错误”。如此

说属实，则《毛选》中不乏“捉刀”之作。这不足为怪，毛日理万几，秘书代为起草文章很多，将代写的文章误为自己的大作，也是可以理解的。

牛棚中的牛，有时却变成了狗。这又是怎么说？牛鬼蛇神在牛棚中所做的，主要是写交代（交代自己一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学《毛选》（翻来覆去阅读《毛选》四卷），但最重要的则是互相批判、揭发，这时大家就像狗一样地“狗咬狗”起来。既然都是落难之人，有如“涸辙之鱼”，理应“相濡以沫”才对；但是不然，为了表现自己认罪、改造得好，“狗咬狗”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你死我活”的斗争。有的甚至告密诬陷，摇尾乞怜，争功邀赏。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心就发痛，感到很悲哀，觉得人性真是恶的，且是残忍的。阶级论者反对人性论，其实他们反对的只是人性中的善与爱；人性中的恶与残忍，在“文革”中是得到公开鼓励并付之实践的。

这类丑恶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一些有关“文革”的文章，对此大都有所回避，因为当事人还都在世，不便多谈。这里姑举两例，但隐去其名。一例：某市某局，甲局长与乙副局长，同是“走资派”，甲局长罪名更大些，还有“叛徒”的帽子。乙副局长为了“争取立功”，便在甲局长学习之用的《毛主席语录》内的毛泽东像上用笔打上一个十字叉，然后去造反派处告密，甲局长因此罪上加罪，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受批斗。二例：甲乙是多年同事，同在一个牛棚，一次批斗大会，造反派以甲乙罪名严重为名，命令互打对方耳光，以示惩戒。甲不肯从命，乙比甲年长且是老干部，却遵从举手连批甲的脸颊。人们于此判出甲乙二人的品格。

对于中国人民（就其实质而言主要为知识分子）来说，一

部“牛棚史”就是一部受难史，一部被奴役史，更是一部屈辱史。个别性格刚烈的文人，在“文革”初期已预见到将要来临的侮辱，他们抱着像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而留下的遗书所说的：“五十六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跳进了太平湖，傅雷（一九〇八—一九六六）夫妇拧开了煤气，李平心也用煤气结束了生命，邓拓（一九一二—一九六六）据说是“愤怒地走向死亡”。一部分三十年代熟知江青（即蓝苹）底细或江青与之有宿怨的人，则被投进监狱，如聂绀弩（一九〇三—一九八六）、叶浅予等。有的则被迫害致死，如王莹（一九一三—一九七四），郑君里（一九一一—一九六九）。绝大部分忍耻负辱，身处牛棚而活了下来的人，支持他们活下来的信念，主要是对父母妻子儿女的责任感，因为一死就成了“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株连全家，永世不得翻身。此外还有两条不愿一死了之的信念：第一条，不相信世道会永远这么邪恶、黑暗下去，相信光明终将来临，正义也必然会得到伸张。第二条，总要看看这台戏的结局，看看这些倒行逆施、张牙舞爪、不可一世者的下场与报应。倘若愤而一死，就看不到了，那也将是遗憾的事。著名画家叶浅予在他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文化大革命”对他也有好处，其中一点是，“住牛棚、蹲监狱的经验，用钱买不来”。这是事后的自我宽慰之词，不会有人出钱买这种充满血与泪的惨痛经验，但这也说明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用宽广的胸怀来宽恕世间的不平与罪恶的。

一切过去了。时间如流水，会把往事从记忆中逐渐冲淡，直至一干二净。但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是“淡化”不了的，也是抹不掉的，重要的是还其真相，留给后代，

作为永久的教训。

一九九三年

“千夫指”之谜

“文革”后期，大约是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发生了一件“大案”：一个自称“千夫指”的，连续写了好几封匿名信，“恶毒攻击”称为“旗手”的江青。这些匿名信，据说写在质地粗糙的草纸上，寄发地点上海，但一封信换一个区。这个案件曾经惊动一时，倒不是报纸、电台的报道广播，报纸、电台一个字也没有透露；而是内部严密掌握，上上下下，逐级负责，直到基层单位，街道居委，排出可疑名单，一个个查疑点，对笔迹。还传达了王洪文的“指示”：一定要查出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年不行二年，二年不行三年，就是十年二十年也要查他出来；人死了也要查，把他从棺材里挖出来！王洪文的“指示”当然也反映了江青的意旨，“千夫指”一定揭了江青老底，触及她的痛处，所以显得如此咬牙切齿，暴跳如雷。

但是，这个“千夫指”胆量不小，就在发动群众深入追查的时候（我想他不会不觉察），却还继续“作案”，似乎有意蔑视对他的追查。

“文革”中经常听到查获匿名信的事，大抵只要发动群众，查对笔迹，很快就查出来了。查出来的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但这次很不顺利，查来查去没有什么结果。

“千夫指”的匿名信写些什么，属于“防扩散材料”，谁也看不到，所以不知其详。仅从零星听到的传闻，好像信中提到了武则天，又提到了埃及女皇克丽奥佩屈拉。至于查对笔迹的办法，则是从信中摘录个别词句，拼成不连续的文字，让人

辨认。上面传下话来，根据信的内容、笔调、知识面和文字水平等情况分析，这个罪在不赦的“千夫指”大概是一个曾在旧时报纸干过的文人，懂点京戏，熟悉历史和国际时事，也熟悉三十年代文艺界，文字有小报格调。又听说为了查验“千夫指”笔迹，曾拿到上海几个名画家、书法家那里验认，还拿到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学者那里检验。但同样没有什么结果。那时我正在工厂“战高温”，响应号召，弃文从工。忽有一天，原单位人事科办事员 S 来厂，找我谈话。他拿出“千夫指”匿名字迹拼贴起来的复印件给我看，要我辨认谁的笔迹。我回说不认得。S 于是介绍组织上已掌握的“千夫指”情况，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些特征，问我有没有这方面认为可疑的人，我说想不起，举不出。S 态度尚和气，不像审问者那样盘问，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就走了。

我对这场谈话很觉坦然，以为这只是例行的调查，我如实回答，事情就结束了。“千夫指”始终没有破案。不久“四人帮”垮台，这件事就过去了。

想不到一九八〇年我重归旧业，遇见了多年不见的老友 G，他为“胡风案件”吃了二十多年苦，如今苦尽甘来，不仅恢复了工作、待遇，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我们没说几句话，G 就说：“你知道吗？‘文革’中有人到我那里调查过你！”我问调查什么。他说：“调查你是不是‘千夫指’呀！”我感到奇怪：“怎么可能呢？”G 说：“对呀，我也这么说。来调查的人说他不是钱夫子吗？‘钱夫子’不是跟‘千夫指’一个音吗？”我好笑起来，不能不佩服这些办案人员动足脑筋、想入非非的推理思维。我问：“那你怎么回答呢？”G 说：“我回答只知道他叫钱某某，从不知道他叫钱夫子，也没有人这么叫过他。那调

查的人只好不高兴地走了。”G当然说不出调查者的姓名来历，总是有来头的吧。我虽然觉得可笑，一面也想好险呐！原来我是怀疑对象，暗地里进行审查，我还蒙在鼓里呢！

这位“千夫指”无疑是反“四人帮”勇士，虽然写匿名信方式不足取。究竟是谁呢？恐怕将永远是个谜了。

一九九三年

“文革”特准出版两部书

——简评《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

“文化大革命”期间，什么书都停止出版，除了《毛泽东选集》。所有印刷厂日夜开班，赶印《毛选》。进入七十年代，情况稍有变化，有两部书得到特许，准予出版。人皆相信，这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决定，别的人谁也没有这个权力。这两部书，一部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另一部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在百事俱废之际，毛泽东唯独批准出版这两部书，其中原因何在，一直是人们饶感兴趣的问题。

一种说法，毛泽东同这两人是老朋友，有相当的情谊，故而另眼相待。这一说，似乎是，又似乎不是。似乎是者，这两人确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也确有一定的交情。以郭沫若来说，还在抗日战争延安时代，毛泽东就印发了他的评论李自成失败教训的长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延安干部“整风学习”的材料。建国以后，毛泽东发表抒写长征途中情怀的《娄山关》词，郭沫若为写文章诠释，校样送呈毛审阅，毛作了大段的修改。倘非知交，不可能这样不分彼此。以章士钊来说，一生浮沉学界宦海，做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为女师大风潮，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之职，从此被进步阵营目为顽固派的典型。解放后，凡为鲁迅所恶者大都命运不佳（虽然为鲁迅信任者也并不走运），独章士钊安然无恙，且荣任中央文史馆馆长。毛泽东自己说，他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办理留法勤工俭学一事，曾得章士钊的资助，铭感在心，可知对章的器重。似乎不是者，毛泽东

对老朋友固然颇念旧情，但在“路线斗争”面前，则是不容情、不手软的。党外的老朋友如梁漱溟，因不识时务，讲了点真话，且倔强不肯认错，致遭当众痛斥，群起攻之，使梁废锢数十年，只能闭门思过。党内一些老同事的下场例子就不多说了。“文革”中人人自危，郭沫若也不例外，并未因是老朋友而稍容宽贷。“批林批孔”时，郭的大著《十批判书》曾受毛的批评：“《十年判书》非好书”。据说江青一次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开到一半，江青厉声问：“郭老来了吗？”郭战战兢兢站起，诚惶诚恐回答：“郭沫若领同妻子在此报到。”所以即使是老朋友，也还是朝不保夕的。

又一种说法，这两部书适合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文化大革命”实行“四大”：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连。这两部书正好成为学术专著中的大批判型的示范之作。什么叫大批判？按照“文革”的经典定义，就是“批倒批臭”，就是“老账新账一齐算”，就是“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李白与杜甫》是对杜甫的大批判。先树立一个正面的偶像，这就是李白；再树立一个反面的对象，这就是杜甫。推崇的偶像必须好上加好，批判的对象必须坏上加坏。例如李白一向被视为“酒徒”，这也有损于“诗仙”的形象，故应转嫁到杜甫身上，而且是用科学的方法统计出来的。书中说：“杜甫的嗜酒实不亚于李白。我曾经就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四百多首中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凡谈到饮酒上来的共有三百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作为一个对照，我也把李白现存诗和文一千零五十首作了一个统计，谈到饮酒上来的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杜甫的嗜酒超过李白五个百分点，可见杜甫是名副其实的“酒徒”了。一个人饮酒多点点，原是小事，但为了

抬高此人，压低彼人，就得大做文章。《李白与杜甫》总的用意，就是褒李白为反传统的斗士，贬杜甫为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

《柳文指要》是一部研究柳宗元的专著，其中不乏创见。研究柳宗元，必然要连带论及与柳齐名的韩愈，将两人作一比较，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部书并不是对韩柳两人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而是对柳宗元是无限地赞美揄扬，对韩愈则是无限地诋毁痛骂；所以虽然有些独到的见解，却全被淹没在这一片主观的、片面的对韩愈的大批判声中了。现摘引几篇，以概其余。如论到韩柳的学识修养，书中如此说：“夫韩氏者，亦束三传不观，摈仪礼不读，用字不求切解，行文不中律令，名利纷纭，下帷时少之假斯文尔，子厚则不然。微论其入仕前，涵濡骚赋，寝馈功深，入仕后一贬十四年，无书不读，波澜老成，其功力为退之所万万不及。”这是说韩愈是一个才疏学浅的假斯文，柳宗元方是有真才实学的大学者。当论到韩柳对佛学的态度时，书中如此说：“退之好佛，直好佛耳（指韩与僧徒交往），同时置儒之道于不顾，而子厚好佛，辄不忘儒，且往往援佛以入儒。退之好佛，单纯而偏嗜，有甚于子厚，人或以佞佛罪子厚，吾谓佞佛者退之，非子厚也。”这里不单将韩愈的辟佛之功一笔抹煞，而且把原来戴在柳宗元头上的一顶“佞佛”的帽子转戴到韩愈的头上。这同郭沫若将“酒徒”称号从李白转给杜甫，如出一辙。当论到韩柳共有之道时，书中又如此说：“退之之道，号为远大，彼并不能自为远大，特不过投合后来民贼之需要，供求相应，而为人利用，姑予推崇而已。子厚之道，崇民至上，视民如伤。”就是说，韩愈推行的道是“以民为仇”，柳宗元推行的道是“以民为主”（此二语见于此书“出版说明”）。谁好谁坏，一目了然了。就像孩子看戏，必要父母指

出好人坏人，简单的头脑满足于简单的划分。大批判或准大批判式的许多文章、论著，所起的作用，大略类此。这部书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书中引用某人的话或某人的文章，都有名有姓，但是书中引用了一些曾国藩的话和文章，却把名字故意回避起来，称之为“吾乡屠伯某氏”、“伪帅”、“豪夺兵权者”等等，知者阅之恐将失笑：这是为什么呢？为贤者讳乎？为仇者讳乎？当然不是为贤者讳，想来因为曾国藩打过太平军，曾被称为大汉奸、大卖国贼（这一称号是范文澜加的，他写了长篇文章批判曾国藩），因此连他的名字也在禁讳之列了。作者用心良苦，下面一段自白说出了当时一点真实思想和特殊心态：“国家从事文化大革命，作者虽日薄西山，而亦在同声同气之列，固不能与青少年程功比烈，终究不无多少进步可期。”下署“千九百七十一年八月十四日时年九十有一”。因此，从这两部书的内容、论点以及所用的论证方法诸方面来看，都适合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才得以特许出版，既可示主政者对老学者的宽大，亦可点缀异平以见荒芜已久的学术园地又露一丝生意。

但是还有一说，即这两部书迎合了毛泽东个人的心意和爱好。众所周知、毛泽东博览群书，尤其对诗词和历史的修养极高，他本人就是杰出的诗人。他写的文章，大量引用古人成语、典故，使他的文章格外增添文采。例如他引用《诗经》“嚶其鸣矣，求其友声”，以说明苏联是中国的好朋友；用韩愈的话“行成于思，毁于随”来说明学习必须持之以恒；引《汉书》刘潭“清君侧”的故事，来批斥“胡风分子”对周扬等的攻击；引刘禹锡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来形容“苏修”的穷途末路与马列主义的永葆青春。最令人赞叹的，是引李长吉诗“黑云压城城欲摧”来形容“右派分子”的“向党猖狂进

攻”，很能烘托出当时气氛，并给预感即将遭逢厄运的“右派分子”们以心灵的震撼。这些都是神来之笔，看似随手拈来，却是非具有广博的知识与深厚修养者莫办的。由于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敬，所以凡为毛泽东所引用的成语、典故或诗词，还有称赞过的历史人物，包括传说人物，如共工、愚公等都被辗转传诵，成为一时风尚，有的甚至成为学习的对象。当然也有错会了毛的意思，原为响应号召却走入误区，大倒其霉的；如吴晗的大肆宣扬海瑞精神，写了戏曲《海瑞罢官》，被姚文元称为宣传单干风，被毛泽东定为为彭德怀翻案，最终导致杀身之祸，即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一般说来，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做文章，总是有益无害的。据说毛泽东最喜爱的唐代诗人是“三李”，即李白、李贺与李商隐。《李白与杜甫》无疑就是从这方面得到了启发，有意推崇李白以取悦于时而写出的。那《柳文指要》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作者的自序说：“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一九四九年革命初期，尚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又说：“一九四九年后之柳文崛起，乃出于内外形势之自然而然，并不由何人强迫招致，仔细思之，倘中唐绝无子厚其人，而此时欲得一士，作为承先启后，并裨辅毛主席著作之天然准则，势且通涉历史，徬徨无所措手足，世事茫茫，读者亮同斯意。”这几句话颇为费解，《毛泽东选集》中未见引用柳宗元什么话，或对柳宗元有何正面评论，也没有听说毛泽东口头曾说过什么崇柳批韩的话；但这句话终究还是说出了作者写作此书的本意，乃是作为“裨辅毛主席著作之天然准则”，就是说这完全是顺着毛泽东的思路而写的。由此看来，说这两部书是为迎合毛泽东的心意和爱好而写，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

这两部书，现在已成为历史。“文革”以后，《李白与杜甫》

受到过一些批评，主要是为杜甫鸣不平，现在也无人再提了。

《柳文指要》则没有人提到过，好像这部书从未存在过似的。大家都原谅这两部书的作者当时的处境。这两部书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泛起的两点小泡沫，瞬起瞬灭，让后人留念的倒是由此反映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心态。毛泽东曾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梁上君子”，又说是附在某块皮上的毛，他们没有独立性，只有依附性。毛泽东真是看透了摸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大概也就在这里。

一九九二年

[附记]

这篇文章发表后，看到近年出版的有关回忆录，证实《柳文指要》原稿，曾经毛泽东审阅，出版也是经他决定的。

一九九三年

记黄嘉音并谈《西风》

先要声明，这个题目是套用董鼎山先生在本报发表《访黄嘉德谈〈西风〉》的，他的文章虽然有一处说了一句“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主编《西风》”的话，但对黄嘉音的踪迹与下落却只字未提。凡是《西风》过去的读者，既然晓得了哥哥黄嘉德的近况佳胜，感到高兴，那么对于弟弟黄嘉音的信息肯定也是关心的。

我想就我知道的写一点。可惜我不能写《访黄嘉音》，因为黄嘉音早已离开人世了。

我同黄嘉音认识，是在一九五五年他主持的“家出版社”与其他几家私营出版社合并，成立上海文化出版社的时候。他担任这个出版社某一编辑室副主任。我与他同在出版系统，有时开会便常遇见。我也是《西风》的一个忠实读者，所以早就知道他的名字。他那时大约四十岁左右吧，略高的身材，微胖的圆脸，穿着很为朴素。虽然长期沉浸于西方文化，举止却不带洋气。他给我的印象，是对待事情很认真，开会积极发言，当然免不了书生气十足。记得有一次是开座谈会，地点就在今天的文艺会堂，黄嘉音上台侃侃而谈。我是接在他后面发言的。他谈些什么，我自己谈些什么，都忘记了。那时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很高，出于爱国热忱，真心诚意拥护党的领导和各项政策。不过也爱提意见，又常常轻信，说话直率，因此不大能为各级领导所喜。

不久，反右扩大化的悲剧就开始了。出版系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称为“藏龙卧虎”之地，反右斗争自然开展得

如火如荼，一天一个“胜利”，揪出的右派分子不计其数，黄嘉音是上海出版界的头面人物，很快就被揪出来了。而且当作“崇洋媚外”的典型反面教员来教育大家，专为他开了一个斗争大会。我记得地点在上海电影院，楼上楼下全坐满了。正当炎夏，天气很热，会场气氛更见炽烈。上台批判的人很多，别的一个也记不起了，只有一位著名精神病专家的发言却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这位专家说：黄嘉音自称懂得精神分析学，还以医生自居，经常为人作精神分析，这是胡说！黄嘉音根本不懂医学，他贩卖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唯心思想！这位专家是黄嘉音的老师，是出版社这次专门请来“剥开黄嘉音冒充精神分析专家画皮”的，这倒使我知道，黄嘉音不仅过去在他主编的《西风》上经常介绍精神分析病例及其治疗方法，而且现在还付之于实践，增加了我对他的认识。至于这位专家的发言，我相信不是出于本心，而是迫于形势，无可奈何。那些年代连父子、夫妻尚且相斗，遑论师生！

反右暂告结束，我也因未逃劫数，又有幸与黄嘉音一同参加过一两次学习，主要谈各自的改造计划。他给我的印象，仍是认认真真，当然还是书生气十足。

一九五八年底，上海出版系统掀起了支援大西北宁夏的高潮，去了不少人，我听说黄嘉音全家去了。他是真心诚意到那里去的。到了通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有从宁夏回来的人传来消息，说黄嘉音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关在监狱里死了。事情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是在监督劳动的时候，他忍受不住对他的百般侮辱，不知是出言冲撞还是还了一下手，便构成了反革命罪。彼时彼地，右派升格为反革命是轻而易举的事。写到这里，我是感到很悲痛的。长期极左思潮肆虐，伤害

摧残了多少有才能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呵，黄嘉音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当然没有疑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嘉音的这一冤狱一定得到了昭雪。我希望上海出版界不要忘记这一位对现代出版事业作出过一定贡献的人士。如果编写“上海出版家列传”或“编辑列传”，请莫漏掉他吧！

关于《西风》，我也想说几句话。我看《西风》恐不能归入“礼拜六派”，两者的宗旨与格调绝不相同。《西风》主要介绍西方社会的风尚、习俗、文化、艺术、医药和科学以及存在的社会问题等各方面的知识。它提倡幽默与趣味，但并不“颓废”。我觉得《西风》当时给我的好处就是增广知识，扩大眼界，同时培养我的幽默感。我最爱看它转载自《笨拙》(punch)与《纽约客》(New Yorker)的漫画。那种不用再加文字说明的西方特有的幽默，常常叫我忍俊不禁而又回味无穷。《笨拙》与《纽约客》这两个刊物的名字也译得好，既译其音，兼肖其形，并引发读者想象，可称神来之笔。仅此已可体会《西风》的某种风趣了，单是这点风趣，今天似乎尚无继者。

一九八四年

颜文梁先生年谱

一八九三年（清光绪十九年）癸巳 一岁

是年七月二十日（夏历六月初八日）先生生于苏州干将坊本宅。名文梁，字栋臣，乳名二官。按文梁之梁（有木字傍），通作梁，因父信五行之说，谓先生命中缺木，特命作有木字傍之梁。

曾祖碧泉，曾祖母邱氏。

祖知恬，业医，二十八岁时罹伤寒症去世。祖母程氏，怀孕在腹，产后悲伤过度，不治身亡，年二十九岁。遗二子，长乃先生之父，次遗腹子即先生叔秋泉也。

父纯生，名元，号半菴居士，生于一八六〇年（清咸丰十年）。母张氏，生于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二十二岁归先生父，生二子一女。长子文焘，次即先生，兄弟相差三岁。女珊，小先生九岁。

先生父纯生幼失怙恃，长以画名。生平事迹略见于王德森撰《半菴居士生传》，传云：“半菴居士者，吴门老画师也，年七十矣，而兴益豪。余隐于医，居士隐于画，不与世相闻，日惟于茶亭客座间听居士从容谈画理，娓娓不倦。居士左耳失聪，右耳亦重听，春冬甚，而夏秋少差，故以半菴自号也。尝自言，粤事甫平，即少怙恃，抚育于外王母。年十余，习商业于沪上，屡从业不成，而天性嗜绘画，喜涂抹，稍稍积资，始从师学。时山阴任伯年，方以画名张歇浦，见而才之，录为弟子，得其指授，而艺益精。返苏，又与萧山任阜长游，得交阜长子立凡

辈诸名画家，手追心摹，而神乎其技矣。既而佐友转漕燕北，乘兴点染，人争取之。越两载，倦而归，遂以画为业。其时安吉吴昌硕，松陵陆廉夫，同县顾西津，皆以书画负重名，不轻许可人，而独于居士无贬辞焉。然自恨早年失学，欲补读书，并习篆隶，娴吟咏，以润色画事，其耄而好学又如此。”德森，字严士，号岁寒老人，昆山人。寓苏州行医，娴于文学。此传撰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己巳，先生父时年六十九岁。昌硕，名俊卿，号缶庐，又号苦铁。廉夫，名恢，号破佛龕主。西津，名麟士，字鹤逸。皆与先生父为友。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 甲午 二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三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四岁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五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六岁

是年始入塾读书。启蒙师周先生（名佚）。此为旧式私塾，设于先生居宅斜对门。初授方块字，周先生写“独占鳌头，状元及第”八字，命依次熟读。继授《三字经》、《千字文》等书。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七岁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八岁

是年自周先生私塾，转入郭先生（名佚）私塾。始读《大学》、《中庸》、《论语》等书。

新正，先生随祖姨母程氏至亲戚蒋太太家拜年。先生偶至花厅，见桌下有瓷髻数只，大肚圆口，似向人张口而笑。先生端详久之，愈感逼真，骇而奔去。祖姨母与蒋太太怪而问故，皆笑童驢无知。然先生自此印象深入，成年后屡欲以髻作画，肖其笑状。后至巴黎，见有画家即系专以画髻闻名者。一九七

二年，先生时年八十矣，画髻之念仍在。某日乘电车，立而未坐，售票员示以座位，先生告以下站即到，不需再坐。售票员见先生龙锺倔强，笑曰：“人老心不老。”先生陡忆童年所见髻笑往事，归家感而赋诗曰：“瓷髻张口对我笑，笑我童年胆量小，如今磁髻依然笑，笑我人老心不老。”志此以见先生画髻之志，数十年未泯也。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九岁

六月，妹珊生。先生童年扎辫，妹生之日，正于厅前对镜照影，见镜中亦有一扎辫童儿，诧以为镜后必藏有一童儿在，猛以手往镜后一扑，欲“抓牢伊”，此时忽闻报妹生矣。妹后适吕氏。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十岁

是年又自郭先生私塾，转入张先生（名佚）私塾。

练百步拳。塾中有年长学生诳先生练所谓百步拳，云每夜中二时起身，朝井中打空拳百下，至四十九日，井水涌起，中有妖怪出现，即可厉声问其姓名，彼回答后自然隐去，后此妖怪即为我所役，我隔百步击人，人必随拳而倒。先生信以为实，且欲实践以验其效，每至午夜，潜起至庭中井边练之。先生时伴祖姨母程氏眠，一次伊夜半醒觉，忽失先生所在，大惊，遂为察觉，严加禁止。先生遇事喜亲自实验，自童年已然，此其一事也。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十一岁

夏，某日，先生父纯生携先生访金心兰。中途遇阵雨，避于况公祠，先生父为讲《十五贯》故事。心兰，名 ，号冷香馆主，长洲人。善画，为怡园画社社友，画社则吴大澂所创也。心兰晚年失明，自号“瞎牛”。

是年先生父应友人俞觉请，为绘无量寿佛八帧，刺绣织锦，献之慈禧太后。赐“福寿”二字。觉，字冰臣，举人，为张謇门人，曾赴日本留学。妻沈氏，工刺绣，得慈禧赐字后，改名曰寿。后夫妇创办刺绣学校于苏州，作育刺绣人才甚多。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 甲辰 十二岁

先生在私塾前后读书六年，是年入诚正学堂。学堂系书院性质，受维新运动影响，设有算学、历史、地理等新式课程。堂长陆敬斋。

先生自幼爱涂抹，喜以实物作描绘对象。是年以毛笔画火车、轮船，亲友见者，咸以为能肖其状。

始遵父教，临摹《芥子园画谱》，学国画。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十三岁

是年临摹胡三桥画作《锤馗》一幅，吴昌硕见而嘉之，为题字曰：“画稿出三桥胡君手，栋臣世兄仿之，益见高深独到。昔人云唐晋贴，非同工，仿佛似之。”署老缶。三桥，名锡珪，号红茵馆主，长洲人。擅人物山水，时人称其胎息阎李，白描水墨，精雅无比。死时年未四十，识者惜之。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十四岁

是年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读书。长者长洲，元者元和，吴者吴县，皆苏州府辖也。清末科举之制既停，苏州地方士绅集议，移科举经费办高等小学四所，长洲、元和、吴县各一所，再一所则以长元吴合名，校址设苏州草桥，供住宿，四年毕业。校长称总理，长元吴小学首任总理为王同愈，曾为翰林；副总理蒋炳章，亦进士也。教务主任章慰高，字伯寅。

是年与先生同时入学并同班者，有吴万、顾颂坤、郑际云、潘锡厚、章元善、俞人龙等人。万字湖帆，颂坤字颀刚，际云

字逸梅，后皆以字行。人龙字肖簪。

图画教员曰罗时敏，崇明人，上课以铅笔画教学生，兼教毛笔画，系以毛边纸五十页合订一本俗称“大五十”者习之。

“大五十”可于校中任意领取，费用期终结付。时同学中盛行打灯谜。先生常自制谜面，粘于自修室玻璃窗上，即以“大五十”为奖。某次以教务主任章慰高名制一谜面曰“章伯寅之父”，打一同学名，卷帘格，谜底则高慰生也。为同学传诵，以为制作甚巧。先生父期终至校交费，见领用“大五十”数倍于人，怪而问之，先生答以用作灯谜奖品矣。父笑而置之。

此一时期，学校生活颇饶风趣。每晚就寝后，宿舍中常举行武装演习，以此为乐，先生亦多参与。就寝前例由舍监点名，熄灯，一时寂静无声，稍间，忽同学群自被内跃起，一时枪棒盾牌，纷然并举。所谓枪棒，门闩、帐竿是也；所谓盾牌，枕头是也。时尚无电筒，迨舍监闻声执烛而至，则各迅速钻入被内，一无声息。舍监云，则又蠢蠢动矣。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十五岁

先生入长元吴高等小学后，第一年图画成绩平平，至第二年则跃居前列，每次习作可得九十分以上至一百分矣。罗先生教画之法，颇与一般不同，系以粉笔于黑板画一物象，旋即揩去，命学生至黑板依样默画。先生默画，辄获优等。某次，罗先生在黑板画一十景榭象外廓，命学生依次至黑板添画其中层次间架，人画一笔，互为补充，名之曰“发明”，实寓立体透视训练之意。最后罗先生问曰：“尚可发明否？”众唯唯，以为无可发明矣。独先生细察，见榭中一角，尚有一笔未备，乃上台补足之，甚得罗先生称赞。又一日，罗先生于黑板上作一山水范本，重峦叠嶂，林木森然，既成即拭去，指名先生上台默写

之。先生不假思索，于黑板上走笔如飞，顷刻而就，位置层次，不差累黍。时同学中有四人图画成绩相等，同称翘楚，每相竞赛，则吴万、汪可权、潘志铎与先生也。

先生是年作铅笔画《浒墅关车站》，画成后于夜间煤油灯下着色。次日视之，画面色彩呈一片深黄，因悟灯光下不宜施色。自此常留意于作画之光线色调，及其强弱浓淡之各种变化。

八月，至无锡旅行，作铅笔画《惠山》，画中配以人物，有两人对坐石上。归后呈之罗先生，蒙其嘉许，配以镜架，置于学校陈列。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十六岁

秋，南京南洋劝业会开幕，学校推荐先生所作铅笔着色画《苏州火车站》，作为本校学生佳作陈列。先生借此得至南京游览，观光劝业会，又参观南京陆军学堂，见学生戎装操练，气概雄壮，颇生向慕之心，以为强国必先强兵，文事无益于国，决意投笔从军。返校后，积极上体操课，锻炼身体，唱军歌，吹军号，作从军之准备。

是年与同学俞人龙、沈维玦、陶为湘、查杰等七八人，合影留念，皆素日志趣投合者也。为湘后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杰则擅长运动，惜皆英年早逝。同时留影者，今唯人龙与先生健在，且同臻高龄，洵为有缘。人龙居苏州，善旧体诗，以吟咏自适。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己酉 十七岁

是年先生毕业于长元吴高等小学。图画考试系以山水及动物命题，先生得一百分。

先生既有从军之志，毕业后即申请送考陆军学堂。按投考陆军，本校必须征得家长同意，始允送考。而先生父意有不愿，

所复学校征求家长意见之信，仅云先生“本人愿去”，教务主任章慰高以为此乃家长不同意之表示，故不允保送。先生殊失望，郁郁不乐。兄文焘知乃弟意，于是怂恿父携先生去上海观看外国马戏，以舒胸怀。时父已见上海报载商务印书馆招考技术学生，亦有意携先生赴考。

七月，抵上海，看马戏，并遵父命至商务印书馆报名应考。报考者四百人。商务印书馆以所聘日本画家松冈正识主考。国文题《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论》，图画题为用铅笔画一猫。揭晓录取三十人，先生在焉。

商务印书馆录取技术学生，规定先须学习半年，月发银元一枚，供膳宿。教材系以日本美术学校所编《洋画讲义录》与苏州两江师范学堂教习日人村井雄之助所编画贴为主。同学有廖恩寿、唐仲礼等人。恩寿后为中国从事拍摄电影及制三色铜版之第一人；仲礼后为中国首创石印凹版，曾任上海印制局局长。学生宿舍在北福建路，上课则在宝山路，相距五里之遥，先生为节约计，逐日步行往返。月用不足，则由叔父秋泉资助。叔时设怡盛洋货店于南京路，陈晋甫先生时为店员，以诚恇勤恳，为先生叔所器重，后即先生岳父也。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庚戌 十八岁

是年先生以商务印书馆技术生毕业，分配铜版室为练习生，铜版室主任为日人和田满太郎。先生所习者除刻铜版外，兼习机器铜版制版术，指导技师为日人渡边金之助。先生业余，辄以铜版室景物为写生描绘对象，凡室内茶壶、皮鞋、雨伞等物率为画题。某次画渡边刻铜版工作后影，又一次画办公桌玻璃板所映屋顶悬挂煤气灯象，日人技师见之，目视先生，用日语交谈。有顷，其中一人用上海话谓先生曰：“好来西！”盖铜

版室日人技师都不谙华语，仅晓两句上海话，坏为“呀呀乎”，好为“好来西”也。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 辛亥 十九岁

先生在铜版室学艺，整日伏案，精雕细作，父恐过损目力，谋之蒋维乔。维乔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乃将先生调至画图室，主任亦日人，即前主考先生入学试之松冈正识，西画家也。先生得其指导，专习西画，实自此始。

松冈年六十余，待人律己，都尚严格。善画葡萄，精究透视，颗颗明亮，饱含鲜汁，先生慕之，然勿能为也。某日经福州路，见一镜框店中陈列印版西洋油画一幅，画内葡萄、桃子，精美如真，果汁喷溅欲出，心益羨之，立志学习。唯镜框价昂，商之店主人，仅将画片购回，反复临摹，渐得其法。又一次于街头见弄西洋镜者，中有西洋画，二人对坐，窗间置一玻璃牛奶瓶，亦亮澈与真瓶无二，为之神往，归后益发奋摹习，日有进步，乃粗解光影之理。

是年初学油画。父前至上海，曾见法人所画普法战争巨幅油画，即薛福成出使巴黎所见，法人以之激励国人爱国之心，为文记之者也。父见其场景宏伟，形象真实生动，极赞之，以告先生。先生知有油画之名自此始，亦欲习之。然苦无师授，又无工具材料，忽发奇想，于水彩画上涂以胶水，求其“发亮”，如油画之状，而屡试无效。后从松冈教，于水彩上施以蛋白，果“发亮”矣，然终非油画也。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 壬子 二十岁

是年三月，从父命，辞商务印书馆职，回苏州，俾专心学画。是为先生以绘画为终生事业之一重要起点。

至苏，为苏州新剧社绘制布景。辛亥革命，民国成立，百

业维新，新剧风行。开明新剧社系排演话剧之团体，上演剧目均加“新”字，如《新茶花女》之类，以示别于旧剧之旧。先生所绘布景，亦以电车、洋房、火车等新型事物为多。

是年立志自习油画。先生先于玄妙观书摊曾购得西洋油画杂志多册，又自父之友人俞觉处借得自日本购回作刺绣范本用之油画多幅，临摹取资之具差备，唯缺油画材料。乃自行试制，先以熟菜油和以中国画色彩试之，不能干燥。又是蓖麻子油和以色粉试之，亦同此病。再试以瓷漆，则色粉调入粘住不易着笔。后从漆匠教，用熟桐油调以色粉，似可溶化矣，然粘性过强，滞涩殊甚，难以开笔。后再求教老年有经验之漆匠，教以用鱼油（现名清漆）加松香水，调入色粉，易溶速干，可以作画。先生所作第一张油画《石湖串月》，即松香水加鱼油画也。石湖在上方山，苏人于中秋后二日，群游石湖看月，湖中灯船如织，笙歌之声，通宵不绝，先生所绘即此景色，以之陈列于观前街裕昌祥镜框店，经友人朱士杰介绍其同学之姊赵颢，以八元购去。颢，女刺绣家也，购此画作刺绣范本之用。士杰住干将坊，与先生毗邻，喜吹笛，亦能画，因与先生有同好，故相友善。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 二十一岁

是年始任桂香小学教员。小学为贝氏家庭所办，校址即设于贝氏桂香殡舍，故以为名。校长贝颂美，教员贝启中。贝赋琴医生子也。先生教图画、手工、体操，月薪三元。

先生夙喜音乐，善辨音色。尝取磁碗，别其声之清浊高下，剔存凡七，以箸击之，歌曲小调，悉可借碗以为节奏，听者直以与乐器无殊也。至桂香小学任教后，即组织学生二十人，成立乐队。自以薪金四元购笛二十支，又以五元用蒸笼蒙以牛皮，

制铜鼓一面，师生同练进行曲，且常“出队”演习。“出队”者，游行之谓也。出队时，学生列队，先生前导，击鼓吹笛，招摇过市。市人见此不成乐队之乐队，无不哄笑，先生等意态自如，不以为嫌也。

是年继续自行试制油画材料。用鱼油作画，虽效果尚佳，然不能作高低凹凸状，无立体感，先生意不满足。知者有告以所谓亚麻仁油者，云性质优良，宜于作画。先生立即赶赴上海，至棋盘街科学仪器馆探问，果有此油，购得一瓶而归。先欲验其性能良否，乃试涂于卧室门框，随时察看，至第七日，果干燥矣，为之喜极。先生所作第二张油画《飞艇》，即系以此亚麻仁油为之者也。此画之作，乃先生偶于苏州火车站见贴有上海江湾跑马厅广告，云有美国人史天生小姐于某月日作飞艇表演，欢迎观看。先生对新鲜事物素有爱好，为其所动，即携带画具，乘火车至沪参观。是日观者甚众，史天生小姐着红色飞行衣出场，作婀娜刚健之姿，向观众频频招手。惜起飞仅及屋顶，即自行坠落，虽一再作轰隆发动之声，亦不能升起矣。观众讪笑，先生则以为此乃科学实验，失败不足为耻也，为图其飞翔之状，以表赞美。此画陈列于苏州裕昌祥镜框店，为警察局警察科长王锺元以二元购去。锺元，河南人，醉心科学，尤喜研究天文，亦好美术，见《飞艇》图，赞赏备至，愿识先生，遂相过从。锺元自上海购得商务印书馆出版沈良能编译之《透视学》一书，有不能解者，质之先生。先生已购读《论画浅说》一书，中有透视一章，颇感兴趣，唯过于简略，仅足浅尝，得锺元此书，读之甚喜，与锺元共作探讨，并以书中理论，观察实景，自此有志于透视学之研究。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甲寅 二十二岁

是年改任钱业小学教员，并应苏州商团事务主任何筱农之请，教习吹号。商团成员皆各业商店店员，每晨集操，以军号进退。先生所教吹号员，中多成绩优异者，后且有至陆军任司号长之职。

初识吴子深，经筱农之介绍也。子深，名华源，顾鹤逸画弟子也，作山水竹石，甚有逸趣；家饶于财，称苏州首富。为人慷慨重然诺，与先生一见如故，交谊日笃，终生不渝。后先生办学，创立苏州美专，得子深财力之助为多。

是年顾鹤逸为子公柔娶妇，先生画《婴戏图》以赠。鹤逸与先生为至交，于先生多所奖借，尝以仇十洲、郎世宁许之。此图即从鹤逸意，仿郎世宁工笔画法为之。鹤逸为公柔悬之新房。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二十三岁

春，至振华女学任教。校长王谢长达，苏州女界维新人物也，以提倡天足闻名。有二女，均送美国留学。

识金松岑。松岑，名天翮，苏州人，以文学负重名。是年，江苏省第二届运动会于苏州举行，先生为图当场实景，陈列于观前街镜框店。松岑见之，大为欣赏，知先生执教振华女学，因女学舍监周女士之介，与先生订交。松岑喜游，所至均有题咏，尝以诗意属先生绘《胜游图》十幅。先生后又据其诗意，绘《太湖东山图景》四幅。松岑甚宝爱之。

是年识杨左匋、锡裘兄弟。左匋，吴江同里人，读书东吴大学，敏捷多才，能西洋画。东吴大学有话剧团，其布景皆左匋所作。是年阴历正月初二，至同里演出，剧社主人约左匋兄弟、朱士杰，张某（名已忘）与先生五人，于幕间插电光魔术，以“美国电光专家”相号召，有骷髅跳舞、空中飞头、飞球等

戏，其灯光幻景，皆左匍设计，观众惊奇，莫测其妙。左匍后应英美烟草公司聘任图画设计师，得公司资助，赴美国留学，曾参加华德狄思耐动画片《白雪公主》之摄制。其弟锡裘，业建筑师，尝设计上海百乐门舞厅与大陆游泳池。

十月，与陈蓉珍结婚，先生叔秋泉作伐也。蓉珍姐妹五人，蓉珍居长，其妹即先生叔子妇也。

十二月，母逝，享年五十一岁。母归先生父三十载，安贫节俭，治家有条，不以家事累父。母亦能画，父画人物，母辄佐之布景；父画花卉翎毛，则为之研朱调粉。唱随之乐，怡如也。不幸染痲瘵，中道而亡，先生父痛悼，子女悲伤。母逝前一日，手持苹果一枚授先生，先生藏之不食，以为纪念，日久成灰，终不忍弃，今尚以玻璃罩罩之。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二十四岁

是年兼任吴江中学图画教员。吴江中学设于炉香亭，旁有三高祠者，其神殿为学校用作教员宿舍。先生同舍五人，与杨耕青、夏汝仁最相得。先生素不喜杀生，而耕青教博物，日剥制动物禽鸟标本。某日，耕青于郊外拾得髑髅一具，欲以之骇先生，携回供于香案之上。先生见之，知其用意，乃以其道还治之，取此髑髅藏之他处，而另以报纸包一手炉，纳于耕青之被中。耕青自外返舍，不见髑髅，佯作不知，就寝，以脚入被，忽触纸包，中有坚物，大骇，以为髑髅在此，缩脚不及。众皆匿笑，耕青亦自笑。耕青为人，外圆内方，汝仁则严正忮急。耕青后任苏州女子师范教务主任，学生与某教员不合，而起风潮，有毁物之举。耕青曰：“器物无罪，毁之何益！”愤而辞职，后遂家居不出。汝仁青年早死，遗寡妻孤儿，无以为生。耕青迎归家中，为具衣食，贍其子至成长自立而止。一九五六年，

先生返苏州，探知耕青尚健，登门拜访，白发相对，欢谈往事，终日不倦。

是年吴秉彝从先生学画。秉彝，子深四弟也，能画花卉。子深先从顾鹤逸学，求作画之法。鹤逸教以国画亦须参用西法，并以先生之画为式。子深已与先生相知，至是命秉彝从学，己则旁侍，观先生用笔之法。秉彝后任苏州美专国画教授。

先生是年应子深请，为作油画春夏秋冬四幅，幅各有题，春曰“浅红嫩绿远山春”，夏曰“绿树荫浓村绕水”，秋曰“赤霞光烂火烧天”，冬曰“月黑灯昏残雪夜”。

先生自作油画，常苦粉色不全，缺少原色，难以调配，时作各种试验，以观其变。是年获读日人矢野道也所著《绘具制造法》，日语绘具，华语颜料也。读此书后，颇有所悟。尝依法以重铬酸钾，和以醋酸铅，沉淀得粉末，晾干即成铬黄，应用甚便。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巳 二十五岁

是年兼任太仓省立第四中学图画教员。识陆寰生。寰生，号顽僧，四中学生也。诚朴好学，善读古书，长于文牍，与先生谊属师生，情同家人，后助先生创办苏州美专，任秘书行政工作，忠于所职，数十年如一日，先生倚为左右手。

是年为上海来青阁书坊画水彩画风景十六幅。来青阁主人杨寿祺，先生读书诚正学堂同学也，通晓古今书籍版本，设来青阁书坊于上海三马路，经售古今书籍，兼印售画片、月份牌等美术制品。寿祺多礼，新正遇友于途，亦必当街跪拜，不稍苟简。此十六幅所画乃杭州、苏州与无锡风景，系先生于苏州去太仓班船上，陆续画成。当时储稿及画具之手提藤箱一只，迄今犹存。画分四次交稿。寿祺得稿即交商务印书馆以三色版

彩色印之，四幅一组，售价一元。发售后，销行之广，出乎意外。第一组四幅，寿祺每幅原致酬二十五元，后以销行日增，又每幅补送二十五元。第二组四幅，每幅提高致酬一百元。至第三、四组，则每幅致酬二百五十元矣。是年，先生又为来青阁画月份牌两幅，一曰《春园独立》，一曰《梦还》，画中人皆少女，徇时好也。一九六二年，米谷、江丰为筹设中央美术馆事，自北京至上海征集作品，访先生于沪寓，承告北京近发现《梦还》，知为先生旧作，拟入馆藏。先生为之逊谢不遑。

是年又为《滑稽杂志》制封面，画一人捏鼻作滑稽状。此与先生所画月份牌，同为少年随俗之作。《滑稽杂志》仅出二期，编者为王钝根、丁悚。

先生往返吴江、太仓，所乘班船，恒于苏州阊门犯人码头停靠。前清官府解送罪犯过江，此为专用码头，故名。某次，先生自太仓返苏州，至犯人码头上岸，时已昏黑，忽见前行一乡人皮夹落地，即有人疾趋拾起，知为先生所见，回顾示勿声张。先生方错愕间，乡人慌张奔回，遍地寻觅，云所落皮夹中有钞票四十元。拾者暗拉先生衣角，诓乡人曰：“一小孩拾去。”随意指一方向，乡人即又奔去。先生责曰：“失物应归原主，汝此举将使乡人情急跳河，汝何忍心！”拾者曰：“天上落下，地下拾得。”愿与先生平分。先生拒之，拾者纠缠不放，直至马路亮处，先生不顾，雇车而归。拾者犹在后呼曰：“蠢大！”次日，先生至茶馆吃早茶，晤父执朱怀瑜，谈及此事，尚为乡人失财或致轻生而忧。怀瑜笑曰：“此‘虱包’也，拾者与乡人实同伙也。汝幸未与拾者平分，倘一念贪财，则乡人必于汝等分财时奔回，执汝大敲竹杠，非罄身藏所有不止。”先生闻之，亦哑然失笑。“虱”，吴语音笃；“虱包”者，诈以失物为诱，引人上当

圈套之谓也。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戊午 二十六岁

是年又兼任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图画教员。为顾鹤逸画水彩画春夏秋冬四幅。又应苏州张多记扇庄约，画扇面五幅，其一为《博古图》，俗称“打翻字纸篓”，鹤逸为题曰：“唐、宋时画尚写真，绳尺维谨，南宋以下，真意方疏，渐入化境。但雍、乾间，海西人郎西宁供奉内廷，所画与我国古法合，得毋昔之沦入异域者，今将返之祖国乎？循环之理，岂独画然。因观颜君文梁所绘，雅有古意，爰舒肌见。”鹤逸所遗画论不多，此则所题，于举世风靡元、明文人画之时，独标唐、宋写真之旨，可谓卓识。此扇画面，以套色彩印，购者甚众。余四幅为风景：一题“春草碧色，春山绿波”，一题“冬郊犹出牧，不畏雪霜寒”，一题“清泉石上流”，一题“月映江心”。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己未 二十七岁

是年一月，与葛贲恩、潘振宵、徐泳清、金天翮及杨左匄共同发起美术画赛会，征集当代苏州与全国各地中西画家作品陈列，以十六字为宗旨，曰“提倡画术，互相策励，仅资浏览，不加评判”。陈列品范围，曰：国粹画、油色画、水色画、气色画、钢笔画、铅画、炭画、蜡画、漆画、焦画、照相着色画、刺绣画等各种画件。观此名目，可知当日各种画称，与今迥异也。陈列资格，曰：个人之著作以及学校之成绩，非抄袭或临摹前人之著作者。每次陈列时间二星期，自阳历元旦至阳历一月十四日为止。此美术画赛会按年举行，赅二十年未间断。初期展出作品一二百件，后逐年增至二三千件之多，蔚为大观。

是年又兼任苏州第一师范学校图画教员。至是，先生已同时兼任苏州五所中学教职，薪金所入每月最多达一百二十五元。

后此先生办学，以至出国游学，赖此项收入为多。

六月，至上海，画大世界游艺场夜景。时先生正试验各种画布之不同性能，此画布系用肥皂、铅粉、胶水混合涂于竹布试之。画至一半，油彩剥落，乃知此法不可用。于是改用熟桐油、火油、石粉调和作底，涂于布面，使油彩得以粘附。又试于白布直接着色，不用他物打底，以观其效。总之，先生学习油画时，一切画具材料，均须自行摸索试验，非如今日，至市购取，各物俱备也。

初作粉笔画。是年粉画材料初入中国，先生首以试用于创作，第一张粉画作品为《画室》。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 二十八岁

是年作粉笔画《厨房》，以写实法为之，意在重现一典型中国旧式厨房全景，求形象之逼真，色彩之调和，而于光影之向背明暗，尤三致意焉。画中主点偏于右方，有正面、侧面、斜面、直线、曲线、圆形、方形、不规则形、以及光影之高低、左右、前后等距离及不等距离各种透视变化，为先生数年来学习、观察及实验透视学诸原理法则之总集合。自谓画风素尚写实，学无专师，至此画之成，而稍具型式云。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辛酉 二十九岁

是年夏作粉笔画《肉店》。开始以苏州陆稿荐肉铺为作画对象，借对街一钟表店作写生之地。次日，陆稿荐老板忽暴病而亡，店门紧闭。开业后，其后人出于迷信，不允先生继续作画。先生于是另觅对象，得学生张德铨介绍，以其叔父所开设之“老三珍”肉铺代替，写生位置设于其对门之“朝天禄”糖果店内。时画家写生，尚属罕见，故作画时，观者如堵，“朝天禄”糖果店为之门庭若市，交易骤增。按《肉店》为先生早期粉画代表

作之一，以人体与物体作适当之对比，重现二十年代苏州市民夏日生活景象，其运用透视与比例，至为精确。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三十岁

七月，与胡粹中、朱士杰、顾仲华、程少川创办苏州美术暑期学校于海红坊苏州律师公会会所。是为先生办学之始。先是先生早有意于创办专门美术学校，从事美术教育，培育艺术人才。一九一九年发起美术画赛会后，即拟约同学王承英、陶善镛筹办一美术学校，因承英等不感兴趣而罢。继于太仓四中识留学东京美专之叶费坤，亦以此意告之，谋其合作，费坤亦无意于此。至是得粹中等四人为同志，又商得苏州律师公会同意，愿暂借会所，遂先行试办暑期学校。招生广告甫出，报告者纷至沓来，共有学生一百余人，且以苏州大中学校学生居多数，殊出先生等意外。此次暑校，由粹中、士杰与先生任教西画，仲华、少川任教国画。至两月结业，学生意犹不足，要求续办长期学校。先生得此鼓舞，四出筹借校舍。然或以房主不允，或以租值过高，成而复失者数次，几经奔走，最后得苏州县立中学校长龚赓禹赞助，允以县中余屋九间借作校址，先生得此基地，数年来办学志愿终告实现。苏人因主办者系先生、粹中、士杰三人，乃以“眼乌珠”（颜胡朱）称此初生学校。粹中住铁瓶巷，自少即与先生友，日相过从，共研画法。

九月，苏州美术学校成立，第一期招生，得十三人，有张紫珺、黄觉寺、张念珍、花农、蔡鸿斌、高奎章等。教师除原暑期学校四人外，又请顾公柔教国画。学生以两年毕业，每月交费一元。草创伊始，凡百简陋。所有开办费及日常经费，均由先生于数校兼课所得薪金支付。教员全尽义务。开学后，聘金东雷任文学教师，亦义务职，东雷为抬高学校身份，对外自称

有薪水三十元。校舍无独立门户，与县立中学共出入，校牌以仿宋体写之，挂于县立中学校牌之侧。学习所用纸笔颜料，均由学生自备。上素描课，无石膏像，先生于旧货摊以大洋四角购得一日本造小型狮子像，作学生素描之用。雇校工一人，乃常熟老农，名竹溪。后徐悲鸿来苏见之，以其貌极拙朴，用作模特儿，画入《田横五百义士》图。

美术学校开办未久，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刊出一署名王一夫之《旅行写生日记》连载三日，略云至苏州见一所谓“美术学校”，有一面骷髅式校牌，十三幅水车式画架，学生学画打格子，无一石膏像，云云。先生见之，知其讽刺所在即本校设备之陋也，恐引起社会人士误会，致此初生学校横遭夭折，特往访苏州劝学所所长潘振霄，请其致函报馆，证明先生办学宗旨，非为敛财者。振霄曰：“办好就好，何需证明？”友人杨耕青见文不平，自告奋勇，撰文历述先生办学之志与学校经费艰困情况，亦投寄《时事新报》，冀其刊载，迄无回音。然此事自寝。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 三十一岁

是年来读学生增加，又借得三贤祠河南会馆房舍三间，成立西校，原附设于县立中学之校舍则称东校。第二期招生，改四年毕业，录得十余名。录取新生中有名周焕章者，湖南人，上午携铺盖到校，拟入学住读，见校舍设备简陋如此，大失所望，下午即襁被而去。学校经费拮据，至点灯费亦无着落，校工竹溪售去火油箱一只，得大洋二角，以之购买灯油。

是年，先生所办美校首次招收女生一人，乃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徐慧珍，自愿毕业后来美术学校学画。是为苏州学校男女同学之始。先是，辛亥革命，民国共和政体成立，

而苏州社会之封建守旧势力则依然如故。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有二女生因剪发而遭开除。凡女子学校，恒设有所谓“界门”，以之隔绝内外，虽男教师亦不得越界与女生相见。其防范之严如此。至是先生于美术学校首开男女同学之例，青年学生与社会进步人士群表欢迎，风气为之一变。二三年后，曾开除剪发女生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其本人亦随时髦自行剪发矣。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 三十二岁

是年，美术学校第三期招生，录取四十人，中有女生十余人，特辟东校校舍三间为女生宿舍。有女生胡某，无锡人，入学前已订婚。入学后，因募捐演剧，与学校英文教师王君互生感情。王君，东吴大学学生也，爱情热烈，至有逾墙之举。学生朱某，年少好事，预先侦知，伏于墙下，将王君扭送警察局。先生深恐此事授顽固派以反对男女同学之口实，与胡粹中、朱士杰多方调处，警察局未加深究。胡回家结婚，王撤销妄念，此一喜剧得告结束。

是年浙、鲁军阀战于安亭，苏州震动，群相避难。先生亦仓皇出走上海，仅随身手携小提琴一，法国制粉画纸一卷。同学郑逸梅于车站见先生惶遽之状，撰文记之，载于《晶报》，曰《颜文梁逃难》。十月，战停，自沪返苏。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三十三岁

是年，陆寰生来美校任研究生，兼管教务，嗣后专任校长室秘书，学校文牒往来，皆寰生主之。时美校第一期毕业生大都志愿留校任职：黄觉寺、张紫珩任教师，徐则安、张念珍分任校务、事务工作。此数君与先生志趣投合，不谋荣利，不计报酬，苏州美专之得发展有成，此数君与有力焉。

是年奉、直军阀混战，直军大溃，奉军进驻苏州，传闻于

城外杀人，苏人一日数惊。先生主办之美术画赛会仍于阳历正月按期举行。奉军官兵皆戴皮帽，有进城至旧皇宫参观画赛会者。人见皮帽，即知系奉军也。

是年九月，子振康生。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三十四岁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 三十五岁

是年，先生应苏州公益局之聘，任沧浪亭保管员，受命筹设苏州美术馆。美校亦自县立中学附址迁设沧浪亭内，正式定居。按沧浪亭为苏州历史名迹，广阔数里，具山水泉石之胜，然年久失修，房舍倾圮，亭园荒废，邑人久有重修之议，因无人任责，议而不行。至是北伐革命成功，新任公益局长蒋靖涛，乃先生旧日学生，秘书徐孟蓼则先生任教第二中学同事也，共赞先生主持沧浪亭重修事。先生亦愿为美校图一有幽美环境之永久校址，遂以公益局委派之保管员名义，接收沧浪亭，除筹建美术馆，陈列当代中西画家作品，此处所属房舍尚多，稍加修葺，由公益局会同教育局拨作美校校址。美校既获定居，又得此良好环境，四方学子负笈求读者日众，校务日益扩大，然经费益感不足，同学友好多有为先生坚持办学之志所动，自愿筹助经费者。杨寿祺首愿年助美校六十元。吴子深谓先生曰：“汝办学，我出钱。”立以千元支票相付，作修理校舍之用。先生为谋久远计，乃筹设校董会，敦请苏州知名人士张一麀、叶楚伦、朱文鑫、金天翮、汪懋祖、王謇、许厚基、龚鼎、徐嘉湘、章骏、赵昌为校董会董事，以子深为主席，委以重任。子深亦慨然自许，不故相谦让。此后凡校舍之修建，设备之购置，所需各款项，率由子深出资相助。

秋，徐悲鸿偕妻蒋碧薇，抱子伯阳仅周岁，来苏相访，始

与先生订交焉。先生至旅馆回访，悲鸿指伯阳笑曰：“惭愧，唯此一子！”悲鸿自法返国，任教中央大学，极赏先生画，以“中国梅索尼埃”赞之。梅索尼埃者，法国十九世纪名画家，以细密真实著称者也。悲鸿力促先生去法深造，谓彼邦美术居世界冠，多大师巨匠，可亲与游处，得其教益。先生陪悲鸿夫妇游天平山，又乘船遨游太湖。悲鸿爽朗，食苏州点心合子酥，喜其甜美，连尽数客；为先生与陆寰生、黄觉寺、胡粹中速写画像。

始从吴孝培学法文。孝培，震旦大学毕业生也。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 三十六岁

是年九月，赴法国巴黎留学。先生出国之念，初起于任教第四中学，有英文教员郑惠祥，系美国留学生，劝先生去法。嗣与悲鸿定交，得其怂恿，心亦为动。适于此时，因北伐易帜，苏州中学校长全部撤换，原有教员大都解聘，先生任教各校，仅有一校留聘，形同失业。时值欧洲各国币值贬低，中国一元可换法郎十二，有利于中国留学生。而先生历年舌耕所入，除办学之用，尚有储蓄八千元，足敷出国费用。后有人谓先生出国，系吴子深资助，非也。子深闻之，亦笑曰：“颜文梁私人从不用我一钱！”时有震旦大学法律系学生孙彭年，亦拟赴法留学，经人介绍，与先生结伴同行。其出国护照等事，则请四中同事郑惠祥代办。美校校长职务由胡粹中代理。至九月，摒挡就绪，自上海乘法国二万吨邮轮帕朵斯号启程。途中经香港、西贡、新加坡，越印度洋，历科伦坡、吉布提，渡红海，经苏伊士运河，过塞得港，即入地中海，于马赛登陆，途中凡三十五天。

中秋之夕，尚在途中。是夜海上月色皎洁，波平浪静，海面如洒银光。中国学生乍离祖国，不免异乡异客之感，群聚船

中餐厅过节，演奏乐器，先生吹笛。中国学生于餐厅悬挂中国国旗，以表庆祝，为法国旅客所阻，云此系法轮，应悬法国旗。中国学生群情愤慨，云中国人集会，有权悬中国旗，坚决不屈。同船有越南学生多人，亦愤法人之专横，挺身而出，助中国学生与法人对峙辩论。法国船长闻声出视，慑于中国、越南学生之威，恐激起事变，自承法人无理，允挂中国国旗，与法国国旗交叉挂出。中国、越南学生终获胜利。先生于此深感国人爱国之心，至国外而益强烈。中国之受侮外敌，非中国人不爱国，乃中国政府之腐败，造致中国人不团结也。

先生自马赛登陆，换乘火车，遂抵巴黎，此世界美术名都也，先生心向久之，今得如愿以偿，欣何如之。先住萌日旅馆，于此识庞熏琴。次日，与高元宰参观卢森堡美术馆，名作如林，眼界一开，胸怀亦为之拓展无限。

特访达仰·布凡尔脱于其寓所。达仰时年八十余，美术界大师也，荣膺欧洲六国国家院士，徐悲鸿游法，即从其游。此时因年迈体衰，久家居谢客。先生按址往访，未敢必见。撤铃叩户，有老年女佣出而应门，问来意，曰：“达仰先生卧病，见否须待通禀。”先生立候，心突突跳，须臾，女佣出曰：“先生允见客，请君下午五时再来。”先生大喜，不敢远离，即于户外附近徘徊，候至五时往见，延入客厅。达仰深坐沙发中，病弱不能起立。先生见其衣着朴素，容色平和，无名人见客倨傲之态，望之如乡村一老叟。知先生中国人，有志学画，甚喜悦。先生呈上所作粉画《厨房》，敬求指教。达仰谛视良久，曰：“佳哉！余以为佳也。唯图中二小孩形象稍有不足耳。”先生问巴黎画家，谁可从学。达仰曰：“巴黎画家有二万人，然无人可学。”先生惊其评鹭之高，愿执贽为弟子。达仰曰：“余老矣，多病，

画笔久搁，且家中无石膏模型，无法为汝师。”乃为介绍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教授披埃尔·罗朗斯，云“巴黎唯此人可为汝师”，嘱往见之。

翌晨，先生即访罗朗斯教授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罗氏见先生所画《厨房》，赏之，又得达仰之介，许入学，愿自任导师。先生即日持其同意入学之签字一纸，办理入学手续。手续简便，有教授之许可，并每年交费一百法郎，即可入学学习。

先生至巴黎，原居旅馆，至是与徐公肃夫妇、周述、高元宰共五人，于巴黎郊区圣西尔，共僦一屋，先生占一斗室，才容一榻，榻上半以置书籍，半以睡卧。公肃学政治，并治法律；元宰读地理，兼习雕塑。均留法学生也。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三十七岁

是年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先于石膏室习素描，室有石膏像数千，凡希腊、罗马有名石像，以至历代著名建筑浮雕、塑刻等名作，无不尽有。石膏室门首堆置麦秸所制小椅无数，备学生实习时取用。学生入室，可任选一像，坐麦秸椅，对之写生。法国学生性情活泼，神态自若，边画边唱，歌声满室。下午，则由学校发给长期出入证，至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临摹原作名画，此亦学校功课一部分。如此学习半年，经各室负责教授审查成绩，合格者经批准，可入其领导之实习室，作进一步之学习。学校共有实习室四，分男生二室，女生一室及男女生兼收一室。罗朗斯教授领导之实习室，即男女生兼收之一室也。各实习室均用真人作模特儿，其模特儿男女老少、黑白、肥瘦、妍丑皆备。逢星期六，即有各色职业模特儿来实习室作自我表演，裸体者不论，须着衣者，且自备各种服装。其合格者即与之签订合同，雇用时间大都为一星期，最多倍之。雇用

期间，学生须另付模特儿小费，每于周末，由一值勤学生持帽至各同学前兜揽，各掷法郎一二不等。模特儿得此，则于合同期内可无缺席之虞。罗朗斯教授每星期三、星期六来室指导一次。师生亲如家人，罗氏每搂抱学生之肩，以手自后指点优劣。其改画用铅笔，不用木炭，改笔所至，精密准确，虽左右前后，不能移动分毫。

新生自石膏室入实习室，表示艺术之升级，例须庆祝，由此升级之新生请老生吃茶点。学校对面一小咖啡店，为学生日常游息叙会之所，新生请客，都假此举行。先生习素描卒业，进实习室，迹遵例于此处举行庆典一次。到同学六十余人，每人咖啡一杯，点心一客，共费八十法郎。此项庆典有一规定，主人须唱歌一支，先生为歌郑板桥道情《老渔翁》一曲，法国学生不解所以，胡卢鼓掌。经此仪式，老生即以平等视先生，不称 vous（您），而称 tu（你），以示亲热矣。校中学生每年举行四种艺术舞会，须取得老生资格者方许参加，每一舞会交六十法郎，参加者全体裸体。先生既成老生，遂有同学来邀请。先生中国人也，虽以被邀为荣，然对此谨谢不敏，婉辞拒之。

是年春，游比利时。自巴黎乘火车至比京布鲁塞尔，约四小时。在此游滑铁卢，观威灵吞败拿破仑之战遗迹。又游刚市，刚市教堂藏发明油画者望爱克油画，特往一观也。

三月，以粉画《厨房》、《画室》与油画《苏州瑞光塔》，送巴黎春季沙龙评选，均蒙入选。此届沙龙送选者六千人，入选三分之二。入选作品展览期为五、六两月。六月，《厨房》得评选委员会评为荣誉奖，图上标以金签，并授与奖状。授奖仪式隆重，法国教育部长、美术部长亲临主持。

六月，游伦敦，居两星期，画英国议会与海德公园二图，

皆油画也。

先生在巴黎，习画之余，以游旧书店为乐。曾以二十法郎购得《美术地理》一册，查见其中竟有关于中国苏州文庙艺术品之记载，叹其搜求详博。又收集法国历届沙龙画展目录，一旧书店主人见先生访求之诚，举其所藏自有沙龙展览以来全份目录，共两大捆，以平价售与，先生视为奇遇。其它新旧书籍收集，不下四千余册，堆置室中，几无隙地。

习画访书之外，先生更立志为苏州美校购置石膏像，先求希腊名作，次及古罗马与文艺复兴诸时代著名杰作。二三年间，共得四百六十余件。其小者，先生购得即乘电车自携回寓所；大者则雇汽车运回。圣西尔寓所之客厅、饭厅，为先生所购石膏像堆置几满。每购储一批，即随时交轮船公司托运回国，其包装捆扎，有运输公司派专人办理，先生亦必逐件亲手检视，期无损坏。迨先生返国，遂于苏州美校辟专室数间安置，且仍陆续向法、比订购，至抗日战争前夕，共得五百余件，超过当时全国美术学校所有石膏像之总和，质量亦称第一，皆数年心血之功也。后大部毁于战乱。迄十年浩劫，终于只像无存。于今闻者无不为之怆然。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 三十八岁

五月，游意大利，同游者刘海粟、吴恒勤、杨秀涛与孙福熙也。海粟在上海创办图画美术院，早与先生相识。此游先至罗马，继去佛罗伦萨、威尼斯，最后至米兰。同游五人，未始终偕行，中途各因费用不足，先后分散，唯先生一人至米兰。盖初抵罗马，他人每餐恒费二十里拉，先生知此游旅费昂贵，主尚节约，每餐不过五、六里拉；他人购买图书，不加选择，所费不赀，先生则拣确有需要者购之。恒勤等初皆笑先生撙节

过度，然甫离罗马，他人即感旅费不支，至佛罗伦萨、威尼斯，已有三人返去，迨至米兰，仅余先生一人独游矣。米兰有达·芬奇名作《最后之晚餐》在，此先生渴欲瞻仰，不可失之者也。留米兰数日，饱览名画、建筑，游大教堂写生，乘火车回巴黎。此游凡三星期，画油画十四幅。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 三十九岁

是年续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

十二月，学习期满。按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有规定，学生在学年龄，本国学生限为十六至二十八岁（中有服兵役之一年），外国学生限为十六岁至二十七岁（不服兵役，故少一年），过此即须退学。先生出国前，经友人指导，知有此规定，已预为计之，故出国护照所报年龄，少填十岁，俾便入学。至此年满，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发与学习期满证书，势不能再留，遂决意返国。与在法攻读文学毕业之严大椿偕行。因来法系由海路，返国乃改遵陆道，可多观异域风光。此行自巴黎乘火车，经德国柏林住二天，再乘火车至波兰、苏联，换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至满洲里，入国境，再经哈尔滨、长春，至大连乘轮船，经青岛直抵上海。途中凡十八日。经莫斯科时，因换车曾小作逗留，得参观美术馆、博物院，并游红场，瞻列宁墓。船抵上海，胡粹中、陆震生等人至码头迎接，三载阔别，握手欢然也。至苏州，有美校学生在车站欢迎，并于校内开欢迎会，由先生报告旅法学习经过。

欢迎会后，先生尚未至校理事，即逢一小风潮。缘值年假，尚余一月膳费，学生要求发还。粹中等主事考虑学生得此退款，不过随意用去，故主张留下移作明年学膳费之用。学生不满，集会争吵，且紧闭校门，看守教师，不许离校。先生得讯，赶

至学校，善为劝导，事告解决。先生去国三年，校中颇有散乱之象，学生纪律松懈，先生处之以理以情，为之逐步整顿。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四十岁

是年八月，苏州美校新校落成，采希腊式，列柱拱廓，宏伟宽敞，辟石膏室、陈列室、实习室、办公室与教室，共五十间，其规模为全国美校校舍之冠。先是一九二八年，与先生去国同时，吴子深亦赴日本考察，参观东京美术学校，见其校舍庄严美奂，设备齐全，造福学子，深为所动。归国后，即主动建议，独力出资五万元，为苏州美校筹建新校舍四十间。胡粹中、朱士杰闻之，大为兴奋，立即致函巴黎，促先生返国，主持其事。先生以至法甫半载，学业未成，而建校大事，亦非仓促可就，乃复函请待回国再议。至是先生返国回校，而子深则因近年兴办农场，投资六万，惜用人不当，事业不振，故对建校计划，已无前此意兴。先生深知子深为人，并知其信任之专也，乃约同徐镇之、俞觉与吴秉彝，往见子深，劝其仍续前议。首由先生说明，苏州美校当前必须速求教育部批准立案，不然即为“野鸡学堂”，而得以立案与否，教育部先须看校舍建筑，故建设校舍一事，实关美校与学生之前途，至为重要。镇之等亦从旁赞说。子深曰：“建校立案，以后如何？”先生应曰：“中西合璧，造就人才，前程远大。”子深点头称是，欣然命笔，签发三万元便条一纸，命其帐房照付。先生于是请得上海工部局建筑师吴希猛，依希腊建筑之式，设计图样，招标承造，得标者则苏州张桂记营造厂也。自春间兴工，至八月完成，共耗资五万四千元，所有建筑费用，皆子深独任也。

九月，徐悲鸿约先生在南京举行联合画展，报纸称为“艺坛盛事”。

十月，教育部批准苏州美校以大专院校立案，正式定名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简称苏州美专。按国民党统治时期，私人办学，如未经教育部立案，则学生毕业，无正式文凭，求取职业，至为不易。而得以立案之限制颇严，首须校舍、设备、基金及教职工之薪资标准等项，符合其所谓法令条例，经调查核实，层层审议，并须当道有力者之推荐说情，始得通过批准。先生为学生前途与学校前途计，不得不履行此一手续。徐悲鸿对先生办学，素表同情，为苏州美校立案事，亦屡向教育部有关人员说项焉。时凡大专学校得以立案，即可请求国家补助经费，然亦须奔走联络，方克有成。立案后第一年，苏州美专得补助费六千元，第二天得一万六千元。先生曾拟以此项补助款，为学校造一新楼，四周环水，与已建之希腊式校舍，互作映照。因抗日战起，未得实现。

十一月，苏州美专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会，同时举行展览会。子深于会上发表演说，略谓“颜、吴合作团结，为苏州美专事业发展之基础”云。苏州《明报》为文祝贺，曰《美专之美》。

先生爱歌，特为美专制歌曲多支，于每周晨会，教学生演唱。其主题大致为培养、鼓励学生勤奋努力，爱艺术，爱学校之精神，除校歌外，前后所制共十四支，目次如下：《艺舰》、《沧浪四时》、《艺术迈进曲》、《青年的苏美》、《沧浪夏夜》、《沧浪秋夜》、《我爱苏美》、《我们的力》、《好友你莫忘》、《留恋曲》、《苏美一艺侠》、《听奏钟声》、《记功柏》、《艺术忧思》。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四十一岁

四月，先生在苏州美专本校科学研究会作讲演，题曰《科学的解释》。

五月，先生率领苏州美专高中科全体学生，旅行镇江写生。为罗时实写像。时实任省府秘书长，先生为苏州美专申请补助教育经费，得时实之助，年拨一千元。先生乃以此款与苏州中学交换空地五亩，作扩充美专之用。

秋，兼代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徐悲鸿应邀赴德苏等国举行画展，定期一年半，其所任“中大”美术系主任教职，以为非先生莫属，特商请代理。先生感其知己，允之，每周由苏州去南京三天，除代理系主任工作，并为“中大”学生讲授素描、油画课。

悲鸿出国前，邀先生游玄武湖，同游者有悲鸿夫人及“中大”学生陈汇林、陈健，弄琴鼓乐，乐而忘返，至晚九时，方踏月而归。所经和平门已闭，禁止通行。时有城外二农民，抬一重病人，急须进城就医，门者仍无动于衷，不许通行。悲鸿气愤至极，连呼：“不近人情之至，不近人情之至！”后以悲鸿名通电话，允为开门。悲鸿愤曰：“我不领他情！”不进，折返玄武湖，坐待天明。饕蚊肆虐，终夜不眠，悲鸿意气自如。先生服其强项。

是年，苏州美专开办实用美术系制版组，为中国制版美术造育人才。先生亲赴上海谦信洋行订购各种仪器及印刷机器，聘请专业技师。九月，实用美术科第一期招生，先生于其开学，特撰告同学书，题曰《从生产教育推想到实用美术》，载于校刊。

《艺浪》一卷一期出版。苏州美专同人于一九二八年，编印校刊《沧浪美》，由黄觉寺主编，每期约十余页。后改名《艺浪》。至是扩充篇幅，定为月刊，仍由觉寺主编，每期有论文、随笔、文艺小品与美专校讯，并精印铜版画及三色版彩印，即本校制版组所制也。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四十二岁

一月，偕胡粹中莅常州参观常州美术会第一届展览会，系美专同学刘昆岗、李复、徐京、于中和、吴建寅、尤伯良、钱延康、王栖霞、金若水、张英、倪冠亚等人，仿苏州美术画赛会而发起者也。在常州晤其邑名画家邓春澍等人。

作《法兰西近代之艺术》一文，载《艺浪》二卷一期。

三月五日（夏历正月二十日），先生父纯生卒于桃花坞寓所，享年七十五岁。绝笔作曰《洗桐图》。十一日，先生父生前友好及门人等假沧浪亭明道堂举行追悼会，并于十二日起，假美术馆举行遗作展览会，共分二室，自早期至最后遗作，共百余件。先生父纯生晚年，虽画名日增，而谦素不伐，始终如一。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四十三岁

是年苏州美专高中艺术科学生毕业，出版级刊，先生系高中科级任导师，为撰《级史》一文，载于级刊特辑。

梅兰芳至苏州开明剧院演出，访先生于苏州美专，致敬佩意。先生与之于面水轩合照一影留念。面水轩者，美专会客室也。兰芳离苏后，又特寄赠其单人照一帧。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四十四岁

四月廿一日，南京中国文艺社春季旅行团徐悲鸿、汪辟疆等十五人抵苏，至美专参观，并举行茶话会，由先生陪同招待。

五月，赴杭州写生。

作《艺术教育今后之趋向》一文，载《艺浪》二卷二、三期合刊。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四十五岁

七月，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

八月，日寇侵略上海，苏州初尚平静，九月间学生仍有来

校者，美专亦拟如常开学。旋日寇飞机来扰，初次轰炸阊门外，继即炸市内道前街矣。人心惶惶。十月，先生率学校同人，仓遽迁校，先至离苏十里之北庄基，再至离苏三十里之同里，最后至袁家汇，住锺志轩家。志轩以祠堂相借，遂拟久住，并发通知，定期开学。住两星期，风声日紧，日军进逼平望，袁家汇首当其冲。先生等幸雇得大船一只，小船二只，弃去学校设备，仅载师生三十余人，乘夜而逃。胡粹中等乘小船先行，相约至安徽屯溪相会。途中闻袁家汇失陷，惨遭日军屠杀，先生友人朱询刍全家六人被祸，吴江同里有严障者亦被杀。船至余杭西下陡门，须过水闸，粹中等小船过闸，遂去屯溪。先生所乘大船，体大不能通过，舍舟登陆，滞留余杭西下陡门农家。先生以进退失据，乃宣示同行师生有愿离去者，人发遣散费五十元，工友三十元，约胜利后再作聚合之计。临别依依，情景凄惨。

十一月，先生以余杭西下陡门非久留地，决意去上海。于是偕张念珍、黄觉寺、陆寰生、张新械，并家属十余人，自余杭赴杭州，乘火车至宁波，再乘德商轮船德平号，抵上海，于十六铺码头上岸，暂住老垃圾桥妹夫吕鉴熙家。人多，合居一室，藉地而卧。先生诸人，转辗月余，奔窜逃避，至此始得一勉可安眠之所。

杨寿祺闻先生至沪，相访，见室无长物，为送红木桌椅以备应用。又见冬寒少衣，赠皮裘一袭，乃寿祺平日自御者，胸前鼻烟之渍斑斑。患难相助，其意殊可感也。

得苏州来人消息，云苏城沦陷后，美专校舍为日军占作司令部。在沪师生闻之，无不愤慨。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四十六岁

春，应苏州美专在沪学生之请，于王家沙某小学租得教室一间，开办苏州美专沪校，有学生三十余人。教师有吴秉彝、黄觉寺、朱士杰、张新斌，陆寰生任秘书，先生自任素描、油画课。

秋，沪校迁至四川路企业大楼七楼，学生增至四十余人。学期终了，于大新公司举行师生画展。此期学生成绩优异者，得陈士宏、汪惟馨、倪景楣三人。

时上海已成孤岛，物价日涨，沪校经费不足，先生始为人画肖像，以所得补贴学校开支。

有日人松村雄藏者，原任日本政府派驻苏州领事，素与先生相识，时在上海任所谓兴亚会会长，侦知先生在沪，派人至老垃圾桥寓所相访，劝先生回苏州复校，许发还校舍，并由日本政府资助经费。先生辞以无学生，无教师，无设备，难以从命。

美专沪校特聘李咏森为副主任。咏森擅水彩画，任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广告主任，熟谙上海各界情况，多有交游，故先生引以为助。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四十七岁

是年，松村雄藏又指使一日本画家名田代博者，前来专访，以关心先生办学为名，云日本民间商家愿出资与先生合作办学，可改用民间商家名义。先生婉词谢绝。

秋，先生拟返苏州一行，以料理家务，省视亲友。晨起，偕夫人去火车站，见万头攒动，旅客上下车，势如潮涌。先生夫妇候至下午四时，枵腹以待，鞋子挤落，仍无法上车，嗒然求归，然站门亦为人群所堵，只得自站旁篱笆空穴钻行而出。时孤岛怪现状甚多，此其一也。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四十八岁

美专沪校所租企业大楼房金，月月加租，先生售画所得，亦不敷支付。而先生作画，恒经月始成一幅，自愧无挥毫立就之才，故作品不多，所得亦甚有限。某次，上海纸业公会俱乐部名伦社者，允借先生开个人画展，然有一定限期，逾期即不能再借。先生虽日夜为之赶画，至期仍不足展出之数，所谓画展，终未开成。有好心友人劝先生“搨两笔”即可，因购画者重视乃“颜文梁”三字署名，他可不论。先生谢弗能也。惟生活日艰，先生日间忙于教学，夜间作画，常须稍备饼干点饥，至此并饼干亦无力购置，每日晨起预购大饼数枚，置饼干筒中，以为代替。

是年上海美术界为赈济难民，于大陆商场开救灾画展，先生亦以作品多幅助展，每张售一百元，所得款全数捐赈。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 四十九岁

是年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进占租界。在日军胁迫下，上海文化界成立所谓中日文化协会，指定文化界、教育界知名人士参加，表示中日亲善。先生亦在罗致之列，乃与黄觉寺商议，觉寺以为处此逆境，虚与应付，然先生不宜出面，乃由觉寺代表出席，不发一言。美专沪校为避日军注目。沪校名称取消，改称画室，不登报招生，学生知者自来，不知者任之。学生毕业，由学校开一证明书，不发毕业文凭，因文凭须送伪教育部核准盖章，此先生所不愿也。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五十岁

上海在敌伪统治下，物价飞涨，伪币之值日贬，美专沪校虽改称画室，几亦无法维持。学生最少时仅余二三人，教师亦各谋生路。沪校所用工友一人名和尚者，亦予辞退。一切杂务，

先生自兼。某次，有在《中华日报》工作之美专一女学生，需学校出一证明书，无人送去，由先生亲自送至报馆。报馆在四楼，门警见先生衣貌乡拙，不许登楼，命于底层立候。此女学生下楼见之，极表歉意。先生则以为以衣貌取人，人之常情，不足怪也。

时逢阴历年底，沪校所在企业大楼之巡捕、电梯、杂工等，均须支付常例钱，沪校平日所用老虎灶水费及其他费用，亦需清付。是年先生已定回苏州度岁，妻儿先行，先生仍留沪筹款，不知所出。所幸数月前，有友人介绍当时称上海纸业巨头徐大统者，向先生定画《百鸟图》一帧，至小年夜送来画值一万元，恍如天降，得以清偿欠债，余款少许，持归苏州。夫人笑曰：“此汝所画百鸟之报也。”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五十一岁

续售画度日。赖友人范能力、陈植之介绍出售。后定画者日多，而先生画笔甚慢，每月仅能以一二幅应命。

是年应之江大学沪校聘，授水彩画。之江自杭州迁沪，设于大陆商场之内。陈植、王华彬，即之江教授也。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五十二岁

是年，苏州美专教师储元洵，宜兴人，征得先生同意，于宜兴设立美专临时分校，教师有孙文林、刘昆岗、王佩南等。一年后，即迁苏州与总校合并。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五十三岁

八月，抗日战争胜利。

十月二十日，苏州美专成立复校委员会，以胡粹中、朱士杰、黄觉寺、吴似兰、王士敏、杜学礼为委员，先生任主任委员。首议接收沧浪亭校舍，从事修葺，并计划招生开学事宜。

十一月，先生于流离八年后，第一次返苏州美专本校授课。

十二月，吴子深至校主持校董会。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五十四岁

一月，先生亲率沪校全部专科学生，至苏州本校上课，沪校则改为研究室。

七月，胜利后首届毕业学生徐则达、黄祖荣、朱丹三人。

秋，苏州美专创办初中部，首次招生。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五十五岁

苏州美专校刊《艺浪》复刊，主编者仍黄觉寺也。

作《期望建设全国性之美术馆议》一文，载《艺浪》复刊第二号。

是年，苏州美专举行建校二十五周年校庆。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五十六岁

苏州美专复校后，学制改五年新制，分中西画二组。原有之实用美术组，因设备于沦陷时被劫，暂时停办。至是年，全校共有学生二百四十余人，教职员四十二人。其人事、教授及课程安排，概况如下：校长颜文梁，总务主任胡粹中，教务主任黄觉寺（后任副校长），训务主任商家坚，事务主任朱士杰，秘书陆寰生，校董代表吴似兰，舍务主任储元洵，文书主任顾友鹤，会计钱定一，出纳李霞城，书记陆昂千。教授及课程：西画并理论：颜文梁、胡粹中、朱士杰、黄觉寺、孙文林、徐近慧、陆国英；国画并理论：吴似兰、张星阶、钱夷斋、朱竹云、张宜生、凌立如；英文：黄恭誉、黄恭仪；法文：袁刚中；国文：顾叔稣、沈勤庐；艺术解剖：金石、包希坚；色彩：杜学礼；图案：商启迪；音乐：王之玑；体育：程鸣盛；公民：陆宣景。

沪校研究室，其性质相当于法国之美术学院，校务由先生以校长名义暨秘书陆寰生兼理，主任为李咏森，教授有丁光燮、承名世、江载曦、张念珍等。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 己丑 五十七岁

四月，苏州解放。

五月，上海解放。

自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生及其手创之苏州美专，喜获新生，参加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之建设。

先是二月间，先生偕家人自上海至苏州省墓，归时，无锡已解放，去沪火车中断；乃自吴江步行至同里，乘小船至上海朱家角，几经周折，始达沪寓。沿途国民党军关卡林立，检查綦严，然混乱殊甚，人民怨声载道，先生知国民党军必败矣。

六月，上海各界于跑马厅广场举行庆祝上海解放大会，先生率沪校研究室学生二十余人，以苏州美专旗帜前导，列队参加。红旗招展，群情奋昂，一片欢欣鼓舞之状，先生深受感动。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庄严声明，集中反映百年来爱国志士心愿。先生个人之思想与艺术，于新中国之成立，而进入一新阶段。

一九五〇年 庚寅 五十八岁

是的，先生每周自沪去苏州，为美专授课一二小时。苏州美专校务，由副校长黄觉寺主持。

一九五一年 辛卯 五十九岁

是年，先生参加上海美术家协会每周学习会，始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努力改造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立场、观点。

一九五二年 壬辰 六十岁

是年全国大专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苏州美专与上海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址设无锡，以原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任校长。先生则调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即原杭州艺专也。

先生自维年老力薄，不堪胜任，写辞职书一通，面呈华东文化部部长彭柏山，恳辞新职，愿以余年担任某一影剧院布景师，月薪三十元足矣。柏山以辞职书压置先生茶杯下，指壁悬丹阳女子刺绣学校出品刺绣一幅，问曰：“何如？”先生曰：“此乃乱真（针）。”乱针为刺绣一法，此双关语也。柏山笑曰：“国家尚需颜先生作育人才，望勿推辞。”刘海粟、唐弢在座，亦同劝驾。先生感其厚意，勉为承命。唐弢，作家，时任华东文化部文艺处长。

十一月，朱维基陪送先生至杭州。维基，诗人，时任华东文化部科长。彭柏山先已至杭。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召开师生大会，欢迎先生莅任。柏山先为致词，先生答谢。时美院华东分院院长为刘开渠，教务长则庞熏琴也。

自此先生即为华东分院任教，以透视学、色彩学授学生，约两星期往返沪杭，开课一次。

一九五三年 癸巳 六十一岁

七月，先生赴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住东四旅馆。徐悲鸿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偕夫人廖静文来访，多年阔别，把晤甚欢。悲鸿见面即笑曰：“我中小奖！”盖指前顷小中风也。次日，悲鸿约先生至全聚德饭庄吃烤鸭，高朋满座，旧雨新知，济济一堂。悲鸿意兴甚豪，并云将在美协大会发表演说。翌日中秋，叶浅予勿遽来告，云悲鸿患脑溢血危殆。第三日，全国美术家协会举行大会，美协副主席江丰

报告，宣布悲鸿逝世消息，全场震动。先生尤为悲恸。

在京作油画《天坛》、《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玉带桥》。是年上半年，在杭州作油画《卖鱼桥》，系带领美院学生写生之作。又是年，在沪作油画《虹口公园人造山》。

一九五四年 甲午 六十二岁

是年，先生按期往返沪杭，以“油画八法”授课。八法者：一、薄涂，即以颜料用调色油调稀作画；二、薄贴；三、厚贴，即以较薄或较厚颜料轻贴于画布上；四、揉腻，即直接以数种颜料揉腻于画布上，不经调色板之调配；五、揩摩，即以颜料轻揩于画布之上；六、扫掠，即用笔尖将颜料轻轻扫掠于画布上；七、埋没，即以—种颜料覆盖于另—种颜料之上，属于不透明之颜料重叠；八、拍贴，即据画面表现需要，将所需颜料拍打于画布上。先生自云：此八法乃融西方画法与本人绘画经验，多有西人所未道者，今为教学需要，整理而成，兼备科学实践与艺术手段，适合初学油画之实习。先生在沪同时并为上海戏剧学院授课，又经常为电影学校及工厂、报馆等美术班义务上课，授美术透视与色彩常识。

一九五五年 乙未 六十三岁

是年五月至七月，先生在杭州屏风山疗养院休养，编写《美术用透视学》。

作油画《疗养院》。

一九五六年 丙申 六十四岁

十一月，迁居淮海中路新宅。先生自抗日战争期间，避难至沪，即寓老垃圾桥旧宅，屋宇简陋，然安之泊如也。至是，在党与人民政府关怀下，由上海美协分配新居，殊宏敞。是月，子振康与施亚荣结婚。

一九五七年 丁酉 六十五岁

参加上海美协召开之整风会议。

九月，先生编著之《美术用透视学》，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分第一部“透视原理”，共九章，属学理介绍；第二部“透视应用”，共十五章，属实用方法。都十六万字，为当时国内出版研讨美术透视最为完备之作。

十月，孙女清诚生。

一九五八年 戊戌 六十六岁

一九五九年 己亥 六十七岁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于本年改称浙江美术学院，以潘天寿任院长，先生仍任副院长。

九月，《颜文梁画集》出版，出版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画集共收油画二十幅，一部分系解放前后在国内所作，一部分则系欧游时期之写生。出版者为画集所写《前言》，略云：“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画家风格的转变，在国外的作品，色彩沉着而含蓄，用笔也较大胆。……从解放后在国内所画的作品来看，虽然画风趋向谨慎细腻，但在调子上显然又有很大区别，色彩新鲜明朗，画面上充满欣欣向荣的生气，可以看出画家新的感受和心情。”

是年，作油画《国庆十周年》，系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纪念之献礼。此画反映上海最繁华之南京路国庆夜景，取景包括各种车辆、商店橱窗、各色电灯、行人及焰火之大小、远近、明暗、强弱，系先生分别于夜间、日间实地写生所得，草稿有数十张之多。图象逼真，气氛热烈。其间实物位置之安排，透视之比例，光色之调配，皆非照相所能办到。起画于是年国庆，因取景不易，至次年五一节方补足最后一笔。

是年又作油画《雪景》，则非实地写生，乃集各种雪景印象，综合而成。此画笔触豪放，与《国庆十周年》之细密，适成对照。于此见先生画笔，粗细咸宜，非必拘守一格也。

一九六〇年 庚子 六十八岁

三月，与浙江美术学院教师潘思同、费以复、关良、曹思明等十人，同游绍兴。在绍兴作油画《大禹陵》。

是年，作油画《人民大道》、《轧钢厂》。《人民大道》一画费时达半年之久。

九月，赴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此为解放后先生第二次至京。在京作油画《颐和园》、《九龙壁》、《太和殿》、《北海雨景》、《景山》、《十三陵水库》。

是年，上海美协选先生任副主席。林风眠亦同时被选任副主席。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颜元临摹任伯年画集》，系先生为纪念父纯生而编也。

一九六一年 辛丑 六十九岁

五月，赴杭州，为浙江美院所办罗马尼亚画家油画培训班学员讲课，授色彩与透视原理。

作油画《里西湖》、《三潭印月》。

一九六二年 壬寅 七十岁

七月，上海美协为庆祝先生七十寿辰，在文艺会堂举行集会。

作油画《七宝塘桥》。

一九六三年 癸卯 七十一岁

春节，参加上海春节油画美术展览会，先生以《深夜之市郊》等展出。

十一月，香港中艺公司主办之上海名家油画展览会在香港开幕，以先生与刘海粟、林风眠领衔，共展出三十人作品。先生有《厨房》、《巴黎凯旋门》等十六幅作品入展。

是年作油画《西郊公园初春》、《城隍庙》、《复兴公园林荫》、《傍晚灯光雪景》、《孙女七岁时》。

一九六四年 甲辰 七十二岁

春，偕费以复去苏州旅行写生，留一星期，作油画四幅：《双塔》、《拙政园》、《苏州留园》、《西园湖心亭》。晤老友杨耕青，五十年前吴江中学之同事也。聚谈三日，饮茶，吃糖白果，欢若平生。

秋，至嘉兴南湖写生，留三日，成油画《南湖旭日》，象征中国共产党之光荣诞生。此画于一九八一年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在上海作油画《家园一角》。

一九六五年 乙巳 七十三岁

春，作油画《中山公园之春》。

夏，作油画《百果丰收》，历时三月。

秋，作油画《韶光》。

冬，作油画《长风公园之冬》。

始作油画《百花争艳》。此画绘作时间最长，时断时续，至一九七六年方告完成。

是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油画小辑》，收先生解放后油画作品八幅。

一九六六年 丙午 七十四岁

是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破四旧”，浙江美院来人，先生交出游学法国时所摹日凡《罗拉》、蓬那《善勃》、安奈《泉水》等巨幅油画，因皆有裸女也。上交之画，后不知

去向。旋浙江美院红卫兵亦勒令先生去杭州受审，挂“吸血鬼”牌子，与院长潘天寿等同受批斗。两周后，从宽放回上海，规定每星期交思想汇报一次。

一九六七年 丁未 七十五岁

参加上海美协学习，每周三次，与会者皆“斗私批修”。

丰子恺时任上海画院院长，轮转批斗，次数频繁，先生亦常陪斗。

一九六八年 戊申 七十六岁

二月，第二次被勒令去杭州，夫人准许偕往。至浙江美院报到，被安置于一空教室内，俾作息于此，交代解放前后经历。

一九六九年 己酉 七十七岁

五月，先生得宣布“解放”。此次在杭受审时间，计一年三个月。

一九七〇年 庚戌 七十八岁

一九七一年 辛亥 七十九岁

九月，浙江美院院长潘天寿含冤去世。先生闻讯，怆然久之。

一九七二年 壬子 八十岁

秋，至长风公园写生，作油画《长风公园之秋》。

一九七三年 癸丑 八十一岁

自春至夏，至襄阳公园写生，作油画《雁来红》，一名《星期六》；又作油画《襄阳公园之夏》。

秋，作油画《毛家塘》、《菜花》、《龙华之秋》。

八月，去苏州小住，留五日。去无锡游览，归以途中印象作油画《途中》。

一九七四年 甲寅 八十二岁

春，至中山公园写生，作油画《中山公园之春》（按一九六五年有同名之作）。

是年，作油画《卧室》、《蜀葵花》、《玉兰花》、《漕溪公园》、《晨曦》、《浮图迷濛月光寒》。

一九七五年 乙卯 八十三岁

是年，作油画《炼油厂》。

一九七六年 丙辰 八十四岁

十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日月重光，普天同庆。

油画《百花争艳》完成，此画始作于一九六五年，历时十年，至此竣工。曾先后于一九八〇年在上海、一九八一年在苏州展出。

一九七七年 丁巳 八十五岁

作《报晴》和风景组画《春光好》、《夕照明》、《载月归》、《朝气新》。画中点景人物，为一画家，系以孙女作模特儿，其精神则先生自况也。

一九七八年 戊午 八十六岁

风景组画四幅完成，此皆先生独出心裁，凭借想象，每幅有一主题，配以歌词。

十月，《色彩琐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本书系有关色彩运用及调配方法谈片，共二〇九则，皆先生平日教学与作画心得，间亦有读书札记。先曾以油印讲义形式流传，颇受青年学子欢迎，有远自边疆慕名来索者，至是题为《琐谈》，辑印出版。

《回忆徐悲鸿》一文在《南艺学报》本年第二期发表，系为纪念徐悲鸿逝世二十五周年征文而作也。

一九七九年 己未 八十七岁

一月，南京举行粉画展览，展出粉画名家李超士、徐悲鸿、潘玉良、李咏森、陈秋草等人作品，先生早期粉画杰作《厨房》、《肉店》等亦参加展出。三月，展览会移广州举行。

四月，苏州美专在沪校友主办沧浪画展，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开幕，先生亦以作品参加展出。

一九八〇年 庚申 八十八岁

春，去苏州写生，作油画《枫桥夜泊》，取唐诗人张继诗意也。

至苏州工艺美术学校，为师生讲话，介绍原苏州美专所办实用美术系创办经过；并勉励师生重视工艺美术，以优美高质之设计与制作，锻炼服务精神，为祖国作贡献。

四月，全国粉画展览移北京举行。中国美协主席江丰为展览会选品作序，略云：“北京的这次展出，是中国自有新美术运动以来的第一次粉画展览会。作者包括老、中、青几辈人。应该指出，这次展出是有不少精品的，像徐悲鸿、李超士、颜文梁、陈秋草等老一辈的粉画作品，无疑是向青年作者提供了范本。”

一九八一年 辛酉 八十九岁

中国美术家协会增选先生为全国美协理事。

七月，苏州美专在沪校友，假东风饭店聚宴，预祝先生九十岁寿辰，盖依旧俗“做九”之例也。

论文《色彩学上的空间透视》，在本年第一期《新美术》发表。此文乃阐述物体色彩因远近而产生明暗不同变化之原理，盖有感于观察景物常依就近所见印象解释推想之，造成客观与主观之脱离也。《新美术》为浙江美术学院院刊。

冬，上海文史馆聚会，一百二岁老人苏局仙以七绝一首赠

先生。诗云：油画当今负重名，得来工力信非轻。一腔热血老仍在，有意多工教后生。形衰志壮敛精神，渔巷家风自有春。笑煞当年绛县老，未多甲子傲时人。

一九八二年 壬戌 九十岁

一月，浙江美术学院聘任先生为顾问。

四月，上海美协主办之上海油画展，在北京开幕，先生以油画《晨曦》入展。

作巨幅油画《祖国颂》。以大海波涌，旭日东升，朝霞灿烂，为我中华祖国祝颂。

本年纪事，暂止于此。先生高年遐寿，一生追求艺术之美，无日或歇，老而弥健。其所创作，日趋化境。以后事迹，容待续编。

后 记

这部年谱，概要地记录颜文梁先生一生习艺办学的经过，以及立身行事的为人之道，字数虽然不多，前后却写了近十年之久。我是大约一九七一年前后与颜老相识的，承他不弃，成为忘年之交。那时我正从“五七干校”转业到工厂去“战高温”，自己下定决心，从此终老于斯，再不要笔杆子；但是逢到厂休，或是做夜班、白天空闲的时候，又无书可读，怎么排遣呢？于是就常到颜老那里去，看看他画的风景画，听他谈谈过去学画和创办苏州美专的故事。颜老的画，都装在一只只大小小特制的画箱里，每当有人要看画，他就不厌其烦地亲自从一只只画箱里搬出来，放到阳台光亮充足的地方，让你观赏，然后再一张张收回画箱。他的风景画，给人一种和平宁静的感觉；看

着他的画，我就好像进入了一个纯洁高尚的境界。

颜老十分好客健谈，只要客人愿意，他可以陪你谈上一天，不露倦容。他的记忆力很好，年轻时的许多事情都记得很清楚。我是一向有“掌故癖”的，前贤往哲的遗闻佚事，常能令我心醉。从颜老谈的零零碎碎的故事里，我自己也好像置身于八、九十年前那个古旧的社会之中，接触到了一些过去年代人物的声音笑貌。颜老的一生，经历了清末维新、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迎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他所看到的人和事，够丰富的了。他是今天尚健在的足备沟通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资格的少数代表性人物之一。这种人物今天是愈来愈少，也愈来愈宝贵了。

颜老特别爱护青年，这是我从同他的交往中发现的一个特点。青年人，其中不少是首次慕名而来，向他请教学画，我看见他从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学识和经验，总是诚恳地、不惮其详地指点艺术的各种门径与方法。后来找他的青年人几乎成群结队，他就索性在家办起了一到两个学习班，每星期上课，由他讲解他最有心得的透视学和色彩学，并实地指导学生们的习作。当然这都是尽义务。每个班最多时有二十多人。一到上课的那天，他家里的客厅就充满了青年人的声音，生气盎然，但是也显得一片乱哄哄的，可是他一点没有烦厌的表示。

颜老待人接物，有他自己一套老派的规矩，除了对客人和青年学生热诚相待的态度，他还坚持送客。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届八十高龄，虽然身体、精神还很健旺，但步履蹒跚，即使在家里也只能一步步地移动行走，然而他却一定要吃力地移动着脚步，把客人送到门口，并且看到客人转弯不见，方才进屋。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每当我告别后再回头，见他还站在

门口堆满仁慈亲热的笑容朝我招手时，我的心里就充满了一个后辈无故受到长者过分礼遇的不安之感。他这个规矩，前后始终如一，不是看人的地位而有区别，也不是随着自己环境顺逆的不同而有变化。经过多年混乱，人情如纸，谁都知道，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事。

这样，来往的日子一多，我对颜老的生平经历、艺术成就、办学始末，以及他的处世为人，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世人对他的评价，也许有各种不同的议论，但是我想，有一个事实是大家所共同承认的，这就是他的一生和他的绘画创作，对于中国近现代的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都是至有关系的，少了他恐怕不行。因此，我觉得，对于他的生平，关于他的有关的史料，应该记录下来，保存下来，留给后代人看看，其实同代人也应该看看。但是，那时好像没有人想到要做这个工作。这也难怪，当时还正处在长夜难明的时刻，人人自危，谁敢替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树碑立传呢？这不是一点点的“罪行”。

真是积习难除呵，我忍不住又想动起笔来了，自告奋勇给颜老建议，为他写一本年谱，即使只是雪泥鸿爪，总算一生有个记录。颜老欣然同意，可知他平日早有这个意思。我们商定，这份年谱写好后，保守秘密，只给自己看，不能外传。颜老说，他准备身后只留给子孙看。于是我把所听到的口述材料，排比了一下，便写成了至解放前夕为止的这一部分。因为采取的是年谱形式，也为了节省笔墨，所以用的是文言。至于解放后这一段，由于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由于有些事实尚难论定，留待以后再写。所以最初的年谱稿，止于解放前夕。写好后，复写了两份，颜老保存一份，我留一份，秘不敢示人。但是，

补写出解放后这段历史的愿望，在我一直是存在的。不过有所顾虑，一搁，就搁了七、八年。

打倒“四人帮”，天日重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伟大祖国出现了真正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我个人在经过了八个寒暑的“战高温”后，也终于归队复业，高兴地重又拿起笔来，得以继续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因为想要尽快补偿过去的损失，时间却感到不够用了，因此虽然政治的顾虑是消失了，已写好的年谱稿的前一部分，也可以公开给人看了，但是补写颜老这份年谱稿后一部分的心愿，一时却未能实现。这要感谢学林出版社编辑部同事的好意，是他们看了我写的年谱稿后，认为尚有发表的价值，建议我继续补写，以便放在祝贺颜老九十寿辰的集子内出版。这才使我鼓起劲来，把多年搁置的心愿予以实现，最重要的还是党的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使我对一些历史可以据实直书，不必有所顾忌了，补写的工作便很顺利，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年谱便是包括了颜老一生所经解放前后的两个部分在内。

颜老今年九十岁了，真是人世上瑞，国家休贞，应该热烈祝贺。他长长的一生，为艺术作出了卓越贡献，为国家培育了大量人才，他没有虚度自己的一生，这是即使在这部如此简略的年谱中，读者还是能够具体看到的。当然，这部年谱还没有写完。颜老的创作力，老而弥健，仍极旺盛，目前他每天仍不断地工作，用他的生花妙笔为这个世界创造美妙的图像。这部年谱还将继续写下去，要有再续、三续，记载他的更多的事迹，这是我所深信的。

一九八二年

为颜文梁先生写年谱

好几个月前，有一位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来看我，他是通过颜文梁先生哲嗣振康君，探听到我的住址的。他正在写关于颜文梁的毕业论文，特来收集有关的资料。他说我写的发表在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颜文梁》一书内的《颜文梁先生年谱》，是目前唯一的记载颜文梁生平事迹的完整传记，他希望我提供更多的有关材料。他还问我对颜老的评价如何，特别提到了同刘海粟、林风眠的比较。

我很惭愧，自从写了那份年谱，并有机会得到发表之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没有再进一步去辑集资料，或作一些专门的研究，所以对来访的那位研究生，谈不出什么新的东西。这大概叫他感到失望。但是，我也谈了一点我的意见，这也是我为年谱所写的“后记”中表达过的，这就是世人对颜文梁的评价，可有各种不同的议论，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大家必须承认的，他的一生和他的绘画创作，对于中国近现代的美术史和艺术教育史，都是至有关系的，少了他恐怕不行。我又说了一点几位画家之间比较的问题，这是我在年谱和“后记”中都没有提及的。我说，不应作比较，也无法作比较，各人的风格和成就各不相同，在各自的领域里，他们各自达到了自己的高峰，也各有自己的不足，你怎能分出他们的高低呢？只有以模仿剽袭为能事的画家，方可比较；有独创性的开拓性的画家，是不应也无法作比较的。

那位研究生带有相机，要我同他合影，此外来访无所获，匆匆走了。我不知他的论文后来写得怎样，也不知他的论文写

的是什么问题，合影的照片也未见到，此后就无下文了。

但是由此倒使我重又在脑际浮现出那一段与颜老相处交往的一幕幕情景，颜老的声音笑容貌又似飘忽在我眼前，往事有的仍很生动，有的则令我陷入沉思。岁月无情，这段往事一晃已有二十多年了。

我是大约一九七一年前后与颜老相识的。他已属八十高龄，承他不弃，成为忘年之交。那时我正从“五七干校”被发放到工厂去“战高温”，自己下定决心，从此终老于斯，再不耍笔杆子了。所以当上级号召“战高温”的“臭老九”们正式转为工人时，我是第一个自愿报名的，却想不到在这个工厂中也是仅有的一人，与我同被发放来的几位则宁愿留一条日后仍调回做“老九”的后路，坚持不响应号召（这中间主要是平日积极“响应号召”的“积极分子”）。我为之不解，然人各有志。我给远在黑龙江边疆插队落户的儿子写信，不无自豪地告知他以后填写履历，父亲成分一栏可写“工人”了，自以为从此便是“劳动人民”了。我从事的工作，乃是派在高温车间，做“回火”（即淬火）小工，经常做夜班，每晚十时至次晨六时。做“回火”有一好处，两小时在电炉上爬上跳下一番，便只要隔一小时一次观察炉子温度，大部分时间可以休息睡觉。因此我很愿意做夜班，白天整天时间可归我所有。但问题也就来了，体力劳动上有点像工人了，精神生活上却不知如何方能同体力劳动那样“工人化”。白天有了空闲时间，又无书可读，怎么排遣呢？于是就常到颜老那里去，看看他画的风景画，听他谈谈过去学画和创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的故事。颜老的画，都装在一只只大大小小特制的画箱里，每当有人要看画，他就不厌其烦地亲自从一只只画箱里搬出来，放到阳台光亮充足的地方，让你观

赏，一面看一面给你解说。然后再一张张颤巍巍地收回画箱。他的风景画，树木葱茏，绿茵成片，常能给人一种和平宁静的感觉。看着他的画，我就好像进入了一个纯洁高尚的境界。

颜老十分好客健谈，只要客人愿意，他可以陪你谈上一天，不露倦容。他的记忆力很好，年轻时的许多事情都记得很清楚，人名和别号也都能一个个叫得出来。我是有“掌故癖”的，前贤往哲的余风流韵、旧闻轶事，常能令我心醉。从颜老谈的零零碎碎的故事里，我自己也好像置身于八、九十年前那个古旧的社会之中，过去年代一些人物在他的叙述中复活了过来，许多事件展现出逝去时代的风貌。颜老的一生，经历了清末维新、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迎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他所看到的人和事，够得上丰富多彩的了。他是足备沟通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资格的少数代表性人物之一。就在他同我娓娓而谈的时候，像他这种人物已经是愈来愈少，也是愈来愈宝贵了。

这样，来往的日子一多，我对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平经历、艺术成就、办学始末，以及他的立身行事的处世为人之道，就有了一个大概的较为全面的了解。我觉得，对于他的生平，关于他的有关的史料，应该记录下来，保存下来，留给后人看看，其实同代人也应该看看。但是，那时好像没有人想到要做这个工作。这也难怪，当时还正处在长夜难明的时刻，人人自危，谁敢替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树碑立传呢？我却偷偷来做这个别人不敢做的工作。于是便给颜老建议，为他写一本年谱，即使只是雪泥鸿爪，总算一生有个记录。颜老欣然同意，可知他平日早有这个意思。我们商定，这份年谱写好后，保守秘密，只给自己看，不可外传。颜老说，他准备身后只留

给子孙看。我把所听到口述材料，排比了一下，并参考了颜老保存的一些文献资料，便写成了至解放前夕为止的年谱初稿。写好后，复写了两份，颜老保存一份，我留一份。除颜老的学生兼秘书陆寰生知有此事，并看过年谱稿外，秘不示人。现在年谱解放后这一部分事迹，则是打倒“四人帮”后，为祝贺颜老 90 寿辰纪念画集的出版而补写的。现在年谱止于 1982 年，最后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本年纪事，暂止于此。先生高年遐寿，一生追求艺术之美，无日或歇，老而弥健。其所创作，日趋化境。以后事迹，容待续编。”越二年，1984 年，先生去世，享年九十二岁。所以我写的这份年谱，事实上还是不完整的，我也没有实现“续编”的诺言，这是深感遗憾的。

虽然这是一份未完成的年谱，但是我想，颜文梁作为一代艺术大师和艺术教育家的成长经过与主要业绩，都包罗在里面了。颜文梁本质上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孕育成长的，但他学的是西洋画，他的技巧与修养深受西方绘画熏陶，他一生严格遵守西洋画法，不像有些画家中西兼擅，忽西忽中，亦洋亦华，挥洒自如。他认真拘谨，严肃，刻板，因此不如有些画家那样“讨俏”。他一生创作的大量粉画、油画，无不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神色。他的许多画的画题，用的就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句，但又决不逾越西洋画法矩矱于一步。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个中国化的西洋画大师。

我在写这部年谱时，最感兴趣的，也是最想多记载一些这方面事迹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他的教育与影响，以及他本人在成长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毅力和不懈的对美的追求。所以我特别重视他所叙述的一些小事琐事，我认为这才能更真实地表现他的性格与为人。他就是从这些小事琐事中成长起来的。

这些小事琐事，对他来讲即是大事。我想一反正统年谱的干巴巴只记所谓大事像本流水帐那样的写法，尽可能把这部年谱写得生动些、活泼些，也更真实些，虽然用的是文言。

例如一九〇二年十岁那年的纪事：

练百步拳。塾中（指私塾）有年长学生诳先生练所谓百步拳，云每夜中二时起身，朝井中打拳百下，至九十九日，井水涌起，中有妖怪出现，即可厉声问其姓名，彼回答后自然隐去，后此妖怪即为我所役，我隔百步击人，人必随拳而倒。先生信以为实，且欲实践以验其效，每至午夜，潜起至庭中井边练之。先生时伴祖姨母程氏眠。一次伊夜半醒觉，忽失先生所在，大惊，遂为察觉，严加禁止。先生遇事喜亲自实验，自童年已然，此其一事也。又如一九一七年二十五岁的纪事：

先生往返吴江、太仓，所乘班船，恒于苏州阊门犯人码头停靠。前清官府解送罪犯过江，此为专用码头，故名。某次，先生自太仓返苏州，至犯人码头上岸，时已昏黑，忽见前行一乡人皮夹落地，即有人疾趋拾起，知为先生所见，回顾示勿声张。先生方错愕间，乡人慌张奔回，遍地寻觅，云所落皮夹中有钞票四十元。拾者暗拉先生衣角，诳乡人曰：“一小孩拾去。”随意指一方向，乡人即又奔去。先生责曰：“失物应归原主，汝此举将使乡人情急跳河，汝何忍心！”拾者曰：“天上落得，地下拾得。”愿与先生平分。先生拒之，拾者纠缠不放，直至马路亮处，先生不顾，雇车而归。拾者犹在后呼曰：“蠢大！”次日，先生至茶馆吃早茶，晤父执朱怀瑜，谈及此事，尚为乡人失财或致轻生而忧。怀瑜笑曰：“此‘刮包’也，拾者与乡人实同伙也。汝幸未与拾者平分，倘一念贪财，则乡人必于汝等分财时奔回，执汝大敲竹杠，非罄

身藏所有不止。”先生闻之，亦哑然失笑。乱，吴语音笃：“乱包”者，诈以失物为诱，引人上当圈套之谓也。

像这类琐事小事，我看正统的年谱作者是不会写进他的年谱中去的吧。但是颜老却首肯这种写法。他谈这些故事的时候，本是随意当作笑话来讲的，我却认真听着，追问发生的年份，追问细节，这也使他认真起来。颜老对写他的这部年谱，曾有一个评语：“有点特色，有点与众不同。”有特色，与众不同，不一定就是写得好，但至少是没有流于平庸，避免了一般化。

我很注意颜文梁的交友。凡是他记得起的。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所提到过的，不论是有名的、无名的，不论是同学、师长、同事、朋友，以至官员、商人、贩夫走卒，我都一一记录下来，务求详实，不令遗漏。我觉得这是当代最可珍贵的资料。当然我所重视的，不是他们的履历，而是他们的言谈行事，通过他们的神情语气，显示各人的性格。例如，我在三个地方记下徐悲鸿所讲的四句简短的话语。一九二七年三十五岁纪事：“秋，徐悲鸿偕妻蒋碧薇，抱子伯阳，来苏相访，始与先生订交焉。先生至旅馆回访，悲鸿指伯阳笑曰：‘惭愧，唯此一子！’”一九三三年四十一岁纪事：“悲鸿出国前，邀先生游玄武湖，同游者有悲鸿夫人及中央大学学生，弄琴鼓乐，乐而忘返，至晚九时，方踏月而归。所经和平门已闭，禁止通行。时有城外二农民，抬一重病人，急须进城就医，门者仍无动于衷，不许通行。悲鸿气愤至极，连呼：‘不近人情之至，不近人情之至！’后以悲鸿名通电话，允为开门。悲鸿愤曰：‘我不领他情！’不进，折返玄武湖，坐待天明。饕蚊肆虐，终夜不眠，悲鸿意气自如。先生服其强项。”一九五三年六十一岁纪事：“先生赴北京，参

加二次文代会，住东四旅馆。徐悲鸿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偕夫人廖静文来访，多年阔别，把晤甚欢。悲鸿见面即笑曰：“我中小奖！”盖指前顷小中风也。”我记得颜老看到这些地方，也笑说：“你这是传神阿堵了！”我想我不过是如实记载罢了。

今天看来，这部年谱还可更完整些，有些材料可以补充进去。我只举一个例子够了。颜文梁爱歌，为苏州美专制过十多支歌曲，于每周晨会，教学生演唱。年谱中只列歌名，未录词曲，是一缺憾。我这里录一首歌词，以见一斑。这首歌名《青年的苏美》，歌词如下：

青年的苏美，蓬勃气概，
仁慈和蔼，光明灿烂。
苏美系我侪，我侪爱苏美。
同声颂赞，千秋万岁。
艺宫之雄伟，松柏之葱翠，
艺术至尊，举世共爱。
青年的苏美，虚心为怀，
涵养正气，展布英才。
青年的苏美，蓄精锐，
期将来，焕发异彩！

颜文梁表现在画风上的，是浓烈的中国气派；表现在做人的立身行事上的，则是守旧的老派作风。这后一方面的表现，我在年谱的“后记”中提到过两件事：

一是爱护青年。青年人，其中不少是首次慕名而来，向他请教学画。我看见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学识和经验，总是

诚恳地、不惮其详地指点艺术的各种门径与方法。后来找他的青年人几乎成群结队，他就索性在家里办起了一到两个学习班，每星期上课，由他讲解他最有心得的透视学和色彩学，并实地指导学生们的习作。当然这都是尽义务。

一是待人接物有一套老派的规矩。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虽然身体、精神还很健旺，但步履已颇艰难，即使在家里也只能一步步地挪动行走，然而他却一定要吃力地挪动着脚步，把客人送到门口，并且看到客人转弯不见，方才进屋。他这个规矩，前后始终如一，不是看人的地位而有区别，也不是随着自己环境顺逆的不同而有变化。

其实，这方面可补充的事例，还是相当多的。

我们谈到过读书问题。他说青年时喜欢看林琴南翻译的《说部丛书》。我也是喜欢林译小说的，所以在读书上有同好。他说他到上海定居后，买到过一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言翻译《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还配着一个木头匣子。他很宝贵这部书。说着，他不怕吃力，从卧室去捧出这部书给我看。得到我的欣赏，他很高兴。

他的衣着很朴素，外表上看颇像个“土老头儿”。持家勤俭，几十年的旧物都不愿丢弃。他住宅的廊檐是很宽大的，堆满了旧篮子、旧箱子和旧家具。几十年前的旧皮鞋也保留着。他的一位女学生曾责怪说：“颜先生，你好开垃圾店了！”他笑笑，不以为意。他家的煤气灶的开关是上锁的，每晚，他必定亲自锁上，巡视房屋一周，然后入寝，数十年如一日。他克尽孝道，母亲临终前给他的一只苹果，他一直用玻璃罩罩着，放在卧室内，已经成了灰，还是当作纪念品保存。

我最后一次见到颜老，是在南京路上的上海美术馆，他在

那里举办一次规模盛大的个人美术展览。时间大约是一九八二年或一九八三年。几间大厅挂满了他的画。就是在这个美术馆“文革”中曾开过一次“黑画展览会”，陈大壮、刘旦宅、林风眠等画家的画，都作为“黑画”在这里展览过。打倒“四人帮”，彻底否定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艺术也从极左思潮中解放出来了。否则的话，颜老是不可能在这里开画展的。颜老的画展，获得很大成功。那天，他精神很好，接受来宾对他的祝贺。我走过去向他致意，他认出了我，要站起来同我握手。我赶紧按住他的手，要他不必客气。他紧紧拉住我的手，说道：“我们是老朋友了！不仅是老朋友，还是患难的朋友呢！”说着，我们两人都笑了，大概是都意识到过去那段偷生苟活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九三年

一首诗引起的回想

叶笑雪先生送来潘伯鹰先生的遗著，并附短简道：“《玄隐庐诗》一册，为潘夫人嘱带奉，中有赠君诗一首，今日读之，倍增怅惘！”我很感谢潘夫人的高谊，使我得读这一本印制精美的诗集，摩娑翻阅，如见故人。

集中赠我的一首七律，题目是《钱君伯城见示所述唐宋古文之作，题以奉赠》：

著书岂必穷愁事，历世终看倜傥传。
尚论韩欧微喻指，不离形质妙忘筌。
霜飞转益岩松茂，火蚀无伤璞玉坚。
握手相期青眼在，浮荣自古例浮烟。

诗题中说的“所述唐宋古文之作”，指的是我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本小册子《唐宋古文运动》，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一。当时出版后，送请伯鹰先生留念的。想不到他隔不了几天，就派他的一位学生（可惜姓名已忘）送来了他书写的条幅，写的就是赠我的这首诗。这是对朋友的慰勉，洋溢着真诚的感情。

“霜飞转益岩松茂，火蚀无伤璞玉坚”，这既是嘉许，也是期望。我想伯鹰的原意，恐怕不仅是对我个人，应该也是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而言吧。“握手相期青眼在”，这是伯鹰的自道。他对朋友始终如一，不以贵贱荣辱而改变态度。愈是处于逆境的朋友，人们像怕瘟疫那样避开的时候，他愈是表现亲热，

青眼相加，握手谈笑。他遵守的做人之道，显然与一般的识时务者们大不相同。

家中一只老式的大镜框，伯鹰的条幅正好镶配在内，我就一直挂在陋室中，朝夕相对。伯鹰是名书家，他的书法遒劲雄浑，自成一家，为我的陋室增辉不少。

不过我们平日往还不多。那些年政治风云起落不定，工作之外就是不断的学习，几乎每天精疲力尽，朋友间也难得见面。我不敢记日记，怕惹麻烦，但许多事因无记录，大都忘失。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伯鹰，是在听说他患病卧床，我同妻子去他胶州路住宅看望。看望的具体日期年份，全不记得了。据《玄隐庐诗》所载小传，他卒于一九六六年五月，那么我们见的最后一面大约是一九六五年底或一九六六年初。

那时他已不便行走，躺在床，但精神很好，见到我们夫妇，十分高兴。我们看他双眼仍是那样炯炯有神，透过近视镜片发出闪光；讲话的声音也仍如平昔那样宏亮，我们想他的病情或不像所闻严重，也感到宽慰。那天他谈了许多话，现在回想，大部分也忘了。只记得他虽在病中，还在关心朋友们的生活，其中特别提到因遭“扩大化”而被遣送回籍的 Y 君，想要助他一臂之力。

这次一面，遂成永诀。待我听到他的逝世消息，已是“文革”的雷声滚滚而来之时，什么友谊、人情、道义等等，一概“横扫”而光了。他写的条幅，我不敢保留，取下焚化了。他的赠诗，我曾记在一个本子上，几经搬迁，也不知去向了。倘若不是这次看到《玄隐庐诗》保存了这首诗，我是不会提起有此一段因缘的，实在是遗憾之中的慰藉。

一九九〇年

李平心之死

李平心是“文革”最早的受难者之一。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一本杂志《自修大学》，以知识青年为对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鼓吹抗日救国，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他用“李鼎声”这个名字写的一本《中国近代史》，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抗日战争期间，平心留在当时称为“孤岛”的上海，靠着租界庇荫，仍从事理论写作工作。一九三九年，苏联背着盟国突然宣布与纳粹德国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引起舆论大哗。在一次左派文人为苏联立场辩护而召开的座谈会上，平心独持不同论调，对苏联的做法提出质疑，引起了“言必听苏联”的左派文人们的不满，视平心为“异己分子”。但平心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愿像牵线傀儡那样听人摆布。

五十年代初，平心在华东师范大学执教，还是不断写文章。在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是上海知识界的两个重点“帮助”对象之一，另一个是复旦大学的刘大杰教授。两人都不识抬举，拒绝“帮助”。刘大杰跳了苏州河，平心则以木棍猛击头部，但两人都获救，虽然后来两人的遭遇判若霄渊。令人惊异的是，平心竟安然逃过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可说幸运。当然，他逃不过“文革”这一关。“思想改造”运动仅是以后若干次针对知识分子的“牛刀小试”，算是最为温和的，对知识分子的触动面不算很大。平心“脑震荡”了一下，很快就过去了。还是爱写文章，发表一些不合“左派”理论家口味的言论，因而常常受到“左派”的围攻。

平心是我敬仰的朋友。我敬仰他的勇于坚持自己信念的“书

生气”。六十年代，我从事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的编辑工作，常向他约稿，往来一多，便成了知交，几乎无话不谈。他是二级教授，离婚独处，住一套高级公寓，用了个保姆烧饭洗衣，再用一个女秘书为他整理抄写文稿，生活比一般人优裕。我去看他，他必留饭，去附近一川菜馆点两个菜来家，温半斤黄酒，边饮边谈，彼此兴致很高。那时他已转向中国早期社会研究，对甲骨、金文都有新颖独到的见解，《中华文史论丛》很欢迎他的文章。他博闻强记，无书不读，随时随地一册在手。他曾同我研究，如何在洗澡时躺在浴盆也能看书。他设计了架在浴盆上的木板，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关键是要使书本能竖立起来，平放是无法阅读的。他果然找木工试做，效果不错，颇为自负。这使我想起牛顿为大猫小猫分大洞小洞的故事。

现在叫作“四人帮”中的文痞姚文元，是经过“御封”的“棍子”，专打主子所不喜的知识分子，打到谁谁就倒霉。姚文元炮制的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称为吹响“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开始了所谓“清官问题讨论”，事实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这是一场大骗局，称之为“钓鱼”也好，“引蛇出洞”也好，总之是每个运动开展前采取的诱发手段。当时一些书呆子不明就里，纷纷响应所谓的号召，参加座谈会，争着发表己见，就像飞蛾扑灯一样，个个自投罗网。平心也接到通知，因故未曾出席，原可侥幸漏网，但却在报上发表了文章，于是也被诱入这场骗局。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一天夜间，我正在他家闲谈，忽有某大报记者来访，因他未出席清官问题座谈会，特请他专门写篇文章。我在隔壁听到他们谈话。他先是推辞，后来却不过情面，只得应允。记者一走，我就提醒他，清官问题讨论的背后恐有花样，还是慎重

为好。我倒不是什么先知，也未得到任何内部信息，不过预感到姚文元此人虽是条恶狗，逢人便咬，但善伺主子的脸色，所以能博得上头的欢心，他的每一吠声都是有点来头的。平心听了只是笑笑，似乎不以为意。几天后，某大报就登出了他关于清官问题的长篇论文，引经据典，涉及中外，充满了学究气，光是附注就引用了好几国文字。其中有一条注文叫“新黑帮分子”，引的是俄文，可见征引之博。就是这个名词，后来被姚文元反过来栽在平心头上。不久，形势大变，所谓讨论就变成了讨伐，发表过文章的知名人士更是成了讨伐目标。平心首当其冲。姚文元用“劲松”化名写的批判文章，充满杀机，称平心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

其时形势日紧，我已在本单位受到监视审查，但在看到姚文的当天中午，乘中午吃饭不受注意之时，还是偷跑出来看望平心，告知他姚文透露了某些不祥之兆，要他小心，不要再写文章辩论。平心却很泰然，认为不会有什么，反而劝我不要多虑。我不敢多留，匆匆告别，他殷殷送我到电梯旁，目送电梯下降。平心那矮胖的体型，显示智力发达的特大头颅，架一副近视眼镜的和善如弥勒的面容，至今犹在目前。想不到与他匆匆一晤，过不了几天，就传来他自杀的消息。导火线果然就是姚文元化名出笼的那篇文章，引发了对平心的批斗。在大学批斗大会前，平心义不受辱（这与傅雷的自杀是一致的），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哀哉斯人！

平心虽死，事情却并未了结，有道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死人也不能轻易放过，这是最高上峰的教导。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曹荻秋在动员报告中点了八个“反动学

术权威”的名字，作为大批判的对象。这八个人是：周谷城、周予同、周信芳、李平心、李俊民、贺绿汀、瞿白音和王西彦。八人中只有平心已死，但也不能幸免，还要“批倒批臭”。另外七个“反动学术权威”中：周谷城系复旦大学教授，因发表“无差别境界”理论，违反了矛盾论；周予同也系复旦大学教授，因有“批逆鳞”的言论，大有向无产阶级进攻之势；周信芳即麒麟童，上海京剧院院长，因主演《海瑞上疏》，抬着棺材上舞台，乃是“向无产阶级示威”，而提倡海瑞精神，即是为彭德怀翻案；李俊民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因为写了一篇历史故事《杜甫还家》，杜甫“怀念出奔的唐明皇”，就是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贺绿汀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因替资产阶级音乐家德彪西辩护，就是与姚文元对抗；瞿白音系上海电影局副局长，因写了《创新的独白》被扣上“主张电影不要党的领导”；王西彦系作家，因写小说而“反党”。七人中有一半现尚健在，他们是周谷城、李俊民、贺绿汀、王西彦，都是八九十岁的老翁了。

经曹荻秋（他自己后来也成了“叛徒”，瘐死狱中）公开点名，他们便受到了轮番的纯然是侮辱性的批斗。李俊民每次被揪上台，由一个身穿绿军装的造反派站在身后，将他双臂反剪，美其名曰“喷气式”，再双膝下跪；有一次，李俊民稍有反抗，一个造反派死命扭他耳朵，直至出血。贺绿汀强头倔脑，不肯低头认罪，因此大吃苦头；每逢文化艺术界的批斗大会，即使贺绿汀不是主角，也要押来陪斗，他的女儿就是因为不堪受辱，愤而自杀的。周信芳是麒派老生的祖师爷，唱唱戏罢了，却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三反分子”，他被反背双手，跪在一辆大卡车上，儿子周少麟也跪在旁边，两

个造反派分别揪住父子的头发，使脸部朝上示众，周游全市，这叫作“游斗”。周氏父子脸色煞白，几无人形，路人不忍卒睹。这三人的批斗情景，都是我目睹的。

平心以自杀躲开了对他的人身侮辱，他也许有先见之明。多行不义必自毙。“四人帮”作恶多端，最后以覆灭告终。平心泉下有知，当可告慰。

一九九三年

老报人徐铸成

徐铸成一生办报，死而后已。即使很长时期被剥夺了办报权利，心底里还在办报。他亲手创办的上海与香港两地的《文汇报》，其业绩具在人间。“文革”后（确切点说，应是一九七八年“右派改正”后），他重返新闻界，虽然处于闲散地位，却迸发出少有的热情与活力。其时他已年过古稀，壮志犹存，雄心未已，重又拿起被迫废弃多年的笔来，为了追回失去的时间，在近十年中赶写出数百万字的一本又一本“报海旧闻”（如《风雨故人》、《张季鸾传》、《旧闻杂记》等），为香港几家报纸撰写专栏文章，同时还在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担任教职，讲授他积数十年办报经验的“新闻烹调学”。但是他的最大心愿，念念不忘的，仍是在他有生之年能再办一张新报。他对我说，这张报纸将办在香港，为国家的海外宣传出点力，以民间面目出现，避免官方色彩，要“小骂大帮忙”，取得读者信任，这样宣传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他准备请两位朋友做他的助手，其中一个是我，并说已把名字报上去了。这“上”指的是什么部门，他没有具体说明，我也没有问。我也有一个办报梦，当然乐于从命，但也知道能不能通得过，并不是容易的事。果然，过不多久，他告诉我有人说了一句：“我们不需要‘小骂大帮忙’！”这事就告吹了。他后来不再谈此事，故知道的人不多。但我想，此事未成，他是不会释然于怀的，只能是赍志而殁了。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他拟去医院检查身体，临行上厕，事毕起身即倒地不起。据谓系心肌梗塞，抢救不及，终年八十五岁。四天后，上海《文汇报》于二版右下角刊出一

块二寸见方周以黑框的讣告，报道他的死讯。按照我国报纸发布讣闻的规格，一版二版，带不带照片，都有不同的待遇。徐铸成的这个讣告，仅由报社署名，似尊重又似区别对待，规格显然不能算高。就我所见到的报刊，迄今未见任何悼念文章。人的是非功过，原不靠身后的哀荣褒贬来论定，但徐铸成这种情况不也多少反映一些世态人情吗？

一九八六年，徐铸成八十岁的时候，海外一些朋友准备在香港为他举行一个庆祝会，并已向他发出请柬，却受到了劝阻，最后未能成行。劝阻的理由是，像他这样一位名报人，应在国内祝寿为宜。后来好像是开了一个小型的集会，以示祝贺。倒是上海《文汇报》的一些退休老记者、老职工，在南京路上的扬州饭店办了两桌席，为他祝寿。我因抗战胜利后曾在刚复刊不久的《文汇报》有过一段短暂的工作关系，也获邀参加。那天来的都是平头百姓，没有领导讲话，没有来宾发言，也没有什么仪式，大家无拘无束，频频举杯，叙旧谈笑，气氛融洽愉快。徐铸成偕同夫人一同光临。他们是白头患难夫妻。夫人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家庭妇女，一心相夫，不计其他。丈夫在外遭难，她也在家连累受苦。十年浩劫，徐铸成被赶到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灶披间居住。这位夫人还带了一位相从数十年的老保姆，挤住在一起，整整住了十年之久。比起某些名人之妻，一旦丈夫倒楣，立即“划清界限”，离异而去，徐夫人是可风的了。中国家庭妇女的传统美德，大概就是表现在这些方面吧。

徐铸成是《大公报》出身。《大公报》在旧中国是中间偏右的报纸，但在中国新闻史上，由于它的敢于议政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却是影响最大、培育人才最多的一张报纸。《大公报》的第一代是张季鸾、胡政之与吴鼎昌（吴中途从政）；第二代主要

有二人，一是王芸生，另一是徐铸成。从第二代起，《大公报》分化出中间偏左以至左派群体，这一群体的代表者即是徐铸成。这导致他最后退出《大公报》，另行主办《文汇报》。从抗战胜利至全国解放前夕——亦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段时期，上海《文汇报》实质上是起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政治战线同盟军的作用。它一方面揭露抨击国民党政权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另一方面则把中共的各项进步政策主张传播给全国人民。就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而言，我以为即使比之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开辟的一块“解放区”亦不为过。徐铸成无疑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战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汇报》被国民党政权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终遭查封，徐铸成连同《文汇报》于是只得去香港另组新馆。香港的《文汇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与早已在香港立脚的中右报纸，唱起了对台戏。直到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南下，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方促使有的态度暧昧、立场摇摆的报纸开始转向，忙不迭地向胜利一方靠拢。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中共中央邀请在港民主进步人士北上参加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徐铸成自在被邀之列。原来的中右派却以能否被邀而惴惴不安。但是想不到，到了一九五七年，一九四九年的左、右派地位就来了一个大变换。原来的左派成了右派，原来的中右或右派，这时“重新排队”，成了“反右”的左派。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次嘲弄。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使徐铸成的命运发生急遽转折，使他从战友、诤友、左派进步人士，一下子降为“批倒批臭”的“大右派”。“反右”的起因是“帮助整风”，口号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是，“右派分子”的悲剧就在于相信了“言

者无罪”这句话，提意见时超越了应有的“度”。怎样适应这个“度”，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需要集合数十万人的痛苦经历方能略通门径，然而对某些人来说，恐怕终生未能登堂入室。二十年后，在闲谈中，徐铸成曾同我谈起这个“度”的问题。他说鼓励提意见时，你不提，显得不是“诤友”，提什么呢？最好的提法，莫如说某某同志呀，我对你的意见很大，群众对你的意见也很大（这时听意见的同志脸色阴沉下来）。就是你太不顾及自己的身体了，日夜操劳，巨细不遗，这样下去身体能不垮吗（听意见的同志脸色开始转晴）？要注意身体呀，你的身体不属于你个人，是关系到革命和国家前途的呀（听意见同志这时已满面笑容，但做出严肃听取样子）！这样就皆大欢喜了。我说，你这是说笑话吧？他说，笑话也含有真理呵。我至今还不明白，他这说的是笑话还是真理。

对“右派分子”的待遇，可说每况愈下，先还算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处理”，接着就被归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境遇日惨了。徐铸成降职降薪，被逐出《文汇报》，调往上海出版局审读处。这就是徐铸成为什么有近二十年时间脱离新闻界而在上海出版系统“悔过改造”的原因。我是一直在上海出版界工作的，办公地点恰在出版局旁边，虽然同他不相往来（非不愿也，乃不可也），但他的一些情况却也从别人处时有所闻。有时，上下班在路上相遇，也打个招呼，但话是不多说的。他同平日一样，戴着厚厚的近视镜片，必须走近方能认出人来，脸上还是挂着一副平日常有的忠厚笑容。像所有“右派分子”一样，他几乎断绝了一切交往。

他是第一批“摘帽”的“右派”之一，举行了摘帽仪式。那时上海出版界的“右派”约有二百多人。仪式在上海人民出

版社的饭厅举行，我也躬预其盛。主持会议的好像是出版局的党委书记或副书记，记不大清了，讲的话大概是“宽严结合”之类吧。最给人印象深刻的，则是立刻从直呼其名改称“同志”，有如天上颁下的纶音，受者如醍醐灌顶，顷刻间从地狱回到了人间，顿生无限感激之情。但是宣布“摘帽”的只有二人，徐铸成是一个，再一个是李小峰，他是原北新书局老板，鲁迅的著作大部分是他出版的；公私合营后，他并入了上海文化出版社，有了“资本家”身份，也成了“右派”。在场的大部分未蒙“摘帽”之荣的“右派”，一看“摘帽”的比例如此之少（2%还不到），都不免有点泄气，轮到自己不知何年月日。徐铸成和李小峰都讲了话，表示感谢党的恩情，要努力学习，脱胎换骨。这是当时“右派分子”朝夕不离的口头禅。最后由李小峰所在出版社的党支部书记讲话，声色俱厉，警告一切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莫以“改造”为儿戏，若不痛改前非，诚心悔罪，只有死路一条。这番杀气腾腾的训词，把会场仅有的一点祥和之气，一扫而空了，在场的“右派分子”莫不从心底又感到了透骨的寒气。散会后，我走到徐铸成身边，向他道贺。他微微苦笑，看近旁无人，轻声说：“做戏！”我吓了一跳，装未听见，忙走开了，但心里很佩服他的勇气。听说他后来不再提“改造”“有罪”这类的话，不像有的人出于无奈成天把这些话挂在口上，逢会必讲。他不愿再说违心之言，便成为他不断受到歧视的原因，即使在“文革”之后。

徐铸成的这台戏继续做下去。由于他是知名人士，开始，真有点礼遇有加的样子。原《文汇报》经理严宝礼逝世，登在报上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除了上海市的党政要人（好像柯庆施亦在内），也有徐的名字，这是公开宣布他“回到了人民一边”。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到了史无前例的那场“革命”。其时徐铸成已从出版局调到出版文献编辑所，当一个普通编辑。他虽已“摘帽”，仍是“摘帽右派”，又是“大右派”，这时更是“老右派”，自然成了显著的目标。《文汇报》和出版系统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把他“揪”了出来，揪回到《文汇报》进行批斗。我记得有一天的《文汇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就是赫然的“揪出大右派徐铸成”，并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从此大会斗，小会批，只要是出版界和新闻界的批斗会，无不有徐铸成的踪影，不是主斗，即是陪斗。有一次在南京路上海杂技场的环形剧场内，我同他相遇。这是一次出版界批斗大会，押上台的“牛鬼蛇神”胸前都挂一块大牌，写明身份。我正好站在他身边，相视无语。又一次是在衡山路的风雨操场，这是一次宣传系统的宽严结合宣判大会，宣布了两个从宽和从严处理的典型，交代和检查都很深刻，并不比新闻界那位从宽处理的典型差到哪里去。但既要分出宽严，谁好谁坏，就得由造反派来定。这也是“做戏”。会议中间，一些来此受教育的“牛鬼蛇神”由造反派管领分成一堆堆坐到草地上谈体会，并结合小型批斗，这叫作“大会套小会”。徐铸成同我分在一堆，我看他没有抢着发言，混过去了。

接着便进入了“五七干校”时期。“牛鬼蛇神”被监督劳动，开批斗大会，徐铸成照例陪斗。造反派忙于内哄，不断有新的“分子”揪出来，什么“五一六分子”、“共向东分子”等等，很为热门，对“牛鬼蛇神”（特别是有些“死老虎”）的管教也似乎放松了一些，晚间如有文娱活动，也允许可以参加了。一次，各连队（出版社都依军事编制编为连队）举行乒乓比赛。我去观赛，看见徐铸成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每个选手的表演，遇

到精彩处，脸上就绽出了欢欣的笑容，一点不像一个人们心目中郁郁寡欢、垂头丧气的“大右派”。我知道他是喜爱体育的，他进《大公报》起始便是任体育记者；但是处于如此的逆境中，尚能保持早年的爱好，发自内心，形之于色，不能不说是一点赤子之心的流露。在那腥风黑雨的日子里，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文革”后，我曾同他谈起我的这次印象。他说这一方面是他的爱好，另一方面也是他对“批倒批臭”的一点反弹，只有自我感觉“不倒不臭”，才能活下去，把这场戏看完。但是，他又说，他原是很爱京戏的，但是对“样板戏”却无论如何听不下去，再强迫也不行，这也是所谓“阶级感情”吧，当然这种感情那时是不敢流露出来的。徐的爱好京戏，我也是知道的。桂林撤退，他到重庆，住在《大公报》的李子坝宿舍，我那时与他初识，是一个后辈，就听他唱过京戏，好像是青衣，唱什么就不记得了。

一九七〇年，我去工厂“战高温”（一“战”就是八年！），离开了“五七干校”。后来“干校”人员陆续上调，徐铸成调到辞书出版社修订《辞海》。同时一起的有陈虞荪、曾彦修、冯英子、束纫秋等人，都是一批原来的“牛鬼蛇神”。一直到“四人帮”覆灭，还延长了相当一段时期，他们仍被作为“专政对象”对待。要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批人（包括徐铸成），方重获新生。

现在，徐铸成已是历史人物了。将来写中国新闻史，他的名字是会载入史册的。我相信历史会给他公正的评价。就我个人对他的认识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以笔为武器、以说真话为天职的新闻工作者。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在一篇关于杂文的文章中，还引用刺灸治病“刺入的针，一定要刺到痒处痛处”

而恢复健康为譬，反对时下盛行的虚假文风：

可见，即使是针对“人民内部”的杂文，也该抓着痛处痒处，痛下针砭，这才能起治病救人的作用。如果老是唱歌颂功德的调子，或者不问“病情”只看“行情”以决定下针的深浅程度，那只能是对杂文本身的讽刺。

这是为林帆的杂文集《老马咏叹调》写的序，未署写作年月。此书版权页的出版日期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估计从交稿到出书约需半年，则徐的序言当写于此年的五、六月间，距他去世不足半年，虽不一定是“绝笔”，至少也是最后的遗言之一了。一位老报人临终前直言说论，是他的生命的最后呼声，是很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

一九九三年

沧桑饱经徵交谊

——忆陆澹安先生

《文学报》的总编辑送来一组陆澹安先生的诗作，并要我写一点纪念文章，这使我得以回想与澹安先生交往的某些情景。文章我是乐意写的，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几次提笔，却又不知从何写起。回想往事，心潮起伏，反而难以下笔。澹安先生长我三十岁。我尊他为前辈和师长，他却不以年辈分先后，视我为知友。外人几乎不知道我们二人之间有着多么深厚的交情。这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特殊环境所造成的特殊友谊。澹安先生把我同他的这一友谊，喻之为“饱经沧桑”，这是他在赠我的一本书上的题词，我现在就移来作这篇回忆文章的题目。谈起这句话，就有一段往事可述。《小说词语汇释》是澹安先生一部著作，出版于一九六四年，他亲笔题签，分赠友好，我也在内。不久，“文革”风暴陡起，四处抄家，我知道不免，赶紧把有着澹安先生题字并图章的这张衬页撕去，免得暴露我们的关系，也叫他不受我的牵连。这样做，后来证明是大有必要的。在我以后没完没了的各种口头的和书面的“交代”中，便可不提他的名字，为他减掉了麻烦。有一位文艺界的名人士S先生，也是澹安先生老友，因在“牛棚”久读毛选，想调剂一下，偷偷找澹安先生借了一部《西游记》，带到“牛棚”，放在毛选下面阅看。谁知不小心，被造反派发现，犯了不老实改造之罪。除批斗外，勒令交代书的来历。S先生无奈，被逼讲出澹安先生名字，这下便增加了他的麻烦。造反派几次登门调

查，要澹安先生写材料揭发 S 先生宣扬“封资修”的罪行。这是澹安先生亲口告诉我的一件事。《小说词语汇释》这本书，抄我家时只被翻阅检查，未被抄走，幸而保存了下来。转眼一九七四年，到了“斗批改”阶段，我被放逐“战高温”，管制较松，朋友间稍可走动了，我便请澹安先生在这本幸存的书上补写题字。他欣然命笔，写下了几行字，如今我特请《文学报》制版，以存真迹。当时他已八十一岁高龄了，但笔力仍健，还很见精神，一点不显苍老。

澹安先生中年以后，潜心碑帖之学，尤富汉碑的收藏。他曾告诉我，施蛰存先生也研究汉碑，时有切磋，但他的收藏超过施先生。据郑逸梅《陆澹安小传》所载，澹安先生这方面的著作有《汉碑通假异体例释》、《隶释隶续补正》等。所以澹安先生的书法，长于隶书，但我却更喜他的端楷真书，以为娟秀中特具刚劲之气，很像他的为人，外圆内方，可自成一家。就在他补写《小说词语汇释》题词的前一年，也是他八十岁那年，我请他为我写一幅真书条幅。那时一些老先生或书法家，为人写字，一律都写毛主席诗词，免得当成借古喻今或是影射什么的。澹安先生给我写的字，却与众不同，录了一首龚定庵咏七夕的《南歌子》词：

灵鹊飞秋夕，香车驾暮烟。针儿七 箇尽情穿。略费玲珑七孔藕心钱。床上宜施宝琴，中替辨弦。七襄报我定何年。且喜南楼七分好梦圆。

署款是“癸丑冬，幸翁，时年八十”，钐的章则是“澹盦”。我至今不明白，写字的时候冬日，为什么录一首七夕的词。抗

扰尘寰，莫辨东西，是不是借用“好梦圆”三字，以当祝愿？但他的自号“幸翁”，我却是明白原由的。他一生澹泊自安，与世不争。他名澹安，是名实相副。他常对我说，他生平最维持两点不变：一不变是不做官，二不变是不参加各种党派。在旧时代，多少人拉他做官，又有多少人拉他参加国民党和别的党派，在富贵和名利前，他都谢绝了。

解放后，他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闭户著书，自愿做一个太平盛世的闲云野鹤。经历了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浪潮，眼看朋辈的一个个落劫难逃，他以闲散之身，躲过了朋友们的不幸命运，真是太幸了。我想他确是凭这一点自称为“幸翁”的。这幅字最近我已托苏州桃花坞师傅装裱，不时悬挂出来，有朋友来不知“幸翁”是谁，我就介绍这是陆澹安先生手迹。

我与澹安先生情谊虽密，但过从并不密，一年最多相会三四次，不过每晤面必作半日谈。澹安先生健谈，但不像有的老先生那样只管自己讲话，旁人无从插嘴。他自己讲，也愿意听对方讲。所以每次见面，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我也可告诉他一些见闻。天南地北，上下古今，都是我们的话题。谈得较多的是近现代的一些旧闻轶事、人物掌故。文学报总编辑送来的诗作中有两首《题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七绝，使我想起我们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谈话。我认识澹安先生时，他事实上已是所谓的“鸳鸯蝴蝶派”的有数的几位硕果仅存人物了。他主编过《侦探世界》杂志，自己写侦探小说，创造过一个李飞侦探；又参加翻译《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为推动中国推理小说成长和引进外国推理小说首开风气。不肖生（向恺然）的两部武侠小说名著《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最初发表都在赵茗狂主编《红玫瑰》杂志连载，每回由澹安先生撰写评语。后一部

小说原名不很通俗，是由澹安先生改拟的。他还写了许多长短篇小说和散文笔记、弹词开篇等，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中的多面能手。我们关于“鸳鸯蝴蝶派”的谈话，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是对“鸳鸯蝴蝶派”这个贬义名词的看法；第二是对这派作品的评价；第三是对这派作家的论定。澹安先生在题《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这一部书的七绝中，对这三个问题基本上作了回答：

蛮触争雄已可怜，漫劳萁豆更相煎。
即今高处寒难尽，愿作鸳鸯不羡仙。
劫后神仙不值钱，而今鸡犬尽上天。
何如幻梦成蝴蝶，消受庄生一觉眠。

在我们的谈话中，澹安先生对“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虽觉不妥，但不过一笑置之。倒是我为之不平，认为以偏概全，殊失公允，主张应称通俗小说派，而且不应排斥于新文学运动之外（近时持此论者已较多）。澹安先生诗说“原作鸳鸯不羡仙”、“何如幻梦成蝴蝶”，意思是你们这些作神仙的叫我为“鸳鸯”“蝴蝶”，我就作“鸳鸯”“蝴蝶”吧，我并不羡慕你们这些作神仙的。神仙当然也指那些对通俗小说派不屑一顾的新文学作家又做了大官小官的人。

“蛮触争雄”和“萁豆相煎”二句，指新旧文坛派别、门户之争的可怜可悲。这部《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一片讨伐斥骂之声，什么“封建的小市民文艺”、“逆流”、“反动”，甚至“文娼”之类的词句都用出来的了。这不怪编者，他只是编录资料，凡有资料价值的皆可收录。但由此可见新文学派排拒“鸳鸯蝴

蝶派”态度的偏激，由来已久，于今为烈，澹安先生当然是不会以为然的。虽然如此，我们在谈到这方面问题时，他还是显得心平气和，并未义愤填膺。我曾向他表示过这样的看法，“鸳鸯蝴蝶派”作家虽被蒙上恶谥，但他们的人品，特别是苏州地区的作家群（这也是“鸳鸯蝴蝶派”的中坚和主要构成成员），他们在抗日战争和敌伪统治时期的表现却是大义凛然、坚持民族气节的，我并一一列举了这些值得尊敬的老先生们的名字，他们都是苏州人。我还说，这比起那些过去以骂“鸳鸯蝴蝶派”为时髦，后来却颯颜事敌不以为耻的文人来，真是鲜明的对照。我想，将来《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这部书发行新版时，编者或许会从更全面的观点来注意这方面的资料。

在记忆中，有一次难忘的聚会，那还是在“反右”前，我还可以较为无顾忌地与人来往的时候，澹安先生约了严独鹤、平襟亚先生和我，在山东路的老正兴饭店小酌。据说这是正宗的老正兴，以本帮菜闻名，由澹安先生点菜，我所记得的只是一只“生煨草头”，那也是“正宗”的烧法。我看过独鹤先生的长篇小说《人海梦》。襟亚先生用“襟霞阁主人”名义刊印过不少明人小品集（惜校刻不精），也是我所熟知的。他们三位都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阅历既多，这时已进入绚烂归于平淡的境界。席间大家喝了好几斤绍兴花雕，兴致很高，脸红红的，话也多起来。其中独鹤先生颇善谐谑，引得笑声不断。那一次三位老先生，倒真是开怀畅谈畅饮，想来这样的小聚机会，在他们来说也并不是很多的。我同严、平二位，仅此一面，以后风云日紧，彼此就各不相顾了。

我在澹安先生处遇见来访的老友，只有郑逸梅先生。他与我互通姓名后谈了些什么，都已忘却。后来忽然在一九八二年

出版的郑先生所著《艺林散叶》第 4235 条看到“钱伯诚为颜文梁撰年谱”的纪事，真是感到惊异，同时也佩服郑先生的记述之勤，巨细无遗。但他把我的名字中的“城”误为“诚”了，这是朋友中常常弄错的。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朱熹排列三者的次序，以忠信为为传习之本，可见忠信是做人的根本规矩。回想澹安先生往事，最使我怀念的，也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力行的做人的规矩。我希望澹安先生的著作，应该整理成集：他的生平事迹，也应编写年谱，这是近现代珍贵的文学史料。

[附] 陆澹安先生诗抄

重九登大可寓楼作清谈归途口占（一九六九）

登山无计且登楼，聊把清谈作壮游。
小劫幸逃容啸傲，余年待尽任沉浮。
读书举喜研新义，阅世相期豁远眸。
浪掷精神休自笑，焉知敝帚不千秋。

无 题（一九七〇）

甘心作老九，自矢不觉臭。
愿他香孩儿，永永获天佑。

无 题（一九七一）

春江水白水纹青，徒倚桥头感慨深。
四野犬声人迹静，不堪惆怅到天明。

忆陆澹安先生

几十年来，相交师友每有著作出版，承他们不弃，都亲笔署名，惠赠留念。这在寒斋藏书中，都被我视作珍本。其中有一本书，则承蒙作者两次签名：第一次签名的书前衬页，文革初起时，为免作者受累被我撕掉；其后文革凶焰稍有消弱时，我又请作者在扉页上补上了他的签署。这一本书，就是陆澹安先生的《小说词语汇释》。他在第二次补签时，写了一段文字：“沧桑饱经，存此（指本书）不易，即此亦足证我二人之交谊也。”这一段话，表明了我们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

澹安先生长我近三十岁，是我的前辈，但也是忘年之交，并且可以称得上是知交。所谓知交，我看至少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条，彼此有相投的意趣，谈得来，合得拢；另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彼此相信对方不会出卖自己。这后一条，平日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政治风云突变或利害冲突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句话流传了几千年，但这个“信”字，能做到的并不多，而澹安先生是做到了的。

我与澹安先生相识在五十年代初，但他的名字，我早知道，也读过他的小说。他是所谓的“鸳鸯蝴蝶派”的主要作家之一，我少年时就看他主编的《红玫瑰》杂志和《侦探世界》杂志。他是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和推理小说的最早倡导者，自己也创作侦探小说，创造了一个名叫李飞的福尔摩斯式人物，还主编专门的侦探杂志《侦探世界》，这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本专业性侦探杂志。“鸳鸯蝴蝶派”无疑是带贬义的名称，近年对它评价虽有所提高，但我觉得对这派作家的人品还重视不足。这派作家

虽然写的是“软性作品”，人品却极高尚，大都洁身自好、淡泊名利，从不作阿附权势、卖身求荣之事。抗战八年，上海沦为孤岛，这派作家坚持民族气节没有一个“落水”事敌的，也没有接受伪职的。澹安先生即是坚守这种大节的一人。我认为评论家在评论“鸳鸯蝴蝶派”的功过时，不应忽略这一点。

澹安先生八十岁后自号“幸翁”。他在“文革”中曾有诗道：“小劫幸逃容啸傲，余年待尽任沉浮。”他曾对我说，他的处世之道是“不争”：不与世争，不与人争。所以他决不参加党派，也不参加公职。虽然曾有不少朋友一再劝他出山，他则不为所动，故而幸得逃过一些劫难，所以以“幸翁”自慰了。

澹安先生的著作，除《小说词语汇释》外，还有《戏曲词语汇释》，也是传世之作，那是他已归道山后方出版的。寒斋亦有藏本，却无从请他签署了，为之抚卷怅然！

一九九五年